



共产主义实践成就



中国正兴堂国际文化出版集团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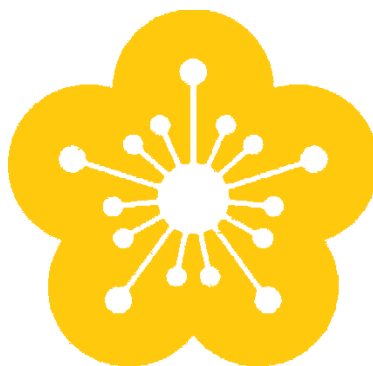
第一章：共产党皆变成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7
第二章：朝鲜的罪恶与恐怖和秘密.....	19
一、党内争权夺利大清洗.....	20
二、司法黑暗与恐怖.....	20
三、政治正确.....	21
四、极权统治的恶果.....	22
附一：抗美援朝韩战真相.....	23
1.谁挑起韩战？.....	23
2.毛泽东支持韩战的动机与目的.....	24
3.没有赢家——韩战极悲惨的结局.....	26
附件二：金正日真面目.....	27
1.朝鲜人民灾难的源头.....	27
2.发动朝鲜战争.....	28
3.花花公子政治流氓疯子.....	29
4.朝鲜大古拉格死亡集中营.....	31
5.共产党特权阶级和人为谋杀性大饥荒.....	32
第三章：古巴共产极权政权的罪恶.....	35
一、夺权与清洗迫害.....	35
二、司法黑暗与酷刑.....	36
三、秘密警察特务统治.....	37
四、极权统治.....	38
第四章：越南共产党暴政罪恶昭彰.....	38
一、秘密警察统治，党内争权大清洗.....	38
二、强制劳教死亡集中营.....	39
三、煽动阶级仇恨，暴力抢劫地主.....	40
四、杀人如麻酷刑迫害知识分子和宗教信徒.....	40
五、人为制造大饥荒大批饿死人.....	40
第五章：中欧和东南欧共产党暴政的深重罪孽.....	41
一、大清洗政治异己.....	43
二、毁灭公民社会.....	45
三、迫害宗教信仰组织.....	45
四、大建集中营.....	47
五、共产党人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	48
六、从后恐怖到后共产主义.....	50
七、如何处理过去与展望未来？.....	53
第六章：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55
第七章：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55
第八章：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共产党政权的血腥暴力.....	58
一、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暴政）的罪孽.....	58
二、莫桑比克共产党政权的罪恶.....	60
第九章：尼加拉瓜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61

第十章：秘鲁共产党的血腥残暴.....	64
第十一章：阿富汗共产党暴政罪大恶极.....	67
第十二章：虐杀成性的柬埔寨共产党暴政.....	72
一、历史概况.....	73
二、大建集中营，反复清洗党内外异己.....	74
三、欺骗成性，杀人如麻.....	75
四、滥杀无辜，暗杀恐怖.....	75
五、群体灭绝.....	76
六、屠杀迫害宗教信徒.....	76
七、变态残忍致极的谋杀，共产党极权恐怖统治.....	77
八、司法暗无天日，共产党无法无天。.....	78
九、共产主义乌托邦：强制农业集体化.....	79
十、共产党政权特有的制度性饥荒和瘟疫.....	80
十一、摧毁一切传统价值.....	81
十二、愚昧至极的疯狂.....	81
十三、红色高棉病态疯狂的原因.....	84
十四、柬埔寨共产党暴政的恶果.....	86
第十三章：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86
一、波兰简史.....	88
二、苏联共产党对波兰共产党人的迫害.....	88
三、1939-1941年期间的强制驱逐.....	89
四、群体恐怖（1944-1947）.....	90
五、秘密警察特务统治.....	90
六、司法黑暗，酷刑普遍.....	91
七、国家恐怖主义.....	91
八、特务线人遍布全社会.....	92
九、公然抢劫富农财产.....	92
十、迫害天主教会.....	92
十一、政治迫害渐渐减弱.....	92
十二、选择性迫害时期（1956-1981）.....	93
十三、瓦勒萨的波兰团结工会.....	94
十四、国家的战争：全面镇压.....	95
十五、从停火到停止抵抗（1986年-1989年）.....	96
十六、波兰政治民主大革命.....	96
第十四章：苏联共产党暴政的滔天罪行.....	97
一、秘密警察特务恐怖统治.....	98
二、野蛮暴政.....	99
三、红色恐怖.....	100
四、肮脏的战争.....	101
1.镇压革命同盟无政府主义者.....	101
2.镇压共产党内异己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	101
3.镇压罢工工人.....	101
4.镇压农民起义.....	103
五、共产党体制性大饥荒.....	106

六、宗教迫害.....	108
七、泡制恶法.....	109
八、消灭富农.....	109
九、强制集体化.....	109
十、迫害社会异己.....	110
十一、大恐怖（1936-1938）.....	111
十二、滥用司法草菅人命.....	112
十三、清洗红军.....	113
十四、镇压布拉格之春.....	114
十五、死亡集中营.....	114
十六、最后的阴谋.....	115
十七、解冻与摆脱斯大林恐怖主义.....	115
十八、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	115
十九、哥尔巴乔夫与苏联政治民主革命.....	116
第十五章：中国共产党极权暴政的滔天罪孽.....	118
一、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118
1.中国古人与古代西方一样也充满着非常野蛮的杀戮。.....	119
2.中国当权者的酷刑杀人手段之狠毒残忍堪称世界第一.....	120
3.中共极权暴政的野蛮残暴杀人罪孽.....	121
二、中共夺取政权以前的杀人罪孽.....	121
1.1927-28 年广东海陆丰农会屠杀地主.....	121
2.1928-29 年井冈山时期共匪杀人十万计。.....	121
3.1931 年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屠杀罪行.....	122
4.1930-31 年，清洗 AB 团.....	122
5.中共为党内争权历来不择手段自相残杀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124
6.1935-36 年毛在陕北根据地杀刘志丹红军.....	124
7.1936 年毛泽东借刀杀张国涛的红四军至少六万人.....	125
8.1940-43 年在抗日战争岁月中杀抗日国军将士数万人.....	125
9.1940-41 年，借刀杀害项英和新四军数千人。.....	125
10.1942-45 年延安整风运动.....	126
11.1945-49 年发动四年内战杀害国军和平民 2000 万人.....	126
12.1948 年围困长春之战饿死长春市民 16 万.....	126
三、中共建政后的滥杀罪孽.....	127
1.1949-51 年土改运动.....	127
2.1949-52 年“镇反运动”。.....	128
3.1951-52 年“三反”、“五反”运动.....	129
4.1951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29
5.1950 年开始迫害各种宗教。.....	129
6.1954 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	130
7.1955 年肃反运动.....	130
8.1955 年反胡风运动.....	130
9.1957 年反右运动。.....	130
10.1958 年大跃进运动。.....	133
11.1959 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运动。.....	133

12.1958 年-1961 年中共故意谋杀性质的大饥荒。	134
13.中共的劳改和劳教。	134
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	135
(1)文革实质是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毁灭性破坏	135
(2)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	135
(3)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136
(5) 1966 年北京市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	136
(6) 1967 年青海省西宁解放军枪杀 170 名青年事件。	137
(7)1967 年湖南省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	137
(8)1968 年湖南省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137
(9)1968 年江西省瑞金县屠杀黑五类。	138
(10)1968 年江西省兴国县屠宰黑五类。	138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八个县大规模吃人事件。	138
(12)1970 “一打三反” 运动。	138
(13)文革武斗致死无辜平民近 50 万人：	140
(14)1971 年批林批孔运动。	140
(15)1975 年炮轰云南沙甸回民村事件。	140
(16)1975 年驻马店溃坝事故	141
(17)1976 年北京四五运动	141
(18)1976 年唐山大地震	142
15.1978-1979 北京西单民主墙民主运动。	142
16.1983 年“严打运动”。	143
17.1989 年六四天安门屠城。	143
18.残酷镇压一切组党运动。	144
19.1980 年迄今镇压家庭教会。	145
20.1994 年新疆克拉玛依市的恶性火灾.....	146
21.迫害西藏新疆少数民族。	146
第十七章：人为制造谋杀性大饥荒虐杀农民 5000 万.....	147
一、1948 年为换取苏联援助不惜饿死延安和东北地区农民。	147
二、1955 年抢粮逼迫 20 万农民自杀。	148
三、1958 年-1961 年四年大饥荒饿死 4000 万农民。	148
1.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与农民的反抗.....	148
2.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149
3.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	149
4.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	150
5.大饥荒期间仍然出口粮食 1000 万吨。	151
6.大饥荒期间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	151
7.大饥荒期间用粮食制造航天用酒精，不停止研制原子弹.....	152
8.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	152
第十八章：论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归宿.....	153
一、全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实质上均极度无知而狂妄.....	153
二、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皆是罪恶魔鬼的化身.....	154
三、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实质是依错误理论实施犯罪.....	155
四、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例是其自身政治改良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	156

五、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全世界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	156
六、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相似性.....	159



《共产主义黑皮书》

Stephane Courtois 主编 郭国汀译著

该书由法国拉封（Laffont）出版社于1997年11月俄国革命80周年之际推出，是一部有关共产主义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由全球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合编的共产主义罪恶的总结。共产主义运动造成至少一亿五千万人死于共产党暴政，其中亚洲共产党政权虐杀超过一亿人。本书依据原始档案材料，全面揭露了被故意隐瞒的共产党罪恶史。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是极权专制暴政，皆犯下了群体屠杀滥杀党内政敌和同盟及人民；实行秘密警察特务恐怖统治；抢劫公私财产；强制农业集体化制造谋杀性大饥荒；强制劳改集中营奴役；迫害宗教信徒；毁灭公民社会；封锁新闻；强制洗脑；践踏法律酷刑及强制失踪等十二类罪恶。该书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政权实质上皆是无法无天的极权专制暴政。

该书长达846页，有11位作者参加写作。若按地域区分，此书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一个反人民的国家政权〉，记述从苏联建国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为止的苏联专制镇压史，由苏联史专家、当代研究所研究员威尔斯（Nicolas Werth）执笔，是全书份量最重也较受评论推崇的一部分；第二部分题为〈世界革命、内战与恐怖〉，论述共产国际的有关恐怖暴力活动；第三部分讨论东欧，题为〈另外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受害者〉；第四部分为〈亚洲共产主义〉；第五部分：在「再教育」与屠杀之间，其中有近百页的篇幅论及中国。

第一章：共产党皆变成杀人抢劫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提要：我在1984年曾指出：“如果西方研究马克思的水准是研究生的话，苏联仅有高中水平，而中国则只有小学水准”。

此种情形迄今并无实质改变。本文令人信服地深刻揭示了当权共产党无一例外皆演变成杀人犯罪集团的历史与理论根源，作者是法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除了精通马列原著外，对其他著名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也相当精通，文中大量引证原著论证列宁及其他苏共党魁的蛮不讲理，胡说八道；同时列举了“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充满智慧理性与远见卓识的评论，值得每位关心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国人一阅。

作者指出：列宁的恐怖是针对所有的政党和各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士兵，警察，宪政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及整个平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待遇尤其坏。列宁创新之处在于不仅那些不与其同路者是反对我，而反对我的必须死！此外，列宁扩展这一原则到政治王国以外的全社会广泛的领域。恐怖涉及双重变异：对手被首先标签为敌人，然后宣布其为罪犯，导致将他从社会上排除出去，排除社会很快又变成消灭。敌友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能满足解决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寻找经净化的不再含敌意的重新组合的人类，通过马克思主义摩西式的计划，将无产阶级重新组合成新人类，并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社会从政治斗争逻辑进展到排它

阶段，然后进入清除意识形态阶段，进而至消灭不纯成员阶段，最后便是对人类的犯罪。

列宁与所有的共产党人一样仇恨知识分子：“那些二流知识分子及其资产阶级走狗，自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大脑。他们不是国家的大脑，而是狗屎！”列宁说“在现实中，国家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他辩称：专政的本质乃是：“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1]列宁接着说“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形式，已经发展和扩大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确切地说，它是最广大的人民，被压迫的劳动的人民的民主”。

托洛斯基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中称：“革命暴力业已成为必要，是因为历史的即时要求，无法找到一条通过议会民主机构的途径”。他接着举证说：“无产者是历史上升阶级。。今日资产阶级是落没的阶级。在生产中它已不再起着核心实质的作用，且用其帝国主义的掠夺方法，正在毁灭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的人类文化。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执着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将整个社会拖回至深渊的威胁力量。我们被迫粉碎这个阶级并将他们抛弃。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用于对付具有巨大破坏性，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它能且须解释在内战中我们击溃白军，以使它们不能毁灭工人。因此，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毁灭人的生命，而在于保护。。必须使敌人变得无害，在战时这意味着必须消灭之。对于战争中的革命问题，取决于摧毁敌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并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谁将统治国家的问题，亦即，有关资产阶级的生与死，将取决于双方，而不依赖于宪法条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

内查也夫定义革命者“是一个已经丢失的人。他没有特殊的利益，没有私人的业务，没有个人的牵挂，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个单一的思想，一个独特的热情——革命。在深层的存在，而不仅是言语，而且他的行动，他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病态的社会应分成几类：第一类是那些必须立即杀掉的。。第二类是那些允许继续活下去，以便其恶行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义”。

巴古宁写道：“在革命兄弟之间，我们行动的基础应当是真实，诚信和信任，撒谎，欺诈，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于反对我们的敌人。。而你陷入了马基佛利的诡计，你用此种方法来营建组织。最终你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己的朋友。”

考茨基认为：“两种社会主义运动。。是两种基础不同的方法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冲突。两种运动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但是其中之一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极可能导致毁灭；通过充分的讨论争辩，我们坚定地选择民主。独裁专制并不要求反驳对方相反的观点，而是强制压制令对方闭嘴。因此，民主与专制在讨论争辩的开初更不可调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压制的。”“少数人的专政，经常发现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赖武力取代多数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诉求暴力代替拒绝他们的投票；内战成为调整政治和社会争议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占上风之所，少数人的专政经常会受到武装攻击或持续的游击战争。。独裁专制者就会陷入内战，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续危险之中。。在内战中，各方均为生存而战，失败者面临被灭绝的威胁。这一事实的意识正是为何内战会如此残

酷的原因”。“确切地讲，我们的目标不是此种社会主义，废除每一种剥削和压迫，直接反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某种性别，某个种族。。如果我们证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唯有基于毁灭私有财产基础上才能取得，我们将抛弃社会主义而无损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用的词汇都是极富弹性的，使当权者得随心所欲随时将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排除出人类之外加以消灭”斯登伯格评论布党使用的“国家恐怖的方法体系”时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问题：“推翻旧世界，代之以一个相同的旧的恶，留在其机体内的新生命，一个被相同的旧的原则污染了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被迫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作出决择：使用旧模式的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暴力还是选择革命暴力。。旧模式的暴力仅是为了保护奴隶制，而新暴力则是通向解放的痛苦历程。。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决择：我们应当控制暴力以便确保终止暴力。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这是伤害革命的道德空缺。这是中心难题，该冲突不可避免成为更多的冲突和苦难之源”。他接着说：“象恐怖，暴力，在影响胜利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之前，将时常首先腐蚀征服者的灵魂。”

史利亚尼科夫当场质疑列宁：“你昨天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按马克思意义论，在俄国并不存在。请允许我祝贺您，代表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管理和行使独裁专制权力”！

托德洛夫论证：“敌人是为恐怖寻找的最大借口，极权国家需要敌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敌人，它们就制造敌人。一旦被标签为敌人，他们便受到无情的对待。。成为敌人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烙印。。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产主义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机时刻屠杀）资产阶级，属于该阶级足够；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他提及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是科学主义而非人道主义帮助建立起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通过所谓科学的必然性（生物或历史的）赋予行为的正当性：一个人必须是科学主义的信徒，即使它是‘疯狂’或‘狂暴’的科学主义，相信完美的社会改造，因此相信通过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种理想进行社会改造的可能性。”

布洛斯塞特对兽化人类的过程下如下结论：“极权主义的诗人和屠夫们，首先是从他们使用的语言暴露自己。莫斯科刽子手们的‘清洗’与纳粹谋杀者们所使用的‘解决’密切相关，是苏联精神与文化灾难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种语言微观现象。

人类生命的价值崩溃，分类的思想（人民的敌人，叛徒，不可信赖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纳粹屠夫的理论与实践，将他人兽化，净化和防止传染的念头并无法与世隔绝，与种族观念密切相关。它用超人和劣等种族来将社会人种等级化。

但是，1937年苏联有关种族的理论，极权主义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将其他人完全兽化，因而在此种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绝对化，从而付诸实际便成为可能。”

科拉斯基认为：“那种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已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因此世界将按照某种意志变得完全，完美，最终彻底解放的观念，乃是一种人类精神最疯狂的变态。。当然此种变态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但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思想，轻视所有的市俗价值，让位于超自然空间的力量，要远比那种教导我们能够保证救赎，从地狱的深渊跃向辉煌的天堂的说教，远不那么荒唐。”

伦那在其《哲学对话》中指出：“在无神论社会确保自己拥有绝对权力者，不是对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胁，而是创建了一个真实的地狱—集中营，以惩罚反抗者，并恐吓吓唬所有其他人；丧失良知，完全忠于政权，完全抛弃道德的秘密警

察，变成随时准备实施各种残暴行为的服从机器。”

马列主义纯属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共产主义者有如下共同特征：共产党政权全部蛮横无理，唯我独尊，妄自尊大，根本不敢也无法进行公开充分的讨论争辩，而只会滥用暴力恐怖欺骗谎言试图强迫他人接受其观念；共产党政权全部是依赖秘密警察对全社会进行特务极权统治；共产党政权全部从不敢进行公平竞争，从不遵守公平游戏规则，皆不择手段比赛厚黑流氓术；共产党政权皆信奉暴力论，因而滥杀无辜几成必然；当权共产党人皆极度无知且极度狂妄，他们均仇恨真正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共产党政权全部疯狂迫害工人农民及平民大众；共产党暴政皆迫害宗教教会及其信徒；共产党国体制皆强行国有化和集体化，导致经济落后，制造大饥荒；共产暴政皆对其国民进行过至少一次公然大抢劫，即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共产党国体制皆对各国传统文化文明进行过毁灭性破坏；共产党国家皆造成国民精神道德沦丧，官员贪污腐化堕落，全社会各行各业欺诈虚伪盛行。

简言之：彻底终结共产党暴政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2010年3月14日

共产党皆变成杀人犯罪团伙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为什么现代共产主义运动，自1917年始，几乎立即成为一个体制性血腥残暴专制独裁的犯罪体制？个体暗杀和群体屠杀是所有共产党政权犯罪的真实画面。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所有现代共产主义的摇篮。整个19世纪，基于法国革命的经验，主导了暴力革命的理论。

1793-1794年法国革命的极端暴力表现为三个显著特点：最残暴的是“九月屠杀”，在巴黎1000余人被暴民杀死，既未受政府干预，也没有任何政党组织指挥。最著名的是由人民委员会监督由革命法庭审判，在巴黎将2625人送上断头台，在其他各省16600人被砍头。长期被掩盖的是由共和国旨在镇压起义的“最可恶的纵队”实施的恐怖，共杀害了数万名无的不知名的人。但是尽管有几个月血腥恐怖，其仅是法国革命悠久历史中的一段插曲，最终的结果创建了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选举产生的议会，真实的政治辩论。当罗伯斯比尔被罢免后，革命恐怖便终止了。

在许多方面，法国革命的恐怖预示了苏联共产党的许多实际恐怖。罗伯斯比尔奠定了列宁恐怖的第一块基石。法国大革命会议宣言称：“惩罚祖国的敌人，我们必须分清谁是敌人：但我们不是要惩罚之，而是要消灭之”。

马克思强调暴力，并为“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辩护，但他是从一般视角而非将暴力作为某种针对特定人民的制度性的计划。马克思有关恐怖作为暴力解决社会冲突手段的论述含糊不清；同时，马克思严厉批评巴黎公社导致2万余名工人死亡的灾难性的经验。在第一国际早期的争论中，马克思反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古宁（Mikhail Bakunin）。

议会民主的迅速发展，代表了社会主义者策略的一种新的和基础的要素；1910年大选，国际工人党法国支部获得74个席位；另有30个独立社会主义候选人入选。德国社会主义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100万成员，110位众议员，220省议会代表，12000市政议员，89名其他代表。英国劳工运动也组织良好。社会

民主党在斯康德纳维亚北欧国家迅速发展。

19 世纪末，一位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与一位伟大的马克思著作翻译家考茨基（Karl Kautsky）皆指出资本主义并未出现马克思预言的衰退迹象，因此应当采用渐进与和平的方式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工人阶级应当学会公民与自由的进程；1872 年马克思曾表示期望在美国、英国和荷兰可以采取和平方式革命。对马克思这一观点，恩格斯于 1895 年在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第二版前言中作了进一步阐扬。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 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和辛迪加主义者）和极左派仍强烈反对所有议会民主，而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夺权。但第二国际在一战前夕，采纳了一系列和平解决方案。

极左的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虽源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传统，但亦有沙俄土地运动革命之根。整个 19 世纪该革命运动与暴力活动密切相关。内查也夫（Sergei Nechaev）是其中最崇尚暴力者；首任契卡头子多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即以他为样板。内查也夫 1869 年在《Revolutionary Catechism》定义革命者“是一个已经丢失的人。他没有特殊的利益，没有私人的业务，没有个人的牵挂，没有财产，甚至没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个单一的思想，一个独特的热情——革命。在深层的存在，而不仅是言语，而且他的行动，他已经与社会，文明世界，法律与习惯，社会礼仪与道德规范中断所有的联系。革命者是一个死敌，他如此活着以便能够确保摧毁社会。”“对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称做革命者”。“病态的社会应分成几类：第一类是那些必须立即杀掉的。。第二类是那些允许继续活下去，以便其恶行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义”。[2]

[1] V. 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e Kautsk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2) pp. 32-3320.

[2] Michael Confino *Violence dans la violence* le debat Bakounine Netchaev (Paris Maspéro 1973) pp. 101102.

1887 年 3 月 1 日暗杀亚历山大沙皇三世失败，列宁的长兄亚历山大与其他四名同谋被绞死，种下了列宁仇恨沙皇体制的种子，1918 年未经苏共政治局知晓，列宁下令屠杀了沙皇一家人。按马利亚（Martin Malia）的说法，这一暴行是法国革命的疯狂再现。首开政治恐怖主义（与孤立的暗杀行动比较），作为现代世界体制性计谋。因此，来自下层的群众起义的大众策略，与来自上层的精英恐怖相结合，在俄国对源自 1789-1871 年的西方革命传统的政治暴力赋予合法化。这种在社会边沿的政治暴力，受到几个世纪以来在俄国社会常见的暴力特征火上加油。俄国社会悠久的谋杀传统，无疑创造了一种集体意识，使得一个和平的政治世界希望渺茫。

伊凡四世沙皇，年仅 13 岁时，于 1543 年将他的总理亲王（Chuisik）杀死喂狗。1560 年他的妻子之死，使他变成谋杀者般的狂怒；导致他怀疑每一个人均是潜在的背叛者，并在大范围内清除真实的和想象的敌人；他创建了一个叫做（Oprichnina）的权力无边的皇家卫队，在大众中制造恐怖；1572 年他又杀掉了该卫队的成员，然后杀了他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彼得大帝对俄国的敌人，也心狠手辣，对贵族和人民也几乎没有更多的仁慈，他亦亲自杀了自己的儿子。

从伊凡到彼得，奴役人民和精英的绝对权力，导致专制和恐怖的国家，有着牢固的传统。沙皇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力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农民暴动，群

体屠杀贵族，本身亦野蛮残暴。给俄国人的意识烙下了深印。1667-1670 年斯登卡（Stenka Razin）暴动和 1773-1775 年普加乔夫（Pugachev）暴动迅速漫延，严重威胁凯斯琳娜大帝的政权；在伏尔加河流域留下了长期血腥的伤痕。普加乔夫被捕后，被以极残暴的方式处死：肢解，朵成碎片喂狗。

高尔基（Maksim Gorky）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残暴方法，1922 年他写道：“俄国人的残忍似乎没有任何进化：在受害人嘴里塞入炸药，然后点燃引信；还有在肛门塞入炸药引爆的。在妇女的乳房处挖孔，用绳子穿越伤口并牵引。”1918 年和 1919 年，在 Don 和乌拉尔（Ural）地区用同样的酷刑，在男人屁股下放炸弹然后引爆。这种残忍无法用精神病或变态形容，也非个别现象，我是以他们将人类受难作为群体娱乐来考虑的。”

1861 年亚历山大三世沙皇废除了农奴制，建立了地方权力中心；1864 年他批准司法独立，作为实施法治的第一步。大学，艺术，媒体均得以繁荣。公民浪潮在全社会涌动，暴力在全国消退。即使 1905 年失败的革命，结果仍激发了社会民主热。可惜这一进化进程被 1914 年 8 月 1 日暴发的欧洲历史上最坏的群体暴力所打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群体暴力，超过历史之最。万士兵战死，平民亦伤亡惨重，暴力达到史无前例。

考茨基是德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和主要领导人，于 1920 年指出：习惯于战争的残酷，退伍士兵回家后，大多心态与情感大变，即便在和平时期处理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及主张利益时动辄诉诸暴力和血腥。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没有一人曾参战：（列宁 Lenin 托洛斯基 Trotsky 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斯大林 Stalin 卡门内夫 Kamenev）绝大多数长于行政官僚机构或群众大会上演说，但均没有军事经验，从未真正体验战争灭亡的残酷。直到他们夺取政权，他们仅知道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词汇；仅有死亡，群体屠杀和人类灾难的抽象概念。这种个人对战争恐怖的无知，或许是它本身更加残忍的一个因素。

“军队在战争中是一种社会命令，个体已不复存在，其非人道性创造了一种几乎不可能打破的惯性”。“战争是从正常的公民生活走得最远的政治国家”。战争赋予了暴力某种新的合理性，并降低人的生命的价值。战争削弱了先前急速发展的民主文化，并将新生活置于奴役文化之下。

20 世纪初，俄国业已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社会也变得日益自治化。一战打断了这一进程，突显了旧体制的问题；1917 年 2 月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建了议会宪政选举民主制，伴随而来的工农社会革命；世界大战与俄国传统的暴力，是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夺权的重要原因。但无法解释布党的绝对残暴。这种暴力显然是外来因素所致，较之二月革命的和平性质，这种暴力是由列宁通过布党夺权后亲自强加给俄国的。

列宁创建的专制独裁体制，迅速地赋予它血腥和恐怖的性质。官方正式启动红色恐怖始于 1919 年 9 月 2 日，但实践中早在 1917 年 11 月即已存在；例如 1918 年 1 月 4 日列宁下令强行解散民选议会；并公开枪杀任何在街上抗议的人。孟什维克领导人马托夫（Yuri Martov）立即对此种暴力进行了公开强烈的谴责。

自它夺权第一日始，苏共便开始杀人。杀在内战中俘获的俘虏；杀那些基于保证活命为前提投降的敌人；这些由布党组织和指导的谋杀，在未经任何审判暗杀了数万名无辜后，布党才开始组建最高革命法庭，来定苏维埃体制敌人的罪。

兽类喜欢人类的热血。杀人机器开始运转，最高革命法庭 5 位法官卷起袖子，象屠夫一样工作，但是以血还血，整个俄罗斯大地笼罩在一片血腥雾气之中。构

成社会主义教义基础的真正人道的最大原则被抛至九霄云外。

法国革命的暴力限于一小部分人。列宁的恐怖却是针对所有的政党和社会各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士兵，警察，宪政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主义革命党，及整个平民，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待遇尤其坏。1919年9月6日，在逮捕了几十名公共知识分子后，高尔基给列宁发了一封义愤的信：“我认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力量应当以知识发展来衡量，革命仅在有利于此种发展时才有意义。学者应当受到慎重对待和尊重。但是试图拯救我们的皮肤，我们正在毁灭我们自己的大脑，砍掉人民的脑袋！”列宁残暴的回答与高尔基简明的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人民的智慧力量与资产阶级公共知识分子的力量等同，我们就要犯错误。。工人和农民的知识力量，是在推翻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辅助者的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那些二流知识分子及其资产阶级走狗，自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大脑。他们不是国家的脑袋，而是狗屎！”[1]

这是列宁首次对知识分子表示深切的蔑视，很快他便从蔑视发展成谋杀。列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长久维持权力。

之所以不择手段，抛弃一切基本道德夺权维权，是因为这是列宁将其意见观念付诸实施，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列宁当然也用了好些马克思主义教条，诸如：阶级斗争，暴力在历史过程中的必要性，无产者作为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1902年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了新的革命党概念，按军事纪律组织严密的职业党，他采用内查也夫的模式并发展出与英国，德国各大社会主义组织不同的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成阶级斗争的内战。1920年托洛斯基指出：

“非常清楚，如果我们的问题在于废除生产方式的财产私有制，解决的唯一途径取决于通过将国家权力全部集中于无产阶级手中，设立一个特殊体制的过渡时期；独裁专制成为必要，因为这并非部分改变的问题，而是资产阶级的生存问题。

在此基础上不可能协议。唯有暴力才能成为决定因素。任何人为了达到目的，不可能拒绝手段。”[2]

1917以前，列宁已证明他的坚定信念：他是唯一真正理解了社会主义理论，也是能够解答历史的真正意义的人。而十月革命布党夺取政权，更使列宁相信他的意识形态和分析是正确无误的。1917年革命夺权后，他的政策和理论解释变成了革命圣经。意识形态转化成教条和绝对的普适真理。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的这种转变成绝对“科学”真理，便是共产主义极权的基础。

列宁宣称他自己是数量仍极弱小的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尽管每当工人起义时他都毫不留情地残酷镇压，来确认他的意识形态的正确。这种代表无产阶级的说教，是列宁主义最大的欺骗之一。1922年史利亚尼科夫（Aleksandr Shlyapnikov），一位极少数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布党领导人之一，在布党11次代表大会上直接问列宁：“伏拉基米尔伊里奇昨天确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按马克思意义论，在俄国并不存在。请允许我祝贺您，代表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阶级管理和行使独裁专制权力”！（739）这种代表虚拟无产阶级行使专政权力，在东欧所有共产党国家及第三世界，中国和古巴，是共同现象。

玩弄文字游戏是列宁主义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将具体的人抽象化，意识形态化，是诞生恐怖的另一因素。他们杀的不是人，而是资产阶级，资本家，人民的敌人，尼古拉二世沙皇全家是封建主义的代表，他们是吸血鬼、蝗虫、蚂蝗。

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布党建立起一个称做无产阶级专政的绝对和任意荒唐

至极的权力体系。1918年夏，在布党仅撑权6个月，群体屠杀刚开始不久，考茨基便在他的《论无产阶级专政》书中预见：

“两种社会主义运动。。是两种基础不同的方法的冲突：民主和专制独裁的冲突。两种运动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标：通过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解放无产阶级，但是其中之一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极可能导致毁灭；通过充分的讨论争辩，我们坚定地选择民主。独裁专制并不要求反驳对方相反的观点，而是强制压制令对方闭嘴。因此，民主与专制在讨论争辩的开初更不可调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压制的。” [3]

“少数人的专政，经常发现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是其最强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赖武力取代多数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诉求暴力代替拒绝他们的投票；内战成为调整政治和社会争议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占上风之所，少数人的专政经常会受到武装攻击或持续的游击战争。。独裁专制者就会陷入内战，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续危险之中。。在内战中，各方均为生存而战，失败者面临被灭绝的威胁。这一事实的意识正是为何内战会如此残酷的原因”。[4]

列宁愤怒地以《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斯基》作为回应，拒绝讨论争辩。他引恩格斯的话说：“在现实中，国家仅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因此他辩称：专政的本质乃是：“专政是直接基于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统治。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通过使用暴力反对资产阶级赢得统治权并维护统治，该统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 [5]列宁接着说“苏维埃政府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一种形式，已经发展和扩大了史无前例的民主，确切地说，它是最广大的人民，被压迫的劳动的人民的民主”。[6]正是在“无产阶级民主”的美妙包装下，苏联几十年来干下了无数恐怖罪恶的勾当。

托洛斯基提出“永久革命”论（permanent revolution）他相信世界已进入“政治斗争迅速转变成内战”的时代，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将军和海军上将为首脑的资产阶级民主之间的内战。然而，他的预测错误明显；一方面代议制民主日益成为全球现象，1991年甚至俄国亦采用之；另一方面，托洛斯基与列宁一样，有基于俄国经验（在任何情况下，他时常过渡夸张）归纳出一般结论的强烈倾向。布党相信，一旦内战在俄国展开，它将扩展到欧洲和全世界。托洛斯基下结论道：

“它能且须解释在内战中我们击溃白军，以使他们不能毁灭工人。因此，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毁灭人的生命，而在于保护。。。

必须使敌人变得无害，在战时这意味着必须消灭之。对于战争中的革命问题，取决于摧毁敌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并接受征服者的条件。。谁将统治国家的问题，亦即，有关资产阶级的生与死，将取决于双方，而不依赖于宪法条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托氏的用语很多与鲁登道夫（Ludendorff）描述全面战争的表述相同。这表明布党其实是高度军事化时代的产物。

布党不是唯一起内战者，但它是唯一公开从理论上证内战必要性的。内战成为他们政治斗争的永久形式。实质上是布党与大多数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他们1918年夏以后，开始起义反抗布党暴政）之间的战争，不是传统的两个政治集团之间，而是政府与大多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斯大林时期则是党国针对整个社会的战争。这只有在体系是基于大规模的恐怖，全面控制社会活动的极权体制下才有可能。

近年来基于新开放的档案研究表明：1918-1921年的“肮脏战争”（Nicolas Werth 语）布党源于列宁主义夸张的理想主义，愤世嫉俗主义和反人道的残忍，

期望内战将扩展到全世界，持续到社会主义征服整个星球。该内战植入残忍作为人民相互之间解决争端的通常手段。它打破了传统限制界线，代之以绝对和根本的暴力。744 斯登伯格 (Isaac Steinberg)，是个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人，1917 年 12 月至 1918 年 5 月任苏联司法人民委员，于 1923 年评论布党使用的“国家恐怖的方法体系”时指出：限制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问题：

“推翻旧世界，代之以一个相同的旧的恶，留在其机体内的新生命，一个被相同的旧的原则污染了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被迫在决定性的斗争中，作出决择：使用旧模式的沙皇和资产阶级的暴力还是选择革命暴力…旧模式的暴力仅是为了保护奴隶制，而新暴力则是通向解放的痛苦历程…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决择：我们应当控制暴力以便确保终止暴力。

因为没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这是伤害革命的道德空缺。这是中心难题，该冲突不可避免成为更多的冲突和苦难之源”。

他接着说：“象恐怖，暴力，在影响胜利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之前，将时常首先腐蚀征服者的灵魂。” [7]

高尔基 1930 年 11 月 2 日至罗曼罗兰的信中写道：“苏联以阶级战争对付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试图回到资产阶级政体。

内战仅仅是杀虐。” [8]

苏共以全面恐怖为特征，高峰是 1937-1938 年的大清洗。苏共不仅向全社会开战，而且向党国体制内部宣战。希特勒极少亲自作为迫害者的角色，而是委派其亲信为之。斯大林则赤膊上阵，往往亲自成为迫害主角。他亲自签署了数千人的死刑名单，并强迫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这么干。14 个月内 180 万人被捕，分别关入 42 个巨大的集中营；其中 69 万人被杀害。阶级战争时常取代阶级斗争。政敌不是一个反对派的名字，甚至一个敌对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在列宁统治下，主要敌人时常是非党人士；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本身成为潜在敌人。彼得堡苏共党委书记基洛夫 (Kirov) 被暗杀事件，使斯大林在党内大开杀戒有了借口。他日益采纳内查也夫的主张。迫害的执行人最终也均成受害者。巴古宁 (Bakunin) 指出：

“在革命兄弟之间，我们行动的基础应当是真实，诚信和信任，撒谎，欺诈，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于反对我们的敌人。。。而你陷入了马基佛利的诡计，你用此种方法来营建组织。最终你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己的朋友。” [9]

[1] Quoted in Arkadi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i*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111.

[2] Leon Trotsky *The Defense of Terrorism* trans H. N. Brailsfor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1) pp. 21-22.

[3]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 J. Stenn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1-3.

[4]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 J. Stenn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51-53.

[5] V. 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e Kautsk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2) pp. 32-3320.

[6] V. 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e Kautsk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2) p. 37.

[7] Isaac Steinberg *Aspect Ethique de la Revolution* (Berlin: Skify 1923) quoted in Bayna la terre p. 370.

[8] Arkadi Vaksberg *Le mystere Gorki* (Paris: Albin Michel 1997) 264.

[9] Quoted in Michael Confino *Violence dans la Violence le debat Bakounine*

布哈林在他的党内老同志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和卡门内夫 (Kamenev) 被处死后公开说：“我是如此幸福，他们已被象狗一样枪决了” [1]。不到两年后，他自己也象狗一样被杀。这种斯大林式的党内清除异己的残暴残杀现象，在整个共产党世界非常普遍。

公开作秀审判是列宁于 1922 年首先引入用于审判社会主义革命党人。斯大林在消灭其政敌前时常举行公开作秀审判。

斯大林另用神秘于仇恨教育：逮捕，审判和受害者的命运完全秘密化。秘密与恐怖密切相关，苏共将恐怖带入全社会。

布党不择手段消灭竞争对手，敌人已不再是旧体制的贵族，资产阶级，军官，而是任何反对布党政策的人。在布党眼里，那些成为布党绝对权力的障碍的任何人均是敌人，而不论其社会类别。这种现象甚至比恐怖还早出现。

敌人一词的极大弹性与随政治需要即时变化无穷，成为共产党人的思想与实践的一大关键要素。正如托德洛夫 (Todorov) 指出：

“敌人是为恐怖寻找的最大借口，极权国家需要敌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敌人，它们就制造敌人。一旦被标签为敌人，他们便受到无情的对待…成为敌人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烙印…犹太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产主义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机时刻屠杀）资产阶级，属于该阶级足够；根本无需做任何事情”。[2]

共产党为何要消灭敌人？传统的迫害作用，用福科 (Foucault) 的术语乃是：训练和惩处。索尔仁尼琴 (Solzhenitsyn) 证明共产党对普通刑事犯比对政治犯体制性优待。苏联体制的目标之一是创造新人，暗含对最顽固不化的犯人的再教育。

但为何共产党要杀害敌人？确认敌人在政治中时常至关重要。“任何不占在我一边者即是反对我” (He who is not with me is against me) 列宁创新之处在于不仅那些不与其同路者是反对我，而反对我的必须死！此外，他扩展这一原则到政治王国以外的全社会广泛的领域。

恐怖涉及双重变异：对手被首先标签为敌人，然后宣布其为罪犯，导致将他从社会上排除出去，排除社会很快又变成消灭。敌友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能满足解决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寻找经净化的不再含敌意的重新组合的人类，通过马克思主义摩西式的计划，将无产阶级重新组合成新人类，并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社会从政治斗争逻辑进展到排它阶段，然后进入清除意识形态阶段，进而至消灭不纯成员阶段，最后便是对人类的犯罪。

由于儒学的传统影响，似乎留有再教育改造的更广空间。但是中共劳改劳教实质上比直接谋杀更虚伪。强迫敌人改变他们的信仰道路，屈服于杀人犯，可能比直接杀了他们更糟。

红色高棉相信对整个阶级再教育改造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敌人已经腐化堕落无可救药），因此他们群体屠杀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在精神心理上摧毁敌人，因而强迫他们没完没了的自我批评。

极权政权的领导们自视为社会的道德指导者，并为他们选定任何人须处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感到骄傲。其基本假定相同：

基于科学基础的必要性。托德洛夫 (Tzvetan Todorov) 提及极权主义的起源时指出：

“是科学主义而非人道主义帮助建立起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科学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通过所谓科学的必然性（生物或历史的）赋予行为的正当性：一个人必须是科学主义的信徒，即使它是‘疯狂’或‘狂暴’的科学主义，相信完美的社会改造，因此相信通过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种理想进行社会改造的可能性。”

托洛斯基对科学的方法作了明确说明规定 1919 年他在《为恐怖主义辩护》中称：“革命暴力业已成为必要，是因为历史的即时要求，无法找到一条通过议会民主机构的途径”。为支持此论他接着举证说：“无产者是历史上升阶级…今日资产阶级是落没的阶级。在生产中它已不再起着核心实质的作用，且用其帝国主义的掠夺方法，正在毁灭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的人类文化。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执着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将整个社会拖回至深渊的威胁力量。我们被迫粉碎这个阶级并将他们抛弃。红色恐怖是一种武器，用于对付具有巨大破坏性，但又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 [3]

托洛斯基将历史变成某种必须牺牲一切的神圣力量，他对革命表现出无可救药的天真无知，想象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将会经由一个辩证的过程而得以形成，尽管使用犯罪性质的方法。

“革命蓝色眼睛燃烧着残忍的必须之火”。Aragon 的诗歌颂着残忍

“如果敌人不投降，我们当然得消灭他们”。高尔基如是说

考茨基 1918 年对此问题勇敢而诚实地说：“确切地讲，我们的目标不是此种社会主义，废除每一种剥削和压迫，直接反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某种性别，某个种族…如果我们证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唯有基于毁灭私有财产基础上才能取得，我们将抛弃社会主义而无损我们的目标。” [4]

考茨基虽然作为一个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辩护士，将人道主义置于马克思科学信仰之上。要杀人最有效的手段乃是通过非人化的过程将受害者非人化。检察官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歇斯底里恶狠狠地说：

“枪决这些疯狗！将这些藏着残的齿和鹰爪的匪帮杀光！打倒压榨者托洛斯基，他的嘴里流着毒血，腐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让我们永远清除这些骗子，搂着腐烂的僵尸跳舞的可怜的朱孺！让他们可怕的尖叫彻底结束！让我们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疯狗！他们想将我们新苏维埃国家的鲜花撕成碎片！让我们将他们对我们的领袖的兽性仇恨堵回他们的喉咙！”

法国作家萨特（Jean-Paul Sartre）1952 年称：“任何反共的人都是一条狗！”（南郭注：不独有偶，红色高棉的主要领导人全部是在法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法国思想家芦梭，法农，萨特等人的信徒）

斯大林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这种将人类兽化，体制性杀人者。但是这并非斯大林的发明，而是列宁首创。在布党夺权后，列宁时常形容他的政敌为“害虫，蚂蝗，吸血虫”。

高尔基回应一封由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等人签署的呼吁书时写道：“我认为处死这些人完全合法。很自然，工农政权将象清除蚂蝗一样消灭其敌人。” [5]

布洛斯塞特（Brossat）对兽化人类的过程下如下结论：“极权主义的诗人和屠夫们，首先是从他们使用的语言暴露自己。

莫斯科刽子手们的‘清洗’与纳粹谋杀者们所使用的‘解决’密切相关，是苏联精神与文化灾难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种语言微观现象。人类生命的价值崩溃，分类的思想（人民的敌人，叛徒，不可信赖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纳粹屠夫的理论与实践，将他人兽化，净化和防止传染的念头并无法与世隔绝，与种族观

念密切相关。它用超人和劣等种族来将社会人种等极化。但是，1937年苏联有关种族的理论，极权主义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将其他人完全兽化，因而在此种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绝对化，从而付诸实际便成为可能。” [6]

1932年高尔基（他是特务头子雅哥达的私友，他的儿子在 GPU 秘密警察局工作）在一信中说道：“阶级仇恨应当根植于对敌人的某种原始的嫌恶反感。敌人必须被视为劣等的，我坚信敌人是比我们劣等的，他们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道德意义上均是劣等的”。 [7]

社会历史科学主义最坏的一面与生物科学主义结合产生了共产主义怪胎。这种动物或生物思维，使我们更易理解为何这么多共产主义犯罪会对人类犯下深重罪孽，以及马列意识形态是怎么为其追随者们的犯罪行为合法化的。

在共产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Eugenics），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富有社会分类进化知识的列宁，根据应当被抛进历史垃圾箱的理由决定谁应当消灭。根据马列政治历史“科学”基础，资产阶级代表了没落衰亡的过去的阶级，因此消灭其阶级和个体就有了合法性。

马列主义神圣化体制本身，因而阶级划分和抽象归类远比任何人类的实际重要。个体和团体均视作某种原始的社会与脱离肉体的原型。这就使得犯罪变得容易得多。线人，酷刑犯，刽子手杀人不会受到谴责，他们仅是消灭某些对社会公共利益无益的抽象物。该理论通过否定一个基本事实：人类，人类大家庭，而成为犯罪意识形态。

马列主义的根源或许根本无法从马克思本人身上找到，反而易于从变异达尔文主义找到原型，当将达尔文主义适用于种族问题时，运用于社会问题时，均发生相似的灾难性后果。有一点可以肯定：反人类罪是肯定人类的普世性，而归因于某种特定条件，基于生物，人种或社会历史的观念的产物。

通过反复强制洗脑宣传，共产党人迫使人们相信，他们的作为具有普世性，与整个人类相关。评论家们不时试图将纳粹与共产主义区分开，辩称纳粹计划有其特殊性，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产物；而列宁的计划则具有普世性。这完全是错误的！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列宁及其继承者，将资本家，资产阶级，反革命及其他人，排除出人类范畴；并在他们的社会生物学与政治说教中，将他们变成绝对的敌人。考茨基早在 1918 年便指出：“共产党用的词汇都是极富弹性的，使当权者得随心所欲随时将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排除出人类之外加以消灭”。这些词汇直接导致了反人类罪行。

生物学家阿特兰（Henri Atlan）指出：“人类的观念延及生特学领域时，生物学对于人类几乎无关。”苏联科学家来森科（Trofim Lysenko）试图创造新西红柿，玉米品种，而且曾试图创造新人种。

1870 年特卡契夫（Pyotr Tkachev）俄国革命者，内查也夫的继承者，建议将 25 岁以上的沙俄国人全部消灭，他认为他们不能实践他的革命理想。在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巴古宁对这种疯狂的想法：“我们的人民并不是一张白纸，得任由任何秘密社会，随心所欲在上面涂写，比如象你的共产主义计划”。 [8]

斯大林无疑是 20 世纪世界最大的罪犯之一。特洛斯基经常认为斯大林是个病态的疯子。斯大林是个超级狂热的有特殊才干的政治家，他不信民主。斯大林是列宁开创，内查也夫梦想的运动的逻辑结果：用极端的手段实施极端的政策。斯大林是个高加索土生土长，从小受崇尚誓死报仇雪恨的行侠好汉。他用的匿名“科巴”（Koba）即是个助寡妇和孤儿的俄国版罗宾汉。

巴古宁在一封至内查也夫的信中写道：“这种残忍的重组和绝对疯狂主义，如今你居然要将它作为一般原则适用于整个社会。你想要疯狂的东西，不可能的事情，完全否定自然、人和社会！”[9]早在1870年巴古宁便已理解即使革命行动也必须受一些基本道德规范的制约。共产主义恐怖时常被与天主教宗教法庭相比较。不过小说家远比历史学家更热衷于此。

马克思对人类的命运有某种拯救的信仰，这是暗夜之摩赛亚之梦。科拉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那种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已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因此世界将按照某种意志变得完全，完美，最终彻底解放的观念，乃是一种人类精神最疯狂的变态…当然此种变态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但我们应当承认，宗教思想，轻视所有的市俗价值，让位于超自然空间的力量，要远比那种教导我们能够保证救赎，从地狱的深渊跃向辉煌的天堂的说教，远不那么荒唐。”[10]

伦那（Ernest Renan）在其《哲学对话》中指出：“在无神论社会确保自己拥有绝对权力者，不是对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胁，而是创建了一个真实的地狱—集中营，以惩罚反抗者，并恐吓吓唬所有其他人；丧失良知，完全忠于政权，完全抛弃道德的秘密警察，变成随时准备实施各种残暴行为的服从机器。”[11]

黑格尔之“任何真实的皆是合理的”（everything real is rational）（南郭点评：中共克意将其译成“存在即是合理”恐怕有故意误导之嫌。因为“real”虽然也含有‘存在’之意，但其本意乃是“真实的”；我不知道德文原文使用何词。但依黑格尔的本意应指‘真实的’才更确切也更合理）。无论如何指导世界历史的原则应当是“任何非人道的事情皆是毫无意义和没有价值的”。

[1]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81.

[2] Tzretan Todorov *L'homme depaysé* (Paris: Le Seuil 1995) 33

[3] Leon Trotsky *The Defence of Terrorism* trans. H. N. Briailsford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1) pp. 3560.

[4] Karl Kautsky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rans. H. J. Stenn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4) 4-5.

[5] Vaksberg *Le mystère Gorky* 286-287.

[6] Alain Brossat *Un Communisme insupportable* (Paris: Lharmattan 1997) 266.

[7] Vaksberg *Le mystère Gorky* 286-287.

[8] Confino *Violence* 120

[9] Confino *Violence* 112.

[10] Leszek Kolakowski *Lesprit révolutionnaire* (Paris: Editions complexe 1978) 22.

[11] Idem Todorov *On Human Diver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5.

第二章：朝鲜的罪恶与恐怖和秘密

提要：我有个挚友是中国一家企业集团驻朝鲜的代表，他曾向我讲述朝鲜见闻，在朝鲜的电视及无线电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只能收官方的宣传报导。在金家共产极权暴政下，朝鲜人没有任何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结社自由。1995年我在香港齐伯礼律师行工作期间曾订阅三年英文《时代周刊》，1996年有一篇有关朝鲜正在受饥荒的详细报导称近二百万人饿死。同时我曾读过哥尔巴乔夫诺

贝尔和平奖获奖感言，言及他的历史使命就是结束共产暴政。国际共运兴衰史业已充分证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是以暴力、恐怖、加欺骗谎言统治人民的。自 1989 年至 1991 年苏联东欧前共产党国家革命后，全世界 40 余个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由于邓小平以“杀二十万，保二十年”的残暴镇压，使得中共暴政得以苟延残喘迄今。目前全世界仅剩下的五个共产党残余政权（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和老挝）。研究者公认中共与越共政权实际上业已严重偏离马列原教旨，而朝鲜和古巴则仍坚持以马列主义为国教。这或许正是为何 2004 年 10 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称：“朝鲜和古巴政治上是正确的，他们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政治”，同时胡氏还公然谴责哥尔巴乔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也因此我对胡锦涛极度鄙视，并公开指证胡为：“政治白痴，人权恶棍，法盲，政治精神分裂症重症患”！那么朝鲜与古巴的政治到底到底是什么玩意？！由于朝鲜迄今仍在金正日铁桶般的共产极权统治之下，“几乎任何信息皆是国家秘密”[1]作者主要依据国际人权组织，朝鲜官方及流亡海外的政治良心人士的证词等片断资料，大体归纳出朝鲜社会、政治、经济、司法的真实概况，实际情况只会严重得多。

一、党内争权夺利大清洗

朝鲜第一届政府 21 名高级官员中有 17 人先后被暗杀，枪决或清洗。(550). 1953 年 8 月 3 日朝鲜劳动党即开始向党内高干开刀，14 名党的高干被以间谍罪名提起指控，逮捕，酷刑及作秀审判后枪决。[2]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内政部长，文化宣传部助理部长。外事部长朴宪永(Pak Hon Yong 据称被金料奉(延安派)所害)于 1955 年 12 月 15 日被判死刑，三天后即被枪决。武亭(Mu Chong)曾任中国八路军军中的将军，朝鲜炮兵司令，中朝联军的主要负责人，于 1956 年被杀(不过据成玉环先生称：武亭算善终，韩战间托彭德怀关系病死在中国长春)。[3]凡是与苏联或中国关系密切的官员及支持赫鲁晓夫改革的官员均受到清洗。许嘉谊(Ho Ka I)被控为苏联间谍(据成玉环称许嘉谊是自杀，像高冈一样)，金料奉(Kim Du Bong 据成玉环先生称为朴金喆(甲山派)陷害)被控为中国间谍被处死；此后 1960 年，1967 年，1969 年反复进行了多轮清洗。1972 年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朴金喆(Pak Kum Chul)被捕入狱；1977 年前政治局委员 Li Yong Hi 被捕入狱。1978 年，1980 年，1997 年，党中央书记徐宽熙(So Kwan Hi)与其他 17 名高干一道被处死[4]。金日成(满洲抗联派)则渔人得利，将所有竞争对手一网打尽。中共所谓“十次路线斗争”其迫害规模恐怖程度决不亚于朝鲜。中共用尽各种方式清洗其党内高干从成立初始迄今从未停止过，只不过后期比前期不再那么血腥而已。

二、司法黑暗与恐怖

朝鲜刑法中可判死刑的法条高达 47 条，仅次于中国。中共刑法涉及死刑的法条共有 77 至 81 项。据法律专家 Kang Koo Chin 估计：1958 年至 1960 年期间，至少九千名党员干部被开除后经审判处决。据此推论，朝鲜迄今一共进行过九轮大清洗，至少有九万党员被处决。

阶级出身对于处罚至关重要。所有的法官和几乎所有的律师皆依劳动党的指

令行事，并严格按照马列主义指导。[5]LisanOk 是一名负责为干部保留供应品的党员干部，被判十三年徒刑。她作证说：她所在的监狱关押有六千名犯人，其中二千名是女犯。每天凌晨 5.30 分至夜 12 点被强迫将奴隶般劳动，任何女犯若怀孕皆被强制打胎，若生下则立即窒息而死或割喉而亡。[6]

在朝鲜若一人犯罪则牵连祖孙三代。自 1953 年第一次清洗即开始实行该蛮制度。Kang Chul Hwan 9 岁时与他父亲，一个哥哥和祖父母一起被关入监狱。

起初所有的死刑均公开进行。但自 1984 年始，所有的处决均秘密进行。女犯几乎很少被平静地处死，总是要经受各种羞辱和残暴野蛮的刑罚。An Myung Chul 作证说：我看见女犯的乳房被割掉，阴道被用拖把插入。[7]

看守每抓获逃犯，可获入党及上大学的奖励，致有的看守强迫犯人爬围墙然后击毙之以邀功请赏。

逮捕通常秘密进行，没有法律程序。亲属和邻居均不知道真情，当得知某人失踪后，都避免谈论，以避免自己陷入麻烦。[8]

朝鲜还在西伯利亚设立了一个至少关押 22 万犯人的特大监狱，自 1968 年以来，那里每天平均死五人，一年至少死亡 36500 人，46 年来（截止于 1995 年）合计死亡至少 150 万人。[9]

三、政治正确

朝鲜劳动党党员占总人口的 14%，比率居全世界所有共产党政权之冠。中共党员约占总人口的 4%；阿富汗占 0.5%；埃塞俄比亚仅占 0.1%。

1996 年 1 月 3 日朝鲜广播称：“在伟大领袖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整个社会应当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政治实体，同呼吸，共思想，统一行动”。当代的口号是：“象金日成和金正日一样思想，言说，行动”。“促进团结的党的十项原则”。“我们必须强化我们领导的绝对权威”。

任何朝鲜人必须参加每周一次的理论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每个人至少必须自我批评一条政治错误，批评邻居或同事至少两条政治错误。

朝鲜干部享有物质特权，但同时受到严密监控。他们被强迫居住于指定地区，其电话通讯全部被严密监听，任何音相皆被定期严格检查。所有的电视，无线电收音机只能收听朝鲜官方新闻信息。任何旅行必须获得地方相关部门和工作单位批准。首都平壤所有的房屋均受到政府严密控制。[10]

朝鲜当局对人的迫害与恐怖全方位影响人的心灵，灵魂和身体。政府宣传除了马列主义外，另一套是金家王朝代表了天，地的意志。以此试图证明家族王朝有合法继承权[11]（559）。全社会按阶级出身，地理出身及现行忠于政权的程度，自 1950 年代划分成 51 个分类，依此为据决定每个人的社会，政治，物质与未来。不过，1980 年以后，只剩下三大类。残疾人不得生活在首都平壤，出身于好家庭者不得与出身于坏家庭者结婚。侏儒如今被逮捕关入集中营，不仅被强制与世隔绝，而且不得生育。金正日说：“侏儒的根源必须消灭”。（560）

1959 年数百名日本妇女随夫返还朝鲜，尽管当时朝鲜政府有过承诺，但无一人被允许返日本，即便短期探亲访友也不允许。许多日本妇女被关入集中营，大多被迫害致死。而朝鲜当局时常以这些日本妇女为人质与日本政府谈判，要求粮食援助。（567）

四、极权统治的恶果

自 1994 年始，朝鲜陷入饥荒，1996 年谷物年产仅 370 万吨，比十年前少三百万吨。世界美景 (World Vision) 估计有两百万人受害；德国红十字会估计每月一万名孩子饿死，但朝鲜军队粮食充足。20 世纪以来全世界所有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大饥荒，而苏联、东欧前共产国家、中国、越南、朝鲜、柬埔寨、罗马尼亚、埃塞俄比亚、秘鲁均发生过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至数千万人不等。

金家共产极权政权统治朝鲜近五十年来，党内九次大清洗约造成十万党员丧生，150 万人死于集中营；130 万人死于内战；饿死人数在 50 万至 200 万之间。此外中国志愿军战死在朝鲜约 40 万人，另伤残 45 万人。五十年共产党统治在 2300 万人口的朝鲜死亡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564)

[1]Stephane CourtoisNicolas WerthJean Louis PanneAndrzej Paczkowski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47

[2]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1

[3]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2

[4]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2

[5]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3

[6]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3

[7]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6

[8]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7

[9]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8

[10]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9

[11]Stephane Courtoi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51

附一：抗美援朝韩战真相

郭国汀编译

提要：习近平先生日前公然宣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为守护和平、应对侵略的正义之战”，“这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是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习先生是无知，还是无耻或是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吾以为习近平作为未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绝对不应犯如此严重的常识错误。兹根据国际专家学者的研究专论归纳韩战真相，供习近平先生参考，以免贻笑大方。

2010年11月14日第246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宪政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美国韩国问题研究专家米歇尔在其《金正日：朝鲜人民亲爱的领袖》专著中总结道：“1950年6月25日，经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发动韩战，三天后打下汉城，共产党世界却宣称韩国先动手侵略北朝鲜。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由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参战。美，英，澳，比，加，哥，埃及，法，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土耳其均派兵参战；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则支持。联合国军将北朝鲜军赶回北部，由于中国志愿军介入，挽救了朝鲜失败的命运，直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议。内战的结果造成朝鲜军民死亡300万人，南北朝鲜军和中国军队死亡200万，其中志愿军死45万，伤50万；联合国军方面美国死33000人，英国1000人，其他国家4000人；几十万儿童成为孤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终身残废”。[1]

1.谁挑起韩战？

是北朝鲜挑起战端，金日成最先提出夺取南韩的请求，最早得到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后获得斯大林同意。因此朝共和中共与苏共挑起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决非所谓正义战争。

1949年3月当毛的军队以势不可挡席卷全中国之际，金日成赴苏联试图说服斯大林帮助他夺取南韩。斯说“不”！因为会引起美国介入，于是金转而求毛，4月派国防部副部长到中国，毛予以确认。说乐意助朝鲜攻南韩，但要等到他夺取全中国之后，毛说我们可以派中国军队帮你，毛在1949年5月即鼓励朝鲜打南韩。[2]此时毛拟秘密帮助朝鲜，但当毛赴斯大林生日庆典后，决定公开与美国对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迫使斯大林帮助中共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中国军队为斯大林与美国开战，以换取苏联的技术和装备。于是斯大林同意重新考虑。1950年1月19日苏驻平壤大使报告斯大林，1月30日，斯大林电告 Shtykov 大使转告金日成，苏联准备支持金开打。斯大林并未告诉毛，并要金向中国保密；待毛离开莫斯科后，斯与金制定了详细作战计划，在最后一次会谈时，1950年4月斯对金说“如果你要打南韩，我们不会出兵，你必须要求毛帮助。”[3]

当金日成两个月后到莫斯科时，斯对金说，国际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许可采取更积极的行动统一朝鲜”。但有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北京的支持。”斯还说“因为中国如今所处的地位，能对朝鲜问题做出更多的奉献，因此，金日成必须依赖毛，他对亚洲事务的理解更准确”。1950年3月1日，毛向斯大林报告他的援助朝鲜战争计划，“花几年时间，消耗几十万美国人的生命。”[4]5月13日金日成乘苏联飞机抵北京直接见毛，称斯大林已同意支持他开打。当晚11点30分周恩来问苏驻华大使 Roshchin 要莫斯科确认。次晨，斯大林回电“北朝鲜可以采取行动，然而，此问题应当与毛亲自讨论”。次日，毛给金日成肯定答复，最关键者是“如果美军介入，中国将派军队支持北朝鲜。”

毛还排除苏联参战说：“因苏联受 38 线条约约束，中国不受该条约约束”。因此，毛为斯大林与金日成的作战计划背书，斯于 5 月 16 日电报确认。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大举进攻南韩，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决议支持南韩，苏联代表马立克故意缺席放弃否决权，因斯大林希望西方军队介入。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宣布派军支持南韩，并改变了对台湾的不干涉政策。

2.毛泽东支持韩战的动机与目的

毛泽东支持金日成挑起韩战有他自己的目的：要求斯大林帮助中共快速建成军事工业，取得原子弹技术，迅速成为军事强国，以便挑战斯大林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地位。毛为了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完全不考人命牺牲，也不考虑朝鲜人民的切身利益。可谓狂妄至极。

1950年7月1日毛派周告诉苏联驻华大使“现在我们必须建立我们的空军和海军，以便对付美国的武装力量。”8月19日毛对苏联使节 Yudin 说，“美国可以派 30 或 40 个师，中国可以将他们碾得粉碎”。8月初，北朝鲜军队已占领 90% 南韩领土，但 9 月 15 日，美军在 38 度线附近的仁川登陆，切断了大量北朝鲜军队；9 月 29 日，金日成向斯大林求救，要求中国派志愿军。10 月 1 日，斯电毛称“到了中国人行动的时刻。若你认为可能派军队支持朝鲜，那么你应至少派 5 至 6 个师越过 38 线，可称做志愿军。”[5]毛立即行动，于 10 月 2 日凌晨两点下令早已居中朝边境集结待命的军队随时准备出发。似乎直到此时，毛才将此重大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皆强烈反对出兵朝鲜，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则小心，后来毛说援朝决定是一个半人作出决定的，这半个人即是周恩来。林彪反对最强烈，指出与美对抗将引发巨大问题，美国有绝对控空权，大炮的优势达四十比一，若中国介入，美国可能轰炸中国大城市，摧毁中国的工业基地，还可能向中国投掷原子弹。

毛的野心与赌徒心使他认为美国不敢向中国投原子弹，且毛有最基本的资源：取之不尽的中国人命，尤其是毛趁机处置大量原国军投降部队，克意将这些部队送至朝鲜当炮灰，以除后患。10 月 2 日毛电斯，强调出兵面临的难题，许多人反对，故还需讨论，旨在讨价还价。次日周恩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如果美军越过 38 线，中国将干涉。10 月 5 日，联合国军已打过 38 线，斯电毛提醒中国人多次承诺愿意出兵援朝。若不出兵，将不会帮助中国建空军和海军。[6]

1950年10月5日斯大林告诉毛现在有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两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日本，军事皆已出局，论及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时，斯说“我们害怕吗？依我看，我们不应当怕，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来，而不是让它晚几年再来。”[7]8日，毛任命彭德怀任志愿军总司令，同时派周恩

来，林彪赴苏联要求见购买武器装备，林彪致电毛敦促毛放弃介入韩战。两天后，周、林抵斯大林在黑海的别墅，长谈至凌晨5点，斯大林承诺将提供飞机，大炮，坦克和其他装备。周甚至未谈及价格。但对最关键的中国军队空中掩护却落空了，斯大林曾于7月13日承诺予中国军队一个师124架喷气式战机掩护中国军队。现在斯宣称尚未准备好，还需要两个月。周林争论说，空军掩护是基本的要求。斯大林这时电毛：“中国不必介入韩战”。[8]毛电复：“无论是否有苏联空军掩护，我们皆出兵。”

毛10月13日电周“我们需要战争，我们必须介入”。同日，毛告诉苏驻华大使，“中国将介入，只是希望苏联空军尽快提供空中支持，不迟于两个月。”19日中国志愿军出兵援朝。两个月后，中国军队将联合国军逼回38线以南，恢复了北朝鲜的专制政权，但金正日的军队只剩下75000人，仅是志愿军45万人的六分之一。12月7日收复平壤后，金让出指挥权给中国人。彭德怀电毛：金正日同意不再干涉今后的军事指挥事项。彭随即成为中朝联军总司令。彭拟在38线上停下来，但毛拒绝。彭提出战线太长，后勤跟不上，食物，弹药，鞋，油，盐均极缺，铁路不通，交通不畅，时常被美军飞机炸断。

没有空中掩护。但毛坚持向南推进，毛要逼斯大林满足其建设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雄心。12月13日毛电彭：必须打过38线。彭12月19日电毛：“零下三十度，战士们疲惫不堪，许多军队没有大衣和棉鞋，毛毯被汽油弹燃烧，许多士兵仅穿单层鞋，甚至赤脚。整连人冻僵，因缺营养得夜盲症，很可能发生不可想象的损失”。

1951年1月初，彭拿下汉城，1月15日杜鲁门在广播讲话中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国家处于极大危险之中。”[9]美国国务卿爱奇逊称这是美军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失败。但中国的“胜利”是靠人海战术，以人员巨大伤亡为代价的。25日联合国军反攻，志愿军伤亡极为惨重，3月1日毛电斯：“中国拟用她巨大的人力资源，拖跨美国；中国军队业已死亡十万人，估计今年还得伤亡三十万人，我们正在补充12万兵力，并拟现增兵三十万。准许与美国打一场持久战，花几年时间，拼掉美国几十万人命”。[10]

1950年10月中国海军司令赴苏请求苏联帮助建立中国海军；12月中国空军高级代表团访苏，次年2月19日苏联草签一份协议，开始在中国建立维修飞机工厂。到韩战结束时，仍十分贫穷的中国已拥有世界第三大空军，有战机3000架。

由于美军狂轰滥炸战才打了一年，金正日意识到继续打下去，整个朝鲜将成一片焦土与废墟，故他想结束韩战。1951年6月3日金密抵北京，与毛商谈与美军和谈。毛因目标未达到，停战是他最不想的事。事实上毛下令“将美军拖入北韩越北越好”，毛绑架了韩战，以达他自己扩充军力的目的而根本不顾金日成的利益。[11]7月10日，联合国军与中朝联军开始停战谈判，所有事项均顺利，唯遣返战俘问题上，美国坚持自愿非强制原则，毛坚持一揽子全部返中国。两万中国战俘大多是原国军，绝大多数不愿意回中国大陆。美军主要出于人道和政治因素坚持非强制遣返，而毛却指示谈判者“不许放走一个人”。金正日巴不得结束这场偷鸡不成失把米输定了的战争，“没有理由为这些政治上不可靠的战俘遣返而继续战争”。但毛根本不在乎战俘，他的目的是借战争，快速建成军事工业。于是战争继续没完没了延续。

1952年7月14日金电毛请求毛接受妥协，朝鲜已被炸得面目全非，1/3成人死亡；毛电复否决金的请求。金由于更害怕毛将他废黜，故只好忍气吞声（毛后来事实上阴谋废黜金正日）。[12]

韩战中美军损失了 3000 架飞机，死亡 37000 人。美国公众不愿意接受高死亡故反战情绪高涨，支持韩战者仅 33%。1953 年 2 月 2 日，新当选总统爱森豪威尔在国会演讲中言及他可能动用原子弹对付中共。这对毛简直是音乐，毛趁机要斯大林帮助实现毛野心勃勃的核工业，毛梦寐以求的原子弹。斯不想予毛原子弹，故于是 2 月 28 日决定结束韩战，当晚斯中风，3 月 5 日去世。斯死后，马兰科夫告诉周恩来苏拟结束韩战，但毛坚持继续打下去。因毛想要苏联的原子弹技术，但苏坚拒之，毛才指示接受自愿遣返原则结束韩战。1953 年 7 月 27 日达成最后停战协议。

当下北朝鲜有 100 万陆军，世界第三，空军 11 万，1600 架战机，海军 10 万，800 艘军舰，全部军力世界第五；600 万预备役，男兵服役十年，女兵服役七年。虽然其年军费 50 亿美元仅南朝鲜一半，但占其 GDP313%，陆军 70%置于 DMZ 100 英里以内，2000 辆坦克，8000 大炮，藏在 8000 个地下工事中，特种部队 9 万人是全球最大的之一。[13]

韩国陆军 56 万人，2250 坦克，4850 大炮设施，2300 装甲车，150 门火榴弹，30 枚导弹，580 架直升飞机，海军 67000 人，200 艘战舰，60 架飞机；空军 63000 人，780 架飞机，军人服役两年，预备役 300 万。驻韩美军共 37000 人，其中 27500 陆军，8300 空军，350 海军；另有 47000 美军驻日本。200 架飞机；此外还有 4000 名美国军事合同承包商和 11500 名家属。美韩军力技术高于朝鲜，故朝鲜大力发展特种部队，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4]

3.没有赢家——韩战极悲惨的结局

韩战突显出共产主义毫无人性，为达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的流氓强盗本质。

韩战期间中共先后投入至少 300 万军队，其中至少死亡四十万以上，中共官方仅承认死亡 152000 人；但是邓小平私下告诉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中国人死亡四十万；康生告诉阿尔巴尼亚来霍查总书记也是死亡四十万；俄国一份官方文件显示中国军人伤亡 100 万人；美国韩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在其《金正日：北朝鲜人的亲爱的领导人》书中写道：“韩战中国军人伤亡 95 万，其中死亡 45 万，伤 50 万”[15]。21374 名中国战俘中 2/3 拒绝返回共产中国，绝大多数选择去了台湾。

21 名美军和一名苏格兰兵选反留在中国，但历经艰难曲折不久先后离去。1/3 返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被当作叛徒饱经沧桑以终。毛告诉金日成扣住 6 万南韩战俘，关押于一个绝无任何可能逃生的与世隔绝的处所，绝大多数死于非命。尽管中国人在韩战中牺牲惨重，但朝鲜人并不感激中国人，平壤中国战争纪念馆朝鲜官方人士答志愿军死于韩战多少人时称“或许一万人吧”。2002 年朝鲜在边界用高音广播进行反华宣传，抹掉苏联解放朝鲜的历史，和中国志愿军救金家王朝的历史[16]。

[1] Michael Breen Kim Jong-Il North Korea's Dear Leader (John Wiley & Sons (Asia) Pvt Ltd 2004. p. 24.

[2]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58

[3]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61

[4]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59

[5]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62

[6]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63

[7]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59

- [8]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364
- [9]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365
- [10]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367
- [1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364
- [12]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369
- [13]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35.
- [14]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37.
- [15]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24.
- [16]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27.

附件二：金正日真面目

南郭点评：美国总统布什 2002 年在白宫演讲时公开谴责北朝鲜与伊朗、伊拉克是“邪恶轴心”。2010 年 6 月 10 日北朝鲜潜艇鱼雷击沉南朝鲜军舰后，再次荣获“邪恶轴心”之称。2004 年 10 月 胡锦涛在中共高层一个会议上公然宣称：“朝鲜的政治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学习朝鲜古巴的政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胡氏如此推崇朝鲜和古巴，人们大体可推论出胡氏是个什么玩意；南郭正是由于得知胡氏有此高论之日，公开批判定论胡氏仍“政治白痴”随后论证胡氏乃标准的“人权恶棍，法盲，政治流氓”！实际上今日朝鲜不过是中共文革的翻版，朝鲜的政治仅是保留有更多的马列原教旨，因而其极权专制暴政更突出更荒唐而已。自 1994 年始朝鲜人为大饥荒，迄今超过 300 万人已经饿死，几十万人逃往中国转逃南韩，或隐名埋姓生活在中国，因担心被遣返受惩罚。[3]

1. 朝鲜人民灾难的源头

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广岛（Hiroshima）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三天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向日本宣战，9 日苏军进军东北，10 日，日本通过英语广播表示愿投降，14 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苏军经中国东北进入朝鲜。毫无军纪的苏军用强奸和抢劫解放了朝鲜。[4]金日成对解放朝鲜实际上并无功劳，但苏军欲扶持他，故特意于 1945 年 10 月 1 日在平壤安排了一个欢迎金日成上尉的示威游行。于是造神运动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南朝鲜有亚洲最狂热的基督徒，北朝鲜则有最疯狂的共产主义邪教个人崇拜；前者是世界第九大经济强国，南韩从 1961 年人均年收入 82 美元到 1997 年人均年收入达 10000 美元。后者大饥荒穷得叮当响。1950 年代朝鲜发动内战导致军民伤亡 300 万人。

苏联扶持起的极权暴政。金日成 1912 年 4 月 15 日出生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农家，7 岁时随父母亲移居中国东北，7 年后其父年仅 32 岁死去，他在中国东北生活至 28 岁，会讲流利的普通话，因参加共产主义活动，1929 年首次被捕，1931 年加入中共，并加入抗日游击队，不久被清洗出党。1934 年 6 月参加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一支 300 人的游击队，靠收入参和鸦片农民的保护费，抢劫朝鲜富商，

扣人质等方法筹款。1940年逃入苏联，后成为苏联远东军第25军第88特别大队第四支队队长，该特别大队由一位中国司令领导，金日成是四个支队长之一。1945年33岁的金日成成为远东苏军东北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的朝鲜。民主国家服从于宪法，国际法和规范，自由选举。共产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源于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行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是个谎言：唯物主义认为没有灵魂，没有上帝，仅有物质。但是人类并非仅仅是物质，他们是理想的，受激励的。一个政治体制否认个体价值，待你就象对待一个物体，只能通过专制精英为之。只能通过压迫不义和不平等实现。辩证法认为通过斗争而进步，但是，进步可以通过斗争也可以通过合作。

共产主义吸引了许多追随者，第一代往往最具理想和牺牲精神的政治活动者，因为该谎言掺杂着一半真理，它攻击现行的不义，承诺解决之并创建一个理想的社会。但是仇恨的精神植入其策略：乌托邦要求清除道路上所有的人类障碍：中产阶级，宗教信徒，地主，非共产党人。因此由于其辩证通过镇压和宣传，共产党国家需要不断制造敌人。经一代实践明显证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不过是虚幻。非唯物主义的西方社会确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而且更自由更民主。

里根总统称苏联是象纳粹一样的邪恶帝国。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不是因为他使人民邪恶，而是因为他要求和鼓励人采取非常不人道的行为。

朝鲜的共产主义开始时是马列主义作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金日成后来引进他的 Juche（自我依赖）修正。这种政治思想代表着对依赖俄国和中国的终结，并拟按朝鲜的特殊情况灵活运用马列主义。Juche 实际上提供了个人异端的哲学基础。人是其命运的主人，革命的主人是人民，朝鲜共产主义必须依赖自我。Juche 的关键是最高领导人的作用。因为革命的成功，全部必须依赖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

2.发动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经斯大林事先同意，金日成发动韩战，三天后打下汉城，共产党世界却宣称韩国先动手侵略北朝鲜。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由16个国家组成联合国军参战。美，英，澳，比，加，哥，埃及，法，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南非，泰国，土耳其均派兵参战；丹麦，印度，意大利，挪威和瑞典则支持。联合国军将北朝鲜军赶回北部，由于中国志愿军介入，挽救了朝鲜失败的命运，直至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议。内战的结果造成朝鲜军民死亡300万人，南北朝鲜军和中国军队死亡200万，其中志愿军死45万，伤50万；联合国军方面美国死33000人，英国1000人，其他国家4000人；几十万儿童成为孤儿，数百万人无家可归，数百万人终身残废。[5]2002年朝鲜在边界用高音广播进行反华宣传，抹掉苏联解放朝鲜的历史，和中国志愿军救金家王朝的历史[6]。

实行国家恐怖主义。1968年1月北朝鲜派遣一支特种分队进入南韩暗杀总统，结果27人被杀，2名特工逃走，2名被捕，其中一人用手枪自杀，另一人在监狱中收到朝鲜基督徒姑娘的求爱信，后婚之[7]。

金正日1983年曾派特工在缅甸暗杀全斗焕总统，结果是几名官员做了替死鬼。1981年南韩获得奥运会举办权，1987年韩国人民上街要求宪政改革，坚持了三周，直接危及次年的奥运会。卢太愚（Roh Tae Woo）总统被迫自己要求直接选举，全斗焕（Chun Doo Hwan）让步。同年两名北朝鲜间谍在南韩民航置放炸弹，

据称是金正日下令为之[8]。1987年爆炸朝鲜民航班机，旨在恐赫苏联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

自朝鲜战后，朝鲜发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美国1990年发现朝鲜秘密发展核武器，在国际压力下1994年中止。美国设立了一个朝鲜能源组织，建立了两座轻水反应堆，每年向朝鲜提供免费石油50万吨直至建成。并支付朝鲜46亿美元。

2002年10月因发现朝鲜秘密进行原子弹计划，中止向朝鲜提供援助，朝鲜则报复立即撤出非核武器公约，重新试验核武器，2003年中期，朝鲜宣称其已完成试验。2001年朝鲜向8个国家出售导弹技术获利5亿6千万美元。售核武器生化武器原料给恐怖分子或帮助其他肮脏国家发展核武器，使其赢得布什总统称其为恶轴心，与伊朗和伊拉克一道。

他是一只资本主义的猪，他的邪恶企业以第39部的名义经营。涉及走私毒品，武器，伪造美元。韩国情报当局和澳门警方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了解到金正日走私毒品，海洛因每年至少进账五亿美元。M在日本的市价30亿美元。他们在约4700至7000公顷农场种植毒品，朝鲜与国际毒品集中有牵连，朝鲜外交官不时因涉嫌毒品被捕，自1977年以来超过20名外交官分别被俄国，埃及，中国，瑞士，印度，瑞典，赞比亚，埃塞俄比亚，老挝和尼泊尔当局逮捕。朝鲜第39部涉嫌制造伪美钞，至少5000万美元伪钞进入日本市场。据称朝鲜制造伪钞的技术相当先进，还制造伪日元和伪欧元。他在瑞士澳门和其他地方至少有50亿美元存款。[9]

南北韩军事力量对比。北朝鲜有100万陆军，世界第三，空军11万，1600架战机，海军10万，800艘军舰，全部军力世界第五；600万预备役，男兵服役十年，女兵服役七年。虽然其年军费50亿美元仅南朝鲜一半，但占其GDP313%，陆军70%置于DMZ 100英里以内，2000辆坦克，8000大炮，藏在8000个地下工事中，特种部队9万人是全球最大的之一。[10]

韩国陆军56万人，2250坦克，4850大炮设施，2300装甲车，150门榴弹，30枚导弹，580架直升飞机，海军67000人，200艘战舰，60架飞机；空军63000人，780架飞机，军人服役两年，预备役300万。驻韩美军共37000人，其中27500陆军，8300空军，350海军；另有47000美军驻日本。200架飞机；此外还有4000名美国军事合同承包商和11500名家属。美韩军力技术高于朝鲜，故朝鲜大力发展特种部队，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1]

金正日在1990年代后期的大饥荒中，军队受到特殊待遇，他引入军队第一，党第二的先军政策。军队成为该国最大的公司。国中之国有其自己的矿山，工厂，贸易公司，成为官方的第二经济。

3.花花公子政治流氓疯子

金正日1960年上金日成大学政治经济学。1967年朝鲜共产党展开了新一轮清洗，主要针对外部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影响所致的背叛分子。金日成说：“一个革命者的生命始于斗争，终于斗争；对于革命者而言，生命构成他们的斗争，斗争是他们的生命。”[12]

1977年金正日下令绑架南韩尖电影导演及其他的女演员的妻子（Choi Eun hee），她1978年应邀出席香港电影业协会时被绑架，经8天海上航行送到朝鲜，目的在于吸引她的前夫（Shin Sang ok）导演。金正日亲自到码头迎接，并安排她住在一座豪华的别墅，后来得知是金正日的私人别墅。助手收走了她的护照和

身份证。Shin 则被关在狱中。因为 Shin 决定移民美国，拿到绿卡后抵香港，结果在香港被朝鲜人绑架。先隔离在一家宾馆，他出逃后被弄回关进监狱三个月（此前已经关押五个月），再试图逃跑后被正式指控后作为政治犯关入集中营，四年后才被释放。1983 年 3 月在一个宴会上，Choi 看到 Shin 在一群官员中，金正日说“还不拥抱相认”，他们喜极相拥，掌声四起。金正日宣布 Shin 成为他的电影顾问。

“4 月 15 日让我们为你们举行复婚礼”。“我很抱歉让你受了这么多苦，没有人对 Choi 女士动一个指头，现在我把她完好无损地送还给你。Shin 先生，我们共产党人是纯洁的，不是吗，同志们？”人们狂欢滥直到凌晨三点。[13]

金正日为他们建了一幢豪华别墅并正在兴建一座可美好莱坞的电影城，当他们逃离时。Choi 在北朝鲜还遇见一个从澳门绑架来的中国女人，另一个被朝鲜间谍勾引来的法国女人。金正日给 Choi 和 Shin 拨出 200 万美元预算，公开说绑架的目的是发展朝鲜电影事业。在朝鲜的八年中每天都想逃跑，1986 年趁欧洲旅游之机，摆脱保镖向美国使馆申请政治避难。

金正日喜爱宴会，要女性陪伴而是皆要处女主要是高中女生；1980 年代金正日还从瑞典，俄国聘请舞女。有一次他令五名姑娘裸体跳舞，然后令部下官员与她们跳舞，但警告说：“不准动她们”。[14]他的前弟媳妇 Sung Hae Rang 2003 年接受时代周刊时说。有个部下不小心问道：“金日成还能活多久？”金正日立即下令将他杀了。[15]

金正日酷爱电影，1980 年代便有 15000 部西方电影（不少是色情电影），如今超过 2 万部。

1996 年金正日在 W 看到一群 10 岁左右的男生头发怪异，于是下令全国男生理光头。两年后，在一次讨论中，一位官员提醒他的指示，他不记得曾发过该指令。2000 年会见美国当时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时自嘲是“最后的共产主义恶魔”。

在绑架 Choi 后第一次宴会上，为了打破僵局，金正日问道：“Choi 小姐，我看上去怎样？”然后他自我左顾右盼“你是否认为我看上去象个小矮人混蛋？”引得 Choi 和官员们哈哈大笑。

金正日怪异行为。韩国情报部门形容金正日为危险的疯子，花花公子；他是法国（Hennessy's pricey Paradis）牌白兰地酒全球最大的个人买主。收集了大量西方色情电影。

美国 CIA 政治精神病科学专家 Jemold Post 认为金正日是个疯子，依据是他有最危险的个性失调症，极恶毒疯狂的自恋核心特征。[16]此种自恋导致自我膨胀，以致无法理解他人，也无法理解他人的痛苦，陷入四面是敌的恐惧感，导致政治误判。这种疯癫使他可以按下核弹按钮。[17]

俄国总统普金评价金正日时说：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机智，对国际事务相当了解，幽默的人。金正日说：“如果人们象外交家那样待我，我也变成外交家。普金真诚待我，我向他坦露灵魂。”有一次，一位伊朗高官访朝鲜，在讲了十几分钟后，金正日问“就这些吗？再见！”“当他高兴时，他可以待你确实很好很好。但当他愤怒时，他可以使房间的每个窗户震动。”

韩国情报部心理学家 Lee-Kunhu 认为金正日是个有轻浮个性的人，更宜做艺术家而不宜做政治家；强于情感而轻于理性，他的表演欲和幽默感似乎是天生的。

精神病学家 Scott Peck 认为邪恶的人的关键个性是“不屈服的意志”，所有成年人心灵健全的人均以某种方式屈服于某种比人类更高的存在，上帝，真理或其他观念；邪恶的人决意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意志，用强力控制他人，不屈服于

上帝，良心，或某种外部观念是所有疯狂者的特征。

布瑞恩则认为金正日有一种相当突出的政治家的性格，他道歉。他身 Choi 和 Shin 道歉；2002 年他向韩国道歉，因为朝鲜军舰冲撞韩国军舰；后来又向日本首相就绑架好些日本公民道歉。2002 年 10 月，他正式承认秘密核武器计划，而未抵赖否认。因此布瑞恩认为金正日属于“积极行动”（Active-positive）情感型个性的领导人。严格意义上说，朝鲜不是由金正日控制，而是由一个组织控制，质言之，金正日既非疯子也非邪恶的个体，但他属于居于该罪恶体制项端的受益者。[18]

4. 朝鲜大古拉格死亡集中营

朝鲜是个谎言国家。每个朝鲜人均处于实怕之中。朝鲜人那怕仅是表达想离开朝鲜的愿望便会被关入集中营。

韩国情报机关估计到 1999 年仍有超过 20 万政治犯关押在边远地区的 10 个集中营；朝鲜集中营使用日本的酷刑技术，并在苏联顾问指导下，集注于内务安全，重点对付政治反对派和阶级敌人，宗教信徒和地主。1957 年苏联顾问撤离，朝鲜进行了新形式的清洗，由金日成的弟弟负责将全体朝鲜人根据家庭背景划分为“友好”，“中性”或“敌对”。1959 年审定 2500 人被枪决，7 万人被划为敌对，发配他们到边远地区。1964 年公民依他们的婚姻和职业被进一步划分为 51 个等级，决定其惩罚的性质。

1966 年在朝鲜作为校编金日成着作的西班牙文和法文翻译的一个委内瑞拉诗人和共产党人 Ali Laheda 和另一位西班牙国际大队的法国人 Jacques Emmamuel，因批评朝鲜当局的宣传，被指控为 CIA 间谍判 20 年刑，前者因 1974 年齐奥赛斯库干涉而提前获释，后者死于监督狱。

1990 年一些幸存者逃到西方国家和韩国，披露了朝鲜古拉格的可怕现状。1998 年至 2002 年期间，他们在美国国会作证，1987 年在 On Sung 监狱发生越狱暴动，结果 5000 名犯人被群体屠杀[19]。酷刑和坦白从未犯过的罪的现象非常普遍。

Lee Soon ok 是一名朝鲜共产党员，负责发放物资的监督员。1986 年 10 月因拒绝给一个高级安全官员额外皮料制作金正日式皮衣被捕，首先被扔进一个有 30 多名男犯的牢房，被用床单盖着，男犯们对她拳打脚踢，直到她昏死过去；随后连续三天三夜审讯不让她片刻睡眠。后来她逃离朝鲜后，写了一部回忆录，披露了许多朝鲜监狱骇人听闻的罪恶。她被关的第一天，女狱官警告她：“如果你想活着，必须放弃人类的尊严”。她在书中写道：

有个名叫 Kim Yong hee 的 39 岁的妇女因偷了一公斤糖被判三年，她不服上诉至高级法院，结果改判 20 年！（即朝鲜不存在上诉不加刑的刑法基本原则）另一个名叫 Kim Jung ok 的妇女，向警察解释为何她偷了一把玉米喂她饥饿的孩子，结果被以批评政府罪名判 15 年！

一个名叫 Choi Sul Rung 的妇女曾在中国生活，因看守听到她说后悔离开中国，被以叛党罪公开枪杀。1988 年 8 月日犯人被集中公开见证处决犯人，一个妇女认出被绑在柱上待枪决的男犯是她的亲儿子，她因不忍看到儿子当她的面被枪决，挖掉了自己的眼球，结果她也被当场处死。[20]

有些女犯入狱时已怀孕，皆被强制打毒针，杀死婴儿，但仍有些妇女生下了孩子，结果都被狱医勒死。Kim Gung ok 生下一个男孩，她恳求狱医不要杀她的

孩子，婴儿仍被窒息而死，她则被关入禁闭室于五天后亦死去。

有一次，看守将男犯集中并宣布任何人能上围墙者皆可获自由，许多人冲向电网，结果均被电死。看守们则哈哈大笑。

1990年春天，150名犯人因食物中毒死亡，被集中埋于树下，且监狱方不通知家属。

在Kechon监狱约100名基督徒因其“迷信”被判10年以上徒刑。他们被隔离关押，委派重活脏活。有个基督徒被倒吊，但他始终不吭声，看守用尽各种手段逼迫他放弃信仰，他却咬紧牙关保持沉默，最后狱官命令全监犯人踏过他的身体，结果被活活踩死。[21]

1991年夏天季，一个女基督徒Lee ok dan不小心滑落一个充满肮脏水的大垃圾箱内，看守命令让她死不准救她。另一位基督徒不顾命令，进垃圾箱救她，另两位基督徒亦加入救援，看守居然下令关闭箱盖，结果四名女基督徒全被淹死在箱内，尸体均未捞出。

狱方每年强迫犯人背诵金正日生日讲话，随机抽检背不出者皆被关入禁闭室。一个平壤银行家抗议说：“我可以死，但我无法记住金正日的讲话”！这被视为污辱伟大领袖，他被公开处决。

金日成指示：“反革命种子必须彻底消灭三代，在古拉格中亦关押了大量儿童。1977年，年仅9岁的Kam Chol hean与家人一道关入Yodok监狱，他的祖父是个从日本归国的商人，祖母是个朝鲜共产党员，因批评政府的议论，被判入集中营，Kang Chol hean与祖母，父亲，叔叔和7岁的妹妹一道关押。祖父另关在Senghori集中营煤矿。他她被强制与父亲离婚，故未被关。当地有10个关押犯人的村，其中四个村是刑事犯与轻罪犯；六个是政治犯包括间谍，地主家庭，资本家和被清洗的党干。至1990年代中期，该地至少仍有7万名犯人。任何试图逃跑的人皆被立即处死。Kam在五年期间看到过15人被公开处决，任何申辩者，看守即用石块塞入其口中，令其无法发声。

Ann Myong Chol逃至韩国前曾任四个监狱的看守。他19岁开始任Hoeryong监狱的看守，上级指令他有权枪杀任何试图逃跑或攻击他的犯人。事实上杀犯人的看守获得上大学的奖励，因此有些无辜的犯人被枪杀。[22]

5.共产党特权阶级和人为谋杀性大饥荒

朝鲜劳动党财政部有个专门办公室负责金正日的健康。确保他获得最好的食物。他的大米来自M县的特殊农场，每粒大米均经过特殊检查。[23]

金正日的侄儿Lee Han Yong逃到韩国后，出了一本书披露了详情。金正日的瓶装矿泉水是Sindok牌但取自指定的矿泉点。

1977年他在全球集各种牌号的香烟。经个人品尝，缩小至Rothmeus和Dunhill，最后确定前者。指令当地按此生产特制Paektusan.Hennessy向Lee Han Yong确认，金正日是Paektusan公司（法国白兰地）最大的个人雇客，每年约700万美元。其订购量成为朝鲜政治晴雨表，因为金正日每年大量赠送给关键部下。[24]

后来其保健医生认为烟酒对其健康不利，他才于1982年开始试烟，并于1999年掉；他原业酒量很大，现在每天仅喝半波尔多博甘地牌白兰地。2001年金正日专列访苏联时，令从巴黎向火车发运。朝鲜官方聘请了两位意大利厨师专门为金正日制作比萨，还有日本厨师及法国厨师。

朝鲜人为谋杀性大饥荒。金正日是全朝鲜唯一的胖子。当他品尝博甘地白兰地酒并抱怨其品味不佳时，全国却有十分之一人口正由于饥饿活活饿死。直到1980年代，朝鲜粮食自给有馀，但此后人口增加，苏联解体停止友好价格，中国也要求支付美元，即出现缺粮。政府要求人民勒紧腰带，一天仅吃两顿；政府否认存在饥荒。一直到1995年由于气候进一步恶化，同年9月朝鲜才开始向国际社会呼救，联合国研究表明，朝鲜政府仅能供50%之需。

世界观察的 Andrew Natsios 发现朝鲜官方仍在欺骗人民。每当外国救援人员抵达现场之前，尸体，乞儿，儿童全被清空，只允许党员走出家接受粮食援助，官方为保政权，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官方向人民说，外国援助的真实意图是贬低共产主义；1995年日本运送了45万吨谷物，官方却告诉市民日本试图将朝鲜重置于殖民统治；同年韩国运送了15万吨粮食，朝鲜人却佩服金正日有办法让敌人供给粮食！同时，金正日为了显示其强硬，指令间谍对南韩攻击。

1996年一朝鲜间谍潜舰艇在南韩海岸隔浅。由于此，且由于据称援助的粮食全部被用于朝鲜军队，1996年至1997年，韩国开始游说外国政府不要援助朝鲜。1998年春，在美国，中国，日本，欧盟的粮食援助下饥荒才中止。[25]具体饿死人数迄今不详，但韩国情报机构据朝鲜官方1998年夏天的人口调查，表明死亡人数近300万。[26]2002年联合国，欧盟调查报告指出：10%的朝鲜儿童致命缺营养，40%严重缺营养；七岁儿童平均比韩国儿童矮20公分，轻10公斤。几十万逃入中国的朝鲜人仍面临逮捕甚至被枪决的危险。至少有30万朝鲜人已逃入中国，大量妇女沦为妓女，或嫁给中国农民为妻，卖女儿标价仅25美元一个！

1995年当全国仅共产党员就饿死了不下五万人的同时，金正日却仍大量进口法国上等葡萄酒，而不用土酒代替。因为他用的是自己的钱，故没有良心障碍。1999年有四个朝鲜妇女因走私超过五公斤的货物入中国即被公开处决。

依韩国银行专家估计，自1990年以来，北朝鲜经济缩水40%以上，代表国民收入90%的朝鲜官方年度预算显示，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下降了几乎一半。始于苏联崩溃，其长期经济援助，友好价格进口原油和其他产品中中断，1990年始朝鲜必须按实价支付真金白银。1999年据称北朝鲜经济增长了6.2%，因金大中采取的政策，使朝鲜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国家建交，与俄国和中国关系有所改善，2001年毛收入达150.7亿美元，人均706美元。

绝大多数亚洲国家多少已放弃专制而朝鲜却由于其错误的领导人保持原样。1993年朝鲜秘制核武器曝光，2002年10月试爆，经济失败，大饥荒，核武器，向恐怖组织出售核武原材料。

[1] Michael Breen Kim Jong-Il North Korea's Dear Leader (John Wiley & Sons (Asia) Pvt Ltd 2004. 米歇尔布瑞恩，自1982年始一直定居汉城，朝鲜问题专家，原系数家西方国家报社驻南韩记者，后成为西方与共产党国家做生意的公司顾问。

[2] 郭国汀 (Thomas G. Guo)，海事和人权律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国际海事海商法教授，法学翻译家。译有《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与律师实务》；《当代中国涉外经济纠纷案精析》；《国际海商法律实务》；《CIF与FOB合同》4版；《Scrutton 租船合同与提单》20版；《Omay 海上保险法与保险单》；《英国保险协会保险条款诠释》3版；《现代提单》；《油污和碰撞责任》；《国际贸易法》；《项目融资》；《国际海事海商法》；《英国协会保险货物保险条款船舶条款保险运费、战争、罢工险保险条款中译》；《审判的艺术》；《国际互联网自由》；《共产主义黑皮书》(精选)；《共产主义的历史》；《苏俄革命史》；《东欧革命》；《列宁不为人知的故事》；《基督教与人类文明》；《还原蒋介石》等专著。

[3] Michael Breen Kim Jong-Il North Korea's Dear Leader (John Wiley & Sons (Asia)

- Pteltd 2004) P. xiisee also An Authentic Biography of Kim Il song pp. 9-10.
- [4]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22.
- [5]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24.
- [6]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27.
- [7]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28.
- [8]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31.
- [9] Anthong Spaeth "Kim' s Rackets" TimeJune 92003.
- [10]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35.
- [11]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37.
- [12]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82.
- [13]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87.
- [14]Joong Ang DailyJune 232003Witnessed by his former Japanese chef:Kenji Fujimoto.
- [15]Defector Kang Myong do Quoted by Jo Yung hwan op. cit. p. 103.
- [16]Jemold M. Post and Lanritall DennyPaper Kim Jong Il of North Korea:A Political Psychology Profile. " : Kim ha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st dangerous personality disordermalignant narcissism. "
- [17]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92.
- [18]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10.
- [19]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29.
- [20]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33.
- [21]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35.
- [22]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40.
- [23]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43.
- [24]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44.
- [25] Michael BreenKim Jong-Il North Korea' s Dear Leader (John Wileg & Sons (Asia) Pteltd 2004. p. 149.

第三章：古巴共产极权政权的罪恶

提要：卡斯特罗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大农场主家庭，家有 2000 英亩土地（一英亩约等于六市亩）。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基本上皆出身于富裕之家，马克思出身于富裕的律师家庭，恩格斯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他本人也是个资本家，而且据称恩格斯一生中曾资助过马克思一家人共计 600 万法郎（但这一说法似乎缺乏依据），而马克思一生基本上纯属靠恩格斯接济养家。

在中共匪帮对象卡斯特罗那样的巨富，要么当人质敲榨勒索直至彻底破产，要么已被杀头加没收全部财产。

按共匪的强盗逻辑，只要是富人便该死。因而中共土改杀地主超过 200 万。古巴另一位革命领袖格瓦拉是个列宁的狂热信徒。1928 年出身于阿根廷布宜诺斯爱丽思的一个富裕家庭，青少年时曾周游南美各国，1950 年初开始反美。1956 年在墨西哥遇见青年流亡律师卡斯特罗，1956 年 12 月与卡氏一道返回古巴，很快便赢得冷酷无情的名声。一个儿童游击队员仅偷了一点食物，便被格氏未经审判直接枪杀。（651）他说“我不能与任何不能共享我的观念的人做朋友”表明其人实质上也是个专制独裁者。作为农业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后任经济部长，但他却没有最基本的经济观念的概念，最后将中央银行搞跨。

1960 年他亲自创设了劳动改造营，创办恐怖学校，绝对有效地将人训练成高效残暴无情，冷酷的杀人机器。他是个信奉教条，冷酷，不宽容的人。被称做古巴的雅格滨和安东尼，亦即冷酷无情残暴。他崇拜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 年格氏到波利维亚推销其游击战术，但没有一个农民参加他的训练计划，同年 10 月 8 日被波利维亚当局逮捕，次日被枪决。郭泉博士曾在一篇文中称他最敬佩的人物即是格瓦拉，恐怕郭泉博士仅读过共产党欺骗宣传的虚假英雄而不知道其真相。（653）

卡斯特罗早年在教会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当了律师，因不满当局而参加革命。1953 年卡氏被逮捕并被判刑 15 年，主要得益于圣地亚哥主教 Serantes 的干预而获释。1957 年 3 月卡氏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称：“我对权力不感兴趣，胜利后，我将回到我的村庄重新当一名律师。”“没有面包，便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也没有面包”，1959 年青年律师卡氏如是说，然而当他成为独裁者后却说：“犯人即使吃得再好，仍然是犯人。”1994 年卡氏说：“我宁死也决不放弃革命！”

一、夺权与清洗迫害

1959 年 1 月 8 日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意外轻松地夺取政权。原 Batista 政府（自由宪政）因对城市恐怖失控，加之美国对其实行军事封锁导致其失败（600）。夺权之初卡斯特罗并非共产主义者。因为其革命损害了资产阶级和美国的利益，需要靠山，苏联愿意做其后盾，而改信共产主义。（31）夺权伊始，卡氏政权即在两大监狱大开杀戒。在五个月内杀了 600 余名 Batista 政府的支持者，特别法庭专门审判那些反对现政权者，极权性质从一开始便已形成。（648）

1959 年 2 月 15 日，卡氏时任总司令，取代 Cardona 成为总理。虽然刚开始

他承诺在 18 个月内举行选举，而到 6 月他决定无限期推迟选举。随后废除了 1947 年《宪法》及《基本人权的保障法》，改依他随心所欲颁布的法令管辖，直到 1976 年他才按苏联宪法翻制定了《古巴宪法》。

1959 年春卡氏改变了政府的民主方向，日益依赖他的弟弟 Paul（2008 年继任古巴总统）和格拉（Guevara）。1957 年 5 月 17 日卡氏启动农业改革，采纳马克思主义方案进行农业集体化改革。1957 年 7 月 Urrutia 总统辞职，外交部长 Agramonte 被卡氏的铁杆支持者 Rea 取代；随后社会事务部长亦辞职，财政部长 Fresque 自 1959 年 1 月便已与卡氏分道，成为反对派，后流亡海外；另一政府高官 Suarez 也被迫离开古巴，最后一家独立报纸消声匿迹。其余皆保持沉默。（650）1960 年 1 月 20 日一家反 Batista 政府的报纸的主编 Zayas 被迫流亡；另一家周报的主编 Quevedo 也流亡美国；唯一剩下的报纸是“共产主义 Granma”。1960 年秋，最后的政治和军事反对派领导人 Morgan 和 Marin 被逮捕。Morgan 原是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次年他被枪杀。（650）最后的民主派 Ray 公共艺术工作部部长，交通部长 Oltasky 被赶出政府。随即开始了第一波大流亡，近 50000 名中产阶级，其中许多人开始时支持过卡氏革命，全部选择了流亡。这些医生，教师，律师的离开，严重损害了古巴社会。（650）

工人成为第二批受迫害的对象。劳工组织从一开始便反对卡氏新政权；一个工会主要领导人 Salvador 曾被选举担任 CTC 总书记，当局指派两名马克思主义者协助他，使之边缘化，1962 年被逮捕，受酷刑，并判 12 年刑。因此卡氏将反 Batista 政权的主要领导人全部赶尽杀绝。后来卡氏又禁止工人罢工。（650）

1959 年教会谴责共产主义渗透教会。卡氏利用 1961 年猪湾事件，关闭了 La Quincena 教会期刊。同年 5 月所有的教会大学，包括卡氏就读的 Bethlehem Jesuit College 全部被关闭，教会房产和财产全被没收。卡氏身着戎军装宣布：“让所有的牧师卷起铺盖走人”！1961 年 9 月 17 日，13 名牧师被强迫离开古巴。虽然古巴称宗教信仰自由，但是通过各种迫害措施，诸如禁止信徒上大学或任职公务员，迫使教会边缘化。（651）

第三批迫害对象延伸至艺术领域，许多著名诗人，作家，画家最终被迫流亡。

1959 年 7 月卡氏最亲密的顾问之一，空军司令 Lanz 逃往美国，一个月后，即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逮捕。自 1956 年始，Matos 即大力帮助反叛者，后成为 Camaguey 省总督，他发现自己根本不赞成共产党政权，于是辞职。卡氏命令国安部逮捕之，作秀审判时卡氏亲临法庭施加压力：“我告诉你们必须作出选择：Matos 或我！”Matos 被判 20 年徒刑，并坐牢至最后一天。与他关系密切的数十位官员亦被捕入狱。（653）

二、司法黑暗与酷刑

在 La Loma de Los Cochinos 监狱，超过 1000 名反革命被处死。（654）Martin 辞去农业部部长之职后，试图组建一个反对派组织 Foco，随即被捕，并判死刑。他母亲求卡氏怜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饶他一命，卡氏答应饶其命，但数日后 Martin 仍被外决。（654）自 1960 年始司法被中央政府控制从而彻底丧失独立地位。

Pedro Luis Boitel 竞选大学生联盟主席，输给了由卡氏兄弟支持的 Cubella，Boitel 是个反 Batista 政府的斗士，也是个坚定的反卡氏政权者。不久他即被捕并判十年徒刑，关入极严酷的 Boniato 监狱，他举行过多次绝食抗议，要求改善

政治犯待遇均未果。1972年4月3日，他举行了最后一次绝食抗议，要求享有南美其他所有专制政权均给予政治犯的待遇。

45天后，他的身体变得极脆弱；49天进入植物人状态，当局仍继续拒绝采取任何措施。5月23日即绝食53天后他死了，当局拒绝他母亲看他的遗体！（654）

1960年代镇压期间，约7000至10000人被屠杀；30000人因政治原因被捕。

军事生产协会MUPA（1964-1967年）是首个利用犯人作为强制劳动创利的组织。自1965年11月始，组建集中营，任何被认为有害社会者，皆被投入集中营。包括天主教，清教，耶和華见证人。两年后，由于广泛的国际抗议，该组织被关闭，但由军事性组织取代。青年人被迫作农业式建筑工，常在恶劣条件下每小时仅7比索，相当于1997年的30美分；对犯人常用精神心理和肉体酷刑，电棍刑常用，犯人子弟被剥夺受高等教育权利，犯人配偶经常被开除公职；刑期时常被监狱当局加刑；凡是拒绝着号服，绝食抗议者，法院视此种行为为对抗国家，因而加刑一至二年。犯人通常均服加1/3或者1/2刑期。Boitel原判十年，最后却实际服刑41年！（657）设计关押两人的牢房通常关押七至八人。高危险犯人被关入地下牢房，近年来，精神心理酷刑取代肉体酷刑；学自苏联的剥夺睡眠刑被广为运用。狱方时常威胁犯人其家人正在受到迫害，或将剥夺与家人会见权。

Q-2中心有个特殊温控牢房，可以每20分钟定期使犯人醒一次，关进此种温控牢房者通常长达数月，往往使犯人受到极严重的精神心理酷刑折磨。古巴最著名的La Cabana监狱，1982年还枪决了100多人，1985年被关闭。其他地方仍继续存在处决犯人的情形。在Boniato监狱有些政治犯用粪便涂抹自己，以免被其他犯人强奸。Boniato是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条件更恶劣，食物被污染，传染病普遍，诸如斑疹伤寒和麻风病相当普遍。结果，数百名犯人死于饥饿和缺乏医护。1995年政治犯与普通犯人举行了一场长达30天的绝食抗议，但未取得改善。（658）

有些监狱仍使用铁牢。铁笼一米宽，一点八米高，十米长，没有水或卫生设施，犯人关入其中达数周甚至数月。

有的监狱迫使犯人赤身裸露会见亲人，女犯人时常成为看守性攻击和侮辱的对象。自1959年超过1100名妇女因政治原因被关入监狱。她们时常被迫在看守面前赤身洗澡或被殴打。

Dr. Martin Frayde是卡氏的老朋友，他描述哈瓦那Nuevo Amanecer监狱时说：犯人通常被强迫劳动12至15小时；此种监狱制度显然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1978年有15000至20000名良心犯。1986年12000至15000名政治犯被分别关押于55个区监狱。今日卡氏政府仅承认关押有400至500名政治犯。1997年春发生另一波逮捕潮。古巴人权代表称：今日古巴已不再有酷刑，大赦国际认为1997年古巴政治犯至少还有980至2500人。

三、秘密警察特务统治

夺取政权后，卡氏即开始建立严密的安全和情报体系。作为国防部长，卡氏之弟重新组建军事法庭，第一个安全组织叫做国家安全部DGCI，被称做红色盖世太保。其任务是渗透和破坏各种反卡氏集团。它残暴地清洗了Escanbrat游击运动，监控强制劳教营，管辖监狱系统。Ranuri Vakdes担任首任特务头子。其有专门部门监控政府所有官员；第三部负责监控文化，运动，艺术，作家，电影部门的任何人；六部负责电话监听，共有1000多人，该部利用犯人的强制劳动，经济地为卡氏政权效劳；该部享有极大的特权，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655）

内政部 DSMI 第三部负责监控宗教和渗透教会。

自 1967 年始，卡氏设立了一支 50000 人的专门卫队。其中 DSP 特种卫队他三个专业部，专家长期研究防范各种暗杀手段，专人事先尝试卡氏的任何食品以防被投毒；专门的医护保健人员 24 小时随侯。(655)五部负责清除对手和暗杀。Elias 在麦阿密被暗杀；Vera 是反 Batista 政府城市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他在波多黎格被暗杀；Matos 流亡美国阿密后被迫雇私人保镖。

四、极权统治

1960 年 9 月卡氏设立保卫革命委员会，负责监控所有反革命行为。结果造成社会的严密控制。监视监听体制是如此严密，以致家庭亲热往往都不复存在。1975 年通过一项《预防犯罪法》，即便没有任何行为，只要当局认为可能对政府有危害性的任何人，皆可被捕。该法实质上将任何思想刑责化，只要不符合卡氏政权的思想，皆被当作犯罪嫌疑犯。1960 年代，人开始用浆投票，流亡成为卡氏调节内政困境的手段。大量古巴人逃往美国佛罗里达州。(663) 1980 年 4 月日数千名古巴人涌入秘鲁驻哈瓦那大使馆要求签证避居他国。数周后卡氏当局允许 12500 人自 Manial 港离境。卡氏政权借机将不少罪犯和精神病人赶到国外。

1994 年厦暴发了自 1959 年以来的第一次暴动；警察禁止人们离境，平息暴动后，卡氏被迫放行 25000 人。卡氏政权动用直升飞机向逃亡的船只扔沙包，结果造成 7000 人丧生海上；1994 年夏天，1/3 逃亡者丧生大海。30 年来超过 10 万人试图从海上逃生；1100 万人口中共有超过 200 万人流亡海外。

1975 年至 1989 年，古巴是马列自由安哥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除了派出技术顾问外，还派出 50000 (……译文如此，疑登载时缺失)

第四章：越南共产党暴政罪恶昭彰

提要：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皆是罪恶魔鬼的化身，它们之间唯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共产党是披着羊皮的狼，而狼决改不了其吃羊的本性。共产党政权皆犹如疯狗，而疯狗必然咬人，因为这同样是其本性。可怜中国人迄今仍然有不少被欺骗愚弄的几成脑瘫的无知“精英”，居然还在妄想中共主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暴政不灭亡，天理不容，神鬼不依！人神共愤，天地人皆怒的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岂能例外？！中共暴政必定灭亡，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定律，也是上帝的旨意。

一、秘密警察统治，党内争权大清洗

越南共产党成立初始，于 1928 年便处死了一名党的领导人，罪名是诱奸女同志。1931 年越共便开始屠杀了 100 多名地主，并模仿中共江西瑞金成立苏维埃 (soviet 本意为工人和士兵委员会)；1945 年越共才首次发起全面抵抗日本侵略，不过越共对叛徒和反动派远甚于对日本人的敌意。地主和地方官员成为越共暗杀的目标，大众法庭审判并没收他们的财

产。恐怖同时针对当时相对弱小的越共反对派（越共党员当年仅五千余人）。

日本于 1945 年 8 月 20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使越共胡志明一跃成为国家政要。在盟军到来之前数周，越共便对所有的竞争者进行大清洗。恐怖受害人包括越共所有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宪政主义者 Bui Quang Chiea，大知识分子和右派政治家 Pham Ouynh 和 Hnyinh Phu So，政治宗派的创始人 Hoa Hao 他本人亲自命令过多起暗杀；托派遭到系统灭绝；Ta TuThau 是托派领导人，1945 年被捕，9 月被杀；1945 年 8 月 29 日越共号召在各共各村设立除叛徒委员会。数百名托派随即被捕杀；其他曾助西贡当局者，大多被剥夺粮食或杀害；1945 年 8 月 25 日越共按苏联模式，建立国家安全组织（即秘密警察），刚清空的监狱很快又被填满。越共还成立了一个暗杀攻击委员会，大多数成员从当地黑社会中聘任。9 月 25 日该暗杀委员会即在法国占领区留下数十具断肢的尸体。嫁给法国人的越南女子也到制度性屠杀；仅在 8 月和 9 月两个月，越共暗杀了数千人，绑架了数万人。这些行为虽然都是地方越共组织发动，但无疑得到了越共中央的鼓励纵容。

越共中央后来公开后悔当时未能消灭更多的敌人。在越共控制的北方，1945 年以前便已设立秘密警察和集中营。成立于 1927 年的越南国民党，与越共之间进行了血腥的争斗，该党作为政治力量于 1945 被越共彻底清灭。越共 86% 的农村党支部被清洗；在抵抗法国期间，95% 的干部被清洗。军队首先受清洗，也最先结束。迫害对军官打击非常大。许多军官因此投奔南越。566

二、强制劳教死亡集中营

二战后，越共的迫害暴力重新成为反抗法国殖民权力的武装抵抗力量。许多证人证实：被越共关入集中营的原法国殖民军，大多饱受苦难并死于集中营中；20000 战俘到 1954 年日内和平协议签署时仅 9000 人仍活着。（567）可怕的印度支那山区传染病在监狱极差的卫生条件及缺医条件下到处漫延，犯人不时受饥饿手段迫害，殴打与酷刑相当普遍；1950 年始中共派了许多顾问，帮助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的劳改营。原则上法国犯人的待遇好过南越人。

范文同总理 1980 年承认：有 20 万人被劳教。按严谨估算至少有 50 万至 100 万人被强制劳改，受害者包括众多学生、知识分子、教士、牧师、神父和军人（包括越南共产党员）。南越反共政府也曾监禁 20 万人于监狱。

越共的监狱条件各异，越北方者越糟。监狱根本没有任何医疗设施保障，卫生条件极差，生存条件非常原始，与世隔绝。

在这些监狱在存纯靠家属接济，犯人每天仅有 200 克劣质大米。饥饿被用作迫害管理逼迫犯人就范的武器。设计关押 20 人的牢房时常关押 80 人，鞭笞和长期拖延审判期限司空见惯。越共监狱与殖民时期监狱相比，后者成为安宁平静的天堂。酷刑秘密进行，处决亦然。犯人不得会见亲人，甚至不得与亲人通信。

Chi Hoa 监狱在旧政权时代仅关押 8000 人，其生存条件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而在越共手中，同样的条件该监狱却关押了超过 40000 人！犯人常因饥饿，缺乏空气，酷刑或自杀而死亡。官方监狱一般皆是殖民时期留下来，条件相对较好；越共集中营全建在原始丛林中，犯人往往被判终生强制劳教；因没有审判，因此不可能用法律程序抗辩。1975 年 8 月日 48 名逃离越南的犯人向全球呼吁关注越南犯人极恶劣的生存状况。

三、煽动阶级仇恨，暴力抢劫地主

1953年12月日越共发动土改，至1956年结束；目的与方式与中共1946年至1952年的土改相似；加强共产党与贫下中农的联系；通过清除潜在的反共中心，土改为国家完全控制经济奠定了基础；由于越共强烈的民族主义，越南传统的农村精英（即地主、富农）初时大多支持越共。越共残暴和野蛮的方式土地改革与中共极相似。在每个村庄，越共极力鼓动最穷的贫农将受害者公审；受害者被相当随意按4-5%的比率任意确定，与毛泽东的5%比率一样。与中共的区别在于：中共的土改是在农业改革前进行，越共则是同时进行。

越共夺权伊始即兴建极权社会。这些土地改革受害者通常被杀害，极少情况下被监禁，其财产被没收，象中共一样，富人全家皆受难。有个富有的女地主和商人，尽管她是越共革命的赞助者及两个越共军官的母亲，仍被指控批斗，当地农民拒绝批斗她，一伙受中共训练的人冲进会场，煽动批斗大会气氛至狂热；她被指控于1945年以前杀害了三名佃户，与法国人睡过觉，还与法国人合作，任其奸细。由于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最后她被迫承认了一切指控而被判处死刑。她的一个当越共军官的儿子当时正在中国，被召回家后立即被剥夺军籍，判处20年刑！

越共不时煽动阶级仇恨。与基辛格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Le Duc Tho证明：“如果希望农民参军，首先煽动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1956年1月日越共党报称：“直至他们被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永远不会平静”。

四、杀人如麻酷刑迫害知识分子和宗教信徒

酷刑折磨是家常便饭。有个越共党员被越共杀害时还高喊：“越南共产党万岁！”因为他以为是法西斯杀害他。越共到底滥杀了多少人迄今仍是秘密。至少50000余人在农村被杀害，100,000余人被监禁；1,500,000名天主教信徒受越共迫害，在法国军队的护送下，其中60万信徒逃往南越。1956年4月日，越共也经历了一场可怕的“百花齐放”运动。知识分子公开要求自由，随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58年初，476名“意识形态破坏者”被迫公开自我检讨，并被关进监狱或类似中共的劳教营。1968年2月日越共进行了一场群体屠杀，至少3000人被杀害，其中包括越南神职人员，法国宗教神职人员，德国医生和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

五、人为制造大饥荒大批饿死人

1959年5月日越共秘密决议将战争延伸至南越。越共变相拟发动类似中共的大跃进。胡志明于1958年10月日亲自撰写多篇文章，鼓励大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项目，结果由于干旱导致农业生产欠收，引发了一场受害人数迄今不祥的大饥荒。连年持续的战争并不影响1964年至1965年和1967年的越共党内大清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批判斯大林后，一批亲苏越共干部随即被清洗，其中包括胡志明的前秘书。表明越共与中共一样反“修正主义”。有些受害者在狱中关了十年仍未审判。

与美国之战直到1973年1月日签署巴黎和平协议美军撤军后才终止。1975

年4月30日南越政府被越共击败。越共夺取全国政权后，立即对一百万原西贡政府工作人员和士兵强制学习三天（实际变成三年）官员和军官强制学习一个月（实际变成七至八年），劳教生还者直到1986年才回家。

越共夺权后，立即造成数十万人逃生大海，相当数量系中国人，其中许多人葬身大海或死于海盗之手。直至1986年越共才出现第一次松动。越共新书记Nguyen Van Linh上台后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并关闭了北部丛林中的杀人集中营，同时颁布了新刑法。许多知识分子和宗教信仰徒仍受迫害和监禁，任何不满和抗议仍被以极残暴的手段镇压。

老挝共产党暴政的罪恶自共产党夺权后，超过30万老挝人逃离该国，其中Hmong少数民族（高山）占30%，约10万人，另全国90%所有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官员逃离。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帮助Hmong族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反共武装。老挝共产党夺权相当平静，堪称亚洲式天鹅绒革命，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仿越南模式，几乎所有的前政府官员约30000人均被关入劳教营长达五年；约3000名要犯，主要是警察和军官，被关入严密的Nam Ngum岛上监狱。1977年皇家成员全部被捕，最后一位王了死于监狱。射杀逃亡者并非罕事。1975年Hmong族人大量逃亡，在此期间至少45000人被杀或死于饥饿。1991年仍有45000Hmong族人在泰国难民营等待分配到最终目的地。有数次对国家和共产党领导人的清洗，但不那么血腥。

1979年与中共关系破裂后也引起一场清洗；1990年当东欧巨变时，又进行了一次清洗。1988年50000名越军撤离老挝，从此老挝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自由经济改革，今日政治犯已很少，共产党变弱。但迄今仅有几千名难民返回老挝。老挝迄今极度贫穷与落后，其未来取决于几十万逃离共产党政权的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难民。

第五章：中欧和东南欧共产党暴政的深重罪孽

提要：前东欧共产党各国只有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主要靠本国共产党的努力而夺取政权，其他各国的共产政权，都是依靠苏联红军的武力支持下强行取得。正由于南共和阿共未得到苏共的实质支持，他们皆有相对独立性，因此敢于公开异议苏联斯大林模式，也因此被受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视为异端极尽打压。而苏联之所以在东欧大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英国首相丘吉尔为了英国私利，目光短浅地出卖了这些国家。1944年10月日丘吉尔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秘会，丘吉尔提出“比例协议”：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归苏联，希腊归英国，匈牙利苏联与英国各一半。[1]当即被斯大林接受。希腊共产党若非苏联的干预本有望夺取政权，因仅获南斯拉夫共产党支持不足以对抗英国，最终被迫放弃。而中共之所以能打败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与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于1945年2月签定的出卖中国利益的雅尔塔秘密协议密切相关：苏军在击败希特勒后三个月内出兵一百万打日本，罗斯福承诺由苏联占领我国东北半年。苏联红军除了将日本在东北三省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设施抢劫一空之外，将缴获的日本关东军所有的轻重武器，包括大量飞机、坦克、重型大炮悉数秘密移交给林彪的四野。因此土八路决非象中共长期欺骗国人的那样“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蒋匪军”！而且共匪军根本不懂也完全没有战争法的基本常识或根本就是故意采用纯属下三滥的流氓战术。例如围歼抗日名将张灵普将军第74师之战，共匪军

居然以地主，富农及其子弟作第一线冲锋头阵，继而以赤身裸体的地主、富农的妻女作为第二阵，然后才是共匪军跟进！而在长春围城战役中，共匪军故意采用饥饿武器，故意饿死长春市平民近 20 万人！据称在朝鲜战场上，当年志愿军彭德怀司令曾向金日成建议采用该流氓战术，仅因金日成多少还有点恻隐之心未采用。

全世界所有的共产暴政都经历了类似的暴力镇压同盟、残酷清洗党内竞争对手、迫害压制知识分子、摧毁宗教文化道德伦理、反复残暴血腥镇压工人和农民反抗、抢劫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私有财产、肉体消灭地主富农阶级、强制农业集体化（唯有南斯拉夫和波兰保留有私营农场）、取缔一切非共产党政治组组、消灭公民社会、利用秘密警察对全社会实行特务警察统治、利用强迫劳教集中营非法奴役及精神病院酷刑迫害所有敢于反抗的任何人士的一系列残暴下流无耻野蛮至极的极权罪孽。

共产党暴政的罪孽深重，史无前例，其迫害至死的人数肯定是史无前例，其野蛮残暴决不亚于希特勒纳粹犯罪组织。然而迄今仍有不少国人，甚至还有不少民运人士仍在一箱情愿地整天幻想与中共流氓暴政和解，甚至主张由中共流氓暴政主导进行所谓政治改良者们，念念不忘为中共暴政的点粒“进步”歌功颂德，至少在客观上严重麻痹误导了中国人的反抗暴政的英勇抗暴精神，导致中共流氓暴政得以苟延残喘迄今；最近中国刑法界在评论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时又出了三个无耻之尤：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教授，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陈卫东教授。南郭以为此三位“教授”是典型的助肘为虐不知羞耻为何物的重罪犯！因为他们决非因学术水准低下，也非由于不知道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深重罪孽，而纯属出于贪图个人一己私利，昧着良心不惜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为中共流氓恶法瞎辩，它们严重沾污了学人的清誉因而应当被牢牢地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共极权暴政是全球仍逍遥法外、肆无忌惮欺压盘剥亿万中国人的邪恶轴心。中共暴政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残民以逞，甚至耀武扬威原因故然众多：除了广大民众对共产党的罪恶本质认识不清，对共产暴政的罪孽真相相当无知，尚未真正觉悟觉醒之外；中国学人中还有不少类似高铭暄，赵秉志，陈卫东等此种无耻至极、极度自私自利的拍极权流氓暴政马屁，以期分脏暴政榨取民膏民脂的“流氓教授”的出卖灵魂之辈克意误导欺骗公众不无有关，也与部分民运及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对共产党罪恶本质的实际上严重无知，以致迄今仍时刻不忘跪求流氓暴政自动政治改良的严重误导有关！共产暴政是绝对不可改良的邪恶政权，这是早已被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为真理的常识！而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肯定是所有共产政权中最邪恶，最下流无耻，最野蛮残暴，最无道德，最无人性的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流氓暴政！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共产党到底是什么玩意？！让事实和证据来说话。这是一篇全面归纳总结东南欧前共产党政权犯罪史的纪实文章，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罪恶远非该文所能全面深入准确揭示，共产党的罪孽深重，远非一篇短文所能完整概括，尽管如此却可见一斑。作者是精通东欧历史的历史学家，立论清晰明确，论据充分，证据来源客观公正，论证亦雄辩有力不容置疑，尽管如此，南郭竭诚欢迎任何人（包括中共的所谓理论家、历史学家、法学家们）认真负责的质疑争论与批判。

一、大清洗政治异己

保加利亚人民爱国阵线 1944 年 9 月 9 日，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夺取政权，10 月 6 日成立人民法庭。1945 年 3 月日，经 131 场审判，作出 10897 个判决，处死 2138 人，包括摄政王，国王 Boris 三世之兄长，政府高官，政治家，法官，记者，企业家。随即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大清洗，3 至 4 万人死亡或失踪，主要包括地方贵族，市长，教师，天主教神父，店主。

1989 年许多秘密群体屠杀坟墓被发现。395。

1923-1944 年通常被认为是专制的君主统治时期，依 1945 年新议会调查后确认：5632 人被暗杀，处决，或死于监禁或由于在该期间被判决入狱。自 1941 年至 1944 年，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期间，仅 357 人被处死或丧生！396 亦即，与君主专制相比，共产暴政要比前者残暴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即便与法西斯政权相比，共产党暴政也决无任何优点可言。

捷克斯洛伐克人特别残忍无情，在追杀德国纳粹过程中，数千名无辜德国平民被杀害。397

据张戎女士《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故事》披露：1961 年中共人为制造的人祸大饥荒最严重时，中国外交部人员曾商请捷克外长减少向中国要粮食，居然为之拒绝。

共产党独裁权力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解放之初即已确定。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其它东欧国家在二战前共产党均十分弱小，故初期皆为联合政府。但共产党皆掌控内务部，司法部或国防部。1944 年至 1945 年期间掌控内务部的有捷、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掌控司法部者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掌控国防部者捷、保加利亚；共产党还掌控国安部，及秘密警察和军队的情报部和恐怖机构。398

苏联共产党清洗所有先前的同盟：例如：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东欧各国则清洗所有非共产党之抵抗运动的同盟和战友；共产党清洗任何实际或有潜在竞争实力者，毁灭一切意识形态，政治理念，及精神领域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求必须将对手干净彻底清除。而且不择手段，死刑，处决，长期监禁，驱逐出境，无所不用其极。399

共产党用的第一个手段是对所有非共产党的政敌进行政治审判。首先在前亲德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

匈牙利小业主党 (Smallholder) 在 1945 年大选中获胜，赢得 57% 的选票，于是共产党内务部长 Rajk 于 1947 年 1 月日，下令逮捕所有小业主党的部长，指控其阴谋颠覆政府，处死了 Donath，其余全部判重刑。(399) 1947 年 2 月日，小业主党总书记 Kovacs 以阴谋反苏联红军的罪名被逮捕，关押在苏联直至 1956 年。受害者范围迅速扩大。小业主党的所有重

要领导人，曾任政府各部部长及市长者，皆被逮捕或被迫流亡海外。在 1947-1949 年期间，独立党和人民民主党被解散。匈牙利工人党和小业主党被彻底清除。400

1948 年 2 月日共产党起诉匈牙利社会民主党，逮捕 Kelemen。保加利亚最先起诉社会民主党人。1946 年，该党总书记 Pastakhov 被判五年徒刑。1946 年夏，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15 名领导人，包括书记 Lulchev，全部入狱，于 1948 年被判刑 15 年。1948 年 5 月日，罗马尼亚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被捕。(400) 1950 年 5 月日，200 多名民族农民党著名党政领导人被关入监狱，包括政治家，将军，

记者，神父，天主教牧师，在五年内其中 52 人死于监禁。400

1945 年至 1950 年期间，东德 5000 名社会民主党人，被苏联和东德法院判决，其中 400 人死于监狱；1954 年在布拉格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审判。

1946 年 10 月 27 日，保加利亚选举期间 24 名农民联盟党候选人被暗杀。该党总书记 Petkov 于 1947 年 6 月 5 日，与其他 24 位代表一道出席国会时被逮捕；他在战后出任副总理，但随后辞职，抗议共产党之恐怖清洗，他被以阴谋武装反抗政府为名于 8 月 16 日处死刑；他发表的自我辩护词感人至深。当法官宣判时称：以保加利亚人民的名义判处 Nikolai Petkov 绞刑时，他高呼：“不！不是以保加利亚人民的名义！我是被你们的外国主子莫斯科处死的，被这血腥暴政欺压的保加利亚人民，决不会相信你们的谎言！”他于 9 月 23 日被绞死。共产党国安部长 Kostov 一手操办了其逮捕，审判，处死。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后他自己也被绞死。402

1947 年 10 月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判处国家农民党领袖 Iuliu Maniu 和其他 18 位该党领导人无期徒刑。Maniu 于 1952 年死于监狱。甚至在 1946 年 11 月 18 日大选之前，数十位政治家，包括自由党的 Bratianu 被军事法庭指控恐怖组织罪。402

捷克共产党赢得了 1946 年 5 月日大选，但捷共在斯洛伐克很弱小，斯洛伐克民主党赢得 62% 的选票；捷共首个迫害目标即是斯洛伐克民主党。其它非共捷党政党，主要受反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支持，对斯洛伐克民主党受迫害有点幸灾乐祸。1947 年 9 月日，斯洛伐克民主党两位总书记被逮捕。(403) 1948 年 2 月日，捷共全面展开迫害其他非共政党；引发了非共政党之部长们大多辞职，包括时任副总理的民主党领袖 Ursiny；和时任司法部长的 Drtina。1948 年 4 月 5 日，25 位斯洛伐克民主党领袖被判刑，一人被处 30 年徒刑。清洗全面展开，其实直到 1948 年 2 月以前，民主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所有的领导人，军中和安全部门的非共产党人员，以前都是共产党的同盟；其中好些人主张与共产党密切合作。

Hekuidir Pika 将军的命运很能说明问题。一个伟大的爱国民主人士，抵抗运动至关重要的人物，亲苏且作为捷克军事代表团代表赴苏联，他曾要求苏联释放一万名于 1938 年至 1939 年越苏边境的捷克人，自 1945 年底开始，他的行动即被军情局严密监控，1948 年 2 月日被解除职务，5 月被逮捕，1949 年 1 月 28 日，被旨在政治迫害的特别法庭处死刑，同年 6 月 21 日晨被绞死。Reicin 军情局长对同事说：因他知道太多苏联情报秘密，苏联要求处死他。而军情局长自己同样因知道太多共产党的肮脏勾当于三年后也被绞死！404

1948 年 2 月日 Moravia 首府 Brno 市长 Toset Podsednik，1946 年大选时他作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候选人，主张民主和人道主义，他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党的代表人物（该党 1947 年 12 月 30 日有超过 60000 名党员），他也是真诚相信与共产党人合作者。1948 年 2 月日后，他原拟移民海外，后因拟帮助那些受迫害的党员而放弃，9 月 3 日被捕，1949 年 3 月日，被国家法院罗织企图暴力推翻政权，非法活动，与外国反动派勾结等罪名处 18 年徒刑。其他 19 位党的干部合计判 74 年刑。所有的证人皆是自已待决的政治犯。另 32 人随后被以 Podsednik 集团成员为名判刑合计 62 年刑。(405) 该案是由国家法院审理的第一起政治案，数十名共产党领导人出席法庭审理，Otto Sling 听判决时笑了，他后来在 Slanksy 审判中被判死刑。清洗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同盟在 1950 年 3 月 31 日至 6 月 8 日审判 Milada Horakova 期间达到高峰。130 名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人民党，及托派领导人被判刑。4 人被判死刑，4 人无期，5 人 15 年至 28 年；另外 300 起

审判与 Horakova 审判有关，仅社会主义党有超过 7000 名党员被判刑；1950 年 5 月至 7 月，全国许多省、市大规模审判，证明这是共产党全国性策划阴谋。在 35 起审判中，共作出 639 项判决，10 人被处死刑，48 人处无期，共 7850 人处监禁。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审判：第一个真实的作秀审判，第一个直接由苏联顾问指导的审判，苏联情报头子亲自指导恐怖措施，事先准备充分，所有的证人和法官均知道底线，整个秀审作为专政的宣传品。(405) 该案不仅仅在共产主义的历史中，在欧洲迫害历史中也有重要意义：一位妇女被绞死，而她曾是一名抵抗运动勇敢的女战士，她曾被关入纳粹监狱五年！

二、毁灭公民社会

共产党永恒的策略，其中心目标在于建立绝对权力，因而清除任何政治反对派及社会中任何有真实力量的任何人，系统攻击公民社会中一切有组织的力量是其必然的逻辑。由于其目的在于独裁权力和独占真理，其必然将所有其他政治力量及精神力量作为镇压目标。因此其系统的攻击目标必然是各种组织，政治活动家，神职人员，记者，作家等。407

社会民主党人，天主教，托派，清教徒，其他被系统攻击者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国内行动，而且是由于他们性质上天然与外国的紧密联系。东德之所以司法相对温和，没有公开秀审政治迫害，不如其他东欧国家残酷，与德国 1949 年以前原有强大的公民社会密切相关。而在其他东欧各国，新政权不可避免地伴随大规模政治迫害和作秀审判。依 1989 年柏林墙跨掉后的研究显示：苏军在 1945 年至 1954 年，在其占领区内将 122,000 人监禁，其中 43,000 人死于监禁；736 人被处决；东德共产党（社会主义团结党）承认：对四至六万人进行了政治迫害。408

在所有东欧国家中，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他是唯一的一个战前即有议会民主传统的国家，虽然罗马尼亚也有有限的议会民主经历。捷克斯洛伐克还是世界前十名的工业最发达之国，其中捷克工人占人口 60%，斯洛伐克工人占人口 50%。

解放之际，它拥有最发达的公民社会；1946 年，250 万人（近一半成年人）分属四个主要政党，200 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属联盟成员，几十万人属各种组织及协会会员。其中 Sokol (Falcon) 俱乐部（政治性协会）1948 年拥有 70 万会员；1948 年夏天，第一个俱乐部成员被捕，对俱乐部成员的政治审判始于 9 月。两年后，数千名领导人被捕，整个俱乐部几乎被毁。

[1]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Holmes is Prof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三、迫害宗教信仰组织

对共产党政府而言，教会是消灭或控制公民社会机构的最大障碍。天主教会是受凡蒂岗指导的组织，成为莫斯科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信仰的最大竞争对手。莫斯科精心策略即是切断罗马天主教会和统一教会与凡蒂岗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独立权力的国家教会。为了减小消除教会的影响，将其置于国家官僚机构控制下，改造成共产党的政策工具，共产党综合采用了迫害、引诱腐败和全面渗透各层教会组织的手段。档案显示捷克斯洛伐克有数百名神父，甚至不少大主教

与秘密警察合作。409

阿尔巴尼亚最先实施宗教迫害，Thaci 大主教死于秘密警察软禁中；Darres 主教在 Predushi 被判 30 年强制劳改，1949 年死于酷刑。1948 年五名神父被处决。100 多名牧师，修女及和尚被枪决或死于监狱。至少一名伊斯兰教士亦死于迫害；Mustafa Pipa 律师因为 Franciscans 主教辩护，亦被处决。1967 年恩维尔霍查宣布阿尔巴尼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官方无神论国家。同年 11 月官方报纸骄傲地宣布：全部教堂和清真寺共计 2169 个，包括 327 个天主教堂被摧毁或关闭。409

1948 年匈因开始国有化无数教会学校，匈牙利政府与教会之间引发暴力冲突，7 月 5 名神父被判刑，8 月更多牧师受审 Mindszenty 大主教 1948 年 12 月 26 日被捕，1949 年 2 月 5 日被判无期徒刑。（410）一年后，政府侵占绝大多数教堂和清真寺，将 12000 名牧师和修女中的绝大多数驱出。（410）1951 年 6 月日，Grose 大主教与前者同命运亦被处无期徒刑。匈牙利共产党政权迫害天主教及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会。

捷克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一样，试图切断天主教与罗马的联系，以迫使其与政府合作。当该策略不凑效后，迫害加剧。1949 年 6 月布拉格大主教 Tosef Beran，先被软禁后投入监狱，他于 1942 年曾被纳粹德国关入集中营。1949 年 9 月。数十名牧师因抗议有关教会的新法令被捕；1950 年 3 月 31 日，在布拉格开始审判数十位教会高级领导人。Mastiliak 神学院教区长被判无期徒刑。其他人共被判 132 年。1950 年 4 月 13 日和 14 日夜，针对神职人员的大规模逮捕，几乎所有的教士和修女全被驱出教堂，或被捕。与此同时，所有的主教皆被软禁，禁止与外界联系。1950 年匈斯洛伐克政权下令清洗希腊天主统一教，命令其与东正教脱离。凡是不同意的牧师全部被关押。410

迫害教会是由共产党领导人负责与控制。1950 年 9 月日，共产党批准了一系列对天主教的审判，始于 1950 年 11 月 17 日，9 名主教，牧师长在 Moravia 被判重刑。1950 年 1 月 15 日，在 Bratislava，以凡蒂岗的代理人为名，三名主教被分别判十年至无期徒刑。1954 年 7 月日，曾因抵抗运动被纳粹关入集中营的 Dachau 主教被判 25 年。共产党不仅迫害居于高位的基督教领袖，而且打击所有的基督教知识分子。Ruzena Vockova 是一名抵抗运动战士，Charles 大学艺术史教授，因支持政治良心犯的事业，于 1952 年 6 月日被捕关押至 1967 年。1952 年在 Brno 举行了 20 世纪最大的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审判。Bedrich Facik 是一名天主教知识分子，1951 年春被捕，受酷刑后被迫认罪，被判 15 年刑，于 1960 年被赦免。

自 1948 年秋始罗马尼亚清洗仅次于东正教的希腊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对此保持沉默，其高层通常支持当局，但并不能阻止当局关闭许多教堂及逮捕其许多牧师。10 月所有的希腊天主统一教堂被关闭，1948 年 12 月 1 日希腊天主教被官方正式禁止，当时其有 1573000 名信徒，2498 座教堂建筑，1733 名牧师，当局没收教堂财产，关闭教堂，烧毁其图书馆，超过 1400 名牧师，5000 名信徒被捕，约 200 人被谋杀。412

1948 年 5 月日罗马尼亚 92 名神父被逮捕，开始迫害罗马天主教，其有 1250000 名信众，罗马尼亚当局关闭全部天主教堂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及慈善机构。1949 年 6 月日，数十名罗马尼亚天主教主教被捕，随后，所有的清真寺亦被禁。

1951 年 9 月日布加勒斯特大审判达到高峰，数十名主教被指控间谍罪。

四、大建集中营

布尔什维克理论是消灭一切私有财产。1945年所有的新政权实施广泛的国有化计划，首先针对德国，叛国者和与敌人合作者；一旦共产党权力稳定，即向普通民众开刀，小地主，店主，艺术家，小工场主，作坊主，没收其财产；1949年至1950年，轮到农民，他们被强迫集体化，产业工人亦因此新举措而受害，其自由和生活水准下降。1948年夏天，罢工潮开始在捷克15个城市，斯洛伐克3个城市出现。1951年底罢工再现于工业区。1953年6月日，10家大工厂宣布罢工，停工。随后472名罢工工人被逮捕。

农民起义不时出现。1950年7月日罗马尼亚农民起义，农民徒手围在党政机构外，受到军警镇压。妇女儿童跪求军警不要开枪，他们仅是因为饥饿请求政府不要强征他们的麦子。但Stanesco Mantin下令向和平起义的农民开枪。415

1945年至1954年，数百万人受迫害，不仅被监禁者，而且他们的亲人也受迫害。大规模从布达佩斯，索菲亚，布拉格，布加勒斯特驱逐流放外省，大学生被赶出校园，数千人被列入黑名单。捷克斯洛伐克早在1950年，工人占反政府罪被监禁者总数的39.1%；工会官员占第二位达28%，农民的比例相对低些。1951年到1952年，几乎一半以上被国安逮捕者是工人。1950年统计反共和国轻罪，在捷克各省41.2%是工人；17.7%是农民；在斯洛伐克工人占33.9%，农民占32.6%；农业工人被判刑占28%。占被判死刑者18.8%，被判无期的17.6%。在其他东欧各国有相似的比例，虽然有时农民是主要受害者。415

集中营是共产政权最野蛮的产物。监狱从来无法满足过多的犯人。布尔什维克与纳粹均是在和平时期大建集中营迫害人民。二战时中欧地区兴建了大量集中营系统：监狱，劳教营，古拉格。1945年后，最早在保加利亚建立新型监狱，1945年法令允许警察建立劳教营，称做“劳动教育公社”及“死亡之吻”。古拉格于1949年至1950年落脚于中欧及东南欧。其主要目的出于经济考虑。其座落均在当局最需要纪律的廉价劳动力之所。匈牙利和波兰劳教营皆座落于矿区附近。罗马尼亚的劳教集中营大多位于Danube黑海附近。称做“死亡隧道”，数千名反抗集体化的农民被关押于此地。捷克斯洛伐克劳动营大多位于Jachymov地区的铀矿，煤田附近。生活条件极为严酷恶劣，特别是1949年至1953年期间，日常的劳动总是使犯人精疲力竭。阿尔巴尼亚有19座监狱，保加利亚有86座古拉格，1944年至1962年期间关押了187000人；匈牙利在1948年至1953年期间，几十万人被起诉，另有人估计700000至800000人被判刑；大多数罪行是侵犯国家财产罪。东德建柏林墙以前，新政治犯似乎很少；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监禁了30万至100万人。英国历史学家DennisDeletant估计罗马尼亚1950年初有18万人被监禁；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至1954年期间已确认政治犯超过20万人，共有422个劳教营和监狱。419

东欧各国监狱系统皆复制于苏联，因而均极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各增加了某些与苏联监狱不同的特点。罗马尼亚秘密警察使用所有传统的酷刑手段于审讯。但位于Pitesti的监狱酷刑远超出通常情形；用烟烫全身，屁股烫焦，皮肤脱落象麻疯病人一样。强迫吃粪便，当犯人呕吐后，再强迫其吃掉呕吐物！（420）罗马尼亚是第一个引进亚洲共产党国家在监狱中使用的洗脑手段的国家。邪恶的目的旨在引诱犯人酷刑举报其他犯人。1949年12月至1952年，罗马尼亚当局原拟扩大使用该亚洲共产党酷刑四阶段术，因被西方世界得悉后，

不断在广播中披露抨击，当局才被迫决定终止该极反人道的野蛮酷刑。保加利亚 Lovech 监狱建立于 1959 年，该监狱处决犯人特别野蛮残忍，直接用棍棒打死。此前被关闭的 Belene 监狱因将死于监狱的犯人喂猪而臭名昭著。(421) 波兰反对派有武装反抗；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有武装反共组织。

五、共产党人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

1945 年匈牙利秘密警察将 Pal Demeny, Jozsef Skolnik 和不少他们的朋友投入监狱关至 1957 年。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总书记 Stefan Foris 下场更惨。他被指控为警方代理人，直至 1944 年，一直置于监控下，1946 年被共产党用铁棍打死。

其母亲四处找他，结果被脖子上绑上石块沉入江心。1968 年齐奥塞斯库曾谴责对 Foris 及其朋友们的政治谋杀。423

1948 年 6 月日，共产国际组织各共产党围攻南斯拉夫铁托总统并要求开除之，除了阿尔巴尼亚外，所有当权共产党国家及意大利，法国共产党均属共产国际成员。一个小共产党国家挑战整个共产王国。随着封锁，南斯拉夫经济危机加重，苏联重兵陈列边境，铁托政府因仍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经济改革是所有共产党国家最早进行的也卓有成效，仍决定建更多的劳教营。南斯拉夫有许多岛屿，第一个苏式集中营建于 Solovetski 群岛，主要的劳改营叫 Goliotok，或裸岛。

其使用的再教育方法与罗马尼亚之 Pitesti 监狱相似。酷刑对犯人乃家常便饭。一种刑罚是将犯人的头强行按入充满粪便的桶内。有一名犯人由于被反复实施此种酷刑，以致在两年多时间内，他都会条件反射主动将头埋进任何他看见的桶内。

1948 年至 1949 年，迫害共产党人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迫害运动。最新披露的秘密显示清洗了 16371 人，其中 5037 人被审判，四分之三被关入 Goli Otok Grgur 监狱。据独立分析员 Dedi jer 的估计仅 Goli Otok 一个劳改营就关押了 31000 至 32000 人。但具体在狱中多少人死于枪决，累死，饥饿，疾病，自杀迄今仍无人知晓。425

1948 年初，罗马尼亚共产党公开审判 Luoretiu Patrascanu，他是 1921 年罗共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 1944 年始任司法部长，1948 年 2 月日被解职并关入监狱，1954 年 4 月日被处死刑，4 月 16 日被枪决。一种说法是罗共总书记 Gheorghe Gheorghiu Dej 害怕他东山再起，视之为潜在竞争对手故迫害他。

1949 年反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第一次审判首先在阿尔巴尼亚展开，阿共领导层与南共关系密切，既定受害人是 Koli Xoxe，共产党武装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战后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他忠于铁托路线。1948 年党内发起政治运动，攻击亲南斯拉夫的由 Xoxe 和 Kristo 领导的托派。1949 年 3 月日所有亲南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全被捕，Xoxe 与其他四位领导人在地拉那受审，1946 年 6 月 10 日被判死刑，次日被枪决。其他四位领导人均获重刑，不久所有亲南的阿共党员皆被清洗。426

第二起反铁托的作秀审判发生在布达佩斯，Laszki Rajk 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西班牙建立国际支队，任内政部长时镇压迫害了许多非共产党民主派人士，后任外交部长，1945 年 5 月日被捕，被先前的同事酷刑并恐吓：若他帮助党将不会被处死，他被命令在法庭上认罪坦白，并指责铁托和南斯拉夫是人民民主的敌人。9 月 24 日匈牙利法庭判处他与另两名

同犯死刑，不得上诉，10月16日绞死。随后军事法庭判处四名高级军官死刑；接着94人被捕，其中15人被处决，11人死于监狱，另加1人自杀一共60人死于非命，50人被处十年以上重刑。（426）该案源于共产党领导人内部的仇恨。

总书记 Matyas Rakosi 和秘密警察头子的心，影响了选定受害人，但基本事实乃是该案实际上是莫斯科秘密警察头子和负责中欧东南欧事务的情报头子的阴谋。该案证人是一名美国人 Noel Field，现已证实是个暗中帮助苏联的秘密共产党员。426

这种试图发现铁托国际集团的阴谋，在索菲亚审判 Traicho Kostov 案中再次得以证实。Kostov 是个富有经验的共产国际官员，抵抗运动战士，曾被保加利亚前政权判处死刑，战后任国家委员会副主席，曾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 Georgi Dzunchev 的继承人。1949年5月日 Kostov 与其他同案一道被捕。12月7日开始审判他和其他9名同案犯，一周后判决死刑，罗织的罪名是保加利亚警察和前政权的代理人，铁托式叛徒，帝国主义的走狗。4人处无期，3人处15年，1人处12年，1人处8年。两天后，他的上诉被驳回并被绞死。（427）庭审中 Kostov 推翻原供，称那是在酷刑下被迫所作的虚假供述，自辩无罪；但他立即被法官禁止说话，在最后陈述时他说自己是苏联的朋友。1950年8月日他的12名同事被审判，1951年4月日另两名 Kostov 阴谋帮成员受审；随后另两名保共中央委员会成员受审，还有数名军人和秘密警察也受牵连。427

匈牙利 1949年5月逮捕 Gejza Charlotte。

1949年位居第三的捷共领导人被捕。1952年8月30日至9月2日，在 Bratislava 审判以 Stefan Kevic 为首的16人，2人被处死刑，其中一个被绞死。苏联 KGB 顾问 Mikhail Likhachev 公开说：“斯大林派我来不是讨论问题，而是砍掉脑袋！”

1951年11月24日捷共总书记 Rudolf Slansky 和共产国际高级官员 Bedrich Geminder 被逮捕，苏联 KGB 官员亲自酷刑准备作秀审判的材料，1952年11月20日秀审开场，一周后宣布判决11人死刑，3人无期。1953年12月3日凌晨3点至5点45分，11人被绞死。429

Slansky 自1945年始任捷共总书记，忠于莫斯科，是党内政治局常委五人小组主席。Josef Frank 是外贸部副部长，1939年至1945年坐纳粹监狱。Otto Fischl 是财政部副部长。捷共 Slansky 审判延续至1954年。1954年1月26日捷共创始人之一，Marie Svermova 自1929年至1950年一直任捷共领导，被判无期；6名同案高官被处总刑期合计113年。1954年2月23日，6名兵捷共托派被判刑合计103年；1954年4月21日，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 Gustav Husak 判无期，四名同犯判合计63年；1954年其他六起审判，主要是军官，经济官员（11人获刑204年）和社会民主党人。

最后一审判是1954年11月15日审判经济学家 Edward Outrat。Osvald Zavodsky 是最后一个被处决的共产党高官。

他是国际大队成员，抵抗运动战士，战时被驱逐出境，1948年任秘警察头子，1953年12月被处死刑，1954年5月19日被绞死。显然是因为他知道太多苏共秘密警察的秘密。（431）1989年档案解密后证实：所有的审判全部是编造的，所有的认罪坦白全部是在酷刑下的供述，所有的程序运作皆在苏联秘警察顾问指导下进行，最初旨在反铁托主义，后为反犹太复国主义及反美帝国主义，清洗秘密警察头子，用大规模作秀审判制造恐怖以吓唬公众。以便消除南斯拉夫离经叛道

的影响，审判共产党高官起替罪羊之效。(431) 因共产党国家无一例外经济皆一团糟，引起人民不满，这些共产党高官牺牲品，许多人自己对迫害暗杀非共产党民主人士负有直接责任，许多人与苏联秘密警察有十分密切的联系。(434)

此种对各国共产党人的迫害直到赫鲁晓夫政府采行“和平共处”政策后才停止，而斯大林则一直在准备打世界大战。哈佛大学资深历史教授理查彼波斯认为：斯大林其实是列宁的忠实信徒，并非象托洛斯基和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主义。事实上列宁是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残暴镇压，冷酷无情，秘密警察，特务统治，欺诈谎言，集中营迫害，党国体制，不择手段等皆是列宁的发明，而且是列宁 1922 年亲自提名斯大林任布党总书记，因为斯大林虽然受教育水准仅是半桶水远不及托洛斯基和布哈林的理论水准，但斯大林长于行政管理，善于笼络人心，在专权之前，表现得温文尔雅，待人友善，善解人意，彼得人心。1919 年布党中央委员会曾举行过一次秘密投票，结果斯大林得票远远超过托洛斯基。斯大林的偏执狂、自大狂及病态狂等临床症状是他大权在握以后，特别是晚年才流露出来的。1999 年俄国举行过一次全国民意测验谁是俄罗斯历史是最伟大的人？斯大林尽管恶名昭著，居然仅次于彼得大帝，普希金，列宁而名列第四！这至少表明公众中是非善恶黑白不分者，尽管人类社会业已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仍然占大多数。

1953 年 1 月日匈牙利秘警察头子 Gabor Peter 自己被关入监狱。1952 年，罗马尼亚犹太裔共产国际官员 Anna Pauker 的命运已定；1952 年 5 月日财政部长 Vasile Luca 与内务部长 Teohari Gheorghescu 一道被解职，并被判死刑；Luca 后被改判无期，后来死于监狱；Anna 外交部长于 1953 年 2 月日被捕，1954 年获释回归家庭生涯。(435) 1951 年 7 月日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头子 Viktor Abakumov 被捕。1950 年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部头子自杀未果，但 1964 年他再度自杀了却了心愿。他的遗书中明确他知道斯大林定期清洗秘密警察头目，并期望自己能免受清洗。436

六、从后恐怖到后共产主义

捷克斯洛伐克，当它成为接受社会主义宪法的第二个国家时，直到 1960 年《宪法》才确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档案显示自 1944 年以来，在中欧东南欧各国的迫害均是由共产国际运动中心苏联引发和指导进行。(437) 1943 年 6 月 9 日，共产国际解后三天，设立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情报部。Aleksandr Shecherbakov 任头目，由 Geirgu Dimitrov 和 Dimitry Mamuilsky 协助。Dimitrov 一开始即是实际负责人，1943 年 12 月日由政治局正式任命为头子。通过各国共产党驻俄国代表传达苏共指令，仅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没有驻苏代表。

苏军坦克首次干预是 1953 年 6 月 17 日在东德镇压柏林和其他城市工人自发的罢工起义，至少 51 人死于骚乱和镇压；2 人被坦克压死，7 人被苏共法庭处死；3 人被东德法庭处死；23 人死于镇压过程中；安全部队 6 人丧生。至 6 月 30 日，共 617 人被捕，另 7000 人随后被捕。430 第二次苏军干预他国内政发生于 1956 年 10 月 24 日，10 月 30 日和 11 月 3 日至 4 日直至 11 月 14 日平息，苏军坦克干预匈牙利反极权起义。1956 年 12 月 8 日，在 Salgotarjan 131 人在苏军与匈军交火过程中被杀死。近 3000 人在战斗中死亡，其中三分之二在布达佩斯；15000 人受伤；在 10 月 23 日至 12 月 12 日期间，秘密警察，苏军和匈军及内政部人员共死亡 350 人。苏军警起重要的镇压作用，波及 10 万人；至 12 月 10 日，依官方

统计，数以万计的人被关入集中营；35000 人被起诉；25000 人被判入狱；数千名匈牙利人被驱逐出苏联，229 名起义者被处死，20 万人移民他国。439

纳吉由人民法庭审判，他是老共产党员，二战时移民苏联，1948 年被第一次解除权力，1953 年成为总理，1955 年再度被贬，他是革命政府的首脑。1958 年 6 月日审结，6 月 9 日至 15 日判死刑。与三名同案一道被处决。他们是：Pal Maleter 将军，抵抗运动战士，革命政府国防部长；Miklos Gimes，共产党记者，革命失败后创办地下报纸；另五名同案被判五年至无期徒刑。纳吉审判是东欧政治大审判中的最后一个，1959 年当第一次审判起义案时，便有部分赦免。1960 年采用特别措施清洗了在 Rakosi 案中造假的秘密警察官员。劳教营被关闭，Rajk 和 190 名其他受害者获平反。1963 年大赦罪犯，但对起义者被定为谋杀罪者除外，终止暴力镇压。但纳吉和其追随者直到 1989 年才获平反。（441）纳吉被处死后，起初被秘密葬于监狱内，用厚水泥复盖但不告诉家属；1961 年当局秘密启开纳吉的坟墓，迁至公墓用假名与另两位受害者一道重新埋葬，但是在极秘密的夜间进行，连公墓管理人也一直不知道该墓是纳吉之墓。家属找了三年一直未果只好放弃。直到 1989 年 3 月当局再度迁墓，显示纳吉的数根肋骨在他死前 3 至 6 个月已被打断，有些则是他死前更短的时间内被打断。亦即他死前受到连续野蛮残暴的酷刑。441

Jozsef Szilagyi 是名老共产党员，抵抗运动战士，战时被关入纳粹监狱，出任纳吉政府内阁首相，1958 年 4 月 22 日被判死刑，二天后被处决。他极英勇坚强，他反复告诉控方：“相较共产党监狱，Miklos Horthy 战时政权的监狱就象医院”。440

1968 年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苏军占大多数，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东德军队也参与，罗马尼亚领导人拒绝出兵干预。4 月 8 日开始准备，8 月 20 至 21 夜行动，第一波共出动坦克 4600 辆，165000 军队；五天后，加上捷克 27 个军，6300 辆坦克，800 架飞机，2000 门重炮，共 40 万军队。1940 年德国希特勒侵占法国仅出动 2500 辆坦克，1941 年入侵苏联才动用了 3580 辆坦克，而捷克人口仅一千四百三十万人，仅是法国人口及苏联人口的一小部分。（442）由此可见苏联惧怕人民和平起义，其制造恐怖芬围的目的至为明显。但抵抗入侵整个过程相当和平，占领军杀了 90 人，大多在布拉格。约 300 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受重伤，另 500 人轻伤；苏联当局逮捕了数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但仅数日后不得不释放他们并与之谈判。数十人公开自焚抗议入侵；第一个英雄是 20 岁的大学生 Jan Palach 于 1969 年 1 月 16 日 2 点 30 分在布拉格中心点燃自己。他死后三天，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抗议示威；2 月另一名大学生 Jan Zajic 亦自焚抗议；第三位是个 40 岁的共产党员 Evzen Plocek 于 4 月初在斯洛伐克首府 Tihlava 自焚抗议。

1969 年 3 月 28 日至 3 月 29 日夜，50 万人自发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捷克斯洛伐克人在 62 个城市上街示威庆祝其冰球队在世界冠军赛中击败苏联队。36 个苏军兵营有 21 个受到攻击。捷共总书记 Alexander Dubcek 被警告：若继续失控他的命运将与纳吉一样，4 月 17 日他被迫下台。8 月 20 日两名青年被击毙，21 日另三名青年丧生；数十人严重受伤，数千人被捕或被军警暴打；至 1969 年底 1526 人被判刑。

苏联选择 Gustav Husak 任捷共第一书记。Husak 本人在 1954 年曾被共产党法庭判无期徒刑，并在狱中关押了九年。苏联批准的用残暴手段大规模镇压，旨在引起群体恐怖，数十万人不得再参与任何公共生活，被禁止从事专业，他们的子女被禁止接受高中和高等教育；民众被有效地作为人质。70 个民间组织被禁

或被强行与其他官方组织合并；实行严密监控；数万人流亡海外，在共产党统治期间超过 40 万人选择移民他国，绝大多数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的各行业精英。1969 年后，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缺席判决。（444）镇压布拉格之春运动后，恢复了政治审判。1971 年 3 月日审判 16 名 HRM 成员，Petruhl 被判 4 年；1972 年另九起审判，46 名被告其中三分之二是前捷共党员；32 人获刑合计 96 年；其余 16 人获刑合计 21 年；最长的刑期为五年半；与共产政权初期比较，刑罚程度有所减轻；但 Petruhl Jaroslav Sabata 和 Rudofl Battek 在刑满后又被判刑共坐九年牢。捷克斯洛伐克成为欧洲政治迫害最严重的国家。444

1956 年匈牙利事件，捷克斯洛伐克关押了 1163 人，其中 53.5% 是工人，但判刑皆在一年以下；阿尔巴尼亚迫害最严厉，1956 年 11 月 25 日，霍查政权处决了三名铁托集团领导人，Liri Gega 阿共中央委员；Dale Ndreu 将军，和 Petro Byku。1955 年至 1989 年期间，迫害表现为强大的警方不时地骚扰反对派，无论是自发的社会运动罢工或街头抗议，或精心策划良好组织的活动。1970 年代，迫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情报网，渗透和破坏反对派运动；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1954 年至 1958 年约有 132000 秘密情报人员，到 1980 年底达到 20 万人。446

1961 年 8 月 13 日，经苏共中央批准，柏林墙建成。

1970 年代末，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面临罗马尼亚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1977 年 8 月 3 日，五万名矿工罢工；1980 年夏天示威者和罢工工人在布加勒斯特 Gakati 和矿区占领工厂。1981 年秋在 Moturvalley 起义；这些罢工起义皆被残暴镇压；逮捕，强制清场，软禁，殴打，即时开除，关入精神病院，审判，暗杀；暴力镇压取得短期成效。然而 1987 年示威和罢工再度暴发，1988 年在第二大城市 Brasov 罢工达到高潮，镇压也特别残暴和血腥，造成死亡和数百人被捕。447

有些罗马尼亚政治犯的苦难似乎是永恒的，Calcin 神父还是个医学院学生时代即被逮捕关押至 1964 年。出狱后他改学神学最终成为神父，但 1979 年 5 月 10 日被秘密审判判刑 10 年，先后举行过五次绝食抗议；机械师 Barabas 因展条幅“打倒鞋匠！打倒谋杀犯！”（齐奥塞斯库原是鞋匠）判 6 年。电工 Bygab 因书写“刽子手，我们不再需要你！”判 10 年。工程师 Guseila 1985 年因发传单要求更换国家首脑被判 4 年。建筑工人 Nastasescu 因传播反政府传单，判 9 年。Totu Pavel Vlascianu 等三名工人，于 1983 年 8 月 22 日因书写标语指责齐奥塞斯库是纳粹，判 7 至 8 年。Iuga 因召开几次会议号召青年反对齐奥塞斯库，于 1983 年被判十年；其余五人被判五年，但 1984 年被赦免，但不包括他。Litoiu 因在 Ploiestv 向共产党机关扔鞭炮及在市场上发传单，被以阴谋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于 1981 年判 10 年。Attila Kun 医生因拒绝签发酷刑致死的政治犯死亡证明书，于 1987 年 1 月日被判三年。I. Borbely 哲学教授，因在匈牙利出版地下报纸，于 1982 年被判 8 年。448

东德，捷克后期多用非自愿驱逐出境，苏联则用精神病院取代监狱迫害。国际传媒广泛报导迫使这些政权，甚至罗马尼亚也不得不有所收敛。（449）奴工和劳教场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之外，在其他东欧共产党国家消失，但政治审判仍然持续，标志着某些进化；但匈牙利最早取消政治审判。Paul Merker 在东德于 1955 年判刑 8 年，但次年即获赦免；阿尔巴尼亚与苏联断交后，亲苏的政治局委员 Liri Beleshova 和中央控制委员会主席 Koco Tashko 被严判。Temo Sejko 将军与其他官员同案于 1961 年被处决。1975 年与中共断交后，霍查又清洗了 Beqir Balluku 国防部长和人事部长 Petrit Dume 等亲中共的官员。（449）该期间许多

政治审判，除非是真实的间谍案，政治犯很少被判死刑，且很少实际执行。

保加利亚 Dimitar Penchev 于 1961 年被判死刑，后改判 20 年，1964 年被赦免。不过，他于 1967 年至 1974 年因非法越境再度坐牢七年。

死刑数量和镇压的受害人，后恐怖时期明显少于 1956 年以前；除了那些 1956 年因匈牙利事件，和 1968 年因布拉格之春运动镇压之外，仅有数百起死刑，其中许多人，总数约为 200 人，在试图越柏林墙时被射杀。（而中共仅在深圳与香港交界处每年射杀拟投奔自由的中国人远远超过数十倍，更不用说在新疆，西藏及中苏等边境地区有多少不甘做奴隶的中国人死于中共暴政罪恶的枪下？！）该期最后政治犯之一 Pavel Wonka 1988 年 4 月 26 日死于缺乏医疗的监狱。（449）

共产党秘密警察普遍采用暗杀手段对付异议人士。1977 年罗马尼亚两名工程师因领导工人罢工，于罢工开始后数周被秘密警察制造车祸暗杀。1978 年 9 月保加利亚作家 Georgi Markov 在伦敦被暗杀。（450）著名的政治异议人士有：Czech playwright Valav Havel；Hungarian philosopher Istvan Bibo；Romanian writer Daul Goma。共产党政权普遍害怕艺术家和有创意的人，但更害怕成千上万人的街头抗议。1980 年末人民突然不再害怕群体恐怖，于是共产政权的没日来临。

七、如何处理过去与展望未来？

激进派主张：宣布共产党组织为非法犯罪组织而禁止之；同时审判所有仍活着的前共产党领导人；更多数的人向于渴望避免使人回忆共产党实践往事的清洗恐怖迫害；哈威尔称共产党政权为“怪物”，沉默的大多数存在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

迄今仍没有共产党被禁止，除了捷克之外，全部东欧共产党皆改掉了名称。最妥协的领导人皆被抛弃，领导层全面换新人。几乎没有对共产迫害应负责的人的起诉。仅有 1989 年 12 月 25 日对罗马尼亚前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及其妻的非正规审判。保加利亚前总书记 Todor Zhivkov 于 1991 年 4 月受审，但法庭允许他自由；阿尔巴尼亚有些共产党领导人被判处盗用公共财产，侵犯公民平等权等罪；霍查之妻被判 11 年；捷克布拉格市第一书记 Miroslav Stepan 于 1991 年因 1989 年 11 月 17 日暴力镇压示威者被判刑两年；前东德领导人被提起数起诉讼。1997 年 8 月前东德最后一任领导人 Egon Krenz 被判 6 年半。1999 年因 1970 年在 Gdansk 镇压罢工造成死亡，时任国防部长下令开枪的 Lwojciech Jaruzelski 将军的审判仍在进行。波共前总书记 Jaruzelski 于 1996 年波兰议会决议赦免他 1981 年强加军管法的罪行。还有数起告捷共邀请四国军队占领捷克的 1968 年布拉格之春。2009 年 1 月联合国与柬普寨建立联合审判红色高棉群体灭绝，反人类罪国际法庭，案件仍在审理之中。

后共产党国家司法还审理了数起秘密警察官员直接涉嫌犯罪的案件。波兰 Adam Humer 和国安部官员，因 1940 年底和 1950 年初镇压反对派而被起诉，Humer 时任公安部调查局上校副主任至 1954 年，被以反人类罪起诉，持续两年的审判，1996 年 3 月 8 日，被判 9 年。在匈牙利，那些 1956 年 12 月 8 日射杀平民者，1995 年被认定构成反人类罪。但 1997 年 1 月日匈牙利最高法院判决认为 1956 年 11 月 4 日后，由于苏联非法干涉，匈牙利与苏联之间存在国家战争，故这些罪行应归类为战争罪。

捷克对共产党政权的罪恶的追究最坚决，是迄今唯一颁布法律，令当局退还 1948 年 2 月 25 日没收私人财产，恢复所有被不公定罪者的名誉的东欧前共产党

国家。1994 年地方法院恢复了 220000 人的名誉；捷克也是唯一设立行政当局追究共产党罪恶，追究共产党政权成员罪恶的国家；对 1948 年至 1989 年期间共产党政权的罪恶予以全部追究。1997 年调查了 98 人，20 起案件业已生效，5 起法院已受理，一名前国安局官员被判五年刑。波兰 1991 年 4 月 4 日颁布新法律将共产党视同法西斯组织，归类为斯大林式的罪行。

事实上，共产党暴政的罪孽深重，随着各国档案解密，越来越多的证据得以披露，共产暴政对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远超出人们的想象。高智晟先生有句名言：“只有共产党想不到的罪恶，没有共产党干不出的罪恶”。兹将近期从各种信息资源获取的共产党系犯罪组织日益得到世界公认的事实归纳如下：

(1) 捷克在 1993 年，通过了一项决议，直接把共产政权称为犯罪政权，把共产党定性为犯罪组织；(2) 1995 年 9 月 22 日，阿尔巴尼亚通过一项法律，谴责前共产政权对阿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和群体屠杀罪行；(3) 1996 年 8 月 22 日，拉脱维亚通过一项宣言，谴责前苏联共产极权暴政对拉脱维亚人民的犯罪行为；(4) 1998 年 2 月 20 日，保加利亚草拟了一项法律宣告前共产政权是个非法政权；(5) 波兰总统在 2006 年作的一个演讲中，明确把共产党称为犯罪组织；(6) 2006 年 7 月 3 日克罗地亚通过一项官方文件指称共产党是犯罪组织；(7) 欧盟议会 2006 年通过了一项“反共产极权体制第 1481 号决议”。(8) 美国前总统布什 2007 年 10 月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仪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现已证实他是共产党秘密警察的线人）曾经将反抗共产主义的斗争形容为“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共产党政权不仅夺走了受难者的生命，他们还企图盗窃他们的人性，抹杀他们的记忆。随着这个纪念碑的落成，我们要恢复受害者的人性，恢复对他们的记忆。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9) 2009 年 3 月 18 日，欧盟举行了欧洲良知和共产极权罪行的听证会。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指出，“在欧洲有两个极端的系统，共产主义和纳粹，造成了人间悲剧，尤其是共产主义，其理念覆盖整个社会，每个人不是受害者，就是行恶的罪犯。如果我们不能够反对导致可怕灾难的共产理念及其机制，将会是很危险的”。(10)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 2009 年 10 月 13 日，呼吁国民清除共产主义污垢，把带有共产党标志的纪念物和偶像仍进历史垃圾堆。恢复历史的真相和公正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尤先科总统 2009 年 5 月 17 日表示应彻底清除共产极权的标志，同时告诫那些不承认共产主义罪行的人们，必将被淘汰。这里发生的大屠杀与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发生的同样残忍，并强调：这样的罪行不会被历史所宽容，也将不会历史被宽容。(11) 立陶宛国会通过法令，禁止在该国任何地方公开展示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的旗帜和纳粹的象征。在立陶宛公展共产和纳粹领袖的图像都是违法。(12) 爱沙尼亚决定禁止纳粹党徽和镰刀斧头标志。包括带有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和纳粹党徽符号的旗帜、标志和徽章。(13) 印度 2009 年 6 月 23 日宣布“印度毛主义共产党”（通称“毛派”）为恐怖组织。捷克、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保加利亚、波兰、克罗地亚、乌克兰、立陶宛、爱沙尼亚、印度、欧盟诸国、美国如今都是自由宪政民主政治，他们都公开使用反共词汇，公开谴责共产暴政，公开指控共产党是犯罪组织。

第六章：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

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三十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

第七章：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提要：国际共运史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举凡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与血腥、

暴力、恐怖、欺骗、极权、独裁、专制、饥荒、宗教信仰迫害、经济落后，文化毁灭、社会动荡不安、国民普遍道德沦丧，精神人格分裂密切相关。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例是其自身政治改良成为宪政民主国，皆是经过革命而成功，无论是天鹅绒革命，还是橙色革命，或是绿色革命，皆乃政治民主大革命。无论是欧洲的前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和东欧 7 国，还是亚洲的中共，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或是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智利、尼加拉瓜，挨或非洲的索马里、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概莫能外，我们不禁要问：难道世上还有所谓好的共产党政权吗？！为什么共产党政权全部那么邪恶？欲知答案，敬请各位读者朋友们关注本系列评论，最终会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非洲共产主义运动受到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在 1914 年至 1991 年整个期间。

整个非洲 1930 年代仅有五千名共产党人，1970 年代增加至六万人。早期共产国际设立了一项支援国际无产阶级的绝对义务。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三个国家都是苏联军供，并得益于世界共产国家的支持夺取政权。除了苏联提供军事援助的 8850 名专家外，古巴提供了 53900 名军人及 1980 年末东德也提供了大量专家。东德和古巴专家为非洲提供当地安全协助。他们扶持的对象分别是：MPLA in Angola the Frelimo in Mozambique the Dergue Ethiopian Workers Party in Ethiopia。极权主义与 1914-1945 流行于欧洲的战时文化之间存在关联，非洲共产主义历史与非洲大陆长期暴力历史有关。非洲共产党与所有的共产党相似，常利用饥饿作为政策，党内清洗血腥残暴，不择手段消灭任何竞争对手，推行极左政策国有化，强制农民集体化导致大饥荒，提倡民族主义，实行国家暴力恐怖，对党派宗教，实施群体谋杀及大规模暴行。

红色王国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政权的罪恶

1974 年 9 月 12 日，Haile Selassie 22 岁的国王，因内外交困导致王国跨台，军人夺权篡政，由 108 位官员组阁。新元首，战争英雄 Aman Andon 将军于 1974 年 11 月 22-23 日夜，因抗拒政变逮捕被杀，另 59 名军官在随后数小时亦被杀。

随后在 7 月民选副主席 Mengista Haile Mariam 于 1974 年 12 月 21 日，公开宣布国家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权。他乐于扮演被社会遗弃的角色，以黑人奴隶的身份反对精英阶层。尽管扮演受欺负的角色，他通其母亲（一位真正的贵族）与上流社会保持联系。他是个私生子，其父亲是个文盲下士。他通过保护其叔父（Selassie 政权的一个部长），得以在军中飞黄腾达。由于所受教育十分有限，根本不够格进入一所专为社会条件极差者保留的 Holetta 军事学院。作为一个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他的领导才能为他两度赢得在 Kansas Fort Leavenworth 受训计划。他没有意识形态专长，但他对权力有极大爱好。革命后，他用了三年时间清除所有的竞争对手。第一步消灭 1976 年左倾的 Jamor Sisay Habte 少校，更中立的 Teferi Bante 将军与之发生冲突，他下令安全部队于 1977 年 2 月 3 日，在一次 Dergue 会议上，用机枪射杀了 Bante 将军和他的七名支持者，然后开始清除政治对手。

1974 年 12 月日 Mariam 提出“埃塞俄比亚道路”，由 1975 年 1 月日设立的临时委员会执行；强制银行、保险及大多数制造业国有化。1975 年 3 月日，废除土地私人所有制，引入每一家庭限制财产所有制。为加速农村土改，当局派出五万名中学生和大学生设立农民协会，协助农村改革成为“合作计划”。由于 Dergue 反对学生们试图创立毛式农村公社，大多数学生迅速变成敌视军政府，并鼓动农民反对之。688 学生们创设了两个马列组织，一是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二是

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虽然两者意识形态高度一致，许多重大政策也相似，但两者却相互内斗不已。

Mengistu 成功地消灭了这两个运动，先于 1977 年 4 月 17 日宣布前者是革命的敌人，Meison 支持之；随后 Mengistu 转过来消灭 Meison，首先处死 Atnafu Abate 上校（他镇压革命时极残暴），所有其他领导人皆被安全部队消灭。1977 年 4 月日埃塞俄比亚断绝与美国军事联系，古巴、苏联对埃塞俄比亚 Mengistu 政权的大量援助，对击败 Eritrean 独立运动和索马里 1977 年的侵犯起了决定性作用。直到 1979 年，才成立组建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即埃塞俄比亚共产党）其组织委员会，党工工人占 1/4，军人，民事人员占有 3/4；农民占全国人口的 87%，仅 3% 是党员。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是军人，知识分子仅占极小部分。690

迄今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成为共产政权恐怖的受害者。1995 年在阿迪斯阿巴巴（Addis Ababa）审判中，判决书引证 1977 年 2 月—1978 年 6 月，仅首都一地便发生政治谋杀 10000 余起。Dergue 杀害和埋葬任何人时，均用“反动派，反革命，反人民”标签。群体屠杀坟墓持续发现。大量失踪者家属被责令向国家交纳枪决费用（上海工人右派英雄刘文辉于 1967 年 7 月被中共按《公安六条》恶攻罪处死后，家属被令补交子弹费人民币五毛！家喻户晓的北大右派学生英雄林昭的母亲，同样被令补交子弹费人民币五角！）。尼龙绳是该政权普遍使用的杀人工具。Teka Tulu 是上校国安头子，1975 年 8 月国王和其子女 Ijegayehu Asfa 公主，便是被用此方法杀害。东德国安和苏联克格勃（KGB）均协助该共产党政权，苏联克格勃将在莫斯科的埃塞俄比亚学生直接交给埃塞俄比亚共产党政权国安处置。1977 年 5 月 17 日，瑞典《抢救儿童基金会》秘书长悲叹道：1000 名 12 至 13 岁的儿童被杀害，暴尸街头，被饿狗吃掉。当你驾车驱出首都阿迪斯阿巴巴后，随处可见。691

1991 年，在新总理 Meles Zenawi 的司法体系下，共审判 1823 起案件，绝大多数案发于城市，但是共产暴政恐怖遍布该国 122 万平方公里的领域，涉及 3000 万人口。

1977 年初共产党政权将 24 名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人用毒气杀害。1988 年，在 Tigre 省的 Howzen 市有 2500 名居民被炸死。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均信奉马列主义。苏联曾试图将该三国建组成联邦国未果，后来选定并全力支持埃塞俄比亚，因此，三国之间的战争，其实是马列主义内部的争战。

该共产党政权还将一群人关入教堂，然后点燃烧毁教堂。法庭证人作证：1975 年夏天，在 Wokiduba 村，110 人被屠杀于天主教堂内。

Mengistu，1977 年 8 月日宣布与 Eutrean 分离主义者全面开战，估计约 8 万人因内战死于非命。

1982 年至 1985 年埃塞俄比亚饥荒。自 1984 年 11 月至 1985 年 8 月，525000 人逃荒，其中 310000 人来自 Welo。饥荒表面系由于干旱引发，但实质则是共产党政权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的必然恶果，加之禁止农民贸易，打击迫害贸易商及由内战引起的广泛的不安全感，严重加剧了饥荒。共产党当局还利用饥荒作为武器，达到控制援助与分布人口，令异议者闭口，增加党国体制科学性空间的目的。军队还禁止非政府组织援助，阻止难民逃离（中共大跃进人为制造的 1959 年至 1961 年三年大饥荒，同样普遍由军警民兵把守各村各县主要要道以阻止农民进城讨饭，这是中共国会饿死 3800 万农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产党当局强制改变人民的思想，生活方式，似开创现代新农村新社会的新篇章，建设社会主义。当局还强制推行人口迁移计划，旨在增强国营农场创造新

人。结果某些移民死亡率高达 14%。约 20 万至 30 万人死于饥荒。694

Mengistu 刚开始试图掩盖饥荒真相，后来狡黠地利用之。

1990 年 3 月苏军顾问撤离埃塞俄比亚。1989 年 5 月 16 日，军方秘谋推翻该共产党暴政，因被秘密警察破获，受到特别血腥的报复。1990 年 6 月 21 日，Mengistu 发布征兵令：理论上 18 岁以上，实际上许多 14-16 岁的学生，被从学校操场上直接拉走加入入伍。1991 年初当局关闭所有高校，强令大学生参军。1991 年 4 月 19 日，Mengistu 宣布组建百万大军，此时共产党政权已有军队 45 万人，而 1974 年埃塞俄比亚王国仅有 5 万军人。由于埃军连续失败共产党政权最终失控。1991 年 5 月 21 日 Mengistu 逃亡津巴布韦。1994 年秋，阿迪斯阿巴巴法院送达传票，拟审判其罪责，由于津巴布韦拒绝引渡，使他暂时避免惩罚。695

“我们将消灭过去的一切传统，并将自然本身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 这位共产党头目如是说。

第八章：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共产党政权的血腥暴力

提要：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莫桑比克等非洲共产党政权由于其共产党员人数稀少，其中安哥拉 0.5%；莫桑比克 0.6%；埃塞俄比亚 1%；加之共产党撑权时间不长，随即因 1989 年至 1991 年苏联和中东南欧共产党政权的跨台而全部跨台，因此，似乎这些非洲共产党造孽犯罪不是太严重，历史包袱相对较轻；尽管如此，在其短短的十余年专制独裁期间，他们仍然对其国家和人民犯下了相对严重的各种罪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乃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唯有在共产党政权党国体制下，发生过大饥荒，而其他自由宪政民主国家及所谓威权专制国家在 1900 年至 2000 年期间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有过饥荒。特别严重的饥荒发生在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阿富汗、及非洲三个共产党国家，这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共产党的公有制必然的恶果。其次，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争夺政权全部是经过你死我活的血腥残暴恶斗，它们全部不懂或不愿遵循公平竞争的公平游戏规则的价值观念，不遵守人类文明政治规则，而奉行匪徒强盗黑社会流氓的逻辑；第三，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皆依赖秘密警察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暗杀进行极权特务统治。第四，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实质上皆非由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由外来因素强制介入引进的产物；第五，所有共产党政权皆杀人如麻毫无人性充满兽性，同时道德高调唱得最动听，国人皆口头说的与内心真实想的背道而驰，亦即几乎人人说假话，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不仁不义。结论乃是：共产党党国体制不可能进行实质性改良，因为它是一种反人性、反自然、反人类的极度虚伪，极端野蛮残暴的极权暴政，因而必须彻底抛弃终结之。

2010 年 2 月 14 日

一、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暴政）的罪孽

安哥拉自 15 世纪直至 1974 年，一直是葡萄牙的殖民地。1974 年葡萄牙左派新政府上台，主动宣布让安哥拉彻底独立。

1975 年 1 月 15 日，独立条约签署；1975 年 2 月至 6 月，40 万葡萄牙人撤离

安哥拉。随后由三个组织即：安哥拉大众解放运动（MP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民族统一独立联盟（UNITA）成立联合政府。由于安哥拉大众解放运动掌控了该政府之情报部，司法部，财政部，因而实力最雄厚；随后这三个组织即在各自外国支持者干预下开始内斗不已。

苏联大力支持安哥拉大众解放运动（简称“解放运动”MPLA）与南非支持的安哥拉民族统一独立联盟（简称“独立联盟”UNITA）（毛派组织，被称做“永远与魔鬼签约者”）成立联合政府。葡萄牙军方左派，特别是有个“红色海军上将”Antonio Rosa Coutinho亦支持MPLA；1975年3月，古巴首批顾问和苏联顾问抵达安哥拉随后古巴援助安哥拉共产党政权的五万多军人登陆安哥拉；卡斯特罗说：“今日非洲是帝国主义薄弱环节，在那儿最有希望无需经历其他地方经历的各阶段而直接从部落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697

1975年11月14日，联合政府因内部争权而破裂。1975年11月11日前后，解放运动与独立联盟分别宣布独立，苏联与古巴支持的解放运动占领沿海和石油，矿石，矿区；南非支持的独立联盟占领北部和中部地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Agostinho Neto原系清教牧师，自1950年始便是亲苏的葡萄牙共产党员，他的许多干部1960年曾在苏联学习受训，通晓马列主义理论，还受到苏联和古巴的军事训练。697

1975年2月，在葡萄牙军协助下，解放运动Neto攻击东部叛乱集团。Nito Alves内务部长是Neto的政敌，有大量黑人支持者，用斯大林手段迫害毛派，1977年5月27日，由于相信得到了苏联古巴和葡萄牙的承诺，Nito Alves试图发动军事政变，以阻止业已开始的大清洗，后失败于外国支持不到位。Neto发表广播讲话声明，指控Nito Alves为种族主义，部落主义，地方主义者，阴谋政变派受到重创。中央委员会全部官职重新换人。首都的血腥斗争迫害波及漫延至各省。

1977年8月6日—7日夜，204名政变者被杀，另据1991年该事变生还证人说当时至少数千人被杀。许多军人被Anibal Sapilinia清洗。699

Nito Alves因其专栏文章和两个无线电广播节目而著名，他时常批评共产党政府，揭露人民生活惨状，他公开证明安哥拉严重缺粮，导致大饥荒。

安哥拉经济在1960年代开始繁荣，但1975年独立后即开始衰落。特权阶级一开始便已形成，尽管共产党政权控制全部媒体，政府却日益艰难否认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解放运动独占国家权力和难于吸引外资；导致黑市价格高出官价55倍。共产党政府将城市市场与地方生产切断，石油出口创汇全部被当权者滥用或贪污浪费，同时共产党政权多少抛弃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农村，任其受命运摆布。官方在所有媒体上刻意避开用“饥荒”一词，但1985年世界粮食组织便已发出饥荒警告。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实行开放政策后，安哥拉共产党政府开始公开承认局势严峻；1987年初，联合国IOEF宣布安哥拉饥荒已饿死数十万人。699

由于税收过度，缺乏基础设施投资，商业障碍等原因，使得城市市场消失，进一步使农村地区极度困难，尽管该政权获得美国里根政府的承认支持，但绝大多数观念源于毛派的独立联盟领导人时常渴望提起城乡之争，使得情形难有实质改观。

1988年12月22日，在纽约签署和平协议后，南非与古巴撤军，直到此时解放运动才开始放弃马列主义转而采纳西方价值观，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产生了预期的效果。1990年7月，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接受了市场经济和政治多元化，1992年独立联盟在选举中大败。

二、莫桑比克共产党政权的罪恶

1974年12月25日，葡萄牙军官建立多党民主制政府，决定将莫桑比克政权移交给1962年成立的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Eduardo Chivambo Mondlane 是一名人类学博士，取得中共与苏共的支持。Frelimo 则赢得多数知识分子精英的支持。1974年底，马列主义开始占上风，莫桑比克自1968年已有中共式的解放区。共产党夺权后，主要由白人，黑白混血儿及印度籍人撑控新政权，主张实现马列主义党国体制；趁着解放的热情，连哄带骗所有的农民（占人口80%）放弃传统的家园，组建新村。人民开初对共产党政府的建议也赞成，创立集体农庄，合作式建筑社，国家依共产党网络等级制，形成了一个严密控制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行政区域。

1977年Frelimo公开宣称他们采纳布尔什维克主义，号召扩大集体化，加强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先后与苏联及东欧各国订立了各种协议，后者提供军火武器和军事援助。在与东欧诸国大签协议的同时，由Ian Smith领导的白人罗德西亚主义者，支持在农村兴起反抗运动。因此官民双方争议不断，以致引发暴力争斗，双方在战斗中均很野蛮残暴，但官方体制性的残暴，更胜于反抗运动方。

1975年初成立的国家安全部（SNASP）负责逮捕和监禁任何危害安全的人，其有权直接将任何人未经审判关入劳教营。

1977年反抗运动第一次大规模攻击的目标即是位于Sacuze的劳教营。

1979年2月28日共产党政权第2179号法令，恢复了葡萄牙殖民政府早在1867年便已废除的死刑。（703）Lazaro Joana Uri等弃议人士于1983年关押期间被当局秘密处决，直至终止共产党党国马列体制后才披露真相。

1983年共产党当局关闭Maputo大学法学院。诗人Jorge Viegas因政治异议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作家协会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及莫桑比克国家安全局（CIA，KGB，SNASP）保持秘密联系。1983年在业已造成巨大的灾难后，当局才停止农村集体化政策。

依《人权观察》报导：1975年至1985年，由于缺粮食造成饿死人数超过官民双方因武装暴力冲突所致死亡人数。联合国粮农组织确认：超过60万人在该期间死于饥饿，与埃塞俄比亚饿死的人数不相伯仲。国际援助成为该国人口生存的主要帮助。1987年1月日美国驻蒙博托（Maputo）大使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称：莫桑比克有350万人处于饥荒危殆之中。

美国政府和一些国际机构立即作出反应，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尽管如此，该国大多数地区仍陷于可怕的饥荒，其范围与后果从未有过完全披露。仅Memsá地区，1989年春，人道组织报导有8000人死于饥荒。市场力量迅速在接受外援地区显示其效益。1991年欧盟报导称：25%的粮援按约定价出售；同时政府控制的75%粮援却通常被偷盗后在黑市上高价出售。

在共产党党国体制下，莫桑比克人民的生活双重分裂：一是隐蔽真实的生活；二是虚伪公开的生活。亦即人民公开说的和内心想的不是同一回事。这是所有生活在共产党党国体制下的人们的共同特征。

第九章：尼加拉瓜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提要：共产党政权皆源于马列主义。既有以苏联为首的正宗欧式共产党政权，也有以中共为代表的亚洲共产党暴政；亦有非洲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共产党政权版本，还有古巴、尼加拉瓜、秘鲁拉丁美洲版本的共产暴政。总体上看，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政权相对杀人较少，但其性质，统治模式，危害则如出一辙。

共产党政权全部是由一小撮极左邪恶的知识人，受马克思列宁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歪理邪说迷惑，初时怀抱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狂热激情，用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以人民的名义，不惜牺牲千百万工农及普通平民和广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生命，践踏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毁灭人类社会一切伦理道德，妄想人为创制共产主义新人，因而它们全部不将人当成人，而是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屠杀毁灭的垃圾及害虫；是故，凡是共产党必定杀人如麻，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且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全部采用纯属黑社会流氓强盗的分脏竞争模式，完全不懂或故意毁弃人类文明社会的最高价值之一：公平竞争，人人遵守公平游戏规则。因此，它们必定首先杀戮一切反对派，然后杀尽党内异议或反对派，继而杀光社会上的其它团体及任何异议人士，最终胜出者，一定是最厚黑的黑心烂肝毫无人性之辈执掌共产党政权的大权；对其掌控下的人民实行超法西斯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统治，以实现独裁独占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达到独占国家一切经济成果的最终目的。

这一切其实是人的自私贪婪的天性（原罪）的逻辑结果。正由于西方传统长期层出不穷的政治思想大家，对人性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探讨争辩实践，远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其他文明先进，因而西方政治法律界早已找到解决人性，在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腐蚀下必然变质或恶性膨胀的有效方法与可操作性强的程序和制度：限制当权者的权力，将国王（当权者）锁进法治的牢笼内；政府权力的三权分立理论，亦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制衡的政治设计和按排，使得任何人的权力欲望，政治雄心及自私贪婪均得到有效制约与限制，从而真实有效地保障了每个公民最根本的权益。

国际共运史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真理：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极端自私自利，残暴无耻，虚伪至极，杀人如麻，抢劫成性，道德沦丧，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纯属依靠暴力，欺骗，封锁信息，和恐怖维持其一党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正如斯大林承认的那样：“共产党党国体制能够生存，唯有对其人民，包括高级官员完全与世隔绝才有可能”。[1]无论朝鲜与古巴或是中国，越南和老挝之所以还在苟延残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严密封锁一切信息并用虚假信息误导欺骗公众。一旦广大人民不再受骗，拒绝谎言，只说真话，勇于争己之正当合法权益之日，即是共产党政权彻底跨台之时！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曾反复强调法轮功精神运动，讲真相运动，三退运动，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弘扬神韵文化，突破网络封锁运动，及广大信众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坚韧不拔，正在进行的真正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运动，对即将来临的中国自由法治人权宪政民主共和大业功不可没！

2010年2月21日第207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运动日尼加拉瓜自1930年始受索摩佐（Somoza）家族统治。1962年以假选举

的方式迪柏乐 (Amastasio Somoza Debayle) 将军被“选”为总统。皇家拥有全国 25%最肥沃的土地和大多数烟草, 糖, 大米和咖啡种植园, 及相当数量的国有工厂。1961 年成立了尼加拉瓜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放阵线亦即尼加拉瓜共产党), 尽管受到多项毁灭性失败, 在古巴和朝鲜的支持下, 解放阵线仍然存在。1967 年首都蒙那瓜 (Managua) 发生暴乱, 政府军镇压, 枪杀了 700 余人, 暴街头, 使得人民开始支持解放阵线。1978 年自由报纸老板切摩罗 (Pedro Joaquin Chamorro), 及另一反该家族的民族阵线领导人被暗杀后, 解放阵线开始游击战。由此内战暴发。

1978 年 2 月 21 日日 Masaya 城起义。8 月游击队领导人帕斯托拉 (Eden Pastora) 占领蒙那瓜 (Managua) 总统府, 捕 1200 人为人质, 政府被迫释放了数十名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 以换取人质。9 月政府军在收回 Esteli 的激烈巷战中, 屠杀了好些人, 并用燃烧弹轰炸该城, 结果 16 万人亡 Costa Rica。1979 年 4 月 Estala 和 Leon 两城再度起义, 6 月解放阵线占领越来越广大的农村, 逐渐逼近首都蒙那瓜 (Managua) 市郊。1979 年 7 月 17 日, 业已丧失国际支持的独裁者被迫离尼加拉瓜。内战期间 25000 至 30000 人丧生, 解放阵线称五万人丧生。300 万人口付出的代价未免过重。(666)

解放阵线是由冯塞卡 (Fonseca) 和博格 (Borge) 发起, 两人政治观念有所不同, 前者崇拜卡斯特罗, 后者推崇毛泽东。

多年后形成三股政治力量: 持久人民战争派(毛派), 主张通过农村包围城市; 马列无产阶级革命派, 寻求萌芽无产阶级的支持; 特色里斯塔 (Fonseca Tercerista) 派是马克思异议民主派, 主张通过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联盟, 组建城市游击队, 发动群众起义(帕斯托拉 Pastora) 欧特加 (Ortega) 初时亦属此派, 后来他转变成马列派) 1977 年在数个尼加拉瓜城市有组织的起义, 在皇家卫队和索摩佐 (Somoza) 空军的联合打击下, 帕斯托拉 (Pastora) 和欧特加 (Ortega) 只得避难丛林。1981 年起义遍及全国, 帕斯托拉 (Pastora) 率军攻占议会和国会, 并解放了博格 (Tomas Borge) 及其他所有的政治犯。1979 年 7 月解放阵线胜利后, 帕斯托拉 (Pastora) 任内务部副部长, 而欧特加 (Ortega) 被选为总统。他极亲古巴, 允许古巴军事顾问和国际主义者大量拥入首都 Managua。帕斯托拉 (Pastora) 致力于宪政议会民主, 两人因此日益分道。1981 年 6 月帕斯托拉辞职后在南方组建军事抵抗力量。

国家重建军人执政团, 由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民主人士和中间人士组成。该军人执政团提出一项 15 点计划, 建立一个全民公投, 自由, 多政党的民主政体。同时行政权保留在该军人执政团, 随即军人执政团被解放阵线控制。

执政团承认与古巴的特殊关系, 但不排除与西方国家参与国家重建计划。内战造成了八亿美元财产和基础设施损失。但民主派很快即被边缘化。1980 年数个民主人士因不满行政权被解放阵线独裁控制而辞职。解放阵线牢控的军人执政团, 并于政治危机暴发初, 成立了秘密警察特务组织。解放阵线将 6000 名游击队员转成秘密警察, 十年后秘警扩大到拥有 75000 人的部队, 对全社会实行无所不在的严密控制。1980 年后又将志愿兵役改为义务兵役制, 凡 17 岁至 35 岁的男性公民, 只有服完兵役后才能升学。

解放阵线实行中央计划经济, 迅速推行国有化, 国家很快便控制了超过 50%所有的生产。共产党政府控制所有的组织、妇女、学生、居民全部被严密控制与监控。工、农及各行业亦然。政党普遍没有真实的自由, 媒体被严控审查。16 万印地安与西班牙混血儿在前政权时期享受相当大的自治、免税和免兵役等待遇。

共产党夺权后不久，即开始侵犯印地安社区。1979年8月一位印地安领袖阿斯德思（Lyster Athders）被捕并于两个月后被杀害；1981年初，一位全国印地安联盟政治组织的领导人被捕；1981年2月21日，政府军杀害七名 Miskito 的印地安人，伤 17 人。1981年12月23日在 Leimus 政府军屠杀了 75 名要求支付底薪的矿工，另 35 人于次日被杀。1982年初，政府军逼迫一万名印地安人内迁，并用粮食作为可怕的武器，7000 至 15000 印地安人被迫避难于洪都拉斯；另 14000 人被捕入狱。军队时常射杀试图越境亡可可河的印地安人。

共产党的群体屠杀逼迫内迁政策和流亡，造成政治种族灭绝。印地安人被迫组建了两支反抗共产党政府的游击队。内务部长帕斯托拉（Eden Pastora）在部长会议上谴责说：“即便独裁政权也让他们自治！他们可能有所剥削，而你们则要强迫他们变成无产者！”毛派博格总统（Tomas Borge 回敬道：“内务部长，革命不能容许例外”！

1982-1987 年，共产党政府对印地安人采取强制隔离，暴力打击，毁灭印地安村庄及其生活方式等方法，试图逼迫印地安人就范。整个国家到处发生反抗，新的内战又起，1981年7月9日，帕斯托拉（Pastora）正式与共产党解放阵线决裂，并离开了尼加拉瓜。

南北两支反抗力量主要由前政府官员，真正的自由战士，前解放阵线中的反对集体化者和印地安亡者组成。罗柏洛（Alfonso Robelo）为政治领袖，帕斯托拉（Pastora）为军事领袖。

共产党政权与反抗力量双方均有不少暴行。1984年5月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常委之一阿尔斯（Bayardo Arce）发表演说时称：“我们尼加拉瓜政府支持极权主义和马列主义。”

1984年7月尼加拉瓜共产党政府为重建形象，组织了总统选举。保守派候选人克鲁兹（Arturo Cruz）中途因解放阵线的流氓 Turbas 使用暴力而被迫退出竞选；故欧特加（Ortega）自然获胜。1985年5月1日始，美国和大多数西欧国家对尼共政权实行经济制裁，50%国民收入被共产党政府用于军费开支，生产全面破坏，到 1989 年通货膨胀高达 36000%，此时尼加拉瓜共党政权采用配给制供应市民。

尼共政府时常采用镇压手段处理反对派。夺权伊始即成立特别法庭处置政治反对派。1979年12月5日第 185 号法令，专门用于处置前皇家卫队官员及平民军官。上诉审由同一个法院受理。1982年3月15日，尼共政权宣布国家实行军事管制，关闭自由电台，停止结社自由权，限制贸易协会自由，开展反宗教运动，包括 Sandinistas 和耶和华见证人。

1982年6月，大赦国际估计 4000 名皇家卫队及数百名政治良心犯被关押；一年后政治犯上升到 20000 余人。更为惊人的大量反革命失踪，及在逃亡中被杀。1983年成立专门审理政治案的法庭，法官均由 共产党政权任命，他们多与秘密警察有密切联系，律师多仅作走过场的秀辩；法庭通常接受任何法外允许的有罪证据。该法庭于 1988 年解散。

1984年共产党在农村兴起逮捕潮。凡是反对党，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联合党的党员皆被捕，且不可能上诉。秘密警察有权逮捕任何人，无需审判无限期关押。有权采取任何方式拘押，阻止被拘留者会见律师和亲人。

尼共政权迅速创设高效的镇压体制，内务部有 15000 人的部队，对国家实行全面控制。其中负责监控的国家安全部（DGSE）是由古巴和东德的专家帮助建立，拥有一支 75000 人的秘警部队。

根据大赦国际报导，在秘密警察监狱中实际死亡人数不多，狱警常使用电棍酷刑虐待犯人。1987年，尼加拉瓜仍有3700名政治犯在狱。到1989年据称1640名犯人中只剩下政治犯39人。

共产党政权在农村地区处决犯人时常断肢。男性被掩割生殖器，群体屠杀农民；凡属反革命者，房屋皆被毁，财产皆被没收，活人被驱逐。旨在强化恐怖政策，并通过此种恐怖消灭反抗运动的社会基础，报复反叛者的家属。肢解尸体，强制失踪，在首都内务部时常随意处决政治犯。共产党争权而发动的内战使45000至50000人丧生。绝大多数是平民，40万人逃难到Costa Rica和洪都拉斯或美国。

1987年签署Esquipulas协议后，尼加拉瓜重启和平进程。1987年9月反对派的日报获准公开发行，10月7日共产党政权与民间反对派双方停火协议分别签署。超过2000名政治犯获释，另1200名政治犯直到1990年2月才获释。1988年3月，共产党政府与反对派直接谈判开启，1989年6月总统选举前8个月，12000反共武装回到洪都拉斯基地。由于无法用暴力强加其意识形态，在海内外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加之党内内斗的削弱，解放阵线被迫重新回到选举程序。1990年2月25日，民主派切摩罗（Violeta Chamorro）以54.7%的票当选总统。独立160年后，由于当权的共产党解放阵线未求助于其他共产党政权，为维持其独裁权力而采取极端恐怖手段，尼加拉瓜终于首次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了政治权力的转移。但是由于共产党强制推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未考虑尼加拉瓜的政治现实而推行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一场真正革命的背离，引发了第二次内战，严重延缓了民主的进程，付出了许多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

[1] 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80

第十章：秘鲁共产党的血腥残暴

提要：我曾所过“无知而狂妄的当权者是中国人的死敌！”而毛泽东便此种“无知而狂妄者”的典型。毛至少是自然科学盲，数学盲加法盲，这是由毛之自传确认的事实。按毛自己的说法他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打败了蒋介石，其二是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间和历史的法官最公正，如今可以下定论：毛是个真正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罪人！毛之所以成为重罪犯，根本原因之一正是毛实质上是个“无知而狂妄”之徒。尽管毛在诗词方面有些才气，厚黑阴谋权术出类拔萃；心黑手赖几无出其右者。然而实质上他在许多方面纯属白痴，却狂妄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导师。全世界经济落后国家均有不少毛派共产党，从秘鲁共产党的毛派的罪孽可见毛不但祸国殃民，且祸世殃国！毛主义的核心乃是：在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武装包围城市，长期人民（恐怖）战争之途。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头子皆或多或少患有此种领袖欲“偏执狂，自大狂，病态狂”的政治精神分裂症。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哥斯曼。。。概莫能外。秘鲁共产党仅屠杀了三万余人，是因为其未夺取政权，仅占领了该国最赤贫的地区，而且最终失败，如果秘鲁共产党不幸夺取了政权，可以断言其杀人数目将几十倍增长，秘共毛派头目哥斯曼即曾公开宣称：准备牺牲100万人的生命夺权！

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了毛派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为在世界舞台上推销毛主义，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

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中共外援激增。在提供外援的国家里，中国是最穷的，却是最慷慨的，借出去的债是不要还的。说到提供武器，毛的口头禅是：“我们不是军火商。”意思是中国的军火不要钱白送。送钱最多的地方是印度支那，毛执政期间至少送了两百多亿美金。中共援助阿尔巴尼亚和越南均各在 100 亿美元以上。在非洲，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访华，毛一口气就给了六千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在共产主义阵营内，毛只争取到一个又小又穷的阿尔巴尼亚。为了拉住霍查，一九五八年，毛给了这个只有三百万人的国家五千万卢布。一九六一年一月，毛跟苏联的分裂加剧，指望霍查帮忙骂赫鲁晓夫，又给了他五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靠着中国的食品，阿尔巴尼亚人不知“定量”为何物。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数千万人饿死的时候。阿尔巴尼亚跟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地（Pupo Shyti）对我们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谨。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有时中国官员不愿给，只要跟毛一说，毛马上就出面责备他们。毛把大量的钱花在分裂各国共产党，建立“毛主义党”上面，由康生负责。各国应声而起了一批“吃毛饭”的人。只要拉起一个组织，唱唱毛的颂歌，跟着就领钱享福。在阿尔巴尼亚档案馆里，有一份资料写道，康生发牢骚说，委内瑞拉的几个“左派”取走了中国经阿尔巴尼亚资助他们的三十万美金后就不见了。荷兰情报部门干脆设立了一个伪装的毛主义党来收集情报，钱呢，自然由中国出。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后任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告诉我们，看到可以如此容易地派人进中国，他们简直乐坏了，找了些人高呼毛万岁，建立毛主义党，中共出钱养这些人，邀请他们去中国。”

1980 年 5 月 17 日总统选举日，秘鲁见证了第一起毛派游击队武装暴动。毛派游击队宣布发动人民战争，年青军人扣留并烧毁设在教堂里的投票箱。数周后，首都利马街头的街灯上吊死的狗脖子上标名“邓小平”，中国修正主义头子被控为背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75

1977 年 7 月-9 月，在秘鲁 Quechua Aycacho 赤贫地区（素有死亡之地之誉）发生了六起总罢工。该地区仅 5%可耕地。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 美元，是秘鲁共产党毛派的发源地。

1959 年位于该赤贫地区的 Ayacucho 大学成为共产党活跃中心之一，一个革命学生组织在大学起着重要作用。起初正宗马列共产主义和毛主义全被禁止。1960 年初，一位青年毛派哲学教师哥斯曼（Abimael Guzman）伴演了主角，他 1958 年加入共产党，是一位优秀的长于形而上学，才华横溢的教师。1965 年他协助建立的共产主义红旗集团（毛派），系中苏分裂后秘鲁共产党内部的产物。1966 年秘鲁政府关闭该大学，因其煽动起义暴乱造成社会危害。这时由哥斯曼领导的红旗党，于次年开始武装斗争。1969 年 6 月，他参与绑架诺查（Rocha）；1970 年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但数月后获释。1971 年，另一共产党派别成立，其宣称马列主义将为革命开辟光辉前途。

军事英雄哥斯曼被誉为“马、列、毛、哥斯曼”之后的，第四位马克思主义高峰。小说家罗伊沙（Mario Vargas Llosa）分析哥斯曼的革命计划如下：“秘鲁的国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故应采取长期人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策略，社会主义的榜样是斯大林之苏联，“四人帮”之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波尔布特之红色高棉。”677

1972年-1979年，秘共马列派的桑德罗（Sendero）在学生组织中煽动组建和发展共产党，并获得圣马技术大学学生的支持，亦渗透小学教师联盟；1977年底哥斯曼秘密组织武装斗争，1980年3月17日，获秘鲁共产党的正式批准。

桑德罗（Sendero）的军队由梅兹（Carlos Mezzich）领导的托派和 Pukallacta 集团的毛派异议者加强。1980年12月23日，秘共毛派实施首例“大众司法正义”，暗杀了一名叫做梅迪那（Benigno Medina）的地主，虽然此时其仅有200至300名成员，它迅速展开消灭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及国家安全部队的行动。677

1981年秘共毛派攻击在 Totas San Jose de Secce 和 Quinca 的警局。1982年8月攻击警总司，击杀6名反游击警，并从警局夺取武器，从矿区取得炸药，攻击炸毁公共建筑，电力设施桥梁。1982年毛派进攻城市，解放了297名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有组织计划地攻击军警。1982年8月，毁坏农业研究和实验中心，屠杀动物，放火烧毁仪器设备；一年后，技术研究所亦被袭击，所长阿兰萨亚（Tino Alansaya）被杀害。随后8年，600名在农村的工程师被杀。1988年美国公民康斯坦汀（Constemtin）被杀害；同年12月4日两名法国援助工人被杀。哥斯曼曾预言：“革命成功要付出1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该国人口总数为1900万人）1982年1月秘共桑德罗马列派在学生面前屠杀两名教师；数月后，67名叛徒被“人民法庭”随意公开处死；农民开初对他们杀死地主和政府官员漠不关心，因为地租和高利贷利率过高；后来桑德罗马列派杀中产者，侵犯到农民的部分利益，他们才加以反对。作为革命纯洁计划，马列派还杀盗窃犯，但自1983年始，桑德罗（Sendero）便与毒品走私集团合作。

在民族冲突地区，桑德罗使尽一切手段煽动人们对利马政府的仇恨。桑德罗称要以波尔布特保护高棉纯种的方式，保护印地安人的利益，起初赢得印地安人的支持，但很快印地安人便极反感桑德罗的残暴杀虐与恐怖策略。

1980年底，桑德罗完全控制了 Ayacucho 地区，妓女被强行剃头，不忠实和酗酒的丈夫被鞭挞，任何人表示任何反抗均被在头发中强制剃出镰刀斧头型，任何传统的庆祝活动均被认定为不健康而强制禁止；社区按等级制全部被人民委员会控制，拒绝合作者被立即处死。为封闭与世隔绝，秘共还炸毁桥梁。

秘鲁政府对付秘共的恐怖主义，初时采用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围歼，但收效甚微。1983年至1984年，秘共煽动的人民战争到处漫延；1983年4月，55名秘共游击队员控制 Luconamanca 地区后，用斧头屠杀了32名叛徒和其他被抓获的逃跑者，共67人（包括儿童）被屠杀。这次屠杀旨在显示桑德罗的权威与冷酷无情。

1984年至1985年，桑德罗马列派侵犯对象扩大致政府官员，1983年11月，暗杀了矿区佩斯科（Cerro de Pesco）市长，因政府没有及时作出反应，该地区的好些市长副市长因而辞职逃亡。1982年桑德罗马列派屠杀了200人，1983年杀了2000人，1984年共发动240次行动，超过400名军警丧生；1984年，政府宣布146个省有10个处于紧急状态。

若发现游击队员，每60人处死3人，许多农民因此被杀，导致农民倒向桑德罗；1985年，马列派秘共残杀了7名地主，他们的耳朵，眼睛，舌头被割除；他们还用塑胶炸药暴炸在 Cuzco Arequipa 的发电中心。秘鲁军方也曾因军警被杀而实行报复，1986年6月在利马三座监狱镇压了200名犯人；但1990年初，秘鲁政府改变原先的政策，宣布视农民为合作者，而非敌人。桑德罗亦改变策略，分解成小组活动，自治组负责游击战，破坏，恐怖和精神心理战。679 桑德罗在 Amazonia 建立起集中营，惩罚任何背叛者。自1983年起，被奴役的农民便试图

逃离桑德罗占领区，任何被抓住的逃亡者被立即处死，被关入集中营者被强制学习，蒙受饥饿与奴役与剥夺之苦。1987年12月，300名幸存的男女儿童逃出古拉格，抵达贝兰（Belem）丛林边沿。

秘共哥斯曼和桑德罗的残暴革命事实证明并不能为穷人带来幸福，大多数农民逐渐抛弃了革命。桑德罗亦与共产党内各派展开斗争，长期试图清除正宗马列主义派未果。1990年，1584名平民和1542名暴动者因桑德罗与MRTA恐怖集团的内斗而丧生。在政府军和MRTA集团的双重打击下，桑德罗马列派开始衰亡，1980年代末，秘鲁共产党因内斗处决了数名关键人物，加速了共产党的灭亡。1992年9月12日和13日，哥斯曼和他的同伴爱伦那（Elena Iparraguire）被捕；数周后，该组织的第三号人物拉密雷兹（Oscar Albert Ramirez）落入警方手中；1993年3月2日，桑德罗的军事领导人多米哥（Margot Dominguez）亦被捕。最后1995年3月30名游击队员被安全部队发现并捕获。尽管消灭了其领导人，至1995年桑德罗马列派仍有25000人，包括3000至5000名常备军人。秘鲁共产党制造的冲突造成2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秘鲁共产党对25000至30000人的生命负有罪责。1980-1991年1000名儿童死于秘共的恐怖行动，另外致伤残3000余人，由于无数家庭毁灭，还造成50000名儿童成为孤儿或被遗弃。

第十一章：阿富汗共产党暴政罪大恶极

提要：共产党毁掉了原来已迈上自由宪政民主政体坦途的阿富汗的光明前程，对阿富汗人民人为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迄今阿富汗人民还在蒙受源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伊斯兰极端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危害。恐怖、暴力、欺骗、秘密警察、群体屠杀、酷刑、共产党内黑社会流氓竞争相互残杀、打压宗教信仰、毁灭文化遗产、死亡、伤残、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最大难民群体，这一切就是共产党带给阿富汗人民的礼物！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其残暴恐怖程度实际上业已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罪犯。而中共极权流氓暴政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绝对不亚于任何共产党政权，迄今全世界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例是在保留共产党党国体制或由共产党主导自愿放弃权力的前提下实现宪政民主政治和平转型的，这是由共产党的犯罪组织的流氓本质决定的。任何迄今还迷信共产党政权可以改良的任何人，难道还不应当反思惊醒吗？！

1963年国王扎伊尔沙（Zahir Shah）宣布进行文化、经济、政治现代化建设。

自1959年始，政府不再强制要求妇女戴面纱，并允许上学和接受高等教育。1965年国王决定建立民主化政府，国家开始实行议会制，多党制，自由选举制。亦即，原本阿富汗事实上早已走上自由宪政民主化之途，若非共产党从中作恶，今日极度贫穷、落后、战乱不断、恐怖主义盛行的阿富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78年共产党发动军事政变和随后苏联军队的干涉，破坏了阿富汗社会政治平衡，中断了业已良好上途的现代化进程。706

1920年9月苏联红军将领法伦兹（Mikhail Franze）亲自率部占领了原属阿富汗的Bukhara Khanate地区，并于1924年正式吞并之。阿富汗人民的反抗持续至1930年代，约一百万人逃亡至阿富汗。直到1933年苏军才彻底平息抵抗运动。

共产党迅速开始影响阿富汗领导层，大批阿富汗人被派到苏联学习、培训。契卡（Cheka 克格勃的前身）成员阿格贝可夫（Georgy Agabekov）负责阿富汗地

区，他长期非法居住于卡布尔和伊斯坦布尔。1965年阿富汗举行了第一次大选。

国王想保持君主立宪制。1969年进行第二次自由选举，结果均有利于地方贵族和政府。皇家在1905年便废除了酷刑法，甚至连依可兰经（Koranic）法是正常的肉体刑罚也弃之不用了。在这些方面，共产政权是严重的历史倒退！709

国王的民主化举措使得地下共产党得以公开化，1965年共产党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名义参加竞选。有一位苏联支持的阿共党员入选国会议员。塔拉基（Nur-Motammed Taraki）当选为阿富汗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侯赛因汗（Mdammed Hussein Khan）出身贵族，任克格勃线人多年；另一名创始人是塔拉基，是个富农子弟，于1969年入选国会议员。共产党分为两个派别：“人民派”与“旗帜派”，以各自拥有的报纸命名。两派皆以马列主义为正宗，与苏联政策相似；1976年在苏联命令下两派合并，阿共党员从未超过4-6千人。阿富汗还有数个团体，其意识形态源于马克思主义。

吉威德（Shola I Javaid）是1970年初形成的毛派，其成员多为希特斯派伊斯兰信徒（Shiites）和学生，后分裂成许多支派，全部反苏并抵抗苏联入侵。709

国王的叔叔道乌德（Mohammed Daoud）1963年被解除职务，1973年他与共产党军官合作发动军事政变。旗帜派有七人进入道乌德（Daoud）政府任职部长，政变后，宪政自由被停止；在共产党人的煽动下，道乌德政府兴起一场迫害浪潮。民主族主义者迈望达勒（Hashim Maiwandwal）1965-1967年任总理，与40余人被罗织阴谋颠覆政府罪逮捕，其中四人被处死，官媒说他们在狱中自杀。酷刑和恐怖变得普遍。

1975年道乌德（Daoud）欲摆脱共产党人，不仅与东欧诸国签定新贸易协议，而且与伊朗，印度也签，从此与苏联关系恶化。在一次访苏联期间道乌德与勃列日涅夫发生争吵，并开始公开促进阿富汗经济独立。于是他于1978年4月27日被共产党组织的政变推翻。

1978年以前，阿富汗是个市俗国家，几乎没有穆斯林极端主义的市场，官方中立与苏联关系和谐。边界及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关系均没有问题。说苏联制止极端伊斯兰根本不是事实。通过推翻道乌德政权，苏联扶持极端伊斯兰，或许共产党低估了极端伊斯兰的力量。

引发共产党政变的起因是暗杀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卡巴尔（Mir Akbar Khaybar）事件。1978年4月17日共产党人组织大规模抗议示威，随后推翻了道乌德政府。夺权显示是事先精心策划预谋的。旗帜派领袖阿明（Amin）在军方有相当实力，原计划在1980年4月举行军事政变。共产党先在工业部门，军队和政府公职中谋取高位；通过这种渗透最后在沙乌尔（Saour（Bull））革命中实际夺权。

道乌德总统试图摆脱共产党控制，以及暗杀共产党领导人阿明事件仅是加速了共产党夺权的进程，暗杀发生后，共产党组织的示威抗议日益漫延全国，道乌德总统下令逮捕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或严密监控之。阿明被软禁，但他受助于打入秘密警察中的共产党特务，结果他在家中得以指挥整个政变。

1978年4月27日，总统府受到政变军队的坦克和飞机的攻击，道乌德总统及其家人和卫队拒绝投降，结果总统与17名家人一道于次日被叛军杀害。4月29日即开始了对非共产党的军人的第一波清洗；政变后对全社会的镇压导致10000余人丧生，因政治原因下狱14000至20000余人。711

1978年4月30日，新政府宣誓就职。塔尼基（Taniki）任总统，巴布拉克（Babrak）出任副总统兼副总理。阿明（Amin）任第二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共产

党政府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废除农村土地债务的抵押，全部儿童义务入学，开始反宗教宣传，从而破坏了阿富汗传统社会生活方式。大量改革引起广泛不满。1978年7月暴发了第一起阿斯马尔（Asmar）起义，政治暴力变得漫延。1979年2月14日，美国大使阿道夫达布斯（Adolph Dubs）被毛派米利（Satem Milli）绑架，要求释放其领导人贝黑斯（Barrudem Behes），但他已被阿共秘密警察枪决。国安秘警介入营救人质，结果却使美国大使和绑匪同归于尽。随后，阿共产党政府开始了反宗教征程。公开焚毁可兰经，宗教领袖和其他宗教领导人被逮捕和被杀害。

1979年1月6日夜，在Mojaddediclam所有的130名伊斯兰信徒被集体屠杀。所有的宗教活动一律被禁止，犹太社区仅有五千余信徒，结果被迫亡命以色列。

(712) 各种反抗随即开始增长，在城市中迅速漫延至农村，在各部落各群组反抗网络开始形成，面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阿共政权及其苏联顾问开始大范围实行恐怖。

1979年3月Karala村1700人（包括儿童），全部男性在广场上被机枪扫射而死，尸体及伤者全部被扔进三个大坑中用推土机掩埋；女人全部亡命巴基斯坦。1979年3月日，刚落入反共武装之手的赫拉特（Heart）城被轰炸，共产党政府军随后进城清场，共有20000至25000人丧生，而该城人口仅20万。此后，反抗遍布全国，迫使共产党政权再度向苏联求援。苏联于是向阿富汗共产党政权提供特别援助5300万卢布，立即向阿富汗运送140门大炮，90辆装甲车（包括50辆水陆两用装甲车），4800枝步枪，1000枝枪留弹，680架轰炸机，但未提供阿共政权要求提供的生化武器和毒气弹。712

波尔乐查尔基（Pol-e-Charki）监狱变成集中营，沙叶得监狱长（Sayyed）向犯人解释说：“你们将在这变成一堆垃圾！”

酷刑非常普遍，每天晚上数百人被活埋。阿共当局采用斯大林的残暴方式：任何群体中有任何成员的个人行为，将由全体成员承受报复。（纳粹希特勒采取每四人中杀一人的比率报复，日本侵华时期也是每五人中杀一人，阿富汗共产党政权屠杀其人民的反抗的报复居然是只要有一人反抗，全体成员全被屠杀！1922年苏联曾发生一起暗杀列宁未遂事件，结果苏共秘密警察以杀500人作为报复！）导致1978年8月15日哈扎拉斯（Hazaras）族300人被捕，其中150人被用推土机活埋，另150人浇上汽油活活烧死。1979年9月日监狱当局承认12000人已被消灭。波尔乐查尔基监狱长向任何愿意听的听众说：“我们将仅留下一百万阿富汗人，那是我们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所有的人。”

整个国家被变成大监狱的同时，阿共内部两派的争权夺利也日益激化。旗帜派日益占上风，人民派领袖持续被解除职务；他们被外派铁幕国家任大使。巴布拉克（Babrak）依苏联指令被派驻捷克斯洛伐克。旗帜派内部也争斗不已。1979年9月10日，阿明（Amin）推翻塔拉基（Taraki）成为总理和阿共总书记。他迅速消灭旗帜派内部的对手，并暗杀了塔拉基。此时苏联已有五千顾问驻阿富汗，和地面部队总司令帕尔洛夫斯基（Ivan Grigorievich Pavlovsky）将军指挥的一支苏军。713

巴布拉克（Babrak）称：15000人死于他的后任塔拉基（Toraki）和阿明（Amin）的清洗。真实的数字至少在四万人以上。国家的全部精英到清洗。在农村共产党用机枪制造恐怖，包括轰炸，导致10万人丧生，50万人流亡海外。（714）

1979年秋整个阿富汗陷入内战。尽管残暴镇压，共产党政权仍无法在农村地区行使其权力，于是被迫再度求助于苏联。

这次援助超出了阿明（Amin）政府的期望。于是阿明总统开始疏远莫斯科，增加与不受苏联直接影响的国家，甚至美国接触（他年青时曾在美国留学）。1979年12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干预计划。12月25日，代号333的行动风暴正式启动，苏军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依前克格勃官员称：“进攻总统府，暗杀阿明总统和任何证人，知情者。在阿明总统死前，予他退休并接受丰厚的退休金的机会，但阿明拒绝，于是被暗杀，并由卡马尔（Babrak Karmal）取代出任总统。新政府在苏联通过广播宣布成立。此时，阿明尚未被处决。714

1989年纳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成为阿富汗国家领导人后，启动国家统一和类似于哥尔巴乔夫的改革。1989年苏联政府以军事技术方式提供250万卢布援助，随后另外提供了价值14亿卢布的武器。1991年底苏联解体后，军事援助停止，纳吉布拉政府随即垮台。

苏军在阿富汗实行全面战争与焦土战略恐怖策略，而在阿共手中并非直接受苏军控制地区的阿富汗人则实行传统方式的恐怖政策。（715）对于任何真实或想象对手均实行系统灭绝。AGSA保护阿富汗利益组织。迅速演变成各种化身，先变成国家情报部，后变成国家安全部，秘密警察组织，其财政和顾问均直接依赖克格勃。这种政府恐怖主义实践，理论上直到1989年苏军撤离时，实践中则直到1992年纳吉布拉政府垮台时才终止。715

通过九年内战，苏军和阿共政权从未控制超过20%的阿富汗国土。仅控制了城市，产粮区，天然气田和油田储备区。苏军在阿富汗共产党政权的协助下发动全面战争。结果阿军损失惨重，由1982年的80000人仅两年后变成不到30000人。

苏军派往阿富汗的60万大军，主要是西部各共和国的军队，包括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死于阿富汗的苏军人数为14751人。死者尸体极少运回国还给亲人，许多战死的军人遗体甚至不带回苏联；送还给亲人的铅封的棺材中时常仅装有沙子或无法辨认的尸体。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军人战死沙场后，政府竭力予以庄严隆重纪念仪式形成鲜明对照。亦即举凡共产党暴政从不尊重人命，仅重物质。716

阿富汗反抗力量发展成拥有6万至20万人的战斗部队。他们受到绝大多数阿富汗人的支持，七支撒尼派伊斯兰（Sunni）总部设在巴基斯坦；八个希特伊斯兰派（Shiite）集团总部设在伊朗，两者均基于激进或温和伊斯兰教旨。阿富汗抵抗力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游击队获得美国武器，包括地对空导弹。而苏军对任何支持帮助抵抗力量的村庄立即实行恐怖报复轰炸。716

1980年底估计有超过100万阿富汗人逃离阿富汗；1982年中期，已有80%的知识分子逃离阿富汗。1983年难民达到300万；1984年400万，1990年初达到500万人，而阿富汗的总人口仅1500万。此外，留在阿富汗境内还有200万难民。

依大赦国际认定，阿富汗难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难民群体。其中2/3逃往巴基斯坦，其余大多逃往伊朗，少数避难于美国与西欧国家。

苏军发动全面战争后，1981年遭到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国际刑事法院的谴责，该院派出由一位阿富汗问题专家巴雷（Michael Barry），一个法律专家佛瑞勒（Rocjardp Fraile）和一位摄影师组成的调查小组，前往阿富汗调查取证证实：

1982年9月13日，苏军在Logar省Padkhwab e Shana将105名藏在地下灌溉渠中的人活活烧死；1982年12月20日，该法院作出正式裁决：谴责苏军的战争罪，阿共政府指责该法庭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拒绝并否认苏军的罪行。（717）在上述同省的Khasham Kala，100名没有任何抵抗的村民被以同样的方式烧死。

(718) 苏军所到之处，便将恐怖带到那。妇孺老人概不能免。在搜索敌人时，若妇女和老人脸上流露悲痛恐惧之态，便会被杀害。苏军还用煤油浇在一个小孩的手上，当着其双亲的面点燃，以惩罚他们不通风报信。一位士兵解释说：“我们从不俘虏战俘，我们无论在何处抓到战俘，就地枪决了事。如果我们正在进行惩罚性远征，我们不用子弹射杀妇孺，而是将他们赶入一个屋子里，扔几枚手榴弹解决。” 718

苏军的目的在于制造恐怖，以迫使人民屈服，同时旨在阻止阿富汗人支持反抗运动。妇女被剥光服后从直升飞机上扔下去，如果一个苏军士兵被打死，则将全村老少杀个精光作为报复。

1983年10月13日，苏军对Kolchabad Muchkizai和Timur Qalacha三个村落126人实行群体屠杀，其中包括50名20至32岁的妇女和26名儿童。1985年4月17日，在Laghman省苏军摧毁数个村庄，扫荡反抗力量基地，屠杀了1000余人。苏军还反复违反国际战争法，投放生化武器，毒气弹，屠杀平民，并向水源投毒。苏军还用阿富汗军人作前峰扫雷作业，用阿军在苏军前面探路。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被怀疑为抵抗运动基地，于1987年2月27日进行了无情的轰炸。 719

苏军在阿富汗安全区，工业基地及农田埋设了超过二千万枚地雷，炸伤残70万人。一个名叫巴兹加尔(Shad Bazgar)的阿富汗人称：“苏军体制性毁灭村庄，攻击每一座房屋，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摧毁一切。(719)

苏军的焦土政策和全面战争战略还包括制度性毁灭阿富汗文化遗产。在苏军的支持下，阿富汗共产党政权在控制区内实行政治恐怖统治。而苏军占领区则成为超级集中营，监禁和酷刑被制度性用于任何反抗阿共政权的人。政治恐怖是KHAD秘密警察的专权。其控制所有的拘留，逮捕，酷刑，谋杀。波尔查尔基(Pol e Charki)监狱在卡马尔(Babrak Karmal)撑权后一度因大赦而清空。但自1980年2月他颁布军管法后，很快又重新填满。该监狱关押12000至15000人。另有至少5000名政治良心犯关在其他8个位于卡布尔(Kabul)的其他监狱拘留中心。KHAD秘密警雇用了7万人，包括3万平民，由1500名秘密警察军官控制。

肉体酷刑包括但不限于：电棍电击男性生殖器官，女姓乳房，撕裂指甲，强制灌尿水，用手和脚指强奸妇女，用各种硬物塞入女性阴道；精神心理酷刑包括假枪毙，当着亲人的面强奸，伪称犯人已获得自由等。 721

抵抗运动一直兴盛不衰。炸弹袭击共产党政府行政中心，抗议示威一直不断。1980年4月27日，学生举行罢课示威。60名学生，包括6名女生被杀害，罢课示威持续了一个月，无数男女学生被捕入狱，受到酷刑，或被开除，或被剥夺和各基金机会，对师生的迫害更严厉。阿共还克意恐吓女生，故意带她们参观酷刑抵抗战士的现场。在KHAD秘警断肢分离的惨景得以在学生中流传，以达到恐怖之效。

历史学教授卡加尔(Hassan Kakar)并非阿共党员，但因曾帮助过人民派阿共党员并提供避难帮助而被捕，审判时禁止他聘请律师，并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他的两名教授同事亦分别被判8年和10年；阿卡巴里(Mohanmed Yunis Akbari)是阿富汗唯一的著名原子物理学教授，1983年被捕，未经指控而被关押；此前他已经两度被捕，1984年被判死刑，并于1990年被处决。 722

阿共政权严密控制任何信息。因为受到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外国人被捕不会受酷刑，也不会被杀害；但一旦审判，明知控方作伪证时，被告人往往被强迫坦白认罪，诸如外国间谍，帮助抵抗运动等罪名。阿富汗人被捕后，既被酷刑也

被杀害。1980年6月8日-1982年4月22日，阿共官方承认以反革命罪名处死了50人；1984年，77人；1985年40人。（723）

1992年4月19日，抵抗力量攻克波尔查尔基（Pol e Charki）监狱释放了四千名政治犯。

1992年5月在该监狱附近发现了一个群体屠杀大坟地，内有12000尸体！亦即证实凡是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加十倍报喜，减十倍甚至百倍报忧！

1986年卡马尔总统（Babrak Karmal）被废免，取代他的是特务头子纳吉布拉德（Mohammed Najibullah），他较象哥尔巴乔夫，属阿共人民派，1980年至1986年期间任特务头子，后任驻伊朗大使，与苏联关系密切，曾受到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欣赏。他的兄弟曾将他与贝利亚相比。在他任职6年期间，他曾签署9万人的处决令。他还对无数酷刑负有责任。阿共还将儿童送还苏联受训成儿童间谍，以便打入反抗组织内部，孩子们被注射毒品以降低其独立性，大一点的孩子则提供免费妓女服务。超过3万名6至14岁的儿童被强制送至苏联培训成间谍。一个儿童因拒绝当间谍被苏联教官电死，另一个被吊死。724

阿富汗内战致死亡150万至200万人，其中90%是平民；并造成200-400万人伤残。直接或间接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在阿富汗培育出激进伊斯兰运动，当前的国际恐怖主义，实质上源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十二章：虐杀成性的柬埔寨共产党暴政

提要：柬埔寨共产党除了在与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60万军民之外，在其夺取政权后的三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的直接指导，凭借超极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官员、军人，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一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以近似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和集中营的残酷虐杀和谋杀性的饥荒及体制性的强劳，屠杀和害死至少200万平民（包括妇孺老弱病残及40万华裔中的20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迄今中共政权不但从未谴责柬共屠杀华裔的罪孽，反而极力阻止审判柬共的国际审判）；系统毁灭宗教，疯狂屠杀信众；摧毁一切传统文化，颠倒一切人类文明价值观；废除金钱，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消灭阶级，毁灭学校文化知识，迫害知识分子和一切专业人士，强制集体化，狂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近70万人；柬埔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在于飞速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超级天才，狂妄地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极权的暴政，而红色高棉极可能是其中最野蛮、疯狂、残暴、无知、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个。

“红色高棉暴政是平庸苍白，充满想象和富于文化的中共暴政的复制品。而中共暴政是没有外援而建立起的，继续繁荣的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共产党政权。毛泽东与波尔布特之间的联系至为明显”（Jean Louis Margolin）。（577）南郭认为作者似乎对中共夺权的真实历史并不了解。因为中共决非“没有外援而建立”，事实上中共除了象绑匪一样绑架人质敲榨勒索抢劫富人外（中共用语为“土豪劣绅”），始终受到苏联操控的共产国际的大力财政支持，直到二战爆发，特别是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后，此种援助才有所减少，但中共立即以大面积种植鸦片并贩毒解决财政收入困境。1945年8月苏联红军缴获日本关东军全部武器装备，

随后秘密甚至半公开全部转让给中共，则是中共最终战胜国民政府的关键。

因此，没有苏联的大力援助，中共根本没有任何可能依靠其自吹的小米加步枪打败武装到牙齿的“八百万蒋匪军”。

尽管波尔布特的局限性，其文化革命和大跃进看起来仅是尝试高速预备勾勒或许是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图依据马列原教旨的教条，但无需长期的过渡阶段，毕其功于一役地跃入共产主义社会。红色高棉在夺权后，一周内即废除金钱货币；完全的集体化在不到两年内实现；社会差别通过消灭整个有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商人得以实现；古老的城乡对抗，通过在一周内清空城市的方法实现。波尔布特相信他将超越马、恩、列、斯、毛，成为 21 世纪革命的导师，正如 20 世纪是俄国和中国革命一样。577

经过近 20 个月的边境冲突，越军于 1979 年 1 月入侵柬埔寨，而绝大多数柬埔寨人视越军入侵为解放之时。邓小平正是在此种背景下，莫名其妙地发动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中共意在挽救红色高棉至为明显。因为红色高棉自 1973 年与越共分裂后，便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死前，波尔布特曾秘密访问北京三次，均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接见与指导，中共曾派约 15000 名专家入柬埔寨帮助柬共，并提供 10 亿美元的援助。据张戎女士查证核实柬共曾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毛泽东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毛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中共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泽东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中共的柬共第六号人物克·米（Keo Meas）1976 年 12 月（即在毛死后不到三个月）被逮捕，被酷刑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1]

在迫害程度上，柬埔寨共产党超越了其他所有共产党政权。一小撮理想主义者变成了邪恶，而传统的精英们却无法拯救国家或他们自己。1992 年在联合国监督下建立起多元政党政治。2009 年在联合国帮助下，设立了一个审判柬共罪行的国际法庭，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一、历史概况

高棉王国自 1863 年始成为法国的保护国，因而避开了 1946-1954 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多少避免受伤害。

1953 年西哈努克王子开始了和平的独立征程。得益于西哈努克与法国之间杰出的外交关系，独立征程相当成功。由于他想要在越南与美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结果导致越、美双方均不信任之。

1970 年 3 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默许祝福下，他被自己的政府和议会解职。国家随即陷入混乱，越南族人受到迫害，45 万越南裔中的 2/3 逃难至南越。越南使馆被毁；朗诺政府发布命令所有外国军队立即离开该国的最后通牒。

越共扶持红色高棉，向柬共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越共以红色高棉的名义，占领了大量柬埔寨领土。西哈努克由于初期受到羞辱而投靠共产党，在中共 and 越共的指导下，红色高棉虽给西哈努克优厚的物质和礼仪尊遇，但实质上不予其任何政治权力。

柬埔寨由此形成红色高棉与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之间的内战

(1970-1975)。由于朗诺政府的军力远弱于越共，且无法赢得西哈努克和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的支持，他转而请求美国军事援助，提供顾问，轰炸游击队并接受南越的支持。

1972年高棉共和国王牌军被消灭，红色高棉力量切断了主要城市供应，以致主要靠空运解决城市供应；美国对红色高棉占领区实行了密集轰炸，在6个月内投放了54万吨炸弹，虽然削弱了红色高棉的力量，但造成农村约1/3的人口计250万人拥入城市避难，同时引发了农民对美国的仇恨。1974年红色高棉占领古都欧通市（Oudong）后屠杀了数万人。1975年4月17日，高棉共和国军队被打跨。

二、大建集中营，反复清洗党内外异己

一 “解放”红色高棉即开始大建劳教营，其与理论上关押重罪犯的拘留中心几无区别。最初劳教营是仿自越共，主要用于关押朗诺政权的军人。此处根本不适用日内瓦战争法公约，因为所有的朗诺政权人员皆被视作叛徒而不被当作战俘。

越共一般不故意杀俘虏，红色高棉则反之，战俘在红色高棉手中基本上意味着死亡。

在亨利洛咖德（Henri Locard）有个拘押1000人的拘留营，连同囚徒的妻子儿女，佛教和尚，嫌疑旅游者，由于极残酷的生存条件，饥饿，疾病致使大多数囚徒及所有的儿童迅速死亡，每夜至少死30人，以致处决囚犯变得罕见。

反复清洗党内外异己。1973年红色高棉与越共分裂。柬普寨共产党1973年1月在巴黎与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美军撤离，导致越共减少对红色高棉的援助，波尔布特趁机清洗了1000余名越裔柬共党员。

柬共领导人大多是在法国学习并接受法国共产党的军事训练，与越共分裂后，柬共即开始着手修改历史。将柬共原属成立于1951年以越共为核心的印支共产党，改为成立于1961年，从而对柬共51派进行清洗迫害。

凡是支持越共的柬共党员均被清洗。Hou Youn；皇家政府所有的外交官于1975年12月全部被召回，除两人外，全部受到酷刑折磨后处死。柬共第6号人物克米（Keo Meas）于1976年12月日被捕后，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清晰明确的指控即被酷刑致死；任何在狱者皆被以野蛮的酷刑后处死。只有坦白认罪者或可免死。旨在彻底清除任何潜在竞争对手和任何与越共及中共四人帮集团有联系者。任何人若对波尔布特有潜在竞争力，皆在清除对象之列。1978年7月日柬共党刊称：“在中心，在首都，在地区，在村庄敌人到处存在于我们的机体之中。”随即13名自1975年10月以来的最高级干部中的5名，及大多数地区的党的书记全部被处决。1978年新当选的7名最高领导人中的2人于1979年1月被处死。

公务员和知识分子渐渐被清洗，最后这一群体也被消灭干净。

清洗最后蔓延至草根阶层。审讯者用尽一切手段套取上级喜欢的口供。据估计，仅在一个区便有4到7万平民被扣上叛徒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合作的罪名处死。

1977年在饥荒达到高峰时，第二波大清洗同时进行。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质，目标是教师、富农和中农，且更加残暴。

1975年清洗放过家属妇女儿童；1977年清洗则将已被处死者的妻儿老小逮捕杀害；全家被屠杀有时全村被屠杀。

1978年后清洗对象扩大至包括妇女儿童。

三、欺骗成性，杀人如麻

波尔布特 1979 年 12 月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作为柬共党魁公然欺骗说：“仅有数千柬普寨人死于我们的迁徙政策”。1975 年 6 月，波尔布特引用的数字承认 1975 年 4 月 17 日以前的内战死亡人数超过 60 万，1978 年他谈及死亡者超过 140 万。589

Khieu Samphan 在 1987 年一份官方小册子上称：“3000 人死于误杀；11000 越南间谍被杀；30000 人被渗透我国的越南间谍杀害。越南入侵柬普寨期间危害柬普寨人民 150 万人以上。”该最后数字间接证明红色高棉杀人总数至少在 150 万以上。

红色高棉的受难者，按朗诺总统（Lon Nol）引述为 250 万人；

前柬人民革命党总书记 1979 年执政的 Pen Sovan 引证死亡人数为 310 万；

Ben Kiernan 认为死亡人数为 150 万；

Michael Vickery 则说是 75 万；

David Chandler 估计为 80-100 万；

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综合各种情报计算（1970-1979 年期间，包括同期因出生率降低引起者）死亡总数为高达 380 万；

根据 1970 年和 1983 年大米种植面积数据分析的结论死亡人数为 120 万；

Marek Sliwinski 根据人口统计学技术的近期研究认为死亡数超过 200 万，但不包括约 7% 自然死亡者。

Sliwinski 依 1975 年至 1979 年两性比率及年龄研究提出男性死亡率为 33.9%，女性为 15.7%。死者遍及所有年龄，尤其以青年男性为最（34% 男性死者为 20-30 岁；40% 男性死者年龄为 30-50 岁）。589

[1]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四、滥杀无辜，暗杀恐怖

红色高棉在内战期间仅暗杀便高达 75000 余人。强制迁徙城市居民使之村民化（包括死于路途及累死者）导致 40 余万人死亡；处决超过 50 万人；Henri Locard 估计约 40 万到 60 万人死于监狱；这一数字不包括那些被即时处决者；Sliwinski 的研究则称总共有 100 万人被处决；饥饿与疾病夺去至少 70 万人的生命。

知识分子有时仅因其身份被杀；更多的情况乃是：如果他们放弃在任何领域的全部现有专业及抛弃书和眼镜，则允许他们活着。591

40 万华裔约 50% 死亡，比率高于越南裔。据 Sliwinski 研究统计 37.5% 越南裔；38.4% 华裔；82.6% 高棉共和国军官；51.5% 所有的知识分子，41.9% 金边市所有的居民被消灭。（1962 年华侨占金边市民 18%；越侨占 14%）红色高棉相信阶级斗争远不如种族之间或不同人民之间的斗争重要。1977 年 4 月红色高棉下令所有的越侨需逮捕并移送中央安全机关。他们的亲朋及讲越语者也被逮捕。在与越相邻的 Kratie 省，祖先中有越南血统者便足以构成逮捕的理由，指控东部地区所有的居民为越南潜入柬普寨机体内的代理人并全部处死。

五、群体灭绝

真正的群体灭绝发生于东部地区。该区域政治军事首脑 Sao Phim 是唯一反抗中央政权的区首脑。1978 年 5-6 月发生了短暂的内战。4 月间，409 名干部被拘留后，Sao Phim 自杀，其妻及孩子皆在葬礼中被杀。该区的一部分军人试图武装起义，然后逃入越南，后来随越共军队进入金边。当柬共中央军重占该区后，以他们皆是在高棉体内的越南佬为名，处死了全部该区居民。

1978 年 5-12 月期间，该地区约 10 万至 25 万人被杀（人口总数为 180 万），先杀军人和青年人。在 Sao Phim 的家乡，120 户 700 余人全部被杀光。在另一村庄 15 户人家被灭绝 12 户，仅 7 人幸存。7 月以后，任何生还者全部被强行迁徙至其他地区，并在当地被逐渐消灭。数千人在迁徙途中死亡，他们被强迫装从中国进口的蓝色工装。凡穿此种狱服者，最终全部被灭绝。在东北一个合作社，当越军抵达时，原有的 3000 名东部居民，只剩下 100 余人。妇孺老弱与原住民和新居民一道被屠杀。除了 1975 年 4 月已逃亡者外，1976 年 11 月日，23000 余人逃亡至泰国，到 1977 年 10 月，60000 余柬普寨人亡命越南。而这些成功的逃亡者，仅是亡命者中的一小部分，任何被发现而抓回者，皆意味着死亡。许多亡命者丧生在可怕的丛林之中。

红色高棉在最后败亡之际，群体屠杀了绝大多数在押犯人。例如，Tuol Sleng 几无生还者。尽管越共入侵远非出于人道主义，但客观上却挽救了无数生命。

柬共群体灭绝罪是否成立？群体灭绝罪适用于制度性灭绝一个民族，种族和宗教团体。1975 年投降的朗诺政府军人，受到体制系虐待，许多人立即被处死，更多的人随后被无情地处决；红色高棉无疑犯有战争罪，也犯下了反人类罪；任何政治反抗，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皆被处决。

六、屠杀迫害宗教信仰徒

自 1973 年始，红色高棉便在解放区镇压佛教，佛教和尚在传统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被柬共视为代表力量强大的竞争对手，凡是未解除圣职者，全部被系统地屠杀。1979 年在 Kandal 省一个村庄 28 名和尚仅一人幸存，其余全部被杀。全国原有 60000 余名和尚，被杀得仅剩 1000 余人。591

柬普寨天主教的命运最为悲惨。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踪。金边天主教堂是被彻底摧毁的极少数建筑之一。593

Cham 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约 25 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波尔布特 1974 年初即秘令摧毁他们的村庄，1976 年所有 Cham 族出身的干部，全部被清洗；在红色高棉占领区自 1973 年始清真寺即被毁，禁止祈祷做礼拜；1975 年以后此种禁令波及全国。可兰经被收缴并焚毁，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毁；1975 年 6 月，13 名伊斯兰显贵被处决，其中有些人仅因公开祈祷，其他人是因为公开参与示威游行要求宗教婚礼的权利。伊斯兰教徒时常被强迫作出选择：要么养猪吃猪肉，要么处决；每 1000 名至伊斯兰圣地麦加朝圣者，仅 30 名幸存。594

与其他柬普寨族人不同，Cham 族人好武。他们时常反抗，因而大量被屠杀。1978 年中期，红色高棉开始系统性清洗 Cham 族人，包括妇女儿童，即使他们被迫同意吃猪肉。据 Ben Kiernan 估计约 50%，据 Sliwinski 研究的数据约 40.6% Cham 族人被杀害。

依 Sliwinski 研究，58.1%的金边居民（100 万死亡）；71.2% Kompong Cham, 90.5% Odder Mean Chney 居民，在 1979 年仍活着，各不同地区的城市死亡率不相同。最后攻占的城市死亡率最高。

一位证人作证说：“在民主柬埔寨，没有监狱，法庭，大学，学校，钱，工作，书，运动和业余时间。。。每天 12 小时体力劳动，2 小时吃饭，3 小时休息和教育宣传，7 小时睡眠；全体住在集中营。Angkar（即波尔布特）控制我们每个时刻的生活”。597

首要信条是极端否定人生有任何价值的观念。自 1973 年始，解放区便镇压佛教，强制青年人与家庭分离，统一着装，所有的集体全部军事化。

所有的教育，运动和贸易自由，宗教，图书全部销毁。公开表示亲热之举皆被严禁；所有当局官员必须盲目服从，人们被迫参加各种会议，强迫批评他人或自我批评。1976 年民主柬埔寨宪法的第一项权利是劳动权！许多人自杀，尤其是被强迫分离的恋人，老人及原先过惯了富裕生活的人。

残疾人被当做懒汉枪决。时常被强制迁徙。逃亡者众多。但亡命在许多情况下仅是一种自杀形式。由于没有地图和指南针，逃难者在雨季为避追捕，携带极少量食物，许多人甚至还未遇上追捕者，便已因饥饿或累死在丛林中。

七、变态残忍至极的谋杀，共产党极权恐怖统治

“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只需要不超过 100 万优良的革命者，我们宁可杀掉 10 个朋友，也决不允许 1 个敌人生存！”此论是红色高棉政权大会上常见的用语。且将此群体灭绝逻辑应用于现实。

在波尔布特统治下，死行暴行下的受害者远多于死于疾病或年老。军队时常屠杀平民，地方干部屠杀整村嫌疑民众，甚至派军队灭绝东部整个地区的全部平民，尤其是最后一年达到高峰。

任何偷粮者那怕仅是在食堂或商店小偷亦可被处死；抢劫者时常被当场砍死；并暴尸街头任其腐烂，以恐吓民众。偷菜和水果有避免死亡的机会。但亦有例外，Khum 作证说有位妇女因她的一个孩子快饿死，偷了一串香蕉而被杀死。另一个例子是一群少年在果园偷了一些水果，被其同志审判处死，并立即从后脑射杀。

有些案例因分享一头母牛而全家人被杀。秘访被强制迁徙的家庭是非常危险的事。男女之间除非是近亲属，交谈必须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任何婚外性行为均被系统性处决；对年青恋人而言，生活特别艰难；好色的干部，许多人被以肉欲罪惩处。消费酒精饮料是另一可处死的罪行。不过通常只有干部和农民被处此种罪。

宗教活动受限制但有些容忍度，如果个人进行而不集体为之（佛教易行，而伊斯兰极难）但任何仪礼均在处死之列。

违抗者一律立即处死。1975 年 11 月日一群教师因不满粮食配给限制，而迅速整体失踪。要求终结政权或越南获胜，甚至仅是承认自己饿，都将面临极大危险。

无论何因未完成分派的任务都是十分严重的事，由于事故、小错误、过失均潜在巨大危险，主要因未完成任务，许多残疾人和神经病人被处决。

任何未完成任务者均是破坏者。任何高棉共和军人受伤者或断肢者，均彻底失踪。疯子表达不满的话，均会被立即枪决。

对柬埔寨人最恐怖的事是强制失踪。死刑执行柬埔寨官员往往彬彬有礼，说尽

好话，骗取受害人的好感。“柬共官员甚至在大屠杀我们时仍然很有礼貌！”

在每个省进行的调查（共 20 个省）发现超个 1000 个群体屠坟。红色高棉反复威胁将尸体于大米田作肥料，现已找到真实案例。在死刑执行时刻，该体制的绝对野蛮再现。为省子弹及满足行刑者变态心理，枪决并不常用。依 Sliwinski 研究，仅 29%的受害者死于枪决；53%死于用砍刀、斧头或农用工具砍头；6%用绞死或用塑料袋窒息至死；5%割喉而死；仅 2%的死刑公开执行，大多为示范恐怖，主要涉及失势落马官员。他们通常被用极残暴的方式处死，包括烧死，通常用燃料堆至齐脖子处或将其脑袋按入汽油桶中后点燃烧死。

八、司法暗无天日，共产党无法无天。

“自我批评会”至关重要。因有任何过错均可能导致下台，每个人的历史上若有任何污点，均不安全。人人处于风险之中，老朋友，老同学之间讲话交流也得小心谨慎，对政权推行的任何政策有任何异议，皆被当作反革命。人人均在秘密警察严密监控体系下，随时可遭受逮捕，搜查。甚至连“死亡”一词也成为禁忌。人们多用“失踪的尸体”替代。

法律程序完全缺位。从未有过任何真实的审判。大批少年儿童被充作警察助手。相当数量成为间谍，他们躲在房内偷听私房话，查出藏匿食物，还有不少人被委任去监控其父母亲，看他们是否有政治异议言论。

任何未经明文许可者均属非法。任何小偷小摸行为，皆可被捕或处死。青少年的小偷小摸行为一般仅受鞭挞，若是成人则可处死。酷刑者通常是红色高棉的军人，但时常也有由同事充任的。关键要表现得完全服从，任何不满均可解释成反抗、异议。惩罚旨在制造恐怖，故有时出现荒唐至极的处决。

共产党地狱般的监狱。原则上，柬共没有监狱。1978 年 8 月日波尔布特说：“我们没有监狱，我们甚至没有监狱一词。我们社会的坏分子，直接分配生产任务给他们干”。

佛教认为惩罚将在下一世，而红色高棉则立即实施惩罚。柬共大建“再教育中心”。殖民时代的监狱被废弃，仅在几个小省城保留，但设计关押 2-3 人的牢房往往关押 30 人。红色高棉政权通常用旧学校建筑或弃废之寺庙做监狱。此种做法虽然与传统监狱，甚至最残暴政权的监狱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既不能改善被拘留者的生活，甚至无助于其生存。食品定量极小且奇缺：有时一合饭（仅够一人吃）供四十个犯人！没有医疗设施，且拥挤不堪，导致传染病普遍流行；犯人长期戴刑具。妇女和轻罪犯人戴一幅手铐；普通男犯戴两副，有时用背铐；所有的镣铐皆固定于地上的铁桩。没有卫生设施，因而不可能洗澡；此种生存条件下的生存期仅三个月；非常少人进此种监狱后能生还。

直至 1976 年约 20-30%的犯人被释放，或许当时共产党仍相信中国式的劳教体制，通过沉重的体力劳动改造成新人。前政府官员和旧政权的士兵，若玩命劳动还真有机会生还。

许多父母亲于 1975 年 4 月 17 日被处死的 20 来岁的青年，被饥饿所迫往往沦为小偷谋生，他们被逮捕后不是受惩罚，而是被以最残忍的方式处死：

- (1) 看守暴打或踢死；
- (2) 绑住脚，倒悬梁然后踢死；
- (3) 抓住孩子的脚淹入池塘中，直至呛水再提起，反复不断进行直到死亡；他们与犯人的主要区别在于：犯人有的立即处死，有的慢慢整死。

酷刑在所有共产党政权普遍存在，但柬共在酷刑方面的创造性尤其病态和变态。最常用的一种酷刑是用塑料袋部分窒息，许多犯人本身业已体质虚弱，因而经不住此种酷刑而丧生；妇女皆受可怕的折磨。任何犯人，无论怎么强壮，那怕通过了所有的酷刑，通常拖几周甚至数月，结局全部一样，一旦被认为已榨干所有信息，便被处决；通常用小刀割死或用铁棍打死。同时用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以掩盖此种残暴的处决方式，引起受害人的惨叫的凄厉声。

一名妇女，因她已连续饿死四个孩子，还被拒绝看望最后一个在医院病危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食堂的一只汤匙而被关入监狱！

说英语也变成犯罪。Kassie Niou 1996 年作证时说：他本人被关入 Kach Roteh 监狱，被穿入皮肤的铁链与其他犯人串联锁在一起，被酷刑数月。每晚看守均叫 2-3 人出去，从不见任何人回还。他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他善于讲述高棉传统神话故事给看守的孩子们听。614

S-21 监狱共有 20000 余名受害人，其中约 5% 被转入专门关押高干的 Tuol Sleng 监狱。该狱的特点在于它是关押有道德品质缺陷的干部和失势领导人的专门监狱。S-21 监狱是个特别强大的黑洞，从中几乎没有机会活着出去。最后 20000 名囚犯只有 7 人幸存。其另一个特点是保留了 1975-1978 年关押的 14000 人的名单，以及大量囚徒（包括高官）的坦白认罪书和审讯笔录。其中 4/5 是红色高棉成员，其余是工人和技术员，许多人是华裔，还有一些不幸落入红色高棉之手的外国人（主要是水手）；该狱常年保持关押 1000 至 1500 人；其中 1975 年关 200 人；1976 年 2250 人；1977 年 6330 人；1978 年一季度 5765 人。2009 年柬普寨审判共产党罪恶的国际法庭审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原 S-21 监狱长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罪案，公诉人要求判其四十年徒刑，律师辩称他是执行上级命令，若不按上级指令行事，他自己小命难保因而要求免于处罚。然而，适用纽伦堡国际法庭确立的国际刑法原则，不能由于因被迫执行恶法而免责。可以预见其难逃法网。

“酷刑被认为绝对必要”。但问题是囚徒们死得太快了，往往在尚未完成坦白认罪之前便已死亡，因此在这座注定死亡的监狱，居然有最低需要的医院。1977 年 7 月 1 日，114 名妇女（90% 是囚徒之妻）被绞死；次日 31 名男孩，43 名女孩被杀害，他们全部是囚徒的孩子。1977 年 10 月 15 日，418 人被杀害；估计共有 1200 名儿童死于 S-21 监狱。61512. 共产主义狂想曲：废除货币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柬共 1975 年 4 月 17 日夺权后一周内完全清空了金边市民，令全世界为之震惊。金边市民约有 200 万到 300 万人，清城过程中未发生大规模抢劫，仅约万余孤寡老弱病残及全家自杀者死亡。其他城市也有几十万人被驱出城市，以致出现了整个国家约 46-54% 的人口皆在路上的奇观。在长达数周的旅途期间，红色高棉不提供任何食物和医疗，仅予平民 24 小时准备疏散，允许带一定数量的行旅和贵重物品，同时下令毁灭一切身份文件。被赶出城者，只要村长同意接收，允许各自投靠农村的亲友。数月后，许多被赶出城市投靠农村亲友的市民被重新驱赶至驱逐中心。这次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再有任何发言权。1975 年 9 月几十万人被从东部和东南部驱赶至西北部。个人被驱赶三到四次者不足为奇。大规模驱逐平民始于 1973 年，约四万人被从卡克欧（Kakeo）省强迁至与越南交界地区。柬共军队攻占的第一个城市克雷蒂尔（Kratie）后，立即强制清空整座城市。

九、共产主义乌托邦：强制农业集体化

波尔布特在 1976 年第一个四年计划中，拟以出口农产品换取发展轻工业，最

后发展重工业的资金；规定每亩产粮三吨（1970年代亩产仅为一吨），扩大大米产区三倍，因而大建大型灌溉系统项目，目标是为每年收获三季（传统仅一季）；其他农作物一律停止。通常每日劳动11-12小时，但在干部发动村与村之间的竞赛中，每天凌晨四点被迫出工直到晚上11点才收工，即被迫劳动17小时！以致不少青壮年最早累死。有些地区完全取消了休息日，其他地方改为每十日休息一天，但强迫参加政治学习。柬共想象的前景天花乱坠，但现实却是灾难性的。

1976年11月日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依难民报告估算，柬共实际播种面积已降至1975年以前的50%。Laurence Picg作证时说，农村道路两旁的大米农田几乎皆被荒废，东行10公里才能见到几个青年村姑在劳作，新人则无所事事，仅1/5的农田被耕种。

许多水利工程在第一次洪水的冲击下便被毁弃。任何批评均被视为对柬共的敌意而受惩罚。建设水利大工程，你所需要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负责人往往是文盲的农民。这种反科技反文化，往往伴随着反常识。不顾季节，地理，气候和生态条件，强制要求统一行动，规划，将传统的地块重新改造成每块一亩的标准田地。

有些干部下令砍掉所有的树，包括果树，以便彻底消灭有破坏大米习性的麻雀，因而毁灭了饥民另一食物来源。所有的人口均按年龄划分成组，完成特定工作标准化越来越普遍。饥荒被共产党政权故意用于达到私利和目的。越饿的人越不会亡命，因为跑不动。柬共象中共大跃进年代一样推广集体食堂，消灭麻雀运动也是毛泽东发明的极度无知的蠢事。

正如苏联和中国以钢铁为指标，古巴以食糖为指标一样，柬普寨以大米为目标。自1920年以来，柬普寨每年除了供本国人食用外，对外出口几十万吨大米。而1976年初实行集体化生产后，大多数柬普寨人每日仅有不到五两的大米供应，而且每况愈下。1975年以前，在Battambang地区平均每人日均消费大米400克，而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一合共一个人食用的大米饭要由五个人甚至7到8人分享。因而黑市成为人们活命的唯一源泉，黑市所卖的粮食主要是由于干部克扣死亡农民未申报的口粮。

Pin Yathay说：红色高棉医院的目的旨在消灭人口远胜于治病，在医院得传染病的机率更高，而没有医生证明，那怕你病得再严重，仍被迫出工。

十、共产党政权特有的制度性饥荒和瘟疫

由于红色高棉政权强制农业集体化，大办公众食堂，导致发生大饥荒和瘟疫，出生率降到几乎零。由1970年3%的下降至1978年1.1%；1989年38%的成年妇女为寡妇，同时有10%的男性为鳏夫。

据Pin Yathay作证说，在他所在的劳教营，1/3的犯人在1975年不到四个月内死亡，主要因饥荒，缺医及累死。在DonEy村，饥荒使得出生率降为零，80%的居民死亡。1976年开始出现可怕的饥荒，1977年在饥荒达到高峰时，第二波大清洗同时进行。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质，目标是教师、富农和中农，且更加残暴。1975年清洗放过家属妇女儿童；1977年清洗则将已被处死者的妻儿老小逮捕杀害；全家被屠杀有时全村被屠杀。前总统朗诺称350个家庭在1977年4月17日被屠杀用于纪念解放周年！1978年屠杀对象转移至农民并达到最高峰。

饥饿与疾病夺去至少70万人的生命。

十一、摧毁一切传统价值

Pin Yathay 报导，一位教师因饥荒吃了亲妹妹；一位医院内勤，吃了一个年青人。两人皆被Ogre处死。一位教师在村委会当着他女儿的面被活活打死。Ly Heng 作证说：一个红色高棉的反抗者被逼吃下自己的耳朵后再被杀死。还有许多吃人肝的案例。Haing Ngor 证明说一个妇女被处死后她的胎儿，肝和乳房被吃掉。Ken khun 讲述了一个厨师作了一个人的膀胱美餐与其上司分享的事例。这些案例表明柬普寨普遍变态吃人，业已丧失了一切人类道德和文化价值，尤其是毁弃了佛教慈悲的中心价值。

逼良为娼的政治体制：毁灭一切传统文化文明。红色高棉宣称其目的是创建一个平等的社会，正义，友爱，利他的核心价值，然而，所有的共产政权均掀起了一股自私，特权，不平等和反理性的恶潮。为了生存，人民被逼欺骗，撒谎，偷盗，变得冷漠无情铁石心肠。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人人皆成为骗子或小偷。因为这是生与死的问题。凡是不骗不偷的人，只有死亡。柬共在取得政权 30 个月后才公开于 1977 年 9 月 27 日正式公布。波尔布特本人于 1976 年 3 月“选举”时才首次公开亮相。Pol Pot 与 Saloth Sar，一个共产党军官，1963 年逃入丛林者是同一人。他始终保持神秘，既没有肖像，也没有官职，没有官方传记，始终没有文集或思想著作，其人格无踪迹可考。只到 1979 年 1 月以后，许多柬普寨人才知道波尔布特就是 Angker。

最高当权者们丧失了长期以来人类慈爱和尊严的准则。波尔布特自 1963 年消失于丛林后，即便在 1975 年 4 月 17 日以后，便未与其家人有过任何联系。他的两个兄弟与弟媳与其他人一样被强制迁徙，其中一个很快便死于非命。603

共产党政权用尽一切手段破坏家庭联系，视之为极权目标：使每个人完全依赖于柬普寨共产党。夫妻时常被隔离数周或更长时期。儿童和青春期少年，有时被分离半年见不到双亲。母亲们被鼓励越少见孩子越好。由于通讯邮局中止，经常亲人死亡数月后才知道真情。许多领导人与其配偶长期分居。

丈夫对妻子的权力，父母对孩子的权力被冲击破坏。丈夫由于殴打妻子可以被处死；孩子可以因挨打而抛弃父母。因任何污辱和伤害，将被强迫在村委面前公开作羞辱性坦白。

强制简化葬礼仪式。隆重葬礼，尊重死者的传统意义有重大价值，转世轮回，或成孤魂野鬼，拥有骨灰至关重要，这些传统价值皆被毁灭。由于丢失牛，人即被打死；或由于打了一只公牛，就被酷刑致死。

一切传统，文化，艺术，舞蹈，绘画，雕塑皆被废弃；这显然是对中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仿。此种拒绝尊重死者，传统，是否定人类生命价值的自然反应。

前部长 Hu Nim 坦陈：“我不是个人类，我是个动物野兽”。605 柬共的教条中有：“你有个人主义倾向，你仍有同情心和友情，你必须抛弃引种情感，抹掉你心中的个人主义”；“你要相信 Angker”！

十二、愚昧至极的疯狂

柬共深受毛泽东之“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影响，旨在铲除任何在贫农家中所没有的任何东西。

回国的柬普寨人必须抛弃几乎所有的行旅和图书。任何帝国主义的作品，法文，英文及高棉语（封建文化的遗产）均在彻底毁灭之列。不再允许任何外国图书。由于革命意味着从零开始，柬共居然下令烧毁一切身份及学历证明。“只有新生儿最纯洁”。教育缩减成：要么根本没有学校，或者仅有一些教5至9岁儿童识字，阅读，书写和唱革命歌曲的班级，而老师们大多都是自己也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农民。实践的知识远比书本知识重要。“与毫无用处的书本知识比较，我们农村儿童也有非常有用的知识”。

在波尔布特时代，确实是由儿童负责。大多数战士特别年青（仅10来岁）。西哈努克的卫队多由少年组成，他们经常通过虐待猫来自我娱乐。儿童少年被强征入伍后，立即失去与家人及村庄的联系。住在与人群相对隔绝的兵营，使之害怕，政府予他们良好的待遇，他们知道自己有全权，比成年干部远无怜悯同情心，在清洗时，他们无需工作还可以杀人。15岁以下的战士更加可怕。“他们很小时即被征入伍，唯一所教的事是纪律。他们学习服从命令，而不会质疑其合理性。

这些儿童士兵没有任何宗教或传统的信仰，唯有红色高棉的命令。这就是为何他们杀自己的人民甚至儿童象杀蚊虫一样的根源”。621

直到1978年，唯有“70”子弟可以允许入伍成为战士。“75”子弟则经常招聘8-9岁的儿童作间谍。Lanrence Picq证明说：6名9-13岁几乎不能阅读书写的女孩，却成为儿童医院的医生。但是柬共给予每个女孩一个大医疗包，他们的工作即是注射。“我们的儿童医生，来自农民家庭，她们已作好为她们的阶级服务的准备。她们特别聪慧。如果你告诉她们：那红色的箱子里装的是维生素，她们能记住！示范她们如何打针，她们也能记住！”中共在毛泽东专权时则在农村大力推广“赤脚医生”。

Tonle Bati 1975年厦在干部会议上发言：“我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技术，在我们的新制度下，我们无需送我们的孩子上学校，我们的学校就是农场。我们用梨来写作，我们无需考试或文凭，知道如何种田怎样挖沟，这些就是我们的文凭！”

中共则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毛泽东自1966年始废除大学教育整整十年，被柬共发挥到极致。

“我们不再需要医生，如果有人要做盲肠割除手术，我就能做。那非常简单，无需到学校去学。我们不需要任何资本主义的专业，我们不需要医生和工程师，我们无需教授来教我们做什么，他们全部都已经腐败。我们需要人民在田地里劳动！我们有些同志仍戴眼镜，如果我挥拳击你的脸，而你退缩，那么说明你看得很清楚。人们戴眼镜是为了好看，这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是因为虚荣才戴它。我们不再需要这种人。那些自以为帅的人是懒汉，是吸取他人能量的吸血鬼！”最后，男女干部排成一条直线，使劲高呼：“以血还血”！“复仇”！“柬普寨革命万岁”！

对性关系和婚姻的强行限制，加上过渡营养不良，时常也扼杀了人的性欲望。柬普寨的出生率从1970年的千分之三十下降至1978年的千分之十一。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此历了类似的对民众的荒唐禁欲，而对共产党高官的纵欲的制度性扭曲人性的举措。

共产党做任何事均是随心所欲的。波尔布特及其党人不可避免地将经济和军事灾难，归罪于叛徒或剥削阶级的破坏，从而为恐怖之炉添加了更多烧料。导致该政权从未摆脱战争状态，仇恨则总是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主流，进而演化成血腥的病态澎涨。

波尔布特学毛泽东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教导其党人“你们应当永

远不忘阶级斗争”。其它共产党政权及为红色高棉辩护的人们宣称：“波尔布特政权是某种极左现象，或浅薄伪装成共产主义的红色法西斯。”但如今可以确认无疑，红色高棉确实是共产主义家庭成员。柬普寨共产主义与中共之共产主义极密切，远远超过中共与苏共之间的联系。624

柬普寨合作社明显复制于中共之人民公社。强制性公共食堂，公管儿童计划，大型水利工程，所有有用的工具和设施的集体化，集中生产一种或两种农作物，完全不现实的生产指标，快速完成任何事项和任务，相信良好组织的人力的无限可能性等等皆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翻版。

毛泽东曾说：“有粮食和钢铁在手，任何事情都好办”。“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红色高棉则称“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的大米，我们就有足够的任何东西”。似乎波尔布特不知道或不在乎中共的大跃进是如何收场的，“让我们采取大跃进的方式，来建设我们的祖国，一个宏伟的光荣的巨大的大跃进”！其回报同样是一场巨大的谋杀性的大饥荒。627

清空城市术可能受到了中国数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启发。红色高棉似乎受到毛泽东思想或毛语录的影响远大于中共的实践经验的影响。

Margolin 认为“中共从未有破坏教育体系”。然而，该作者显然对中共的实际了解非常有限，毛共 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随后的反胡适，反胡风运动及 1957 年反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特别是 1966 年至 1976 年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得一蹋糊涂。即使今日中共在从幼儿园至大学研究生院所有大学院校及中小学校均强制党化奴化教育，实际上也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国的公民教育体系。因为党化教育出来的学生往往缺乏公民意识和独立思想人格和精神，不少人其实成为废物。（627）

红色高棉使用的迫害类型的主要影响明显来自中共。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模糊不清的劳教体制，相同的自传和坦白历史，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等级中的职位，取决于家庭出身。家庭出身至关重要。以极权方式要求全社会所有的人都密集参与政治。（628）

Margolin 还认为“中国囚犯通常受到良好待遇，酷刑被禁止或极少使用”。“中共的劳改劳教是出于真心实意”。作者显然受到中共宣传的欺骗，因为中共的囚犯所受待遇只会比苏联的古拉格严酷，而中共酷刑犯人之残暴下流无耻登峰造级，且司空见惯。诸如法轮功学员群体性污辱，性强暴；中共对人权斗士郭飞雄和高智晟的多次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的酷刑更是残忍至极。在柬普寨酷刑被普遍体制性使用。几乎无人能活着离开监狱，事实上囚犯死得特别快。“中共和越共大规模迫害呈波浪式起伏状态。有相当时期的平静。受害人口仅占一小部分”。简言之，柬普寨共产党的毛主义在许多方面，远比中共更接近于化的斯大林主义版本。18.

波尔布特恶魔残暴致极的根源波尔布特有个姐姐和侄女是个蹈演员，是国王（Monivong）的二房；一个兄弟任皇家皇宫军官直至 1975 年。他本人儿童时期曾在皇宫生活过一段时间。悔过的意识导致他有摧毁整个旧世界的渴望。

1963 年他离开闹市进入金边附近的丛林，消声匿迹多年，迄今无人知道他在该期间的情形。不过，他变得日益多疑。当他掌权后，每个见他的人都须经过搜身，他不停地迁移住所，怀疑他的厨师要毒死他，曾处死一名电工。斯大林、毛泽东和卡斯特罗等独裁者均有此种多疑症。

从 1950-1980 年他经常被描述成一个敏感，害羞，热爱阅读法国诗歌，广受学生爱戴，充满革命热情的宣传家。但作为政客，他逮捕了他的许多老战友，包括数位被公认为密友者。他从未回答他们的求救信，反而指令使用最残暴的酷刑

对付他们，最终杀害他们。

他的姐夫，也是他最亲密的同仁（Ieng Sary）后来指责他是个自大狂：“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军事、经济事务；保健学，作曲，音乐，舞蹈，厨艺，时装，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谎的艺术等各方面。他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他高明于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这种描述与斯大林神似，难道仅仅是巧合吗？630

或许波尔布特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失败，是因为半途而废，因为未能干净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腐败和无法控制的城市，知识分子骄傲于知识，只想自己的利益，金钱和所有财务机构，资本主义的遗迹，渗透入党的核心中的叛徒们。

红色高棉渴望用“新人”来创造一个新社会，在现实的重负面前注定失败。不情愿放弃该计划，使共产党政权滑入血海深处，不择手段以便保住权力。波尔布特期望成为列宁，毛泽东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光荣继承人。但是，代之者是歪曲性模仿马克思主义的另类先驱，为其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背书，诸如秘鲁之（Sendero Luminoso），斯里兰卡之（Tamil Tigers）和Kardistan之工人党。

1975年红色高棉的活动分子加上同情支持者一共仅有约120000人，且多数是近期新加入者，士兵仅占约一半。只至内战中期，红色高棉完全依赖越共的力量。1975年柬共仅有约6万名战士，却能战胜20万高棉共和国士兵主要因为后者道德沦丧。共产党的力量其实也很弱，1970年仅约4000人，至1975年才14000人。任何负责人和情报干部，所有被提升至干部职位的农民都相当无知，他们时常误解和误用革命原则。红色高棉政权的疯狂，由于其极度无知低能而加剧，不安全感，危机感则唯有用增加暴力来补偿，进而恐怖亦随之增强，以致恶性循环。结果是一种缺乏安全感，普遍不信任，恐惧未来牢控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与世隔绝的领导人，更易产生到处都是叛徒的狂想，致使盲目的镇压蔓延。

“人可能不时会犯错，误捕某些人，但永远不能让一个坏蛋溜走。”

十三、红色高棉病态疯狂的原因

主要原因大体有如下几项：波尔布特本人，柬埔寨的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综合影响。

“高棉革命史无前例，我们正在试图取得在历史上任何时候从未有过的成就”。红色高棉几乎从未援引马列甚至毛语录。

其民族主义与西哈努克和朗诺相似；越南是第一号欺压国；同时国家被描绘成某种属于神的，有着光荣历史的世外桃源，是与他国无异的国度，其使命在于为整个星球引领进入新秩序的方法。616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独特的革命，有任何国家敢于象我们一样废除金钱和市场吗？我们比中国好得多，他们尊敬我们。

他们正在模仿我们，但他们尚未成功。我们是全世界的好榜样。”柬共官方宣传如是说。616

甚至当波尔布特被解职后，他仍相信1975年4月17日，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历史上所有革命中最伟大的节日。红色高棉的极端残暴源于其领导人的狂妄野心与其面临的巨大障碍之间的矛盾冲突。617

有学者认为，佛教是导致柬埔寨共产党极端野蛮的原因之一。佛教教义模糊晦涩的作用，对当代人的不关心及对社会现实的超然度外，及报应仅在下一转世

的观念，煽动了革命理想主义的实施。其反个人主义及转世轮回说教导致的宿命论，面对被认为不可避免的命定之事强调忍辱负重。因此，消磨了佛教徒针对现实的反抗意志。“或许你前生干了坏事，因此你今日受报应”。虽然佛教徒受到残酷镇压，但他们不象信奉伊斯兰的 Cham 族人那样激励起反抗。

Henri Locard 认为，波尔布特主义的残暴源于西哈努克镇压的野蛮。按年代顺序起因，无疑是对的，但从宗谱学的观点分析，则断不能成立；红色高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和政治目的，决非对西哈努克的应对，而是基于由列宁创建的斯大林、毛泽东及胡志明延续的共产党残忍蛮横毫无人性而充满兽性的传统。

红色高棉寻求报仇雪恨，价值观完全颠倒。学历、资历变得一文不值。洗厕所的工作成为最抢手的职位。对城市的仇恨和恐惧到了病态地步。金边在红色高棉眼里成为“眉公河上的大妓院”，强迁首都的原因之一乃是柬共想象中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和朗诺政权有一项秘密政治军事计划，特别旨在解放后，用金钱、酒和美女腐蚀我们的战士，消磨他们的战斗意志。” 620

（1）法国的影响。由于柬普寨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全部，包括波尔布特）均曾在法国留学或曾是法共党员，许多人曾接受法共的军事训练。Suong Sikoean 副司令解释说：“我深受法国革命影响，特别是罗伯斯比尔，他是我们的英雄。罗伯斯比尔与波尔布特均具有决断和正直，诚实的性格。”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实践性远高于理论性，他们真实的利益乃是实践“真正的社会主义”。

（2）事实上，越共具有最大的影响（尤其在初期）

最初柬普寨共产党只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完全受越共控制，最终于 1951 年由胡志明分成三个国家分部，直到内战爆发，柬共从未显示任何与越共的独立自治性。甚至在朗诺政变后，也是由越共向解放区委派柬共干部。越共的策略是将柬共带回与西哈努克的谈判桌上，而柬共拒绝谈判。

（3）实际上，南郭以为中共才是对柬共影响最重大的根源。尽管在某些方面柬共与越共极相似，诸如，神秘性，模糊性，联盟，战时共产主义。但是每个了解中共真实历史，特别是自大跃进以来的毛共史，则无可否认，柬共所采用的所有惊世骇俗的极端共产主义举措，均源于中共之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愚昧狂想。1973 年柬共与越共交恶后，决定变换“老大哥”为毛共。1977 年 9 月，波尔布特第一次正式访华时说“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但他在未夺权之前，曾三次秘密访北京，均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自接见。第一批中国技术员于 1975 年 5 月抵达金边，不久至少 4000 名（Kiernans 说共有 15000 名）落脚柬普寨，同时中共政府承诺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这一事实证实，波尔布特在夺权之前的 1973 年开始便已获得中共的大力扶持。甚至许多柬共独创的酷刑实质上是在中共专家指导下的杰作，有一种活取人脑机就是中共专家帮助柬共制造发明的，专门用于活体提取囚徒的脑液供领导人长寿进补！（626）

而邓小平于 1979 年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正是在越共军队于 1979 年 1 月入侵柬普寨的关键时刻，这决非巧合，而是中共欲挽救其扶持的波尔布特政权。

（4）北韩亦有某些影响。平壤是波尔布特作为政府首脑时常访问的两个外国之一，有相当数量的朝鲜技术人员入柬普寨帮助重启工业。取自金日成的哲学，波尔布特采用了不断清洗和秘密警察和间谍术，同时阶级斗争的说教被隔置一旁，以人民和一定数量的叛徒之间的某种辩论取代。在实践中，意味着整个社会受迫害。而没有任何团体能接管党国体制。

十四、柬埔寨共产党暴政的恶果

柬埔寨共产党除了在与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 60 万军民之外，在其夺取政权后的三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的直接指导，凭借超极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官员、军人，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一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以近似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和集中营的残酷虐杀和谋杀性的饥荒及体制性的强劳，屠杀和害死至少 200 万平民（包括妇孺老弱病残及 40 万华裔中的 20 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迄今中共政权不但从未谴责柬共屠杀华裔的罪孽，反而极力阻止审判柬共的国际审判）；系统毁灭宗教，疯狂屠杀信众；摧毁一切传统文化，颠倒一切人类文明价值观；废除金钱，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消灭阶级，毁灭学校文化知识，迫害知识分子和一切专业人士，强制集体化，狂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近 70 万人；柬埔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在于飞速实现共产主义，因为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超级天才，狂妄地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

1979 年，42% 的孩子至少失去了双亲之一，其中失去父亲者比失去母亲者高三倍；7% 失去双亲。1992 年与世隔绝的青少年 64% 至少失去双亲之一。今日柬埔寨社会恶漫延，犯罪相当普遍且十分暴力，因枪枝很容易获取；到处皆是腐败，绝大多数柬埔寨人表现得互不尊重，极少有社会团结感，似乎没有人有任何水平的公共利益感。几十万逃难海外的难民，迄今仍时常感到恐怖，以致恶梦连连，丧气比率最高。1985 年放弃集体化后，生产增收几乎立即摆脱了食物溃缺的困境。

“除了朝鲜之外，各亚洲共产政权群体恐怖和试图控制良心的极权，如今已成记忆，政治犯已极少”。南郭以为作者此论显然是对中共极权流氓本质的误断。只要一个国家不存在思想，言论，舆论，新闻，出版，结社，教育和学术的真正自由，既无独立司法，又没有独立自由媒体，且党禁报禁言禁一党专政独裁的国度，此种社会只能是极权社会。而中共胡氏暴政下根本没有上述任何一项自由，更无任何独立司法或独立媒体，其极权如何可能莫名其妙地消声匿迹？！老挝政治犯从 1985 年的 6-7 千人，降至 1991 年 3 月的 33 人。越南情形相似，中国多少也有所减缩。“劳改劳教计划似乎也日益成真”。

必须指出：中共的劳改劳教体制是建立在极端蛮横无理的流氓恶法基础上的最蛮横的超级奴役剥削体制，而决不可能有任何实质进步意义。1956 年毛泽东的反修防修领导迅速使亚洲共产党卷入其中。越南的农业改革，几乎是中共土地改革的翻版。除柬埔寨以外，所有的亚洲共产党国家均有深厚的儒家传统，柬埔寨的政治传统与印度更密切而与中国不一，这一事实可能是为何其暴行如此普遍和血腥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主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极权的暴政，而红色高棉极可能是其中最野蛮、疯狂、残暴、无知、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个。

第十三章：波兰共产党政权的罪孽

提要：全世界共产党政权第一个崩溃的是波共政权。波兰工人阶级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不断抗争，以及瓦勒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及波兰天主教会功不可灭。

所有的共产党均自吹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各国共产党暴政的罪恶史充分证明：共产党其实是工农阶级最大的死敌！共产党是专工农阶级的政！

有一种说法六四天安门屠城对促使苏东共产党暴政解体有功，其实不然，因为波共早在 1981 年团结工会成立后即被迫不断与工会谈判，特别是在 1988 年 8 月-1989 年 3 月间波共当局被迫与团结工会进行圆桌谈判，并达成于 1989 年 6 月 4 日举行大选的协议，波兰人民在该日经大选而终结了波共暴政；同日在中国北京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屠城，约 3000-30000 多学生与平民惨遭中共暴政毒手。波共之所以被迫妥协让步放弃权力，根本原因在于波兰工人阶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争权的斗争，特别是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皆积极参与团结工会活动使之实力强大；苏共总书记哥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并不再干涉波兰内政则是波兰政治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波兰军方统帅由于天良未泯，出于人道主义，拒绝波共高层多数要求派军队镇压的指令，是极重要的原因；此外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明智理性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波共暴政与所有共产党暴政一样，是依靠苏联红军的非法暴力夺取政权，依赖恐怖暴力镇压维持权力，未取得人民的真实同意，因此始终不合法；本质上则是依赖秘密警察特务恐怖暴力谎言欺骗术一党专制独裁治国，波共夺权伊始即建立起数十万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统，对各行各业的全体波兰人进行无孔不入的普遍恐怖迫害。全国成人 1/3 共计 560 万人被国安部秘密政治警察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密监控；自 1980 年始，波共改用渗透及建立假反对派组织的方式企图操控误导反对派。特务头子库溶（Jacek Kuron）建议“不用去摧毁这些组织，组织你自己的。”雇用大量线人打入团结工会。但决不能因此时说：“团结工会最黑！”是波共特务黑是共产党黑而决非团结工会黑。吾以为徐水良先生之“海外民运最黑，部分国内民运最黑”之说，实在糊里糊涂，应属严重误导公众的谬论。

表面上看，似乎波共解体有其主观意愿妥协和解让步的一面，而实质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长期坚持不懈的反共抗暴争权斗争的必然结果。波共自 1953 年斯大林死后，对民众的镇压呈渐渐弱化的趋势，从普遍恐怖，至普遍迫害，到普通迫害，降至选择性迫害，再到有限迫害，进而被迫谈判妥协让步放弃独裁专制权力；且对政治反对派的屠杀及所判刑期远比中共对相同性质的反抗者的大规模屠杀及所判重刑为轻，表明波共实质上相对较中共及亚洲共产党暴政不那么野蛮残暴；而且波共仅对波兰人民实施过一次公然抢劫：即抢劫富农财产。而中共则对中国人民持续进行了三次公然大抢劫：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变成所谓国有资产（实为党有）、抢劫国有资产变成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私人财产、破坏污染中国生态环境抢劫中国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波兰人 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特别是被中共强制洗脑变成的唯物无神论者，其中不乏极度无知且狂妄之徒。因此，中国的自由人权法治宪政民主之路特别艰难是必然的；中共暴政决无任何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政治改良，凡我国人应当早日认清中共暴政这一流氓本质，任何与中共共生共荣的想法，若非中共流氓克意误导，便是思想糊涂之士的一厢情愿，或是别有用心者的故意帮闲，至少也是政治上的严重弱智；唯有全民团结组织起来抗争争权，唯有发展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并坚持不懈英勇抗暴争权，才能终结中共暴政，才能迫使中共暴政妥协让步最后放弃独裁专制特权，全体不愿意做奴隶的中华儿女都应当思考：中国人应该怎么办？！

一、波兰简史

1772-1795 年，波兰被三次瓜分，每次沙皇俄国均参与分脏；波兰人于 1830-1863 年起义反抗俄国侵占，但均被残酷镇压；从此上流社会和波兰天主教神职人员均积极参加反抗外国入侵（无论沙俄还是普鲁士）的爱国和抵抗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曾欺压波兰长达一个世纪的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三个帝国的崩溃，为波兰的浴火重生，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提供了历史性的良机。但独立的动因与苏联革命的目的立即发生了冲突。

1920 年夏，列宁下令红军入侵华沙，遇到波兰全国性激烈反抗而未果。由于斯大林的疏忽大意，导致红军惨败，托洛斯基和图科契夫斯基(Tukhachevsky)元帅等批评了斯大林，后来皆被斯大林假公济私报一箭之仇而丧生。1921 年苏联被迫签署有利于波兰的里加(Riga)条约。³⁶⁴

1921 年波兰参与抵抗运动的波兰贵族、军人和教会，从此被苏共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深恶痛绝。波兰人，无论是否俱有苏联国籍，皆饱受斯大林恐怖的全部灾难：抓间谍，灭富农，反宗教，民族和种族清洗，大清洗，边境地区及红军本身的清洗，帮助波兰共产党夺权的“和平”运动，所有恐怖的形式包括强迫劳教，处死战俘，及对标上“社会危险分子”的大规模强制驱逐等，波兰人皆首当其冲。

二、苏联共产党对波兰共产党人的迫害

1924-1929 年数百名波兰人被罗织间谍罪名处决，其中仅有极少数人确实涉嫌。在苏联反宗教运动期间，数万名天主教徒受迫害，其中几十人被杀或失踪。虽然与苏联镇压东正教相比，波兰天主教徒受迫害似乎并非太严重，但造成构成社会文化和心灵生活基础的教会消失，几十万波兰农民教徒深受其害。70 万波兰农民有 20%被划归富农，另 21%划为准富农，在乌克兰，波兰人的反抗尤为激烈，苏共当局不得不用暴力镇压，仅 1933 年，波兰裔人口的居民即下降了 25%。

1933 年 8 月 15 日-9 月 15 日，苏共当局以“波兰军事组织”间谍和破坏渗透活动为名逮捕了 20 名波兰共产党员，包括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逮捕潮随之而来。该军事组织成立于 1915 年，旨在抵抗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侵占，1921 年业已停止活动，1933 年早已不复存在。该组织成员多为左派波兰社会主义党人，部分分裂成波兰共产党。尽管如此，几十人被逮捕、错误指控并处死，其他人或死于狱中，或在大清洗中丧生。

1935 年 9 月在莫斯科、蒙斯克(Monsk)和基夫(Kyiv)新一轮逮捕潮又起。1936-1938 年大清洗期间，苏共逮捕在秘密警察系统(NKVD)工作的波兰人，从最基层直至最高层，数百名波兰裔，其中许多波兰共产党领导人，被误控、酷刑和强迫认罪。1937 年 8 月 11 日，苏联秘密警察头子爱佐夫签署了项第 00485 号逮捕令：

- (1) 立即逮捕 POW 活动分子；
- (2) 所有仍留在苏联的波兰战俘；
- (3) 所有波兰难民，其抵达苏联的日期在所不问；
- (4) 与波兰交换而来的所有政治移民和政治犯；
- (5) 前波兰社会主义党人及所有反苏维埃的党员；

(6) 地方反苏维埃分子和波兰民族主义者；

(7) 首先逮捕在秘密警察部门，红军，军工厂和所有其他部门中，诸如铁路、交通、航空、能源、海运部门中的军事机关工作的波兰人。凡属前者一律判死刑，立即执行；凡属第二类一律判处五至十刑。

1938年11月15日，苏联NKVD秘密警察和人民委员会作出决定：镇压清洗波共领导人。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共46名委员和另外26名没有投票权的候补委员被处死。1938年7月10日，NKVD的一份报告称：134539名波兰裔囚犯，40-50%（即54000-67000人）被处决；幸存者被驱逐至卡扎克斯坦（Kazakhstan）。波兰人占在大清洗中牺牲者总数的10%，占全部少数民族被清洗的牺牲者的40%。

三、1939-1941年期间的强制驱逐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将波兰划分为各自利益范围。1939年9月14日，斯大林签署进攻波兰的命令；三天后红军大举入侵波兰。宣称解放被波兰法西斯占领的西乌克兰并将其并入苏联。

1939年9月19日，新任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Beria）在秘密警察总部内依第0308号令专设“战犯”部，10月初25000名波兰战俘被强迫修路；12000名战俘送至工厂强迫劳动；还有数量不祥的波兰战俘被关进分布在各地的古拉格系统监狱。1940年2月底，6192名波兰政治活动家，8376名波兰军官被拘押。1940年3月5日，经贝利亚动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三个地区的囚犯，及在乌克兰西部的监狱关押的11000名波兰人适用“最高惩罚”（即死刑）。该建议被斯大林，伏洛希洛夫元帅（Voroshilov），马库洛夫（Merkulov），米高杨（Mikoyan）立刻批准。加里宁（Kalinin）和卡岗诺维奇（Kaganovich）亦缺席同意该屠杀计划。1940年4月3日-5月13日，所有的囚犯被分小组从狱中提出，共4404名囚徒从科兹勒斯克（Kozielsk）提出至卡特涅（Katyn）集体枪决，群体埋葬。在斯塔洛比勒斯克（Starobielsk）3896名囚犯被拉至位于卡尔基夫秘密警察总部集体屠杀、群体埋葬；6287人被拉到秘密警察在加里宁的总部集体屠杀，其死尸体被群体埋葬于效外，共计14587人被屠杀。

第三类是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军官及国家机关或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及各类地主，质言之，所有被视为“社会危险分子”7305人中的绝大多数均被处决。他们被埋葬于何处，迄今未知，仅知道3405人处死于乌克兰，另3880人处决于贝洛路西亚（Belorussia）。

德军入侵苏联后，绝大多数囚徒均面临灭顶之灾。仅西乌克兰一地约6000人被屠杀；数百名试图越狱者被群体屠杀，另有714人（其中500人从未受审）被负责运送的司令官下令群体屠杀。

依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39年12月5日决议，第一波强制驱逐始于1940年2月10日。依NKVD统计共14万人被驱逐，其中82%是波兰人。从乌克兰和贝洛路西亚被强制迁徙至俄国北部的科米共和国（Komi）和西伯利亚西部。

1940年3月2日开始新一轮强迁。这次是针对囚犯的家属（甚至丈夫或母亲已被处决者）以及“社会危险分子”。依NKVD的数据表明约60000人被强迁，几乎都迁至卡扎克斯坦，他（她）们均蒙受极为恶劣的生存条件，因饥荒和寒冷不少人因此丧生。

1940年6月28日-6月29日，启动第三波强迁。这次是针对所有1939年9月以前不是居住于苏联合并之波兰领土上的波兰人。约80000名波兰人被强迁，

其中 84% 是犹太人，他们如果逃过了 1941 年夏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话，全部被关入古拉格集中营。

最后一波强迁始于 1941 年 5 月 21 日，按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旨在清除边境和巴尔迪克（Baltic）地区“不受欢迎的人”，主要是被判处 20 年以上徒刑的囚犯，共计 86000 人，不包括爱莎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人。

依 NKVD 自己的数据，上述四波强迁总数达 330000 至 340000 人。若加上其他可获取的数据，共有 40 万至 50 万人被强迁。在苏联统治波兰东半部的两年期间，约一百万人（10% 的波兰人）直接受到各种迫害：处死、监狱、集中营、强迁、强迫劳动等。不下三万人被处死，9-10 万人死于集中营或强迁途中。

1944 年 1 月 4 日-5 日，第一支苏联坦克部队越过 1921 年确立的苏波边界线。1944 年 7 月 20 日，6000 名波兰抵抗运动成员被捕，1000 人逃亡。1944 年 8 月 1 日，约 25000 名战士，其中 300 名军官被捕缴械并监禁；1944 年底，超过 17000 人被捕，4000 人被驱逐至苏联边远的监狱。1945 年 1 月至 1946 年 8 月，3400 名抵抗运动战士被捕，大多数人入狱，其余的被送交波共政府。此外 47000 人被拘留审讯。至少 25000 至 30000 名市民被从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和塞勒西亚（Upper Silesia）强迁至苏联，包括 15000 名矿工，被强制送至西伯利亚矿区。

四、群体恐怖（1944-1947）

波兰共产党政权是建立在苏联红军基础之上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皆受过 NKVD/KGB 的专门训练，波共依赖秘密警察系统实现党国控制。波共建政同时即建立起波兰安全部，其核心由数百名顾问组成。波共党员人数很少，根本没有机会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因为多数波兰人传统上即对苏俄没有好感而素怀敌意。特别是“解放”带给波兰人民的痛苦的经验，反对苏维埃化的力量来自抵抗运动，地下政治团体，法律界人士及最有实力的波兰农民党。

五、秘密警察特务统治

波共欲巩固政权，其首要任务在于摧毁一切反抗力量，才能建立苏联模式的党国体制。1945 年下半年，波兰安全部已有 20000 名干部（不包括警察）及一支由 30000 名装备精良的士兵组成的内务部军队。针对反抗运动的战争极血腥和残酷一直持续到 1950 年代。因其中掺有大量苏军和苏联秘密警察介入，故波兰历史学家不承认这是内战。376

安全部使用各种手段渗透、预防，拥有良好的通讯和武器装备，还有苏军和克格勃协助，其物质力量占绝对优势。依安全部负责清除反共势力的第三处统计：1947 年冲突造成 1486 人死亡，而波共仅 136 人丧生；1945-1948 年期间，8700 名反波共政府人员被屠杀，绝大多数是由安全部秘密警察干的；1947 年 4 月至 7 月，在波兰的 14 万乌克兰人，被驱赶至德国领土。

安全部的纪录表明：大量欺诈手段运用于 1947 年 1 月的假选举，在大选期间秘密警察逮捕了数千名反对派人士，1946 年 1 月雇用了 17500 名线人，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滥用野蛮暴力。1947 年约 32800 人被国安部第三处逮捕，而负责保卫工业部门的第四处逮捕了 4800 人；在选举前一周，国安部、军警、克格勃和军队逮捕了 50000 至 60000 名农民党活动人士。其间发生了许多谋杀事件，有些则是地

方波共支部干的。

六、司法黑暗，酷刑普遍

波共审讯通常特别残暴。殴打和酷刑非常普遍，拘禁条件极其恶劣。莫克扎尔斯基（Kazimierz Moczarski）是波兰抵抗运动战士，被波共判无期徒刑，他后来获得自由作证说：“自 1949 年 1 月 9 日至 1951 年 6 月 6 日，先后受到 49 种酷刑和殴打，6 年零 3 个月被剥夺放风走动的权利；2 年零 10 个月从未洗过澡，4 年半被单独关押，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没有家人的任何消息，没有书、信，报纸。” 378

波共的理由很简单，任何人不与他们合作，便是反对他们。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决定各主要审判的判决。司法独立被破坏无遗。1948 年 3 月 15 日被判死刑，同年 5 月 25 日被处死的皮雷克基（Witold Pilecki）是一名地主和官员，参加过 1920 年抵抗苏军的战斗；1939 年他组建了一支骑兵队加入波兰军队抵抗德国入侵；1940 年他主动提议，并经波军最高指挥官授权，故意让德国人逮捕，被关入恶名昭著的奥斯维兹死亡集中营，以便在集中营中建立起秘密反抗网络；1943 年 4 月他逃离集中营，立即积极组织“独立网”抵抗运动，随后参加波兰华沙起义；后参加安德将军（Ladislav Ander's）领导的第二军团。1945 年他回到波兰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组建了一个小型高效的情报网络，搜集国家布尔什维克化的情报送交安德将军。1947 年 5 月 5 日被捕，随即被处死。1990 年恢复名誉。

七、国家恐怖主义

东欧各国经历相似了改革：由共产党取缔社会主义党，建立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中央计划经济，加速工业化的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强行反对教会，群体恐怖遍布全国。1948 年后，波兰国安部用恐怖手段控制整个社会，制造普遍恐怖，任何人，包括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均可能突然成为安全部门严密监控的对象，成为党国体制的受害人。

斯大林号召：“加强阶级斗争”，波共则改为：“加强革命控制”。1948 年波共象苏联反托洛斯基派，东欧反铁托主义一样，发起“批判民族主义分裂右派”运动。结果波共总书记哥木勒卡（Wladyslaw Gomulka）与数万名党政干部一道被清洗。

在一个普遍迫害的党国体制中，共产党人较其他人受到的迫害相对较轻。波共受害人数也相对较少。国安部将矛头指向军队，大抓间谍，重点是职业军官。因此，国安部与军事情报处联手逮捕了数百名军官，随后审判处决了 20 几名军官。

不久数十名国安部的高级官员也被关入了监狱。

由于哥木勒卡从未交付审判，波兰苏维埃化并无任何主要作秀审判。而匈牙利有在布达佩斯的（Laszlo Rajk）秀审；捷克斯洛伐克则有在布拉格的（Rudolf Slansky）秀审。

1945-1953 年期间似乎每个人都可能随时被捕入狱：政治局委员，前政府官员，将军，AK 军司令员，大主教，抵抗运动（先抵抗德国后抵抗苏联）战士，拒绝集体化的农民，发生爆炸的矿山矿工，写不满标语的少年等皆在逮捕之列。任何反抗的潜在力量皆被清除；所有自由行为全被禁止，该党国体制普遍恐怖的主

要作用在于向全社会传递一种永久性恐怖的情感。

八、特务线人遍布全社会

贝兹皮尔卡 (Bezpieka) 国安秘密警察撑控全部主要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全权，是该期间的主要特征之一。1949 年夏，原有的 74000 名情报人员，已不再能满足社会安全之需，于是在所有的工业企业中建立起小型的安全组织（即 R0），数年内已有 600 多个 R0；自 1951 年至 1953 年，每年被捕的 5000 至 6000 人，主要是由 R0 执行的，其拥有最大的情报网络共约 260000 人。工厂若发生任何故障或停产，皆自动被视为破坏及颠覆的结果，因此大量无辜工人被捕。

国安的主要目标是地下武装，包括前军人，从西方归国的抵抗运动战士，军官，政治干部及战前的官员。1953 年 1 月，波兰国安将 520 万人列入黑名单（占全国成年人的 1/3），尽管早已消灭非法组织，政治审判却持续上升。由于各种“预防措施”，导致囚犯人数剧增。1950 年 10 月，因“K 行动计划”一夜之间逮捕了 5000 人；1952 年超过 21000 人被逮捕；依官方数据，仅 1952 年下半年便有 49500 名政治犯；1953 年甚至还有 2500 名少年政治犯。

九、公然抢劫富农财产

在农村，由于未能交足够的定额，数千名农民被捕。国安和警察执行这种政治计划：首先逮捕富农，即便他们交足了定额；他们要等待数周后才被审判，其麦子，生畜和其他财产全部被没收；绝大多数审判皆罗织投机倒把，黑市交易和流氓等罪名。1945 年至 1948 年，10900 人被送入强制劳动集中营。1949 年至 1952 年，增加至 46700 人；至 1954 年总计 84200 人。

十、迫害天主教会

在清除了所有的反对派后，天主教会成为仅存的独立机构。1948 年后，对教会的监控日益加强；教会不时成为攻击目标。

1950 年开始逮捕大主教；1953 年 9 月，卡兹马瑞克 (Czoslaw Kaczmarek) 大主教被判 20 年徒刑；超过 100 名牧师被捕入狱。耶和華见证人被视为美国间谍，成为特殊攻击目标。1951 年超过 2000 名神职人员被捕入狱。

十一、政治迫害渐渐减弱

1953 年底开始（即斯大林死后）监狱条件有所改善，酷刑少了些，名声过坏的看守被开除。1954 年 9 月 12 日，自由欧洲电台报导前国安第十部副主任斯洛伊亚德罗 (Jozef Sloiatlo) 投奔自由。数周后，内政部合并国安部，同时增加了公共安全委员会，5 名国安部副部长被迫辞职。

1953 年 12 月哥木勒卡获释，同时他的专案调查组长罗章斯基 (Jozef Rozanski) 入狱。1955 年 1 月日波共中央委员会指责国安部凌驾于党之上，犯了严重错误，一些国安行刑员被捕，国安人员也被削减。然而所有这些改革仅是骗

局。1955 年仍然有 30000 名政治犯在狱。前部长雷科维兹 (Lechowicz) 同年下半年受审；政治局委员斯比查尔斯基 (Marian Spychalski) 被关押至 1956 年 4 月才受审。

对政治迫害的真正减轻始于 1956 年苏共 20 大及总书记比尔鲁特 (Bierut) 死后，赦免了许多政治犯，但仍有 1500 名政治犯在狱，有些人获平反，检察总长和司法部长皆被撕换。安全机关开始丧失其特权，有些秘密线人亦开始淡出。不过波共的策略未变。安全部门仍然对原先的目标监控，监狱仅空了一半。数千名审讯员仍继续忙碌，普遍恐怖体制仅是规模略小了。它们已达到目的：最坚决的反对派基本上业已被处决。

十二、选择性迫害时期 (1956-1981)

此期国安的策略稍有变化。国安将监控转向法律界，地下反抗运动，天主教会和知识界。1956 年第二波工人起义在东欧各国出现。数万名工人罢工，街头抗议，游行示威，攻击一些公共建筑。波兹那 (Poznan) 起义是唯一的一次由抗议者一方首先开火的事件，波共的反应非常残暴，总理宣称：“暂断任何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手’”，军队在坦克掩护下开进，结果约 70 人被杀，数百人被捕，几十名抗议者被审判，但判决在此解冻期相对轻些。1956 年 10 月 19 日-21 日，第八届波兰工人党中央大会结束不久，KISP 被撤销，国安部并入内务部，国安人员裁减了 60%，国安线人 60% 被解聘。在工业企业内的安全组织 PS 被压缩，调查员减半。最后一批苏联顾问撤回苏联，由一个克格勃官员取代。国安部重新审查陈案，许多犹太裔的安全官员被撤职，由年青人取代。不过，波共党的领导人，包括复位的哥木勒卡总书记却反对审判这些人。

1957 年 2 月初，国安部长维查 (Jerzy Wicha) 重申“加强阶级斗争”。此后一直到党国体制寿终正寝，国家，军警，宣传部一直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20 多年的沉默，平静和组织良好的工作偶尔被罢工、暴乱打断，形成党国迫害体制的基础，这种由大量线人，先进的控制手段和设施及通讯监视构成的控制系统，逐年逐步完善。

1970 年新的国安 SB 重点监控经济目标，由波共党组织控制，将不称职的经理撤换，取代逮捕工人。国安现在拥有决定颁发护照权。因而人人愿意合作，以便获取护照。因此国安能够轻易地获悉研究所，工厂，商业和大学的所有各类信息情报。逐渐但系统地秘密警察 SB 重建了其线人网络，尤其在敏感领域。在与天主教會的斗争中，内政部于 1962 年设立了一个特殊部门，很快就有了数百名雇员。1960 年上半年，警察组织了好些针对教會的攻击，除了法院判决以外，数百人被殴打，许多人被罚款。SB 周秘渗透公开组织，地下非法组织及政治反对派组织。知识分子被严密监控，1960 年整个年代，不时用隔离逮捕等方式，对付异议人士。最著名的案子是旺科维兹案 (Melchior Wankowicz) 他是个拥有广大读者的老作家，国安监控共产党异议分子最严密。

1970 年，地下政治组织露斯 (Ruth) 运动 48 名成员被捕，其领导人被判刑 8 年。波共使用暴力镇压手段从未停止过。

波共总书记哥木勒卡恢复权力后不到一年，当年青人上街抗议关闭波普洛斯塔 (Po Prosta) 周刊 (该刊在 1956 年在施压改革方面起了相当作用)，几十人被殴打，10 人被判刑。1968 年罢工和示威游行非常普遍，抗议被非常野蛮残暴镇压，2700 人被捕，1000 人被罗织五花八门的罪名判刑；几十人被判重刑；数百人被强

征入伍再训练。387

1970年12月，工人罢工，45名工人被杀害；数千名工人被军警暴打，时常是在警察局内，但无人被波共当局起诉，所有被拘禁者全被释放。

1976年，在数个城市发生工人罢工，约1000人被捕，数百人被罚款，几十人被判刑。随后的审判，被指控的工人家属，青年军人，异议知识分子，引发了公共知识分子主导的大规模人权运动。结果成立了工人抗辩委员会和捍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等反对派组织。

当局选择拘留相关人员48小时，开除其公职，使用心理压力，没收复印设备，拒绝护照申请等手段。秘密警察SB迅速发展了一个巨大的线人网络。1979年经济部特别委员会恢复，旨在预防反抗运动蔓延至经济领域。387

1980年中旬，新罢工浪潮兴起。强硬派仍占波共高层；但没有人愿意承担用暴力镇压罢工的责任。1980年8月28日，波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被要求参与镇压的军队数量不足以应付时局，也不愿意面对几十万来自数百家工厂的罢工工人。与1956年，1970年，1976年对付罢工的手段不同，库溶（Jacek Kuron）建议“不用去摧毁这些组织，组织你自己的。”亦即共产党开始组建自己的假民运组织，以便撑控和误导民运方向。388

十三、瓦勒萨的波兰团结工会[1]：全国大罢工

波兰是东欧各国受共产主义危害最大的国家。除了1956年罢工骚乱之外，又经历了1968年，1970年1月和1976年三次大规模罢工示威动荡。但前几次大罢工均无法与1980年1月开始的几十万工人大罢工相比，因为1980年正式成立了波兰团结工会。而且从开始直到1981年12月初宣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时，波共政府承认团结工会是合法组织。由于物价上涨40-60%，工会与波共当局谈判要求增加工人工资。波共当局同意予不同工种的工人不同的补贴标准，期望由此引起工人内斗。但团结工会坚持一体解决，不允许按不同工种不同标准，制造新的不平等。工会认清了共产党的目的后，举行总罢工。45

1980年8月中旬，波兰列宁造船厂工会首先组织工人罢工，抗议管理方开除工会领导人，数日后，其他两个邻市工人亦罢工，并提出21项要求。工人还设立厂际罢工委员会，亦即团结工会的萌芽。波共总书记基尔雷克（Edward Gierek）拒绝了工人提出的21项要求，罢工于是蔓延至全国。此时基尔雷克拟推出一替罪羊，因此他将总理开除。试图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平息风波。因此，他一方面承认该厂际罢工委员会合法，同时威胁苏军会干涉，并逮捕了一些领头的异议知识分子和工人。该大棒政策进一步激怒了工人，导致更多工厂工人罢工。虽然多数波共高层领导人主张派军队镇压，但军方将领却警告说：他不能保证军队会忠于共产党，而可能会支持工人。此种情况下，波共同意与工会罢工领导人瓦勒萨谈判。数日后，双方签署甘斯克（Gdansk）协议。基尔雷克辞职，于9月让位于卡尼亚（Stanislaw Kania）。9月底罢工领导们开会设立团结工会，而政府试图加强迫害罢工工人，团结工会因此号召举行总罢工（持续14个月的一系列罢工中的第一个）并坚持直至波共失去耐心；1981年10月，波共新任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与团结工会领导人瓦勒萨（Lech Walesa 通译瓦文萨，但并不准确）举行了一次会谈，11月又与波兰天主教会领袖格伦波（Cardinal Glemp）讨论解决方案，共产党要求工会协助解决经济危机，工会要求如果一个全新的独立于共产党的实体得以合法建立，才能协助。结果谈判失败，促使团结工会更加激进，最后导致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实行军事管制，工会受到比以前更严厉

的迫害；但直至 1982 年 10 月工会仍未被禁止。

波共用同样的策略对付瓦勒萨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在其内部组建分部旨在削弱联盟，渐渐将其控制在波共手中。正如 1940 年代在民族团结阵线所做的那些。波兰国安一直系统地渗透团结工会，到 1981 年夏天，仅在华沙一地，便有超过 2400 名国安线人打入团结工会，国安采取了一系列试探性挑衅，以判断团结工会的反应。逮捕工会会员 48 小时不提起指控，用暴力清空被工会占领的建筑。1981 年 2 月已准备好拟逮捕者的名单，监狱也作好了接收他们的准备；但是波共中央决定继续施用骚扰和挑衅的策略，不时用便衣袭击工会会员。波兰国安初始相当被动，后来得到东欧各国国安的援助才得以强化。1980 年波兰工人罢工后，东德国安史塔西亦在华沙设立了一个行动组。在克格勃统一指挥下，东欧各国国安配合行动，早在几年前便已开始。(388)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81 年 12 月初，警方反恐分队突破团结工会华沙支部的罢工十天，于 12 月 13 日晨，波兰宣布开始实行军事管制。

十四、国家的战争：全面镇压

随后精心准备的大规模军警开始行动，超过七万名士兵，三万名警察，1750 辆坦克，1900 辆装甲车，9000 辆军用卡车和数十架直升飞机和运输机投入行动。旨在中止罢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排除团结工会的任何反应。切断电话线，关闭边境和加油站，严厉的戒严，强制固定的检查，十天，罢工和游行终止。14 人被杀，数百人受伤，约 4000 名工人被捕，第一批审判组织者被分别判三至五年徒刑，最高判十年；所有的被告均由特别军事法庭审判，负责审讯任何抵抗军事管制的行为。整个期间苏联，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亦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当罢工示威转变成全面起义，波军无法有效镇压时出手相援。389

镇压的第二波是拘禁反对派人士和团结工会的活跃人士。1981 年 12 月 13 日夜开始，数日内，根据该简单的行政决定，5000 人被隔离关押在各主要城市郊外的 49 个拘留中心；主要目标是使团结工会瘫痪，撤换其领导人，安排国安线人充任。经 12 个月的关押，原则上秘密警察 SB 未使用禁止性手段（即酷刑），而是用暴力威胁利诱的说服方法。SB 还加紧雇用线人，并时常用恐吓家属的方式，尽力劝工会军事人员移民国外。389

1981 年 10 月 18 日，雅鲁泽尔斯基（Juruzelski）始任波共总书记，兼任国防部长，不得不处理党内强硬派，强硬派组织自卫小组（虽然并没有人攻击他们），并装备重型武器。他们要求普遍恐怖，认为普通镇压因不适用死刑，太仁慈因而不能接受；但波共高层主要领导人此时决定反对采用强硬派的主张。他们决定缓和紧张冲突局势，尽管采用此政策，波共当局还是强制镇压了 1982 年 3 月 1 日至 3 日和 1982 年 8 月 31 日团结工会组织的两次公开示威游行。62 人被杀害，数千人被捕，数百人受审判；有些工会领导人被判五年徒刑；此后波共中央决定于 1982 年 12 月关闭各拘留中心，1983 年 7 月 22 日正式结束军事管制。但此时仍有 1000 余名政治犯系因地下工会活动，地下印刷，传播禁书及文艺作品而被关押；波共当局亦开除了许多人的公职，包括众多记者共有 1000 多人失去工作。390

自 1970 年代始直到 1981 年，内政部即设立第四部，主要负责对付教会和其他类似组织，在军事管制后，其监控对象扩大至包括团结工会，该部特工实施了一系列攻击工会财产的行动；波共特务烧毁工会的建筑，烧毁工会会员的小汽车，殴打工会活动人士，发送死亡威胁信，发布伪造的短文，假的地下刊物，他们还

用安眠药及毒品让受害人上隐后，将其抛弃在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数人被打死，其中一名中学生（Grzegorz Przemyski）被打死在警察局内。尤其以1984年10月19日谋杀神父波皮埃鲁兹克（Jerzy Popieluszko）最为著名。官方说辞是基层人员自发干的，该案直接责任人受到了追究惩罚；但还有好些谋杀牧师及与团结工会有联系的人的事件，罪犯未受任何追究。390

在军管首日的暴力冲突和1982年至1983年全面镇压示威后的时期，标志着更加有限的迫害。团结工会活动分子知道，即使被抓也仅会判几年刑，且不时会赦免政治犯，这个阶段的进化，表明波共党国体制已渐离开斯大林原教旨。391

十五、从停火到停止抵抗（1986年-1989年）

1986年底在苏联哥尔巴乔夫推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perestroika and glasnost）及波兰经济停滞影响下，雅鲁泽尔斯基试图与反对派达成某种妥协。1986年9月11日，内政部长基斯泽拉克（Kiszczak）宣布解放剩下的225名政治犯。如今波共当局面面对的已不是数百名军人，而是数万名反抗的军人。1988年初，在第一波罢工后，镇压重新加强，但8月26日，波共当局宣布开启与团结工会的谈判；1989年1月18日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敦促波共中央委员会与团结工会谈判。最后达成1989年6月4日举行大选的协议。

虽然国安官员们对此种进展感到丧气，大多数安全官员仍遵守纪律，其中有些人试图阻止官民双方达成协议。1989年1月两名基层团结工会工作的牧师被暗杀；但迄今不明是否内政部第四部所为。

1989年6月4日大选及随后马佐维斯基（Tadeusz Mazowiecki）政府就职，内政部和国防部长仍由先前的人控制；1990年4月6日，国安部SB被解散，并由国家保卫局（UOPC）取代。

在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从未取得任何合法性或法律基础，因为其既非基于国际法，也不是建立在其自己的宪法之上，作为一个在1944年-1956年诞生的犯罪实体（criminal entity）该体制经常准备诉诸大规模的野蛮暴力（包括军事暴力）。391

十六、波兰政治民主大革命[2]

1989年1月18日总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敦促波共中央委员会与团结工会谈判。开启了政府与反对派之间圆桌谈判。2月6日，波共当局与其反对派瓦勒萨团结工会，开创了一个其他东欧各国随后跟进的谈判先例。波共政府采取了第一步，逐步取消放弃自己的权力。这一步的性质决定了革命将主要是和平的。唯有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拒绝承认，更不用说与反对派谈判，导致暴力革命爆发，结果齐氏夫妇被革命法庭处死。3月，波共政府正式将（Katyn）大屠杀的罪责归因于苏联；团结工会被重新承认为合法组织；拟大改经济体制，决定于1989年6月4日举行全民大选，议会一半席位将自由竞选。引进两院制立法机构，并赋予罗马天主教会完全的合法地位。

1989年6月4日大选结果团结工会赢得99个席位，35名波共政府候选人仅2人入选；然而波共及波兰政府50年来第一次接受了这一羞辱。7月4日，波兰恢复了与凡帝岗的外交关系。

雅鲁泽尔斯基在团结工会议员主动缺席以示尊重的情况下获得多数票，继续担任国家元首，兼任军队总司令。为使政教分离，他随即辞掉波共中央委员，政

治局委员和总书记之职。瓦勒萨无疑是选举的胜利者，他拒绝将团结工会带入联合政府，两个月后，同意支持马佐维基（记者兼工会活动家）组建新行政当局。在新总理见证下，逐渐解除各项共产主义制度。

1989年12月29日，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一党领导地位；恢复市场经济，波兰停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被抛弃，共产党本身消亡。³⁹²

1990年马佐维基政府颁布实施了五十个法令改革警察权力，司法体制，媒体和地方政府。1990年1月，波共自行解散，重新组建了社会民主党。后来成为民主左派联盟的中坚力量；雅鲁泽尔斯基总统认识到若不当总统能活得更长寿且更自在，故请求缩短他的总统任期，并获得国会批准，故他于1990年12月卸任。

1990年7月新政府通过了《私有化法》，76000家国有企业转成联合股份公司，出卖给公众、团体或公司，包括外国人。

这一大胆政策的代价颇高，1990年通货膨胀高达550%，次年大幅降低，1992年再降至43%，1995年再降至20%。迅速改变工业结构造成当年产值下降3%，次年下降13%，失业者1991年底达12%，后连续四年达15%。

1991年3月巴黎俱乐部成员国减除了波兰一半债务；而美国则免除了波兰29亿美元的4/5的债务。1990年下半年开始，波兰经济持续稳定并进入高速增长；至1996年夏，法国总统已谈论波兰将于2000年加盟欧盟。

1990年4月苏联承认(Katyn)屠杀是苏维埃干的。1995年4月俄国叶利钦总统与瓦勒萨总统一道出席屠杀遗址悼念活动。

马佐维基政府与瓦勒萨之间的关系不久便趋紧张化，瓦勒萨要求对共产主义的追究应当更严厉些，以便加快改革步骤。

1990年11月因雅鲁泽尔斯基总统提前辞任，波兰提前举行了第二届选举，由于第三候选人意外地将马佐维基挤至第三名，同时因瓦勒萨未获法定最低要求的选票，在第二轮投票时瓦勒萨以74.75%的高票当选民主波兰第二任总统。1995年11月瓦勒萨总统败给竞选对手卡斯涅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且由于输得太惨，以致他未出席后者的总统就职仪式，表明瓦氏绅士风度不足略有遗憾。无论如何，瓦勒萨是给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党国体制棺材敲进第一颗铁钉的标志性人物，在世界历史中自有其不容抹杀的光荣席位。

[1]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5-48

[2] R. J. Crampton Eastern Europe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fter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7) 2ed pp. 391-450.

第十四章：苏联共产党暴政的滔天罪行

提要：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全世界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列宁的残暴，残忍，无法无天从他的众多命令、信件中暴露无遗；列宁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或同情工农大众的穷困潦倒而投身革命，而是由于他的长兄亚历山大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沙皇，被当作恐怖分子处死，列宁的姐姐同时也因该阴谋而入狱；加之列宁本人因违纪被大学开除，因而列宁是因仇恨沙皇专制而投身革命的。在苏共夺权后一个月列宁即亲自下令谋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年仅15岁的王子和三个美丽的公主。斯大林则是个残暴至极，毫无人性的家伙。他实质上是病态狂，自

大狂和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马列斯建立起的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实质上是一小撮共产党人打着工农旗号，实则以人民为敌的极权专制暴政；共产党迫害全社会所有的阶级，包括其标榜为其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同盟者的农民阶级；迫害其革命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迫害共产党异议派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迫害社会精英专家学者教授及各行业知识分子；迫害宗教界人士；共产党成立伊始便奉行秘密警察特务恐怖统治术，采用全面恐怖普遍迫害欺诈等手段，对全民实行极权恐怖统治；强制集体化，故意饿死数百万人，滥定恶法，践踏法律正义，随心所欲反复清洗消灭数千万真实或想象的敌人。一部苏联共产党史就是一部暴力恐怖谎言杀人史，世界各共产党国家的所有罪恶几乎皆能从苏共暴政中找到原创。每位迄今仍对中共暴政心存幻想的国人，应当早日觉醒并做点什么才不至于白活人生。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为彻底终结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建设一个真正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的民主联邦共和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一、秘密警察特务恐怖统治

1917年12月6日，根据列宁之选任一位无产阶级雅格滨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政治局全体一致选举德泽尔津斯基(Dzerzhinsky)为首任苏联秘密警察(Cheka即契卡[1])头子。契卡的权力巨大，往往无法无天。(58)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于1917年12月14日指出：“不到一个月内，这种恐怖将发展成全面恐怖形式，正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不仅监狱，而且断头台皆将成为我们的敌人的归宿。”(59)几周后，列宁在一个工人聚会上演说，再次号召实行恐怖，并将恐怖解释为革命阶级的正义。“只要我们未能让投机商接受他们应得的待遇，子弹射入他们脑袋，我们将不能获得任何东西。”59

1919年6月由白军领袖邓尼金将军(Anton Denikin)设立的布尔什维克罪行调查委员会，查明1918年1月在塔甘洛格(Taganyok)，西维尔的军队(Siver's)将50名(Tunkers)白军军官手脚捆绑后，投入沸腾的锅炉中；在爱夫帕托里亚(Evpatoria)数百名军官和资产阶级被捆绑后抛入大海。类似的暴行普遍发生于布尔什维克党占领的绝大多数城市，相类的暴行在1918年4月-5月间在哥萨克大城市发生。邓尼金的调查委员会纪录显示：许多尸体手脚被砍掉，骨折，头颅被砍下，阴部被摘除。(61)直至1918年8月至9月，契卡指令的大屠杀才有所闻，它不仅针对武装反抗，而且针对平民敌人。1918年3月，在雅尔塔(Yalta)240名平民被屠杀，其中70人是政治活动家，律师，记者，教师，还有160人是官员。60

消灭“人民敌人”乃是政治和社会革命扩张的逻辑结果。1917年12月28日，特务头子德泽尔津斯基号召各苏维埃建立自己的契卡，结果这种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特务机构遍地开花。1917年12月，契卡人数不到100人，但仅6个月便剧增到12000人。61

1918年3月10日，苏联政府从彼得堡迁至莫斯科。3月份契卡总部仅600人，至7月便增加至2000人，还不包括其直接管辖的特种部队。同时，人民内务部有400人。1918年4月11日-12日，契卡展开首次行动，1000名特种兵突然袭击约2000名无政府主义者，激战数小时后520人被捕，25人被立即枪决。64

1918年6月8日-11日，德泽尔津斯基召开全国契卡代表大会，当时全国已有12000名秘密警察，到1918年底增至40000人，而到1921年又增至280000人。会后两天即恢复了二月革命已废除的死刑。1917年11月8日，在第二次苏

维埃代表大会上本来已废除死刑。列宁怒斥道：“这是一个严重软弱的错误，一个太平的幻想！”但在实践中契卡一直在法外执行死刑。第一个革命法庭判决的死刑案是1918年6月21日（A. Shahastnyi）案，他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1919年春，德泽尔津斯基被授权组建契卡专门控制军队的特种部队；3月16日德泽尔津斯基被任命为人民内务部委员；所有的军事机构，部队及其军分区全部受契卡控制；1921年一支拥有20万人的特种部队专门负责镇压农民起义，工人暴动，红军哗变。该共和国党卫军成为一支控制和镇压的可怕力量。79

1921年契卡雇用了105000名市民，180000各种人员，包括边界守卫，铁路警察，集中营官员；1925年缩减至26000市民，63000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及30000名线人。1922年，捷尔任斯基建了一个“知识分子处”，系统完备地搜集、整理知识分子的档案材料和情报体系由此开始。

秘密警察靠酷刑逼供，流氓手段套供。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二、野蛮暴政

1918年1月17日是布尔什维克党专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17年11月12日选举产生的宪政议会，布党仅获得707张选票中的175票；因而列宁下令武装取缔议会。而这一任意行为似乎未引起全国任何特别反应。少量示威者很快被军队镇压，造成20人丧生。此时布党的最大威胁来自工人，因经济破产，粮食涨价引发抢粮事件，导致不满情绪蔓延。

列宁下令所有农民必须交出多余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凡是抗拒不交粮者，就地枪决。（63）特赛乌鲁帕（Tsyurupa）接到列宁的命令后，他认为若执行该命令将会造成大屠杀故放弃未执行。

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无疑比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故选举时大败布尔什维克。1918年3月16日和6月11日，布尔什维克颁布了两项引发内战的指令；前者组建一支征粮军（开始时为12000人，后增至24000人），主要由失业工人组成，予以高工资和分成抢来的粮食；后者由农村中的贫农组成，他们仅分享分成。66

1918年5月6日，205家反对派社会主义报纸被关闭，所有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组织被取缔；绝大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组织被暴力袭击，并在军队和契卡指挥下，逮捕反对派领导人。67

1918年6月14日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在全国各地组织工人罢工示威，在科勒皮诺（Kolpino）契卡下令开枪镇压，10名工人当场被打死；同日，在贝维佐夫斯基（Bevezovsky）工厂，15名工人被红军枪杀；5-6月在苏联许多城市和工人罢工，皆被血腥镇压。（68）

1918年6月20日伏洛达斯基（Volodarsky），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党书记被一名社会主义革命党军人暗杀，布党立即报复逮捕了800余名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工人则举行总罢工抗议。列宁给季诺维也夫的信中称：“我们正在号召群众恐怖，鼓励和利用群众恐怖对付反革命的热情至关重要。”70

三、红色恐怖

1918年夏，苏联暴发了140起大的暴动起义。大多与抗拒抢粮和抗议限制贸易有关。1918年8月6日，列宁在给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Nizhni Novgorod）的电报中说：“你们首先必须成立一个独裁的由特洛伊卡[2]，引入群众恐怖，射杀或驱逐出境几百那些引起所有士兵酗酒的妓女，所有前政府官员等；抓住时机，你们必须决绝地行动，采取大规模报复，立即枪决任何被抓住的持枪者，将孟什维克和其他可疑分子驱逐出境。”次日，列宁在给诺夫哥罗德（Nizhni Novgorod）苏维埃中央执委会的一份电报中对屠杀富农作了类似的指令。⁷²

依契卡纪录，唯有三起起义是由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组织发动的；其余绝大多数农民暴动起义，均是由于抢粮政策引发的自发行动。但均被红军或契卡暴力镇压。唯有雅洛斯拉夫勒（Yaroslavl）一地在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下坚持了数周。失守后1918年7月24日至28日五天内，德泽尔津斯基派了一个特别调查组前往处置，立即枪决了428人。⁷³

在苏共官方正式启动1918年9月3日开始的红色恐怖之前的8月间，列宁和德泽尔津斯基向各地苏维埃发出大量电报命令。1918年8月8日，列宁给粮食部长（Tsyurupa）下令抓25个富裕居民做人质，放人以完成当地征粮任务为条件。

1918年8月9日，列宁电报朋渣（Penza）中央执委会设立苏联第一个集中营，并将“富农，牧师，白军军官和其他可疑人士”关入集中营。首先被逮捕关押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等反对党领导人。⁽⁷³⁾1918年8月30日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一是针对彼得堡契卡之尤里特斯基（Uritsky），二是针对列宁。芳妮（Fanny Kaplian）是个军事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理念。她立即被捕，三天后未经审判即被枪决。随后苏共另枪决了500名人质作为报复。1918年9月3日，人民内务部佩特罗夫斯基（Petrovsky）发布公告：开始红色恐怖。

1917年8月孟什维克领导人阿布拉莫维奇（Rafael Abramovich）与德泽尔津斯基有一段关于宪政的对话：德氏说：“我们将通过暴力将特定的阶级全部消灭。”季诺维也夫于1918年9月日宣称：“处置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制造社会主义恐怖，我们将训练九千万俄国人占在我们一边，对另外一千万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消灭他们。”⁷⁶

1918年9月5日，布党政府将红色恐怖合法化，此前各地已有500名人质被处决；9月仅彼得堡一地即有800人被屠杀；实际数字远远高于此。一位目击证人说：以最保守估计至少有1300人被处决。在科洛尼斯塔特（Kronstadt）布党对数百名被处死者未作统计，仅一夜之间至少400人被杀。真理报报导仅29名人质，包括两名前部长被处决，但目击证人证明仅在莫斯科9月3日即有数百人质被处决。⁷⁶

契卡在红色恐怖期间，公开发行过六周周报，披露了恐怖暴行，后因该报导遭报布党领导人谴责而停刊。具体处决数字永远也无法弄清。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拉特西斯（Latsis）证实：1918年下半年，共处决4500人；1918年10月底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Yuri Martov）估算受害者超过10000人。⁽⁷⁸⁾红色恐怖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从此将任何真实或潜在的反对派当做内战行为中的敌人，执行其自己的法律，即无法无天。除了德泽尔津斯基之外，契卡在布党的主要成员有雅科夫（Yakov），斯维得洛夫（Sverdlov），斯大林，托洛斯基及列宁。列宁说“一

个好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个好契卡分子”。79

四、肮脏的战争

布尔什维克之红色恐怖是组织周密和目标针对整个阶级，且在内战暴发之前便已实施的体制性恐怖；白军恐怖则没有此种性质。红色恐怖的受害者达 15 万人。布党红色恐怖目标的先后顺序为：（1）非布党之政治性军人；（2）工人；（3）农民；（4）哥萨克；（5）社会不需要的分子；（6）人民的敌人；（7）可疑分子；（8）人质。83

1.镇压革命同盟无政府主义者

1918 年 4 月 11 日，苏共恐怖的第一次行动：袭击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者[3]，几十人立即被处决。无政府主义者先是联合红军对抗白军，白军威胁消除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党；数十名无政府主义军官被处决。

2.镇压共产党内异己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

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Maria Spiridonova）于 1919 年 2 月日与 210 们其他军人被逮捕，并被关入精神病院。左派社会主义革命党[4]是布尔什维克党最大的竞争对手，议会选举其占多数，1918 年 6 月与孟什维克一道被布尔什维克党清洗出苏联政府。1919 年 3 月 31 日日契卡在各地逮捕了 1900 名军人，无人知道有多少人被即时处决。工人和农民暴动一直不断。84

第二波逮捕发生于列宁公开指责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与白军，资产阶级合作。据契卡纪录显示 2380 名社会主义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人被捕。1920 年夏，7000 多名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人被捕或当人质被拘押。84

3.镇压罢工工人

在所有的镇压信息中，暴力镇压工人反抗被掩蔽得最严实。1918 年初开始连续两年镇压持续强化，到 1921 年达到高峰。

特别是科洛斯塔德（Kronstadt）暴动。1918 年初彼得堡工人便示威抗议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8 年 7 月 2 日总罢工失败后，1919 年 3 月再次暴发工人抗议活动；布党逮捕了数十位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包括极受工人拥戴的马丽娅（Maria）。引发了全面罢工抗议布党政府。（85）3 月 10 日普提洛夫（Putilov）工厂工人委员会，在一万人大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布党政府不过是由契卡和革命法庭支撑的中央委员会独裁专制。（86）列宁于 3 月 12 日至 13 日亲自赴彼得堡，当他试图向罢工工人演讲时，被工人将他与季诺维也夫一道轰下台；工人高呼：“打倒犹太佬[5]和人民委员！”（季氏是犹太人）3 月 16 日契卡袭击由武装工人护卫的工厂，900 名工人被捕，200 多人未经审判被处决；所有参与罢工的工人均被开除或在宣誓是受反动派鼓动欺骗参与的重新聘用。此后，所有的工人均在严密监控下，1919 年春，契卡在各主要工业城市专门设置间谍和线人定期汇报工人

思想动态。1919年春，发生了数十起罢工，均被残暴镇压。在苏联各主要工业中心，均发生了工人罢工抗议事件。要求取消布党特权，释放政治犯，自由选举苏维埃和工会，取消红军，结社自由，表过自由，出版自由。87

[1]首任秘密警察（叫做契卡）头子是德泽尔津斯基(Dzershinsky)，二任孟津斯基(Menzhinsky)改称(GPU)，三任雅哥达(Yagoda)，四任爱佐夫(Ezhov)变称(NKVD)，五任贝利亚(Beria)，六任塞洛夫(Serov)改称克格勃(KGB)，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是第七任和普京是第八任特务头子。除了首任系自然死亡外，第二至第四任特务头子皆死于非命。

[2]南郭注：troika即由秘密警察头目、检察长和公安局长组成的公检特联合特别法庭。大陆中国之公检法联合办案也源于此)

[3]南郭注：无政府主义者是与共产党一道主张革命推翻专制政权的政治派别，其著名领导人巴古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挚友，也是少年列宁最崇拜的人，与马克思一样，主张暴力革命，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且认为革命的力量不是产业工人而是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事实证明他的几乎所有主张都比马克思正确。

[4]南郭注：社会主义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党其实皆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不过他们是修正主义的政党，而修正主义其实是远比列宁主义正确得多的理论，因为马克思设想的诸多要件几乎没有一样属实，故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伯恩斯坦提出修正主义。主张放弃暴力革命而走议会民主选举方式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5]南郭注：现已证实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由犹太左派知识分子组织发动的。马克思本人是犹太人，早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犹太人的比率高达70%以上，波兰共产党则高达90%；1917年十月革命前，托洛斯基从美国犹太富翁获得3000万美元的资助。列宁则获得德国当局500万美元的资助，条件是结束德俄之间的战争。以便德国能从东线战场脱身专注对付西线战争。

工人时常成功地与红军合流，军人们高呼“打倒犹太佬！打倒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在(DrelBryanskGomdAstrokan)占领和抢劫部分城市；经数日战斗，契卡才在忠于政府的军队的配合下夺回控制。布党用饥饿手段制服工人，枪决了数百名罢工工人。87

1919年3月-4月，在图拉(Tula)和阿斯特拉卡汉(Astrakhan)的镇压最残酷。德泽尔津斯基于4月3日前往图拉苏军工基地，这里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政治活动家众多；1919年3月初逮捕数百名社会主义革命党人，引发大罢工抗议。3月27日和4月4日契卡逮捕另外800名领头者，并强行关闭工厂。所有的工人皆被开除。由于饥饿反抗最终失败。重聘工人必须签署一项保证，不得参加任何停工，否则将被枪决。4月10日复工之前，76名工人领袖被枪决。87

阿斯特拉卡汉(Astrakhan)是战略要地，西北科尔查卡(Kolchak)的军队与西南邓尼金白军交接处，当地红军拒绝向示威游行的工人开枪，不少士兵加入工人队伍，攻占布党所在地并杀了几名人员；该区军委主席基洛夫(Kirov)立即颁布命令，不惜一切手段，消灭这些白军害虫。由于逮捕者过多，监狱爆满，数百名士兵和工人被捆绑手脚挂上石头抛入伏尔加河。3月12日至14日，2000至4000名罢工工人被射杀或淹死。3月15日开始镇压资产者，所有的富裕人家均被抢劫，多人被捕或被杀；估计受害者达600-1000人。在一周内估计约3000至5000人被枪杀或淹死。3月18日布党政府举行隆重纪念在罢工暴动中丧生的布党人员，一共仅47人！88

理论上，苏联人按等级分成五类，布尔什维克党享有特权，其次是重工业工

人和红军，最末尾是坐着干活的人，包括所有的知识分子和贵族；彼得堡 1919 年-1920 年分成 33 个等级卡，凭卡领取不同的物资；布党利用饥饿方法来控制和奖励不同等级的人。1921 年 2 月 1 日，列宁致信托洛斯基称：“如果必须如此，那么让数千人死亡，但必须拯救国家。” 89

1919 年底到 1920 年初，自 2000 家企业被军事化后，布尔什维克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军事化是托洛斯基提出的歪理。军事化措施旨在恢复秩序，结果却相反；引发了无数停工，罢工，暴乱，但皆被残酷镇压。1920 年上半年，77%所有的大中型企业均受罢工影响。1920 年 1 月 29 日，列宁致信第五军区军委主席斯米诺夫（Smirnov）称：“我很吃惊你对此问题的轻视，而不立即枪决为数众多的破坏犯罪的罢工工人。” 90

1920 年 6 月 6 日，图拉军工厂工人拒绝星期日上午工作，厂方召来契卡逮捕罢工工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捕，数千名女工和家庭主妇来到契卡总部，要求将她们一道逮捕！四天内一万多工人被关押于一个契卡看守的露天场所。最后 28 人被判监禁，另 200 人被判流放。

4.镇压农民起义

农民暴动始于 1918 年夏天，1919-1920 年扩大，到 1921 年达到高峰。导致农民暴动的原因，不断地强制征粮和强制征兵。1918 年夏，苏共中央计划以制度性征收农产品的政策，取代过去相对自由的交易，各地区各单位均事先预计的收获数量，强制向布党政府交纳粮食等农产品，只有在完成计划后，农民粮食换取的收据才能用于购买制成品。强制征兵。

1919 年契卡逮捕了 50 万逃役者，1920 年抓了 70 万至 80 万。数千名逃役者被枪决，家属被抓做人质。1918 年秋后，人质被日益广泛适用。92

列宁 1919 年 2 月 15 日，签署一项命令：授权地方契卡从未清扫大雪的铁路沿线地区抓捕农民人质。“如果铁路线积雪未清扫干净，人质将就地处决。” 1920 年 5 月 12 日，列宁向各地签署一项指令：“七天内逃役者不回各自家中，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助逃役者，均得作为人质，并按例处置。”

契卡报告称：1919 年 4 月 30 日，4 月初唐伯夫（Tambov）省在雷布亚契斯基（Lebyachisky）地区，富农和逃役者举行暴动，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苏维埃！” 60 人被捕，55 人被立即处决。93

数千类似的报告表明在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之间极大的暴力对抗状态，由逃役引起的暴动，被布党以富农和匪徒为名镇压。苏共往往轰炸和烧毁村庄。当局往往限令逃役者归家，过期一律视为匪徒，格杀勿论。而且民事政府与军事当局皆发布命令：“任何帮助森林匪徒（即躲藏入森林中的逃役者）的村庄一律烧毁！” 94

1918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30 日期间，在 12 个省共发生农民自发暴动 44 起，2320 人被捕，620 人死于战斗，982 人随即被处决。480 名苏共政府人员被杀；其中 112 名是粮食征集队员，红军士兵和契卡秘密警察。

1919 年 9 月，10 个省共有 48735 名逃役者和 7325 名匪徒被捕；1826 人被杀；2230 人被处决；政府与红军人员伤亡 430 人。

最富裕的萨马拉（Samara）和辛比尔斯克（simbirsk）省，1919 年被要求交纳 1/5 全俄国谷物，导致自发的抗议并演变成一场真正的起义。三万农民军占领了 12 个城镇，布党失控整整一个月，布党被迫派数万大军前往镇压；1919 年 4

月契卡头子的报告称：“4240 名造反者战死；625 人被即时处决；6210 名逃役者和匪徒被逮捕。” 95

乌克兰是沙皇王朝时代的面包库，后成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粮仓。因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的破坏，乌克兰业已呈现饥荒，布党仍然强征重税逼粮，而且布党还拟对乌克兰所有的大户实行国有化，旨在将糖，粮食大生产变成集体农庄，将农民变成农业工人，因而遭到农民强烈反抗。

农民在反抗德国和奥匈帝国占领时已经军事化，1919 年既存的数十万农民军在乌克兰政治家指挥下，农民军决定实行他们的农业革命：土地归农民，自由贸易，自由选举苏维埃，不要犹太佬！许多乌克兰农民数世纪以来就有反犹太传统，他们将布党和犹太人皆赶出乌克兰。95

布党与乌克兰农民军和白军争夺该地区。1919 年 4 月暴发了首次反布党抢粮食的暴动；当月在乌克兰的四个省发生 93 起农民暴动；1919 年 7 月头 20 天，契卡自己统计共发生 210 起暴动，涉及数十万军事武装战斗员和几十万农民。希赫尔伊夫（Hryhoryiv）农民军有两万人，包括部分哗变红军，有 50 门迫击炮，700 挺重机枪，占领了数个城镇一个月。

设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其要求：“所有的权力归乌克兰苏维埃人民”。“乌克兰是乌克兰人的，打倒布尔什维克党和犹太佬！”“土地分享，自由企业，自由贸易！” 96

泽勒尼（Zeleny）农民军有近两万人，占领了除少数大城市以外几乎整个省，其口号是：“苏维埃万岁！”“打倒布尔什维克党和犹太佬！”

1920 年初白军被打败后，布党与农民军直接对抗，直到 1922 年才平息。1920 年 2-3 月间，一场新的大规模农民暴动暴发，史称黑鹰起义（Pitchork Rebellion），共有五万农民军，但装备落后；布党红军则有加浓炮和重机枪，几日内数千名农民军被屠杀，数百个村庄被烧毁。（97）农民暴动是因为征粮队强行征走几乎全部粮食，每个农民仅给留下 35 磅谷物，55 磅土豆，及 1/5 生存必需品；农民被迫为生存而战，直到两年后被饥饿击败。

第三个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心是乌克兰本身，一支 15000 人装备精良的农民军，大多由逃役者组成，另有一支 2500 人的骑兵队。1917 年 12 月哥萨克人被布尔什维克党列入另类，列入富农阶级敌人，群体灭绝的对象。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土地分给沙俄国移民，被责令交出武器，历史上作为边境居民，沙皇法律许可哥萨克人拥有武器。这些措施皆是 1919 年 1 月 24 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为消灭哥萨克人的一个秘密决议：“唯有政治正确，采取群体恐怖手段无情地消灭哥萨克富裕农民，只至最后一个人。” 99

1919 年 2 月-3 月中旬，苏俄共处决了超过 8000 名哥萨克人；在每个村庄，革命法庭在数分钟内以反革命行为罪名判处哥萨克人死刑；面对此种蛮横无理，哥萨克人别无选择，唯有起义。

1919 年 3 月 11 日，哥萨克人在维森斯科亚（Veshenskaya）首举义旗，号召 16-55 岁的男子起义：“我们哥萨克人并不反对苏维埃，我们支持自由选举，反对共产主义，反对集体农庄和犹太佬；我们反对强制征粮，抢粮和契卡没完没了的处决”。4 月初哥萨克人起义队伍扩大到三万装备精良的哥萨克部队。99

1920 年 11 月-12 月，在收回克里米亚（Crimea）后，布尔什维克党至少屠杀了五万平民。1920 年 10 月契卡主要头目之一兰德尔（Karl Lander）上任第一件事即设立一个“去哥萨克人专门委员会”，在一个月处死六千人并立即执行。家属有时甚至邻居被当作人质关押。妇孺老人冻饿死无数，女人尽一切手段活命，

看守利用此将女人视作妓女任意蹂躏。(100)哥萨克人反布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19-1920年期间,依最可信的估计,300万人口,约30至50万人被杀。布尔什维克党在城市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解散先前选举产生的议会。禁止所有的贸易,立即导致粮价上涨,进而短缺。对资产阶级课以重税,为确保资产阶级支付重税,大量将其关入集中营作为人质。105

在红军与白军拉锯战地区,布党契卡大量任意屠杀囚犯,嫌疑人,人质。例如在科纳尔基夫(Knarkiv)1919年2月-6月,2-3000人被处决;12月另外1-2000人被处决;在洛斯托夫(Rostov-on-Don)1920年1月约1000人被处决;在欧德萨(Odessa)1919年5月-8月2200人被处决;另1920年2月-1921年2月,1500-3000人被处决;在科伊夫(Kyiv)

1919年2月-8月,至少3000人被处决;在爱卡特里诺达尔(Ekaterinodar)1920年8月-1921年2月至少3000人被处死;在阿尔马维尔(Armavir)1920年8月-10月,2-3000人被处决;在克里米亚(Crimea)1920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五万人被杀。(106)在莫斯科1921年3月22日-24日,契卡与罢工工人冲突,许多工人被射杀,更多人被捕;在彼得堡1921年2月24日,契卡向示威工人开枪,杀死12人,超过1000名工人被捕。但罢工持续扩大,数千名士兵加入罢工工人队伍。

1920年2月26日季诺维也夫电报列宁称:“工人已与士兵合流,若在数小时内援军不赶到,我们将被推翻。”两天后,两艘战舰士兵哗变。3月1日,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亲自出席15000人的大会,但愤怒的工人令他根本无法演讲。

3月7日契卡接到命令,采取决定性行动征服工人。48小时内,2000名工人被捕;3月8日开始攻击,10天后,数千名工人丧生。数百名被捕工人次日被枪杀;4-6月,2103人被处死;6459人被关入监狱。8000人越过冰河逃往芬兰,其中被骗回数千立即被关入监狱,5000人到1922年仅幸存1500人。(114)科德洛夫(Kedrov)契卡负责人将哗变士兵工人哥萨克,农民手脚捆绑脖子上绑上石块沉入德维纳(Dvina)河。

列宁1921年写道:“唯一适合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人的地方就是监狱。”数月后他写道:“如果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人仍然如此,他们必须全部被无情枪决。”

1921年4月27日,政治局决定派军队消灭安托诺夫(Antonov)领导的农民军;10万大军在飞机,重机枪装备下,大规模扣人质,并任意处决,设立死亡集中营,用毒气杀死囚犯,驱逐整个村庄。

1921年7月10日契卡清匪措施报告称:我们当全体村民的面公开枪决21名人质。7月3日在奥斯西诺夫基(Ossinovki)我们带走58名人质,7月4日,公开枪决第一批人质21名,次日再枪决15名。118

1921年7月军事当局和契卡建立了七个集中营,至少五万人被关入。1921年夏,开始出现饥荒。每月死亡率高达15-20%;1922年2月,四万人到9月已减少到1000人。118

五、共产党体制性大饥荒

1. 第一次大饥荒

1920 年农业严重欠收，布党仍向农民征课 1000 万吨粮食，农民连来年的种子也被强行征走，到 1921 年 1 月农民已经断粮，2 月死亡率急剧上升。在 2-3 个月内各种反布党的暴动有效停止。每日成千上万农民聚集在布党委门前等待粮食到来的奇迹。全省至少有 90 万饿以等死的饥民。

苏维埃政府则利用饥饿的方法，饿死所有敢于反抗的农民。虽然有详细准确的征粮政策后果的报告，苏联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预防这些预知的恶果。1921 年 7 月 30 日，列宁向各省地负责人发布命令：立即支付税收征粮的重要政治意见！¹²¹

1921 年 6 月农业学家，经济学家和大学讲师组建了一个“抗粮荒社会委员会”，其中有不少著名人物，取得了高尔基的支持，试图说服苏共高层重视救助饥荒。1921 年 7 月 21 日，布党政府不情愿地承认该委员会的合法地位。该委员会立即展开海内外求援活动。第一个举措是与东正教教宗联系，后者立即成立了一个“全俄东正教援助饥荒委员会”；教宗向全俄教会公开呼吁救助饥民。获得教会支持后，委员会立即向国际红十字会，贵格教会，美国救援协会呼救，全部获得积极响应。但仅 5 周后，该委员会即被苏共强行解散。

列宁指令：“我建议立即解散抗粮荒委员会，以颠覆罪名逮捕组织者判三个月，其他委员全部驱逐出莫斯科，分至其他地区的主要城市，并严厉控制切断他们的一切通讯，指示各报纸组织人员污蔑他们的名誉，指控其与白军，资产阶级联系密切，让他们成为可笑人物，在报纸上连续报导两个月。”¹²³

撤销该民间委员会后，苏共成立了一个官方机构。1921 年夏天饥荒最严重时，有三千万人挨饿。但官方机构仅提供了 300 万人的食品，红十字会，贵格教会，美国的援助每日供应 1100 万人的食物；尽管有国际援助，1921-1922 年全俄仍然饿死了 2900 万面临饿死的饥民中的 500 万人。（129）沙俄时代最后一次大饥荒发生于 1891 年，政府社会绝尽全力救助，饿死 40-50 万人。

2. 第二次大饥荒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是布哈林反对的“军事封建剥削农民的体制”人为造成的。与 1921-1922 年饥荒不一样，前者苏联当局承认，寻求国际援助。官方一直否认 1932-1933 年的大饥荒。GPU 以假相蒙骗外国人，通过外国人之口宣称乌克兰决无饥荒。

1932 年 8 月 7 日，苏联颁布一项法律：“任何偷盗或破坏社会主义财产者，皆处死刑或十年徒刑”。自 1932 年 8 月-1933 年 12 月，超过 125000 人被按该恶法判刑，其中 5400 人被处死。

1932 年 10 月，在相关地区征购任务仅完成 15-20%，10 月 22 日，苏共政治局派出两个特别委员会前往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前者由莫洛托夫(Molotov)率队，后者由卡冈诺维奇领队，包括特务头子雅哥达。他们立即禁绝一切贸易，清洗商店，支付贷款，增加附加税，立即逮捕破坏分子，反革命，皆由 GPU 配合。凡有

破坏嫌疑者，整村农民被驱逐。11月，5000名地方干部被清洗，15000名集体农庄工人被捕，71236人被驱逐；1933年，268091人被驱逐。

1932年夏，第一份有关1932-1933年冬粮荒的紧急报告送达莫斯科，8月莫洛托夫向政治局报告，即使在收成较好的地区也存在实际的饥荒危险。同月，卡扎克斯坦共和国(Kazakhstan)主席伊沙爱夫(Pyotr Isaev)通知了斯大林该共和国饥荒的实际程度。甚至铁杆斯大林分子乌克兰总书记科斯西欧尔(Kossior)，和卡哈塔爱维奇(Khataevich)书记均请求斯大林降低征粮计划指标。科斯西欧尔(Kossior)于1932年11月写信给莫洛托夫：“我们必须考虑给农庄留下必要的最低需要的粮食，否则来年将无人播种。莫洛托夫回信答：“你的立场完全错误，不是布尔什维克。”(164)数日后，政治局给地方党政指令再次强征，连留下作明年种子的粮食也全被强行征收。数百万农民无处可寻觅食，被迫大量进城。

1933年1月22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一项命令：“采取任何手段将农民赶出城市，由党政和GPU执行。”在所有饥荒地区GPU均设立特别关卡，禁止农民离开其所在地区。

1933年3月，一份秘密警察报告显示：一个月内阻止了219460人进城，同时遣返186558人。卡哈尔基夫(Kharkiv)发生吃人事件，GPU和意大利驻当地领事馆报告均有纪录。1933年4月，作家沙罗科哈夫(Sholokhov)路过库岗(Kugan)后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详细描述了地方官员如何酷刑逼粮，要求及时采取救助措施。1933年当数百万人继续挨饿时，苏联政府却继续强制征粮，并为工业化利益，出口1800万英担粮食。

2006年11月，独立后的乌克兰将每年的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2008年，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大饥荒死难者哀悼仪式上说，乌克兰死于大饥荒的人数竟然远多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的人数，这是针对乌克兰人的种族灭绝。普京总统说从今天披露的资料看，从最东端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端的乌克兰，苏联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件。

斯大林约了西方的记者朋友。获得1932年普利策新闻奖的《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见到了很多红光满面的老人和儿童，他报道说，“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被邀请到苏联。“苏联就是人间的天堂”，萧伯纳说。另一位英国人韦伯则说，粮食的确出现减产，但那是阶级敌人蓄意搞破坏。

2003年，普京在参加大清洗悼念时总结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3.第三次饥荒

1946-1947年秋冬季，苏联发生了第三次饥荒，主要在(KurskTambovVoronezhOrel Rostov)五个省，至少有50万人受害，这次饥荒同样被掩盖得严严实实。

六、宗教迫害

布尔什维克党一掌权，立即与东正教会的关系恶化。列宁下令逮捕了许多神父和主教。1918年2月5日苏联政府颁布政教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没收教会财产的命令。1922年2月26日，苏联政府假救助饥民之名下令没收教会一切黄金，银器，钻石等珍宝。3月15日，在契那亚（Chnya）红军向信众开枪，杀死12名信徒。

1922年2月6日，契卡依法废止，由国家政治指导局（GPU）取代，即将对政敌的恐怖迫害镇压法律化。

1922年3月19日，列宁在给政治局的一封信中写道：“要充分利用契那亚（Chnya）枪杀信徒事件，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立即没收教会的几十亿金卢布，唯有此时，大量农民已饿得不能再反抗，所有这些饿以待毙相互吃人的数百万饥民使整个国家陷于灾难。。。 ” 125

1922年3月，4月和5月连续三个月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普遍展开，直接引起1414起反抗事件，数千名神父，牧师，教士被捕，其中2691名神父，1962名和尚及3447名修女被杀害。根据列宁的指令，参与契那亚暴动的神职领导人全部被处决。在彼得堡77名神父被捕，4人被杀；在莫斯科148名神父被捕，62人被处决；缙科宏（Tikhon）教堂被严密监控。126

1929-1930年苏共对教会进行了第二轮迫害。1914年既存的54692个教堂到1929年仍有39000个继续提供服务。1925年苏共无神论协会主席承认，在一亿三千万总人口中，仅有不到一千万人实际上放弃了宗教信仰。（172）直至1937年，仍有70%的成年人认为自己有宗教信仰。

1929年4月8日，苏共颁布一个法令，对宗教活动规定了新的限制；利用宗教…反苏联政府的处三年直至死刑。1930年10月苏共颁布命令没收教堂的钟。扰乱了广大有神论信仰者的宁静。任何与教会关系密切者均加税，教会领导人被剥夺公民权、供应证和公共医疗，许多人被逮捕或驱逐，13000名神父被清洗强迫务农，许多教堂被迫关闭。1930年，14%的暴动是由于关闭教堂或没收教堂的钟引起。1930年1月，共6715个教堂被关闭或毁坏。随后数年以日常骚扰教堂和神父，经济上剥夺的方式，迫使许多神父丧失收入。

1936年4月1日，全俄只剩下15835个东正教堂，4830个清真寺（32%）和几十个天主教堂和清教继续存在；注册神父牧师只剩下17857人，而1928年仍有70000名神父和牧师，1914年则有112696名神父和牧师。

1937年4月，马兰科夫（Malenkov）建议利用此机会最后清除教会组织。数千名神父牧师及几乎所有的主教皆被关入集中营。这次绝大多数被处决。1936年仍服务的20000个教堂和清真寺，到1941年时只剩下不到1000个；官方登记的神职人员降至5665人（半数是在新吞并地区），而1936年时仍有24000人。

1960-1970年代，克格勃严密监控三类人：宗教团体（天主教，浸礼会教友，清教徒，Adventists）、民族主义分子和异议知识分子。

1957年，重新关闭数个战后恢复服务的教堂；1973-1975年，116名浸礼会教徒被捕；1984年，200名浸礼会教徒被捕；1981年，克格勃几乎可以肯定参与了谋杀三名天主教神父的阴谋。

七、泡制恶法

刑法草案第一稿于 1922 年 5 月 15 日送交列宁，他批注：“刑事范围应扩大，应包括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行为，增加驱逐国外及终身驱逐条款”。不到一个月后 1922 年 6 月 6 日，11 名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即被判死刑。

1922 年 5 月 20 日列宁在致秘密警察头子德泽尔津斯基的信中，计划将所有曾帮助反革命的作家和教师驱逐出境。第一批 60 名著名知识分子，哲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于 8 月 16-17 日被捕，9 月被驱逐出境。每人均被迫签署一项声明：“若再回苏联，将立即被处决。”1924 年 1 月 24 日，列宁终于走完了其罪恶深重的一生，据称死于梅毒。尽管苏联当局特意从德国请来一个专家小组仍无力回天。

1921 年契卡雇用了 105000 名市民，180000 各种人员，包括边界守卫，铁路警察，集中营官员；1925 年缩减至 26000 市民，63000 人组成的特种部队及 30000 名线人。

1926 年苏联刑法第 58 条定义反革命的 14 种情形。1925 年以前犯人被关押者并不被强制劳动。1926 年始，监狱与国营企业订合同，使强制劳动成为谋利手段而非改造。

1925 年 8 月 29 日-9 月 5 日，乔治亚秘密警察在总部特务头子贝利亚的指挥下枪杀了 12578 人，即决处决持续了数月。1926 年底首任特务头子德泽尔津斯基去世，由孟津斯基（Menzhinsky）继任。此时斯大林日前插手秘密警察（GPU 即契卡）。

1927 年 11 月所有苏共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人，包括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卡门内夫，雷德克（Radek）和雷可夫斯基（Rakovsky）均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并被逮捕。

八、消灭富农

尽管 1927 年是个丰收年，1928 年 1 月，农民向苏联政府交纳的粮食却从上年度的 680 万吨降到 480 万吨。斯大林趁机发起消灭富农的战争。1928 年 1 月 14 日，政治局向各地当局下令逮捕投机商、富农及任何破坏市场价格的人。苏共委派大量干部下乡，由贫农协助查粮，并承诺予之 1/4 收缴粮食作为奖励。国家收购粮价仅为市价 1/3 甚至 1/4。而斯大林则两倍甚至三倍增加收购量。农民则以减少播种面积和数量作为应对措施。

苏共于 1928 年提出强制集体化，消灭富农，加速工业化三大政策。布哈林和雷可夫（Rykov）党内右派反对派，认为集体化将对农民造成新的封建剥削，导致内战，造成恐怖骚乱和新的饥荒。1929 年 4 月斯大林罗织罪名逮捕最终处决了布哈林[1]，清除了这一最大障碍。1929 年 12 月 27 日斯大林发出消灭富农阶级的指令。

九、强制集体化

1928 年 1 月-1929 年 12 月，苏联共发生 1300 余起暴乱，1929 年超过 3200 名苏维埃政府人员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

原计划 1934 年完成 500 万户集体化，结果仅 1930 年 6 月便已超过 800 万农户被强制集体化，至 9 月则已达 1300 万户。

斯大林发表“伟大事业的转折点”一文，他基于错误的认识，认为农民自愿集体化。强制农业集体化是一场国家与小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战争，超过 200 万农民被驱逐，600 万人饿死，几十万人直接死于始于 1929-1930 年冬，1932-1933 年达到商峰的强制迁徙。苏共当局故意以饥荒手段，摧毁农民的反抗意志。

秘密警察 GPU 纪录显示，1930 年 1 月共发生 402 起暴动抗议集体化和清洗富农；2 月增加至 1048 起；3 月剧增至 6528 起；3 月间，共有 500 万户农民退出集体农庄；4 月发生 1992 起农民起义；6 月，886 起；7 月，618 起；8 月，256 起；1930 年约 250 万农民参与了 14000 起暴动示威反抗布党政府。镇压非常残忍。1930 年 3 月底乌克兰西部逮捕了 15000 人。2 月 1 日-3 月 15 日，乌克兰 GPU 逮捕 26000 人，650 人被处决；按 GPU 纪录：该年仅通过法院判决处死者即达 20200 人。(150) 随后，逮捕第一类富农 64589 人，地方 GPU 趁机清洗各自不喜欢的人，其中被杀人数永远成谜。事实上被以富农名义流放者至 1930 年底超过 70 万人；1931 年底超过 180 万人；1932 年 1 月 1 日官方数计仅 1317022 人。

1930 年 2 月开始清洗第二类富农，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是将 6 万富农流放。严寒，缺食品，传染病夺走了无数人生命。依官方数据 1930-1931 年期间，共计 1803392 人作为清洗富农政策被流放至西伯利亚。

1933 年 5 月在一份送斯大林的报告中称：从莫斯科和彼得堡流放的 6100 人，1933 年 4 月 29-30 日经火车，1933 年 5 月 18-26 日，用船送至纳兹诺 (Nazino) 岛，由于寒冷缺粮食疾病，每日死亡 35-40 人，第四日送来一船面粉，每人仅能分到几磅，不久即发生吃人事件。该 6100 人到 8 月 20 日只剩下 2200 人幸存。

十、迫害社会异己

1. 迫害经理专家技术人员

1928 年底数千名工厂经理，工程师被开除，取消医疗保障，剥夺供应证；1929 年数千名政府工作人员在各部委内，被以破坏分子右派等名义清洗。1930 年 GPU 逮捕了在各部委的著名专家。1930 年 9 月 22 日，波拉夫达 (Pravda) 公开承认：人民财政部和商业部 48 名成员于 9 月 20 日全部被枪决。随后数月内，举行了数十起既定的作秀审判，自 1928-1931 年四年期间，清洗了 138000 人，其中 23000 人被认定为苏联政权的敌人，并剥夺其公民权。

1930 年 1 月-1931 年 6 月，东巴斯 (Donbass) 地区 48% 的工程师被开除或逮捕；1931 年上半年仅运输部门，4500 名专家被清洗。这些对专家的迫害，严重损害了俄国的工业，因此政治局被迫采取了一系列补救举措。

2. 迫害手工业者，手艺匠人

1930 年初，开始清洗所有小手工业者，手艺匠人。1930 年 10 月，苏共政府剥夺一切前政府工作人员的公民权。1928-1932 年期间，苏联城市大量涌入农民，政府大工程项目吸收了大部分，城市生活质量随之恶化，于是苏共通过法律加强

镇压。

3.迫害前政府工作人员

1932年12月27日，苏共以颁布国内护照的方式控制人口流动，清除不受苏共欢迎的人。1933年1月5日，苏共将前政府工作人员385000人全部强制赶出城市，禁止他们在任何城市居住。莫斯科60000人，列宁格勒54000人，其他开放城市420000人被强制驱逐出城。

4.迫害少数民族及儿童犯

1933年6月28日-7月3日，54%吉普赛人被从莫斯科强制迁往西伯利亚的“工作村”。1935年4月7日，苏共政治局给各地法院一项秘密指令：“任何12岁以上犯抢劫，暴力行为，严重身体伤害，断肢，谋杀罪者处死刑。”¹⁷⁷

1934年7月10日，GPU变成人民委员内务部的一个部，失去了其先前具有的司法权。未经征询苏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有权处死犯人，但在实践中效果非常有限。

5.践踏法律正义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总书记基洛夫（Kirov）被一位青年共产党员枪杀，数小时后斯大林即颁布一项命令：该12月1日法令，苏共政治局在两天内批准。将审讯恐怖分子的程序减为10天，允许辩护律师不在场时审讯嫌疑人，允许立即执行死刑。该法令成为随后的大恐怖的工具。数周内，党内反对派被指控为恐怖活动分子，13人被12月28-29日审判死刑后立即执行。

1935年1月9日，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77人包括许多反斯大林的苏军将领被判刑。随后莫斯科中心19人，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卡门内夫（Kamenev）于1月16日被审判。季氏和卡氏皆在审判中承认反党的路线。自1934年12月-1935年2月，6500人被按此特别程序审判。

任何人在任何问题上曾反对斯大林意见者，皆被列为嫌疑犯。1935年1月，988名前支持季诺维也夫者被驱逐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即彼得堡）强迁至西伯利亚。9%的苏共党员共计250000人被开除，其中15218人被逮捕。

十一、大恐怖（1936-1938）

斯大林理解纯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实践性及普遍革命的秘密。作为一个好的社会主义者和真正的爱国者，他主张开明专制和家长式统治。

1956年在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仅指责了斯大林对党内及军内无法无天的迫害，批评他犯了严重错误。1961年赫氏才公开谴责斯大林在大恐怖时期对平民的恐怖迫害，并指控其犯罪。但仍对斯大林迫害的严重程度及具体罪行，赫氏及其同代人一直保持沉默。直至1960年代末，逃至西方的目击证人及历史学

家才描述出斯大林暴政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的梗概。

1936-1938年11月大恐怖期间担任NKVD首脑的特务头子是爱佐夫(Ezhov)，他主持了大恐怖。有学者论证至少600万人被逮捕，300万人被处决，200万人死于监狱和集中营。不过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此数据过于夸张。

[1] 南郭注：布哈林与托洛斯基一样曾是继承列宁的热门候选人之一，他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

苏共政治局文件表明，启动大恐怖始于苏共最高当局，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斯大林本人。1937年7月2日，苏共政治局电报各地方当局，命令所有富农和罪犯，必须立即逮捕，经秘警特务头子，检察长和公安局长组成的“公检特别法庭”(troiki)审判，最严重者枪决，其次者驱逐出境；随后数周苏共中央便收到了各地当局的汇报。1937年7月30日，爱佐夫准备的第00447号报告称，在这次特别行动中，259450人被捕，72950人被处决。1937年8月25日，另外225000人被处决；16800人被关入监狱；1938年1月3日，又有57200人被捕，48000人被处决；1938年2月1日-8月29日，苏共政治局又批准消灭了90000人。187苏共政治局司法委员会拟定的黑名单，由斯大林签署者共计338份，其中涉及44000名党政军领导人，至少39000人被处死。斯大林在第362页上亲自签名。(189)所有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均亲自参与各地的清洗活动，其中赫鲁晓夫负责乌克兰的大清洗。

斯大林是大多数迫害措施的作者和启动者。1937年8月27日下午五点，斯大林接到西伯利亚第一书记请示有关如何处理一批被指控为破坏者的电报十分钟后，立即回电指令：“我建议将这批人全部处死，并在当地报纸上报导”。(189)证据证实，斯大林详细控制爱佐夫的每一举动。在审判图卡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红军将领期间，斯大林每天接见爱佐夫。是斯大林提名任命爱佐夫任特务头子，也是斯大林指令停止NKVD。1938年11月1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命令停止大规模逮捕；一周后爱佐夫即被解职，由贝利亚取代。

十二、滥用司法草菅人命

1937年-1938年，1575000人被NKVD逮捕，1345000人被判各种刑(占845%)，681691人被处死(占51%)。(191)公检特联合特别法庭(由检察长，公安局长和秘密警察头子组成)自1937年8月在各地成立。其旨在完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和指令。其往往一日内看数百个案件，审理越简单越好。从逮捕至处死的周期往往只有数周。判决不得上诉，执行仅在数日内。

为了完成上级指标，地方当局往往将敌人的家属及任何无辜者充数，以致被枪决者中有相当一批人属此种无辜。

1936-1939年关入古拉格的人犯有高等学历者占人犯总数高达70%，证明苏共当局旨在迫害知识分子。191由于斯大林迫害党干是第一个被公开的罪行，赫鲁晓夫有意掩盖了苏共及斯大林迫害知识分子的罪恶。5名忠于斯大林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39名苏共中央委员中的98人，1996名苏共17大代表(1934年)中的1108人，93名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中的72人，385名苏共省委书记中的319人，2750名苏共区委书记中的2210人被逮捕。(192)

列宁格勒的秘密警察头子下令逮捕了90%的苏共党干。乌克兰在赫鲁晓夫被提名为总书记后，仅1938年超过106000人被逮捕，且绝大多数被处决；200名

乌克兰苏共中央委员仅 3 人幸存。相同的情形在其他各地大同小异。(192)

直接针对富农的迫害仅是苏共迫害人民之冰山一角。1937 年 4 月 1 日-9 月 18 日，在奥伦伯格（Orenburg）由 NKVD 主导的清洗托派，随着党的书记被清洗后进行。420 托派分子，全部是行政或经济专家，120 右派，全部是地方领导人，在泽达诺夫（Zhdanov）到访后，另外 598 名干部被捕并立即枪决。普通党员和前共产党员则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共有 7500 人被捕。

1937 年秋天之前，几乎所有的党干及著名经济专家皆被清除，各领导岗位皆被新一代迅速取代。勃列日涅夫（Brezhnev）科西金（Kosygin）格罗米科（Gromyko）皆成为 1970 年代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

1940 年 2 月，在签署苏德友好条约后，570 名在押的德国共产党员被苏联移交给德国盖世太保！1937-1938 年，波兰共产党被彻底清洗，12 名任苏共中央委员的波兰共产党员及所有在共产国际中任职的波共党员全部被枪决。(195)

1938 年第 24260 号档案载明：“西德诺夫（Sidorov）因仇视苏联体制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反苏宣传，说斯大林不会放弃权力，斯大林杀了大量群众，布尔什维克党专权，任意逮捕诚实的人民，你不能说他们，否则会被判 25 年刑。”经公检特联合特别法庭审判：死刑立即执行。(196)

十三、清洗红军

1937 年 5 月，苏联红军现代化的主要设计者和国防部副部长苏军元帅图卡切夫斯基[1]（Tukhachevsky），另外七名将军包括雅基夫（Jonas Yakiv）军区司令；乌波雷维奇（Uborevich）司令；10 天后 980 名高级军官被捕，包括 21 名军团司令，37 名军区司令，由爱佐夫亲自进行残酷的审讯，所有的人皆在审判前受酷刑下被迫认罪；5 位苏军元帅中的 3 人（图卡切夫斯基 Tukhachevsky 爱哥洛夫 Aleksandr Egorov 布拉切尔 Vasili Blucher）；15 名军团司令中的 13 人；9 名海军上将中的 8 人；57 名特种部队司令中的 50 人；186 名军分区司令中的 154 人；全部 16 名军政委；28 名特种部队政委中的 25 人；全部被处死刑。自 1937 年 5 月-1938 年 8 月，35020 名军官被捕或驱出军队，多少人被枪决迄今不明；其中 11000 名军官在 1939-1941 年期间被重新录用。但在 1938 年 9 月后展开了新一轮的清洗，因此，178000 名军官中有 30000 名以上被清洗。(198)

经过 1922 年，1928-1931 年两次迫害，知识分子又受到 1937 年 3 月-4 月的迫害。教师和教授首当其冲，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教授被大逮捕。作家，记者，出版者紧随其后成为迫害对象。2000 名作家被捕关入集中营或枪决；伊萨克巴宝尔（Isacc Babel）于 1940 年 1 月 27 日被处决；然而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最后清洗剩余的神职人员。1937 年 4 月，马兰科夫（Malenkov）建议利用此机会最后清除教会组织。数千名神父牧师及几乎所有的主教皆被关入集中营。这次绝大多数被处决。1936 年仍服务的 20000 个教堂和清真寺，到 1941 年时只剩下不到 1000 个；官方登记的神职人员降至 5665 人（半数是在新吞并地区），而 1936 年时仍有 24000 人。

综合各种信息可见，大恐怖是由苏共最高层在斯大林直接主导下展开的政治运动。大恐怖设立了由年青的斯大林主义者当权的民事和军事官僚体制；新一代领导人将接受的执行斯大林命令而无任何疑问，1930 年代末期以前，苏联各行政机构皆是由前沙俄资产阶级专家和布尔什维克党控制。大恐怖彻底清除了社会危险分子。任何带有“前”字者（前政府党政军各行各业人员）皆被一扫而空。

斯大林亲自命令秘密警察头子苏得波拉特夫 (Pavel Sudoplatov)，除掉托洛斯基。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梅尔卡德尔 (Ramo Mercader) 特工部特务用一冰斧袭击托洛斯基，他于次日不治身亡。

东德柏林工人抗议降薪，于1953年6月16日举行罢工，1953年6月17日，苏军出动坦克镇压，16人被杀，数百人受伤，数千人被判重刑。1956年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第一次反极权的武装起义。苏军出动大军用坦克机枪镇压，3000人被杀，25000人被判刑，数万人逃亡海外。

十四、镇压布拉格之春

[2]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起义，也被苏共组织四国军队强行镇压。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在安东尼诺瓦蒂总书记 (Antonin Novoty) 统治下，既没有匈牙利和波兰的解冻，自由，经济又一踏糊涂。最初的改革要求不是来自民间，甚至不是异议人士，而是体制内共产党知识分子，1967年11月大学生罢课，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结果漫延全国抗议警察特务恐怖统治。一批共产党干部公开批评捷共的政策，诺瓦蒂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将受到冲击，故向苏联救援。随后，亚历山大杜布赛克 (Alexander Dubcek) 取代诺瓦蒂任总书记，他是一个温和派改革者，此时，异议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更多的改革。但仍是共产党自己决定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1968年4月捷共颁布了一项行动计划，引进一个政治多元化及更多宗教自由，但仍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些激进的党员于6月则要求更深入的改革。8月他们草拟了一份新党章：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8月21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军队进入布拉格。按照勃列日涅夫的理论，共产党认为为维护共产国际利益有权干预。结果8月20至21夜行动，第一波共出动坦克4600辆，165000军队；五天后，加上捷克27个军，6300辆坦克，800架飞机，2000门重炮，共40万军队。1940年德国希特勒侵占法国仅出动2500辆坦克，1941年入侵苏联才动用了3580辆坦克，而捷克人口仅一千四百三十万人，仅是法国人口及苏联人口的一小部分。由此可见苏联惧怕人民和平起义，其制造恐怖芬围的目的至为明显。但抵抗入侵整个过程相当和平，占领军杀了90人，大多在布拉格。约300名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受重伤，另500人轻伤；苏联当局逮捕了数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但仅数日后不得不释放他们并与之谈判。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 (Gustav Husak) 取代杜布赛克担任捷共总书记，胡萨克是正宗保守的共产党人，撑权后他日益强硬和不宽容，并对党内进行了不流血的清洗，捷克再次沦为共产党专制政权。

十五、死亡集中营

1930年中旬，约14万名犯人已在此GPU控制下的监狱服劳役。1929年GPU处死56000政治犯；1930年处决208000人；由其他法律部门判决者1929年为1178000人；1930年为1238000人。1932年超过30万人在GPU的集中营服劳役，其死亡率高达10%；1934年7月，GPU由NKVD取代；1935年重组古拉格系统。此时秘密警察特务直接控制的人犯已有965000人。其中725000人在集中营中强制劳动，240000人在监狱外面强劳。1941年，秘密警察控制的人犯增加至1930000人。

每年政治犯占犯人总数约 1/4 到 1/3。1940 年 3 月 5 日，贝利亚向斯大林报告：处决了 25700 名波兰军官；1943 年 4 月，德国人在森林中发现多处集体屠杀现场，苏联人一直嫁祸于德军，直到 1992 年叶利钦访问华沙时，苏联政府才首次承认苏共政治局应对 1940 年处决波兰军官事件负责。（209-211）

苏军入侵波兰共俘获 230000 名波兰军人，到 1941 年夏天，只剩下 82000 人幸存。1939 年 8 月，苏联吞并波兰后，苏共当局立即召见爱沙尼亚，接脱维亚，立陶宛政府首脑至莫斯科，强迫他们签署友好协助条约，邀请苏军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随即苏军 25000 人进驻爱沙尼亚，30000 人入驻拉脱维亚，20000 人入驻立陶宛。

十六、最后的阴谋

1952 年 7 月 11 日-15 日，苏共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 13 名负责人进行审判并全部处决，与工程师和破坏者一道共 25 人被枪决；其余 100 人被判 10-25 年刑。

十七、解冻与摆脱斯大林恐怖主义

1953 年 3 月 25 日，苏联政府宣布大赦，但政治犯除外。120 万犯人被释放。甚至连贝利亚也主张大改革，他于该年 3 月 24 日的一份报告中称：2526402 名犯人中，仅有 221435 人是对国家极危险的。

1953 年 5 月 14 日，14000 名犯人在诺里勒斯克（Norilsk）罢工，要求释放政治犯。1953 年 7 月 14 日，12000 名犯人在维尔基雅塔（Virjyta）举行罢工，苏共当局这次没有立即镇压，而是与犯人代表谈判，并反复推迟攻击。1954 年 5 月，监狱暴发大规模越狱。经 40 天，特种部队派出坦克包围该地区，逮捕了 400 人判重刑，并枪决了 6 名组织者才平息。犯人罢工要求部分得到满足，工作时间降至 9 小时，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1954-1955 年公检特特别法庭被废除。秘密警察改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KGB），清洗了 4/5 工作人员，由塞洛夫（Serov）取代贝利亚负责。

十八、赫鲁晓夫的历史功绩

[3]1956 年 2 月 24 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特别谴责斯大林主义，但仅指责斯大林犯严重错误，未提及自 1917 年以来苏共的任何主要决议。对于强制集体化和大饥荒等罪行只字未提，仅是党员受迫害的才被言及。1961 年赫鲁晓夫才公开指责斯大林犯罪，并允许著名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国内出版著作。

1954-1955 年，90000 名反革命分子从古拉格中解放；1956-1957 年苏共二十大后，310000 政治犯获释；至 1959 年 1 月 1 日只剩下 11000 名政治犯仍在狱中。超过 200 个特别复查委员会派到各监狱进行复查。但官方仅是悄然进行。

1964 年 10 月赫氏被赶下台，1965 年 4 月勃列日涅夫上台，随即采取了两项改革措施：即农业改革和工业改革，短期内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有所发展。但勃氏同时强化了社会高压举措，不再容忍异议及过份自由的批评作品公开发行，索尔仁尼琴等异议作家的著作全面被禁。克格勃特务开始对异议人士进行骚扰

和监控，苏共加强军费开支，强化军事实力。

1960年苏联新刑法第70条规定：任何人以恶意造谣方式诽谤国家进行反苏宣传，将被处三个月至七年徒刑；第190条规定：任何未谴责反苏行为者，得处三年刑或在社区劳动。

1960-1970年代，克格勃严密监控三类人：宗教团体（天主教，浸礼会教友，清教徒，Adventists）、民族主义分子和异议知识分子。

1957年，重新关闭数个战后恢复服务的教堂；1973-1975年，116名浸礼会教徒被捕；1984年，200名浸礼会教徒被捕；1981年，克格勃几乎可以肯定参与了谋杀三名天主教神父的阴谋。

佩特罗将军（Petro Grigorenko）于1967年5月被捕并关入精神病院迫害；1970年代，第年均几十人被关入精神病院服刑。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苏联的异议运动，始于斯大林死后第一次公开大规模审判政治犯。1966年作家安德烈和尤里（Andrei Sinyavsky and Yuri Daniel）以诽谤苏维埃制度罪名分别被判七年和五年刑。1965年12月5日，他们被捕后，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55人举行示威。1960年代有数百名知识分子异议人士，十年后达到高峰时有1000-2000人。他们质疑苏共政权的合法性，要求严格遵守苏联法律，宪法和苏联签署的国际公约。他们拒绝私下活动，而是公开主张利用国际媒体，尽可能广告他们的主张。

1973年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之《古拉格群岛》在西方公开发表，苏联的人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及欧盟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关注的重点。1975年苏联设立了一个监督实施《赫尔辛基条约》的民间组织，克格勃的任意逮捕不再能随心所欲，异议人士的命运能迅速传遍海外。1960-1985年被捕的政治犯人数迄今不明；1970年有106起，包括21例被关入精神病院。1971年85起，1972年24起。1979-1981年共500起。

十九、哥尔巴乔夫与苏联政治民主革命

[4]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死于任上；由前克格勃特务头子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接任苏共总书记。15个月后，安德罗波夫也死于任上，由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续任苏共总书记；但契尔年科于13个月后就死在任上；1985年3月，哥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选总书记，他立即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他与各前任显然不同，任职前他曾周游欧美等国访问，了解到实际的西方自由宪政民主体制；他的经历更为复杂，更愿意讨论问题也有更宽阔的心胸及更少的意识形态。坚决反共的英国首相铁娘子萨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于1984年12月曾评价说：她“可以与此人做生意”！

哥氏上台前早已知晓苏联问题成堆。经济停滞，社会弥漫着对共产党国体制的不满情绪。1957年苏共曾订计划要在15年内超过美国，1970年代经济有所增长，到1980年代已呈全面衰退，不但不能超美，连跟上都难上难。因此哥氏决定促进经济发展。为此他引入了一个重建计划（Perestroika）旨在复苏苏联经济；很快他便意识到最大的障碍来自中央国家行政，他相信群众是反官僚体制的最大动力，因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开放和民主化。鼓励普通公民公开说出是什么阻碍了苏联的发展；哥氏期望他们的主要目标将是反官僚体制。但是，鼓励群众批评共产党官僚体制很快便失控；哥氏与毛泽东不同，未重新采取镇压控制，[5]苏联人感受到这次哥尔巴乔夫是真心鼓励公开讨论争辩，因此抱怨来得猛烈异常；

但批评远超出官僚主义，几乎所有苏联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皆成为公众争辩的主题；一个最危险的领域乃是民族主义者利用这个良机力争自治和独立，哥氏意识到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期望通过发展经济来平息大多数人的愤怒，他清晰地表明他相信苏联人不仅因官僚体制受害，而且苏联因过度援助其他国家而受损；因此，1980年代后期，他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并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哥氏对匈牙利和波兰共产党正在引入政治多元化不加反对；整个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相信，他们反对本国共产党将不再受苏联和华约国的威胁和侵略；自1989年匈牙利和波兰开始，一个接一个东欧共产党体制接连跨台；最后跨的是由当地共产党撑权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及苏联本身。至1991年底，这些国家均推翻了共党政权。苏联于1991年12月正式解体成为15个国家，南斯拉夫则以更血腥的方式解体成6个国家；同时，阿富汗、柬埔寨、蒙古及非洲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共党政权也相继跨台。

中共则在1989年6月4日以30万正规军的坦克机枪血腥镇压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与反腐败官倒的要求，中共官方称死亡300余人，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至少3000名至30000名大学生及市民被杀，上万人受伤，另有数以万计的学生工人被判重刑。共产党暴政再次暴露了其丑陋邪恶的一面。

[1] 南郭注：因为图卡切夫斯基元帅在1921年苏联红军入侵波兰战败被迫签署对波兰有利的割让领土事件中，批评了斯大林指挥不当的错误，斯氏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终于在16年后借机报仇，除之而后快。

[2] Leslie N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5-38.

[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33-34

[4]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8-51, 118-119.

[5] 郭道晖先生根据最新档案统计的数据右派总数461万人。3178470右派加上1437562中右《炎黄春秋》2009年第二期。毛泽东初时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原想体现共产党的民主作风，不料一放而不可收拾；故毛翻脸不认人，公开耍流氓，以反右运动终结之。将461万人打成右派和中右分子判刑劳改劳教只到20年后才平反；或饥饿或因过渡劳累，数十万右派命丧荒漠和劳教集中营，无数家庭破裂，妻离子散，中共迄今仍欺骗公众称仅56万人被打成右派，而且拒绝分文损害赔偿。

西方学者认为共党政权跨台的第一项原因就是哥尔巴乔夫的性格和他实施的政策。他是个有较多妥协精神而较少对抗人性的人。他深知苏联之病，故上台伊始，先进行经济改革，续之民主化（有限政治体制民主化）特别是开放；哥氏的对外政策亦导致共党政权的跨台，新政治思维，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他相信苏联因过份干涉或支持他国，造成苏联经济困难，亦导致共党政权跨台。而他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及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使得东欧人民相信可以不再受苏共威胁，而撑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党国体制本身业已腐烂，经济衰退，无论如何哥尔巴乔夫对和平解体共产党暴政功劳巨大，故他必将成为给共产党暴政送终的标志性历史人物，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

第十五章：中国共产党极权暴政的滔天罪孽

南郭点评：中国共产党暴政毫无疑问是所有共产党暴政中最野蛮残暴下流无耻罪孽最深重的一个，也是迄今仍苟延残喘的五个共产党政权的邪恶轴心。国人迄今还在容忍这个流氓暴政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迄今众多国人实际上仍然对中国暴政的深重罪孽，几乎无知或所知甚微。甚至众多知识精英认为中共政权已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退化成为所谓“威权”[2]。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由于语言障碍，国情生疏及间接了解，不可避免会遗漏许多重大事件及其细节。

《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罪行均有较深入的揭露，尽管中共政权在该书的篇幅仅次于苏联名列第二（长达80页），作者在其《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文中对中共暴政的罪恶有所披露，南郭却认为作者似乎对中共所犯罪孽了解远远不够，故在该文基础上，利用多年来译者关注研究中国自由宪政民主运动积累的资料，和张戎女士之《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郑义先生编著之《窝里斗的民族》及其他相关资料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和补充，对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深重罪孽有较完整细致的披露，但肯定仍仅是中共暴政罪恶之冰山一角，因为迄今中共历史档案绝大多数尚未解密，所有涉及中共犯罪的史料仍属绝密。国际共运史及中共历史史实充分证明：共产党皆以欺骗为基本特征，凡属罪恶坏事其必定初时完全否认抵赖，实在无法抵赖时则成倍甚至十倍上百倍缩小；凡属业绩好事则反之，必定动用一切独裁垄断的宣传机器成倍数十倍狂吹。因此本文仅是一篇动态文章，欢迎任何读者（包括中共党用文人或专家理论家们）提出宝贵批评意见和资料，以便随时修正补充使之更加完善。2010年3月21日第211个反中共极权专制暴政争自由人权民主绝食争权抗暴民权运动日

一、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

在中国党内谋杀的清洗很少，秘密警察相对谨慎。约6千万至1亿中国人直接因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亡，其中包括数十万西藏人，10-20%的西藏人口因中共占领而死亡。此外数千万反革命在狱中渡过漫长岁月，或许两千万死于监狱。1959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拒绝认错的犯罪故意，拒绝采取措施以减轻灾难，导致2000万至4300万人饿死。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事件或许死亡1000余人，与中共屠杀总数比微不足道。朝鲜，越南，柬埔寨共产党皆受中共大力扶持，都是以军队起家，因而均以军事为后盾，中共军队起着苏联秘密警察的作用。

整个汉朝，儒学回归，法律严厉，司法严酷，除了在叛乱外侵期间（遗憾的事时常发生），人命远比绝大多数古代其他国家安全；也比中世纪及现代欧洲安全。

宋朝约300人被杀，但均原则上必须严格审判，并经皇帝本人签署同意；瘟疫，饥荒，扰乱交通后无益地至死刑增加。

1913年，袁世凯命令枪决了数千人；1925年6月广州警察杀了52名参加罢工的工人。1926年5月北京警察枪杀了42名和平抗日的学生。1926年湖南西部一支由黑社会红帮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一支50000人的地方军阀的兵匪；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清共，蒋介石军队利用黑社会青红帮枪杀了

1000 多名共产党人。(南郭注：中共官方原称上海 412 事件 300 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中共党员郑振铎 1927 年 4 月 30 日则证实“群众当场死亡约 50-60 人。此外原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陈雄回忆录披露：李宗仁白崇喜才是“四一二事件”的始作俑者，而蒋介石本人只求清除共产党而无意杀戮)[3]。

中国在 1900 年，1920-1921 年和 1928-1930 年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均因旱灾分别导致 50 万人，200 万人和 300 万人死亡，由于内战造成交通中断，加剧了悲剧。河南省 1942 年-1943 年因饥荒约 200 万至 300 万人饿死，当时的重庆中央政府却仍然拒绝减税；1931 年福建农民曾愤怒地消灭一支 2500 人的军队，因其抢劫财产，强奸妇女。1931 年至 1945 年期间，日本侵华致死中国人约 3000 万人，包括南京大屠杀至少 20 万人丧生；其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战死沙场 320 余万人，包括将级军官 210 名；而中共军队到底死多少人迄今仍是秘密。1946-1949 年，中共挑起三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沙场军人 302 万，其中国军死亡 171 万，共军死亡 131 万。

1. 中国古人与古代西方一样也充满着非常野蛮的杀戮。

公元前 262 年秦将白起杀尽 42 万名赵国降卒；公元前 207 年楚王项羽坑杀秦降兵 20 万人；而 1928 年 8 月 28 日还发生过宋哲元将军下令杀尽 5000 名陕军俘虏的惨剧。宋哲元在亲自监斩了 500 人后限令各师团营于当夜将剩余的 4500 人全部一个不剩杀掉，唯有赵凤林师长于心不忍，让其部下酌情处理，结果约 1000 人死里逃生。[4]

中国皇帝的野蛮残暴杀人不眨眼史不绝书。秦始皇除了活埋 460 名儒生外，烧书，杀或流放了近 20000 名贵族，建造长城过程中杀了几十万人，后宫姬妾凡未生儿子者，全部殉葬，修造秦始皇陵的 20 余万工匠役卒在殡葬礼完毕后被全部封在墓里培葬；南北朝的皇帝石虎公元 345 年一年中仅杀不情愿被征集的美女即达 3000 余人，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相互残杀，其长子石宣被石虎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继砍断手脚，续剜去眼睛，最后扔进柴堆烧死；隋炀帝杨广发动宫廷政变杀死父亲杨坚和哥哥杨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微贱，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夺权后杀尽功臣，命人杀了常遇春原配夫人，将她的肋骨砍成小块煮熟，朱元璋亲自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朱还发明“剥皮揲草”酷刑，即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再塞上草，在每个州县均设剥皮亭；朱死时用 46 个妃妾殉葬；其次朱棣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方孝孺一家灭十族，杀 873 人。

中国农民起义杀人不眨眼更是登峰造极。农民暴动历来野蛮残暴至极，对人命和社会生产力均造成极严重的摧残，中共为了迎合马列主义歪理邪说，故意美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汉末黄巢农民暴动杀人 800 万，杀活人充军粮；张献忠杀戮 600 万四川人，亦杀活人充军粮（另说张仅杀人 14 万）。清中叶白莲教农民暴动使中国人口从 1786 年的 39110 万降为 1805 年的 27566 万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 2000 万至一亿人丧生；人口从 1850 年的四亿一千万，降至 1873 年的三亿五百万。仅约一百万可归因于叛乱相关而被杀。1900 年义和团暴乱则滥杀成千上万天主教信徒和外国传教士。

外族的征服杀戮最为惨烈。我在 1984 年即对列宁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论提出批评并指出国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亡国奴由于处于任人宰割，生命毫无保障的境地，故每当外敌入侵全民族必定共同一致对外。

蒙古忽必烈杀汉人 1800 万人，蒙古帝国在中国实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政

策，共杀 7000 多万人。视北宋汉人为三等贱民，南宋汉人则为四等贱民。四川原有 1300 万人，屠杀后仅剩 80 万。满清征服汉族同样实施屠城政策，先杀辽东 300 万汉人，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到济南、南昌、大同、金华、厦门、潮州、广州、赣州、苏州、江阴、昆山、嘉兴、海南、沅江、舟山、湘潭、南雄、汾州、太谷大屠杀。再到四川“全城屠尽”。模式一样：根据清军头领发布的屠城令，实施残忍的群体屠杀，进行群体强暴，还将女性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中国人口从明末 51655458 人下降到 10633326 人。

2.中国当权者的酷刑杀人手段之狠毒残忍堪称世界第一

[5]人类发展总趋势总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有时难免出现历史的倒退复辟。中共暴政正是将中国从文明拉向野蛮的大倒退。中国古代有割鼻、宫刑（阉割男幽闭女）、砍头、砍脚、膻刑（剔膝盖骨）、割耳、烹刑（煮杀）、炮烙、车裂、凌迟（千刀万剐）、五马分尸、腰斩、戮尸、活人殉葬、株连九族。中共在酷刑残忍野蛮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在瑞金苏维埃时[6]：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延安时期[7]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等。令人发指的还有，延安和平医院竟将三个活生生的“反革命分子”做医学解剖！在土改镇反时，中共发明了切西瓜（用铡刀切脑袋）、烤红薯（将人悬空在烈火上烘烤致死）、点天灯（油浸棉花用铅丝紧扎头颅，点火烧至焦头烂额）、拜城隍（逼人赤身裸体在碎玻璃上爬行，至遍体鳞伤而死）、栽大蒜（将人倒捆头埋泥中，缚在木椿上，使之风吹雨淋慢慢窒息而死）、牵黄牛（用铁钩钩住舌头，一边鞭打一边逼供）、拖地雷（将人反捆吊在马后，火烧马尾赶马乱奔，将人活活拖死）、贴广告（将女人强行剥光，钉在墙上示众，直至痛死）等六十余种酷刑。在文革中杀害民众的手段除了传统的枪决、砍头、沉溺、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外，创下了割喉管、用竹筒插入喉咙、电击乳头、火箸插阴道、机枪扫射、榴弹炮轰平整座村庄、挖死者心肝炒了下酒、割人肉烘烤聚餐、活体取肾等灭绝人性的兽行；又创造了强制长期洗脑、强行用精神病药物摧残人的大脑、强行将拖把插入阴道、用牙刷刷阴道、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房、用高压电棍电击头面乳房阴道阴茎及插入肛门电击、党政军医公检法司紧密配合大规模活体割除盗卖心肝肾眼角膜等人体器官等丧尽天良的畜牲不如的野蛮兽行。

中共体制内学者公开承认：中共专制暴政下至少存在 13 种酷刑：一是暴打或重殴。除了拳脚相加外，还经常配以警棍，亦有踢得孕妇流产。二是吊打，即把人捆绑后悬吊起来施以殴打，多次发生致死事件。三是反铐或背铐。最痛苦的是指铐，而且一只手过肩往下，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将两手铐在一起。曾导致人心力衰竭而死。四是火烙。本为古代酷刑，竟被现代沿用。五是烟头烧烫。此法被常常用来加害于女性受害人身体。六是电击。除了用磁石电棒电击致人死亡的案例外，还发现用强紫外线电击器、电击枪电击，并同时施以殴打而致死人的案例。七是用强力灯光近距离照射眼睛。常常致使人视力严重衰退。八是蹲马步或站马桩，也称“开摩托车”。此种中国武术的基本功，竟用于惩罚同胞。九是利用驯犬撕咬。十是利用假枪毙刑讯逼供。十一是利用下流手段进行刑讯逼供。主要表现脱裤拷打，拳打脚踢男女隐私处，或用警棍乱捅或电击男女隐私处。十二

是强喂或强吃脏东西，如人粪、尿之类。亦曾导致人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十三是实施侮辱性的讯问或惩罚。与用下流手法造成身体痛苦不同，此更侧重于侮辱人格的一面。[8]

3. 中共极权暴政的野蛮残暴杀人罪孽

全球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全部是极权暴政，皆犯下了罪不容赦的滔天大罪；中共极权流氓暴政则是共产党暴政中最野蛮残暴，最下流无耻的一个。充分的证据表明，自中共流氓犯罪组织成立迄今，群体屠杀和虐杀了超过一亿中国人。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屠杀约一亿五千万人，其中苏联 2000 万至 4000 万；中国一亿；朝鲜 250 万；越南 150 万；柬埔寨 200 万；阿富汗 180 万；东欧 100 万，非洲 150 万，拉美 20 万，未夺权的共产党 1 万。中共杀人最多也最野蛮残酷，一个对中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滔天杀人大罪的流氓暴政，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存在一天？！

中共犯罪集团自成立始，即不停地杀人抢劫犯罪。自 1920-1949 年至少屠杀中国 2000 万人，而自 1949-2011 年至少屠杀和虐杀 8000 万人。中共流氓集团实质上靠抢劫杀人起家，不但杀地主富人，而且杀红军，新四军及共产党人；不但滥杀“阶级敌人，黑 21 类”，而且杀工农兵学商即中国人民；不但狂杀政治良心人士，而且滥杀宗教信仰人士。下述披露的中共流氓杀人犯罪集团的罪孽仅是冰山之一角。

二、中共夺取政权以前的杀人罪孽

1. 1927-28 年广东海陆丰农会屠杀地主

1927 年-1928 年广东海陆丰农会在共产党人彭拜领导下，用民主恐怖群众大会方式斗争杀害了无数地主。每次斗争会总要杀人，剖腹取心、肝、肉，逼迫地主子女吃亲人的肉，并由大众分享。1931 彭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审判处死刑，他是中国武装农民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但观念则来源于毛泽东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613 年，隋朝因外敌入侵，杨坚皇帝报复敌人，将上千名俘虏屠杀并下令全军将士吃敌人肉。文革中广西省十几个县发生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子女并吃其人肉，炒其心肝等野蛮现象，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政权也发生过吃人肉事件。

2. 1928-29 年井冈山时期共匪杀人十万计。

1928-29 年井冈山时期共匪杀人十万计。毛向部下说，‘我们是特殊的土匪，是世界革命之组成部分’。[1]1928 年 2 月 18 日，毛匪公开处死宁岗县长张开阳，由暴民用梭标捅死；1928 年新年共匪又召开群众大会，当场杀死地主郭伟谦。共匪的残忍、嗜血远远超过土匪，令袁文才和王佐及其手下匪帮甘拜下风皆臣服毛。[2]毛对部下说：‘如果群众不理解什么是‘土豪’，你们可告诉他们它指有钱人或富人。[3]当时中共的政策是‘杀光每个阶级敌人，烧毁他们的家’。口号则是

‘烧、烧、烧！杀、杀、杀！’彭拜是个崇拜列宁的嗜血杀人狂，其创建的海陆丰苏维埃在两个月内杀害了 10000 多人；周恩来在莫斯科中共六大上说“毛泽东的军队含‘部分土匪性质’”。[4]朱德在此政策下率红军洗劫陈州和莱阳，结果引发了一场兵变。1929 年 1 月 14 日，朱毛红军 3000 人离开井冈山时留下一片毁灭的土地。在毛统治的 15 个月期间，毛没有长期的经济计划，故全部靠抢劫维生。当地民众恨死了毛匪共产党，他们经历过土匪和毛共匪的统治，共产党的统治留给民众的仅是仇恨和复仇；在宁岗县，3570 间房屋被红军烧毁，该县人口从 1927 年的 13 万下降至 1949 年的 31000 人。[5]1927 年，朱、毛红军绑架了一个美国天主教神父爱德华（Edward Young）敲榨勒索 2 万美元未果，爱德华逃走，但他的中国信徒被当做人质者被杀害。[6]1934 年 10 月 8 日两名美国传教士夫妇（师达能（John Cornelius Stam）和史文明（Miss Betty Scott））被方志敏红军在安徽旌德县绑架敲榨勒索 2 万美元未果而杀害。[7]

3.1931 年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屠杀罪行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乃是：斯大林 1936 年至 1938 年期间的大恐怖之先导正是 1931 年 11 月 7 日，“九一八”日本侵华事变不到两个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犯下了屠杀 186000 人的罪行（南郭注：依历史学家考证当时江西人被屠杀超过 30 万）；这不包括战死者；依张女士考证毛共使瑞金人口 1931-35 年期间净减 20%，导致 70 万人死亡，其中至少一半是被以阶级敌人罪名被杀害，或累死或自杀，另一半死于战争。1983 年江西省封了 238844 名烈士，这不包括其他四个红区的死亡。江西人恨死了共产党，1949 年第一位苏联情报官员访问江西地区，新抵达的党头告诉他，江西全省没有一个共产党员。[8]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说“没有人梦想北上抗日”。[9]1927-1931 年在江西，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对‘打土豪分田地’的匪徒勒索抢劫或对过重的税负或强征红军某种反抗行为；延安时期中共征税高达 35%，四倍于国统区，当地农民呼喊：“杀死毛泽东！”因德军于 1941 年 6 月进攻苏联，苏联的财政援助大受影响，于是共产党在延安边区大规模种植鸦片并贩毒直到 1945 年，其收入占 26-40%所有的公共岁入。472

红军主要来源：匪徒、乞丐、和尚、雇佣兵、妓女。毛泽东在 1926 年即意图使这批人成为革命的主要部分：毛说“这些人特别勇敢，能战斗，正确引导，他们将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473）（南郭注：红军的来源除了上述之外，还有大量被强迫征来的农民。毛泽东在 1964 年 12 月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坦言：“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4.1930-31 年，清洗 AB 团

1930-1931 年，毛泽东张国涛假清洗 AB 团为名，屠杀近十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和农民。（即 Anti-Bolshevi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刚开始杀了几名地方干部，随后屠杀了 2000 多名红军将士；红二方面军全军被缴械，10000 余名红军将士被屠杀。江西省地方 19 名共产党高干，其中 12 人被罗织“AB 团”罪名杀害，5 人被国民党杀害，1 人病死，最后一人退出革命亡命天涯。（473）[10]

1929年4月-5月，毛指使刘士奇夺江西红军领导权，引起反抗，刘即以AB团为名屠杀了上千名农民和反对刘毛夺权的红军。[11]

1930年12月毛开始整彭德怀军中反对毛的红军将士，先抓人酷刑逼供出其他人，再抓更多人，展开大清洗。

1930年12月7日，毛派李韶九至富田将江西地方领导人及妻子们抓起来全部施加酷刑，剥光她们的衣服后用火楮插入女性阴道，用小刀割乳。[12]红区全区展开新一轮打AB团大清洗，仅在Victory一个县动用了120种酷刑。

1930年12月20日，毛亲自向上海中央汇报称：一个月内在红军中查出4400名AB团成员，大多数杀掉，全部被酷刑。江西数万人被屠杀，仅红军即被杀10000人以上，占当时毛手下1/4红军。远早于斯大林1936-38年期间的大清洗。毛的湖南同乡刘敌将军因不忍同志间相互残杀因而起义反抗，逮捕毛委派的亲信李韶九等人后，向共党中央汇报了毛泽东假公济私滥杀红军将士的罪行，要求上级公正处理，结果反而被共党中央骗缴枪械后与部下一道被杀，毛不仅滥杀政敌，而且逼迫其他人手上沾血，令朱德审判刘敌并处死之[13]。

福建红军于1930年7月也发生反毛泽东的兵变，数千人被屠杀，中共官方承认屠杀了6352人。中共敲榨勒索无恶不作，红军军长龚楚证实一家读书人父子三人被拘，勒索250元，家人东借西凑了120元加上妇女珠宝手，结果父亲仍被吊死，儿子皆被杀害；但共产党却逼迫家人再交500元！龚楚1954年在香港出版回忆录，杨尚昆私下对少数人说，龚楚的回忆录是真实的。[14]

中共逃跑前周恩来下令将出身不好的不可靠的红军将士，伤兵统统在撤走前干掉，数千人被屠杀，军校大多数教官（被俘前国军军官）被杀害。刑场设在封闭的山谷里，行刑人用大刀把头砍掉，然后一脚把尸体踢进事先挖好的大坑里。有的让将死者自己挖坑，然后活埋。[15]

张国涛在湘西根据地以打AB团为名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据高华之《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披露“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等多种刑法，被打者“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被害人“哭声震天，不绝于耳，残酷严刑无所不用其极”。李白芳、马铭、周冕的妻子来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被施以酷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在惨酷的刑讯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万邦、刘敌、周冕、马铭等“是AB团首领，并供出红军学校有大批AB团”。对于这次刑讯逼供，萧克将军在1982年曾回忆道，“即便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能不令人惨然一叹。我们这些‘过来人’也觉不堪回首”。徐向前说张对阻挡他的人，毫不犹豫干掉，以建立他个人的统治。[16]①贺龙1932-34年在湖南湖北根据地也进行了大清洗，贺龙自己1961年承认至少一万红军被杀；许多人被绑石块沉入洪湖。[17]据称当年胡耀邦亦因读过高中系红军中的[知识分子]差点被当作AB团杀头，这大概是他后来大力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前因。

[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 52.

[2]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 54.

[3]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 56.

[4]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 60.

[5]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 62-65.

[6] Father Young's Own Story (typescript 1927) id. 1929. pp. 890-8; Mandate Against Rev. Edward Young signed by Zhu De Soviet Delegate of Mao Tse Tung CIncetian Achive Rome.

See Jung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2005. P. 84n.

[7] 《开放》2010年第8期第7页。

[8]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109.

[9]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128

[10] 《共产主义黑皮书》郭国汀译，第473页

[1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91.

[12]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92-93.

[13]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95-96.

[14]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107.

[15]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128

[16]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143

[17]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 KnopfNew York. 2005. P. 180

5.中共为党内争权历来不择手段自相残杀没有任何道德底线

与所有共产党一样，中共同样是靠秘密特务警察起家。1928年4月周恩来建立中共第一个秘密情报系统，首任负责人是陈赓。陈与顾顺章一道曾在苏联学习暗杀术，曾破获朱德前妻何芝华拟用350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名单换取五千银元和一本外国护照的秘密。随即陈与顾顺章等共特袭击杀害睡梦中的何夫妇，但何芝华仅受伤未死，后逃回四川隐名埋姓了此一生。

1931年4月25日，顾顺章被捕后叛变（顾原系上海青邦的一个头目），供出大量中共最高机密，若非陈赓事先秘密安排打入国民党政府心脏的李克农和钱壮飞两位高级特工，中共中央极可能因顾顺章的叛变被一网打尽。因此，周恩来下令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全部干掉，包括顾妻和未成年的儿子、妻母、妻妹、妹夫；尽管除了顾的儿子外，他们全是中共特情人员，没有任何人有任何叛变意图。而执行暗杀任务者正是康生。[1]

1931年1月17日康生为巴结王明，在上海出卖中共高干何孟雄等2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并出卖了左联五君子，导致他们全部被国民党当局判死刑。吴冰书（Wu Bingshu）原国民党军统特务头目之一，1949年被中共逮捕，于1967年披露了出卖何孟雄等中共地下党员及上海左联五君子者正是康生。另一名原28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王云诚（Wang Yuncheng）1933年加入军统，1949年被中共逮捕，他于1933年2月24日写过一份报告称：“在中共党内派别争斗中，共产党使用暗杀和披露秘密手段，诸如何孟雄和他的20余名同党，均死于赵容的红色恐怖之手”（‘赵容’是康生1930年代在上海的化名）。[2]

6.1935-36年毛在陕北根据地杀刘志丹红军

毛逃到陕北后干的第一件事便是大清洗刘志丹的陕北红军，逮捕酷刑，活埋，然后毛装作无者解救他们，下令释放刘志丹，停止屠杀，并处分了两分替罪羊，达到两个目的：清洗恐赫了刘的陕北红军，树威。刘部至少300人死于非命。[3]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被毛秘令在战斗中由其警卫枪杀。他死时身边只有两人，一是中国克格勃，各种证据强烈指向毛泽东杀害了刘志丹；随后数周，刘的两名副手杨奇和杨森分别被杀害。[4]

7.1936年毛泽东借刀杀张国涛的红四军至少六万人

1936年毛泽东借刀杀张国涛的红四军至少六万人。张国涛原有八万人，被毛故意搞掉四万人后，于1936年10月抵达延安，尽管仍比毛多一半人，仅获低级无实权的职位，毛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消灭张的军队。派其精锐去打通往内蒙的通路，被国军打败后，21800人被阻隔在黄河以北，毛即令这支红军前往1500公里以外的新疆接收苏联武器。实则借机消灭之。毛故意发相互矛盾的指令，令其无所适从。1937年2月初，被困在沙漠的西路军无法坚持多久，反复电告要求返回延安，毛却电令他们“就地待命，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流尽最后一粒血”！[5]3月中旬张国涛原先的主力部队终于被毛搞得全军复没。1000人被活埋，2000女兵被强奸，有些被酷刑后杀害，其余被卖为奴隶，仅400余人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回到延安，但随即被毛全部活埋！[6]活埋的命令来自高岗，但肯定是受毛的命令。后来张国涛因不堪忍受毛的迫害愤而出走武汉，在试图说服王明，博古，周恩来和项英撤掉毛未果后，大失所望而投向国民党，毛又趁机将张国涛原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大批屠杀，至少活埋200人。[7]

8.1940-43年在抗日战争岁月中杀抗日国军将士数万人

1940年-43年毛共匪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杀抗日国军将士数万人！1940年2月22日，毛电莫斯科称：“在与蒋军作战中，胜利总是属于我方，我们在河北消灭了国军6000人；在陕西消灭国军10000人。”斯大林未制止毛共军的行动，相反，三天后斯大林授权每月给中共30万美元。[8]新四军不但拒不执行命令，反而对国军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10月在江苏黄桥消灭国军11000人，杀害两名国军将军。[9]俄国驻延安克格勃头子报告称“1943年夏天，共军与日军合作，在山东省消灭了国军。[10]

9.1940-41年，借刀杀害项英和新四军数千人。

1940年12月-41年1月，毛泽东借刀杀害项英和新四军数千人。由于项英反对毛大杀AB团，毛想把项英当成AB团杀掉；项英曾警告中央不要带毛长征，他会搞阴谋诡计夺权，项英公开批评毛有时嘲讽毛。[11]毛于12月指令项英过江苏北移。新四军北移有两条路可走。最短的是北上，第二条路是东南方向过长江。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第三次电令新四军走北线北移，毛于29日向蒋确认，次日，毛突然要项英走东南路，毛未告诉蒋改路，故蒋一直以为新四军走约定的北线，1941年1月3日蒋电项英：“我已命令沿线军队确保你们的安全”。项英立即电复他将不走蒋指定的北线而走东南线。但这份关键的电报，从未发给蒋，由于毛禁止所有共军将领直接与蒋介石联系，全部必须通过毛本人转发。项英通过毛转发蒋，而毛故意扣发了该电。故项英1月4日按毛指定的东南线走而不知道蒋从未收到变更路线的电报。1月13日，九天后当新四军业已大量伤亡时，毛电周恩来，“我发给你的项至蒋的电报，若还未转请别呈交，因用辞不当”。表明此前毛从未转发蒋。[12]苏联在西方发起反蒋宣传称新四军被消灭了一万人，而实际上仅死二千人。另二千人转走北线安抵江北。宛南事变是毛想挑动苏联支持他

与蒋争权，同时借机消灭政敌项英。1941年4月13日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使得日本得以抽调兵力南下太平洋，最后袭击珍珠港。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毛的靠山此时自顾无瑕，毛才下收手令“立即停止攻击所有国民党军队。”[13]

10.1942-45 年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 1942-1945 年 5 月展开三年多的洗脑运动，通过抓特务，精神肉体酷刑，强制自我批评，相互揭发，使大批天真爱国青年学生变成没有独立思想的机器人[14]。煽动阶级仇恨，恨蒋，恨国民党，成为毛共夺权的工具。王实味因公开批评中共搞特权而被毛康下令砍头。毛和康生指示金医生毒杀王明。[15]延安医院经康生授权杀害三名反革命制作人体标本。[16]

1942-1945 年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毛泽东与王明苏联国际派争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及用精神洗脑术绑架天真无知青年继续革命。首先是 2 个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开批斗大会斗争丁玲、王实味，再任意逮捕酷刑逼供自承是特务。叶飞将军说：“我们杀了很多叛徒，所以人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走革命道路”。475

11.1945-49 年发动四年内战杀害国军和平民 2000 万人

日本投降当天毛共发动四年内战杀害国军和平民 2000 万人。1945 年 8 月 9 日子夜，在 4600 公里长的战线上 150 万苏联红军和蒙古大军大举进入中国，早在 4 月毛已下令靠近俄国边界的共军作好准备，配合苏军入侵。毛夜以继日调兵遣将布署共军进军东北。[17]苏军一直推进到距满洲边境 750 公里远内蒙古包头，在苏军帮助下，共军占领了察哈尔和交合省大部，包括两省省会张家口和承德。毛说“如果我们占有满洲，我们的胜利就有了保障”。[18]下令进攻国军，当他在重庆时，毛行前电令八路军指挥官们：“恨恨地打，你们打的越好，我就越安全”。当闻知上党战役胜利后，毛喊到：“很好！战越大，胜利越大，我就越有希望返回”。毛两度在重庆当众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但这仅是毛的谎言，毛自己想要中国，他知道他唯一能实现这一愿望者是通过内战。[19]毛 10 月 11 日一返回延安，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拒蒋军于满洲外。林彪被任命为东北红军总司令，成万干部（领导人由苏联飞机）在 9 月中旬已秘送至东北。[20]

12.1948 年围困长春之战饿死长春市民 16 万

1948 年 5 月-10 月中共围困长春之战故意饿死长春 16 万市民[22]。1948 年 5 月 30 日，毛指令林彪“将长春变成一座死城”。林彪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称：“我之对策主要是禁止通行，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郑洞国将军决不投降，拟清空城市平民，因长春存粮有限。林彪则严厉禁止平民离开长春。直到 9 月 11 日林彪经请示毛没有回答后，才下令立即释放长春平民。但是该命令未能得以执行，显然被毛制止。五个月的围困，长春人口从原来的 50 万，下降成 17 万。[23]共军将军苏玉说，这种以饥饿平民的长春模式在许多城市重复使用。

[1]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 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RChin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Tokyo Sydney Singapore1992)p.104

[2] John Byron and Robert Pack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 the Evil Genius behind Mao and His Legacy of Terror in PRChin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Tokyo Sydney Simgapore1992)Pp.86-88, 96。

[3]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171-72

[4]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173-74

[5]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10-11

[6]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11

[7]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13

[8] Mao report22 Feb. 1940. Titov Vol. pp.412-14. Money to Mao:Dimitrov23 Feb. 1940.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21.

[9]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24

[10] Our Party' s tactic:Sima Lu 1952. P.210-11. Why Japan left Reds in Peace: Interview with Prince Mikasa. 2 Mar. 1998.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22D

[1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27

[12]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28

[13]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37

[14]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37

[15]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46

[16]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44

[17]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82

[18]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84

[19]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86

[20]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86

[2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299

[22] 段克文，《共军围困长春饿死16万民众》转摘自郑义编着《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161-168页。

[23]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313

三、中共建政后的滥杀罪孽

1.1949-51年土改运动

中共屠杀了200万至500万人。另有400万至600万人被劳改；1950年初，中国有2000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分子。土改的真实目的主要在于政治和经济，最后才是社会的原因。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便是土地革。毛泽东说：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理论上，土地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实践中则乡一级大量杀人；土地时杀地主无需定罪，只需地主身份便足已杀头，杀害地主约200万人。土改实质是中共对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规模公然杀人抢劫。其根源则是马克思主义之消灭私有财产制。

2.1949-52年“镇反运动”。

所有的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皆大杀旧政权党政军政文教人员，苏联斯大林是在夺取政权近二十年后（1934-36）才开始大清洗，毛泽东则借抗美援朝之机大开杀戒滥杀无辜。直至1951年2月21日才颁布《镇压反革命暂行条例》却溯及既往并适用类推，旨在消灭前政权党政军行政文教人员，至少71万人被屠杀，数十万人自杀，另有近300万人被关押拘禁。中共自称消灭了200万土匪。毛泽东说“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但毛泽东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承认杀了100万人。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一份报告称：“共杀反革命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管制了1200000。”公安部长罗瑞估算则是杀了400万人（南郭注：另有中共镇反屠杀了600万人之说）。例如，1951年4月25日，广州市各界群众3万余人，在中山纪念堂（包括纪念堂外草坪分会场）举行公审反革命大会，会后枪决了反革命分子198人。

毛泽东亲自指示镇压反革命，各省区滥杀无辜缴功请赏：

-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指示：湘西准备继续处决反革命‘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新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地主威风还没有打下来，一贯道甚为猖獗’。

- 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批示：‘在上海，今年要处决一二千人，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南京春季争取处决一二百人’；

- 1951年1月22日毛泽东电告华南分局广东负责人称：“你们已杀了3700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

- 1951年2月中共中央讨论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毛泽东指示上海和南京负责人：“上海是有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我认为年内至少应杀三千人。上半年至少应杀1500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 早在1950年全国各地便已展开滥杀，例如：1950年4月27-28日，仅上海逮捕至少10000人（按国民党的报导是25000至30000人）；从1950年4月27日至5月31日，上海逮捕了300000人；而枪决人数：1950年4月29日南京376人；

1950年4月30日杭州市50人，上海293人；1950年5月6日上海32人，苏州40人；1950年5月23日北京221人；1950年5月31日上海208人；按周恩来报的数字是：广东一省在1950年10个月内，共逮捕89701人，其中枪决28332人。[1]

- 1951年2月17日，北京一夜之间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公开处决58人；3月7日逮捕1050人；3月25日枪决199人。天津市3月已处决150人，计划再处决1500人；毛对此高度赞赏转发各地：“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还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镇反计划，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上海市委随即报告中央：“上海决心在已经捕了1068人，处死100余人的基础上放手捕10000人，杀3000，关4000，管3000。”。4月27日，上海一举逮捕8359人，4月30日一天处决284人，5月9日再杀28人，6月15日再杀284人，此后每隔数日即枪决一批，少则20-30人，多则150人。

- 4月22日，毛泽东借公安部的报告，公开表扬北京一天处决200名反革命

‘杀得好’，说‘这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政府要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

- 1951年5月，两广地区业已逮捕188679人，处决了57032人；其中广东省仅4月间便处决10488人；

- 至1951年4月底，华东共捕反革命358000余人，处决108400余人；到10月统计数字增加至逮捕反革命468385人，杀139435人。

- 中南地区至5月中旬业已处决近200000人；毛泽东于1951年4月20日至电中央局书记：“2月中央会议决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千分之一，个别地方已超出。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才能解决问题。我看可以超过千分之一，但不要超过太多，不要规定一般以千分之二为标准。应将许多犯人从事生产。是一批很大的生产力”。“贵州省要求杀千分之三，我觉得贵州已杀13000人，可允许再杀一万多一点。”

- 川西区委1950年11月处决反革命1188人，12月杀942人，1951年1月杀1309人，2月杀3030人，3月杀1076人，4月杀844人，5-6月再杀403人。

- 中共中央于1951年5月底公布已捕150万人，已杀50万人。饶漱石报告中央称：华东在押26万犯人，年内至少再杀3万人。

- 1951年11月至1952年8月，各地又进行了新一轮镇反运动。仅华东地区新逮捕71128人，处决10727人；而还进一步准备第三阶段的镇反，要求再捕55000人，再杀12279人。

- 江西省第一期杀17699人，关26232人，管20091人；第二期杀7402人，关5954人，管14013人另自杀和病亡767人；第三期杀1019人，关13697人，管4985人。合计杀25588人。

- 福建省则创造了杀人超过0.24%^[2]

3.1951-52年 “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4月30日“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与1952年5月“五反”运动（反行贿，反欺诈，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非法获取国家经济情报），不少资本家被逼自杀。上海市长陈毅据说每天早上让下属汇报又多空少“空降兵”（即资本家被逼跳楼自杀）薄一波称：仅在七个大城市对45万家工厂进行了检查，76%存在违法现象。

4.1951年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首先在北京大学展开，随后波及全国大中专院校，旨在强制洗脑，阉割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1950年12月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年10月日批判梁漱溟；1951年12月批判胡适；1953年1月批判俞平伯《评红楼梦》；

5.1950年开始迫害各种宗教。

“一贯道”信徒几乎被灭绝。许多天主教教会领导人被判20年以上重刑。1950

年中国还有 5500 名外国天主教神父，4000 余名新教牧师，至 1955 年仅剩下数十人。1955 年 20000 名教徒被捕，随后 20 年内几十万名教徒被捕。直至今日迫害家庭教会信众。

6.1954 年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

1954 年 2 月，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案牵连数千名党政军干部，大量被判刑，劳教或开除公职。

7.1955 年肃反运动

1955 年肃反运动，清洗暗藏在政府机关军队及学校中的反革命。81000 至 770000 人被捕或处死。

8.1955 年反胡风运动

1955 年 1 月反胡风运动。胡风 1954 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和胡风只通过一次平常的信件，对胡风的某个作品只表达了喜爱，都会被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胡风家乡湖北蕲春全县的语文教师，都被停职反省一年，要求他们交代与胡风的关系。胡风反革命集团牵连 7300 余人被捕，人民日报头版称：10%的党员是叛徒。

9.1957 年反右运动。

因 1956 年匈牙利暴发反抗共产极权暴政的武装起义，被苏军残酷镇压，加之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迫害党内同志残暴野蛮有所揭露。毛泽东先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诱导国人向中共提意见，以显其“宽大虚心”，由于中共建政短短几年即造孽深重，工农商学各界批评意见汹涌如潮，毛眼看无法收拾，干脆公然耍流氓以所谓“阳谋”，将中国敢言正直知识分子一网打尽。邓小平是中共反右运动实际执行人，也是最积极死硬到底的反右干将，至死从未对其深重罪孽有过任何忏悔，拒绝赔偿右派受害者分文，最终拒绝为六位右派平反。中共迄今称共 554000 人被打成右派。依最新解密档案研究显示：实际打成右派与中右的中国知识分子高达 461 万人。其中右派 3178470 人，中右 1437562 人。[1]右派被清洗出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学术领域长达 20 年，数十万人死于非命，大多数被强制劳教，有些被判刑劳改，至少几十名大学生右派被以反革命罪处死刑，仅北京大学确认有 8 名右派学生被处决。许多人在随后的大饥荒年月因饥饿和过度劳累而丧生。

- 1957 年反右斗争四川省抓了十多万右派，仅四川大学就有五百多名学生被打成右派，物理系女学生冯元春还被杀掉。

- 八个中国“民主党派”受到了严重打击。如民盟中央负责人有 58 名被打成右派。民建的 154 名中央委员中有 28 名右派，占百分之 18，2 万 4 千多名成员中，

右派有 3,100 名，占百分之 13。九三学社成员 6,000 多，右派有 440 多名，占百分之 7。[2]

• 仅 1957 年的北京大學，師生有 1500 人因“反右”蒙受不白之冤，多被開除公職與學籍，發配窮山惡水、荒原大漠亡命了之；

• 不少右派学生随后在文革高潮及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杀害：[3]

1. 黃宗羲（北大学生 1957 年打成右派 1958 年被枪决，他极可能是第一个被枪杀的右派学生）

2. 林昭（彭令昭 1957 年在北大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 年因参与编《星火杂志》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名判处 20 年徒刑；1968 年 4 月 29 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母还被要求支付 5 角人民币子弹费！）；

3. 刘文辉（1957 年工人右派 1967 年 3 月 23 日因批判文革十六条以反革罪处死，他系文革被杀害的第一人，其亲人也被责令补交子弹费人民币 5 角！）

4. 柳有新、彭振邦、陳霖、尤詠仁、楊望義、張鵬宏（前述七人 1968 年 4 月 27 日在上海被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处决；同时被判无期和有期徒刑的三名反革命名字无可考）

5. 顾文选（北大学生 1957 年成右派并判刑 5 年，1970 年 3 月 5 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6. 张春元（北大学生，1957 年打成右派因《星火杂志》被判无期徒刑，后于 1968 年处死）；

7. 杜映华（大学生右派，因《星火杂志》判刑五年，1968 年处死）；

8. 沈元（1957 年北大学生右派，1970 年 3 月 5 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9. 張錫琨（北大化學系学生 1957 年成右派，1977 年因越狱被枪决）；

10. 任大熊（北大教师 1957 年右派，1970 年以反革命罪处死）；

11. 黃中奇（北大哲學系学生 1957 年成右派文革中被反革命罪处死）；

12. 刘奇弟（北大学生 1957 年打成右派，1961 年遭吊打冻饿而殒毙狱中）；韓其慧（北大学生 1957 年打成右派发配西北死于斯）；

13. 陸魯山（北京工業大學学生 1957 年右派文革中企圖偷越國境以反革命罪处死）；

14. 姚祖彝（外貿部的英文翻譯 1957 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5. 王桐竹（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的俄文翻譯 1957 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6. 孫本喬（北京農機學院学生 1957 年右派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处死）；

17. 朱守忠（1957 年在寧夏被劃成右派，1970 年 2 月 21 日被以反革命罪槍斃）；

18. 冯元春，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因反右运动中批判毛泽东，1957 年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处徒刑 20 年。入狱后不屈服，经常上诉，文革高呼“打倒独裁暴君毛泽东！” 1968 年被杀于南充監獄，据说死得比张志新还惨；

19. 周鸿东（1970 年 3 月 5 日与顾文选同以反革命罪处死）

20. 田樹雲、孫秀珍、朱章濤、王文滿（皆为宁夏大学生右派，1970 年 3 月 5 日同时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21. 周居正（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58 年因组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处死刑）；

22. 吴文懿（昆明师范学院学生之所以划为右派，因为要求公开组建中国大同党被枪杀）、

23. 陆兰秀（1966 年以反革命罪被捕 1970 年 7 月 4 日处死）、

24. 蔡铁根（1957年以老红军，大校级教授右派，1970年3月11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25. 舒赛、马绵珍（1970年一打三反被捕，5月10日枪决）；

26. 徐关增（1957年右派，在劳改农场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联盟」和「科学共产主义」于1970年处决）；

27. 刘世广（清华大学学生1957年右派，1958年处13年徒刑，1970年处决）马维崎、孙宝琮十三人被定为「首犯」和「主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8. 张师亮甘肃师范大学教授七〇年月三月十七日死刑；

29. 朱守中，原上海师范学校副校长，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出党，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被枪杀。

30. 王希贞，浙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31. 吴述森、吴述樟、鲁志立（皆为宁夏大学毕业生，因办“共产主义自修大学”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曼宜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

32. 吴晓飞，1970年2月17日，二十二岁时被枪决。因写两篇论文论及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33. 刘勇，因撰文说「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这句话是错误的，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这样一搞，实际上把毛主席搞成偶像了。」为此于1970年被处死刑，惨遭杀害。

34. 谢洪水、谢永祺等十九人，因组建福建省「中国共产党幸福委员会」于1970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谢百添、谢寻兴在劳改营中继续为刘少奇辩护，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执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杀身亡，八人被打伤致死。有的人被枪毙后，妻子、母亲也被逼自杀身亡。

35. 毛应星，甘肃静宁县农牧站女技术员，1957年在兰州农业学校被打成右派。在夹边沟劳改农场「劳教」后到静宁县。文革中她议论「现在就是有一些奉承的小人，将毛主席包围了」等，又被判五年徒刑，但1970年4月3日甘肃省革委会讨论她的案件时，由于她的哥哥在美国，省委负责人说了一句「杀！很坏，家庭是反动的。」1970年4月12日被枪杀。

36. 方运孚，建设银行重庆分行，因谈论「刘少奇是对的。他主张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刘少奇打倒了，但这些主张打不倒。」「彭老总的万言书将与日月同光辉，千秋万代受人崇拜。」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公安局曾拒受银行革委会报捕的要求。可是「一打三反」，公安局为配合运动，将他收捕。经办者拟判十五年，报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最后经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改成了死刑！十天上诉期未滿，他便被枪杀。时为1970年3月。

37. 张九龙，（湖南大学生右派，1970年3月一打三反中被枪杀；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运动前原判决为「死缓」的政治犯全部从劳改农场拉出，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据著名学者杨曦光回忆：「我在劳改队，亲眼看到了五十多个从未有犯罪行为 and 暴力行动的政治犯被处决。」

38. 陈克礼，1957 年右派，文革开始后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文革，认为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的道路。被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一打三反”运动中 1970 年 7 月 5 日被枪杀。

39. 遇罗克（因《出身论》1970 年 3 月 5 日被周恩来亲自下令以反革命罪枪杀）。

40. 王申酉（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 1977 年 4 月 27 日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

41. 胡懋峰（在獄中組織「孫文讀書會」研讀世界名著，批判文革。為人告發，也被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于 1968 年槍殺）。

42. 李九莲（因给男朋友的私信中不满文革及毛泽东被出卖，以反革命罪于 1977 年 12 月 14 日处死，遗体拒绝亲属收尸被弃荒野，后被精神病人割去阴户及双乳）

43.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报不平，被捕，在狱中高喊“打倒华国峰”！被以反革命罪处死刑，1978 年 4 月 30 日处死，刑前被活体取肾）；

44. 史云峰（1976 年 12 月 19 日以反革命罪处死）。

45. 陆锦碧，一九六九年写万言书，批评反胡风和反右派是违宪行为，三面红旗是主观唯心主义，彭德怀案说明党内缺乏民主，《炮打司令部》是公然制造党的分裂，发动内战。并提出恢复民主党派合法地位，废除文字狱，建立国家赔偿制度，加强法制建设，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取消奴化教育，实行教授治校，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农村实行三自一包，缩小剪刀差，改善农民生活，精简机构，减少军队，减少对外援助，发展对外贸易，抛弃闭关锁国，改善中美中苏关系，争取早日进入联合国等治国政见，在一九七一年冬天被西宁市公安军管会一审判处死刑。

10.1958 年大跃进运动。

史称“三面红旗”（南郭注：即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跃进。毛泽东当年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大会，因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 15 年内赶上美国，毛泽东未经与任何人商量，立即也提出中国要在 15 年内赶上英国。毛回国后，头脑越加发热，超英赶美成为报纸热门标题，期限则一再缩短，最后缩为两年内赶上英国！因此，全国党政军工农商学各行各业，全民土高炉大炼钢铁，砍掉无数原始森林充燃料，同时任何木料，连门窗甚至棺材板也均化作燃料；全面收缴金属工具炼钢铁，甚至连锅碗勺也熔化为废铁充数。自留地和农村集会全部取消，公社大办公共食堂）。深翻土地三尺，秘植，消灭麻雀，大建劣质大型水利工程；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 60000 人中有 10000 多人累死；所有的农业之血均输向工业；1958 年全国新招收工人 2100 万人。

11.1959 年反右倾机会主义翻案运动。

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案。因此全国两千万人受株连迫害，数十万党政军干部受牵连被判刑，劳改劳教开除。

12.1958年-1961年中共故意谋杀性质的大饥荒。

几乎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皆由于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原因导致人为大饥荒（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因而此三国也未发生过大饥荒）。三年饿死人数在 2000 万至 4660 万之间，2000 万是 1988 年以后中共官方的数字。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饥荒。第二大者是 1887-1888 年中国北方饿死 900 万-1300 万人；再次是 1932-1934 年苏联饿死 600 万人。1957-1961 年，48%的猪，30%的家畜被屠杀。甘肃省直到 1962 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也饿死近 70 万人。（495）

•（南郭注：大饥荒死人数量有如下几种说法：中共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估计“当时饿死的人数在 4300 万 4600 万之间；张戎女士在其《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认为：“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根据人口学家杨子慧编著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1995 年版），1958 到 1961 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2%，1.45%，4.34%，2.38%。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 1.03%（1957：1.08%，1962 年，1%，1963 年，1%）。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 3767 万。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 1961 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1]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有四千万。”杨继绳先生在其《墓碑》中考证为 3800 万；金辉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社会》月刊（1993 年 4-5 月合刊）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 4040 万至 4319 万之间。1996 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三千万人因饥饿致死。）

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河南信阳地区 1959 年秋，至少 10000 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 800 人！28000 农民受到各种惩罚；（493）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 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13.中共的劳改和劳教。

中共强制犯人象奴隶般地劳作创汇，张林先生的《悲怆的灵魂》对此有非常详细令人信服的真实描述。中共的劳改劳教场所实质上犹如人间地狱。刘晓波先生在被中共无罪重判之际，却莫名其妙为中共流氓暴政的监狱大唱颂歌！至 1980 年，至少 5000 万人被劳改另有数量不详的人被劳教。1959-1962 年期间，犯人死亡 400 万以上；1955 年以前监狱犯人 80%是政治犯；1960 年初政治犯仍占 50%，至 1971 年政治犯仍占 33%。劳改劳教，留场就业，直到 1960 年代，95%的所有劳改犯在刑期执行完毕后，皆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至 1980 年仍有 50%的刑满犯人留场就业。加上 20-30%的在劳教人员。因此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判刑实质上等于终身判决。（500）

1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1976）

(1)文革实质是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毁灭性破坏

文化大革命实质乃是中共对传统文化文明道德伦理文化的毁灭性破坏。起因乃是毛泽东为一己承传权力于至亲之私，同时掩耳盗铃般为己之极度无知狂妄所造深重罪孽涂脂抹粉，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包装，对中国人民犯下罪不容赦滔天大罪[1]。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有反知识的传统。毛尤其典型。毛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大学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而非培养专家，应向所有贫下中农子弟开放。文革破四旧，即旧观念、旧文化、旧习俗、旧传统；砸烂一切封资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造反派均自认为是保卫毛泽东的红卫兵，他们几乎未受过民主或自由观念的影响。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至1979年期间，华国锋当政几乎未取得任何成就，未触动极权主义的任何东西。

(2)文革到底多少人死于非命

法国学者 Jean-Louis Margolin 在《共产主义黑皮书》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致死多数作者引证在 40 万人至 100 万之间”。[2]（南郭注：R. J. Rummel 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 773 万人。1980 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人。”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中共官方过去的说辞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陷、迫害的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文革相关数据是：420 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 余人死亡；135000 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 237000 人；703 万人伤残；71200 余家庭整个被毁”。学者丁抒认为文革杀人在 200 万以上；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在 170 万以上）。文革非正常死因分为三大块：一是迫害致死，约 20 万人被迫自杀。仅陕西一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有 2000 多人；二是因武斗而死，约 50 万人死于非命；三是因清理阶级队伍而亡，约 50 万人死亡；四是冤假错案致死，约 15-20 万人死亡；此外还有因红色恐怖被杀，至少 10 万以上属于此类。1200 名军人被清洗枪决；刘少奇案涉及 22000 人被调查，拘押；文革期间 300 万至 1800 万干部被关入监狱牛棚；其中包括 40 万军人，知识分子中有 142000 名教师，53000 名科学家和技术员，500 名医学院教师，2600 名艺术家和作家入狱；其中许多人被杀或自杀。上海官方 1978 年承认，10000 人因文革致死。

• 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3)毛泽东是文革的罪魁祸首

•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对胡志明说：“这次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中小学”。

• 1966年6月初红卫兵打人事件刚开始盛行，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传达毛泽东“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亦即“红色恐怖”的由来。

• 1966年8月22日，毛泽东亲自批转《严厉禁止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 1966年6月中旬毛泽东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代表宋任穷之女宋彬彬时说“要武嘛”。宋随即改名“宋要武”。

•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说：“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战斗中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武斗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恩来解释说：“名义是抢枪，实际上是发枪。”

• 王友琴博士据中共内部报告确认北京1968年8月20日到9月底，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打死1772人；114600户被抄家，84000户被驱出北京；上海150000户被抄家，32吨黄金被抢；上海市郊川沙县8700户被抄家；浙江嵊县8000余户被抄家；武汉21000户财产被抢劫，32人被打死；62人自杀；全国城镇被抄家总数近1000万户。

• 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谭宗级的《“五一六通知”评析》称：“仅北京市的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狱而死的即达九千八百零四人”。1967年11月，中央文革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仅上海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高潮时，5,449人被迫害致死，审查的有17万人。

(5) 1966年北京市大兴县群体屠杀黑五类。

首开文革滥杀黑五类及其子女的先例。1966年8月26日县公安局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指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谢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公安局就好了”“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随后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黑五类（南郭注：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而红五类则指党的干部、军官、贫农、工人和革命烈士)及其家属 325 人, 22 户被杀绝, 最老的 80 岁, 最小的仅 38 天! [3]

(6) 1967 年青海省西宁解放军枪杀 170 名青年事件。

首创军队屠杀平民的先例。1967 年 1 月 23 日毛泽东批示安徽省军区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应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1 月 28 日中央军委发布《八条命令》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于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2 月上旬,毛泽东又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1967 年 2 月 23 日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独立团计 13 个连军人包围青海日报社,开枪打死 169 人,伤 178 人,逮捕群众近万人。这是文革中军人杀人第一例。[4]

(7)1967 年湖南省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

1967 年 8 月湖南省道县群体屠杀黑五类事件。据 1984 年 5 月抽调 1389 名干部组成的《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确认:“道县杀人事件,从 1967 年 8 月 13 日到 10 月 17 日,历时 66 天,涉及 10 个区,36 个公社,468 个大队,1590 个生产队,2778 户,共死亡 4519 人,其中被杀 4193 人,逼迫自杀 326 人。据道县检察长阎维胜调查,确切数字是打死 20000 人,伤者不计其数。”“道县地区文革死亡人数 9093 人,其中四类分子 3576 人,因类分子子女 4057 人。未成年人 826 人,年纪最大的 78 岁,最小的才 10 天。”其杀人决定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任意决定。[1]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因学校停课而回家结果与父亲蒋勋(原道县一中校长)和哥哥一道被贫下中农杀害。起因乃是:1967 年 8 月 5 日在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总结会议上,县委副书记熊炳恩作报告:“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教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斗。”8 月 8 日“革联”冲击县武装部抢走一批武器弹药。

• 上海市王洪文 1967 年二月夺权后,于 4 月 27 日将造反派头目处死并当场杀掉。张春桥于 7 月说:“如果少数人被错杀,这无关大局,但是让任何真正的罪犯逃脱将造成大灾难。”

(8)1968 年湖南省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1968 年 5 月湖南省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何清涟女士曾撰文称:“邵阳市境内的资江河中每天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延续了半个月左右。”“杀人方式花样翻新: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将煮饭用的铁锅烧红后罩在被害人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不过,可能何女士对具体时间可能记忆有误,因为湖南道县大屠杀发生于 1967 年 8 月至 10 月间,既非 1968 年也非 5 月间。[2]1980 年 12 月 22 日胡耀邦视查中南五省专程前往湖南

零陵地区听取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并指示：“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1982年春最高法院院长江华返乡，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杀人事件，江问道：“你们道县有多少和尚？”“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无天”。他的堂弟也在该屠杀事件中丧生。

(9)1968年江西省瑞金县屠杀黑五类。

有个公社将三查对象集中，令其在山上挖树洞，随后用铁锄锄死推进树洞埋掉，全县有300余名黑五类被以此种方式谋杀。

(10)1968年江西省兴国县屠宰黑五类。

在“三查”运动中该县杀了黑五类及其子女共270余名。

(11)广西自治区八个县大规模吃人事件。

中共官方承认至少有137人，大多数是老师，校长，在当地干部和党组织操控下被活吃。（南郭注：正如纳粹的种族清洗犹太人一样，中共以阶级清洗即消灭黑五类，不是以他们的行为，而是依他们的身份任意处死。郑义先生在《红色纪念碑》中说他曾三次亲自前往广西调查取证，证实广西省数十个县在文革期间曾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吃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恶性事件，被活吃人数至少在3000人以上。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确认：武宣县、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均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蛮事件。仅广西武宣县自1968年6月15日至8月底被吃者100多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一人，挖心肝56人，割生殖器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18人，活割生剖7人；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全被吃掉；[6]在武宣中学，学生批斗完老师，校长后，就地架起炉灶将老师剖腹割肉煮熟分食。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7]桐玲中学副校长黄家冯于1968年7月1日晚被批斗致死，次日晨被挖肝剥肉，只剩下一副骨架。接著一批人在学校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180人，其中刘维秀和刘家锦等人，打死刘振坚后；轮奸其未满17岁的女儿，然后打死，剖腹取肝，切乳割阴。[8]）

(12)1970“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1967年1月13日聯名發出的《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簡稱“公安六條”）第二條說“攻擊誣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而現行反革命則可以槍決。希特勒時代德國法律規定，“侮辱元首者，拘留兩星期”。

文革時代，對毛林遠未到“侮辱”程度，就可能被槍斃！在此期間出現的“現行反革命案”中，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中央首長”的言論罪案件數量最

多。这类案件中，有的是对“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个人崇拜做法的批评、议论；有的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以现行反革命罪处以刑罚；有的是支持1976年“四·五”天安门革命行动，被当作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替“走资派”鸣冤叫屈，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 中央党校教授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称[1]：“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00万人，杀了数以千计的人（南郭注：我在大陆执业时曾看过一个中共文革判处反革命罪的秘密文件称：文革期间全国约36万人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

- 至1972年，仅上海有约3万人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查处反革命集团案122个，1,651人被迫害致死。估计全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达50万。

- 文革结束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称：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宁夏错杀的70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68人；天津市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处死者占22人。

- 中共暴政的野蛮残暴在文革期间登峰造级：

- 张志新，系辽宁共产党干部因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捕[2]，被中共恶警故意唆使重刑犯人强暴后逼疯，仍然被丧尽天良的中共处死，1975年4月4日处死刑前被残暴地割喉！而她并非第一个受此酷刑，此前辽宁已实施近30次！[3]

- 李九莲，临刑前中共恶警将她舌头跟下颚拿尖锐的竹签穿连在一起后被拉到赣州西郊枪杀抛尸荒野又遭歹毒之徒奸尸割去双乳。[4]

- 钟海源，因为李九莲打抱不平被中共法庭判12年徒刑，因多次被严刑逼供，打断小腿骨高喊打倒华国峰被改判死刑，刑前被活体取肾。[5]

- 黎莲，因被男朋友出卖，年仅18岁于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名处决；刑前被活体取肾。[6]

- 曹刚山1948年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学生运动，文革期间被判8年，关押中攻击文化大革命，加判20年，不服管教，攻击毛泽东，判死刑，枪毙前，狂呼“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被狱卒、狱医用医疗器械撑开牙齿，连根割断舌头。

- 史唐枫，在因反对而获罪的“四人帮”倒台后，仍被押上刑场，行刑者怕他临刑前说出真相，便用东北缝绵被的大号针线缝死了他的嘴唇！）、

- 陆鸿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因涂写《毛主席语录》于1968年4月27日处死）刑前被割喉；

- 王希贞，浙江省洞头县革委会常委（学生代表），执行枪决时为防止他呼喊口号，将其喉管割断，家属全部被押不让他们鸣冤叫屈；

- 官明华，海南岛白沙县女医生，刑前一节竹筒塞进她的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无法发声。

- 蔡铁根，老红军，大校军衔，教授，七〇年三月十一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著便对他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已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说不出话来。接著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

- 黄金秋（清水君），被江苏高院宣判后，狱方竟直接将他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因精神病院拒收，他才幸免于难。随后被江苏省监狱关入严管队，狱方强迫他每日长跑近三万米致双脚溃烂血肉模糊，并唆使重刑犯人暴力殴打他。[7]

(13)文革武斗致死无辜平民近 50 万人：

• 武汉市 1966 年 1 月 2 日，造反派将 3100 名干部和保守派关押；1967 年 5 月 27 日陈再道将军与造反派冲突第一次打死人；6 月 17 日造反派头目被拘，但付出了 25 人死亡的代价；6 月 30 日死亡人数增加至 158 人；保守派被击败后，600 人被屠杀；66000 人受迫害；1968 年 5 月 27 日，80000 枝枪枝被盗；

• 广东省红卫兵至少被打死 40000 人。1967 年广东红旗派与东风派武斗，900 人丧生；1968 年 8 月 19 日，30000 名军人和武斗农民围攻桂林，屠杀进行了六天才停止。恐怖扩散至农村，最后以黑五类为替罪羊，有些地区宣称：从此本区一片红，因为已没有黑五类了。

• 湖南省华国锋被称做湖南屠夫。(534)

• 1968 年陕西省安康县武斗中杀掉俘虏 286 人，在一次审讯中活埋了 13 人。

• 广西自治区红卫兵被韦国清将军屠杀 100000 人，（南郭注：主要是由保韦国清的“联指”，对造反派“四二二”及其同情者和无辜的黑五类的大屠杀。自 1967 年秋直至 1968 年 8 月达到高峰。其屠杀规模最大（十万众）杀人手段之残忍（剖腹挖肝吃人肉）在全国首屈一指。云南红卫兵死亡 30000 人。中共广西区整党办公室编印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

纪》概述道：“1968 年 7 至 8 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三’布告[3]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至死 84000 多人。”“成批杀人到处有之，成批敲死，成批爆破致死，成批戮死，成批掷下矿井，成批丢下山洞，剖腹挖肝，割肉挖眼，割头示众，吊割阴茎，先奸后杀，杀夫奸妻奸女，成批溺死皆有之；广西大地，血雨腥风，冤案如山，悲惨状况，史无前例。”“1968 年 6 月 19 日凌云县人武部政委，县革委会主任王德堂阴谋策划谋杀县委书记赵永禧等 21 名干部，教师和学生，他曾多次强奸被害者的妻子及受批斗的六名女学生，去中共却评选他为‘支左’好干部！”1984 年“处遗”工作中概括称：广西枉死者数以十万计，光是活埋的就有十二万人？）[4]红卫兵非常残暴，但镇压他们的军人和执行共产党的命令镇压红卫兵的民兵武装更残忍。

（南郭注：1968 年 8 月南宁“四二二”红卫兵组织的广播员和成员共 26 人被“联指”用机枪扫射死。据称数千反革命被拉到邕江边用机枪扫射死，死尸一直漂到港澳地区，在香港领水捞获的死尸有七千多具。未被俘的“四二二”成员的家属共三千多人，躲进地下人防工事，结果被百年不遇的洪水淹死。[5]1979 年揭露当年的洪水实质上是工兵排长奉命炸毁上游的一座大水库的大坝所致）。

(14)1971 年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反党集团案”牵连数百上千名高级军官，数万人受迫害。

(15)1975 年炮轰云南沙甸回民村事件。

1975 年 7 月中共命军队用大炮轰平云南省沙甸回民村群体屠杀 6000 人事件。起因是中共自文革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宣扬无神论，歧视和压制宗教信仰，使回民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受限制；中共多次派工作组进驻沙甸，强迫回民养猪，

改变生活习惯，限制作礼拜等宗教仪式，工作人员在村子里公开吃猪肉，并将吃剩的猪肉往水井里倒等，严重伤害了回民的情感，导致回民上访。中共污称回民受国外反华势力和台湾国民党特务操控，为其提供武器弹药，要搞叛乱，推翻人民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等。叶剑英，邓小平下令部队平叛。由云南省、州、市党政领导组成的地方指挥机构和军区、军、师、总后分部组成的军事前线指挥机构。参战部队加基干民兵达一万余人，使用自动步枪、轻重机枪、75 无后座力炮、82 迫击炮、152 加农炮、火焰喷射器及数百吨炸药。1975 年 7 月 29 日凌晨三点开始进攻。对沙甸以及附近大庄、新寨、田心、茂克、车白尼等回族聚居村实行军事包围。黎明时分，开始用榴弹炮轰击，其中沙甸、茂克两村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夷为平地。

(16)1975 年驻马店溃坝事故

河南驻马店地区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兴建于 1950 年代“治淮”初期，在“大跃进”的推动下，由于片面重视蓄水，忽视防洪，导致隐患四伏。1975 年 8 月 8 日凌晨零时 40 分，板桥水库因特大暴雨引发溃坝，9 县 1 镇东西 150 公里、南北 75 公里范围内顿时一片汪洋。灾害发生时，17 个泄洪闸只有 5 个能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没有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不敢大量排水泄洪，而上游石漫滩水库的大量洪水急骤流入板桥水库。在溃坝 6 个小时前的 8 月 7 日 19 时 30 分，驻军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 1.3 米，再下 300 毫米雨量水库就有溃坝危险！”8 日零时 20 分，水库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同第一封急电一样，这封电报同样没有得到回应，此时尚未有人通知下游居民疏散撤离，20 分钟后灾难发生，很多人在睡梦中就被冲走。灾难估计直接死亡及缺乏救援、医药救治死亡约 30 万人。

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 2 3 万人；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1 0 2 9 万人遭受毁灭性的水灾，约有十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十万人。

(17)1976 年北京四五运动

1976 年 4 月 5 日北京人借悼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及“四人帮”（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政权的不满。毛下令军方镇压，10 人死亡，200 人受伤，全国追捕数千人。随后至少 500 人被枪决；调查持续到 10 月份，至少上万人被调查。（南郭注：1976 年四五运动是自 1949 年以来国人首次群体自发公开对被捧为神一般的毛泽东说不；毛判断事件后台是邓小平，故将其定性为‘反革命运动’，指示镇压禁止悼念周恩来。尽管周其实也非什么好东西，但当年中国人被长期信息封锁强制洗脑误以为周是好人。当晚一万余名首都民兵和工人纠察队，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手持木棍、皮带包围天安门广场拟武力清场。中共官方称没有死一个人，被捕 300 余人。但据香港郑义先生的说法：当晚八千多人伤亡，其中 600 多人死于棍下，2000 多人伤残，仅北京一地被捕超过 50000

人。[8]1978年11月25日中共平反之。)陈子明、王军涛、严家祺、范增是四五运动的著名人物。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33页。

[2]在中共恐怖高压下,全国仍有不少人挺身为刘少奇鸣不平。因此被定为「反革命」而判刑、枪决的,达两万八千多人。

[3]见《张志新七年监狱折磨成疯死前被割喉管》

[4]见《胡耀邦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昭雪》

[5]见《因声援李九莲钟海源被判死刑活体取肾》

[6]金石开编著《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所载《黎莲》(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

[7]郭国汀《清水君在狱中受到中共监狱毫无人性的虐待!》

[8]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442-443页。

(18)1976年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唐山,这座上百万人的重工业城市,瞬间被强烈的地震夷为平地。在表示震惊和遗憾的同时,世界各国纷纷主动表示了援助中国的意愿。1976年7月28日,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盖茨表示愿意提供中国人所希望提供的任何援助。7月29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瓦尔德海姆称,联合国准备帮助唐山灾区人民克服这场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外交大臣宣布:英国已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药物资。7月3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外相的建议,表示将采取迅速向唐山发出救灾物资的方针。外务省已动手准备发出药品、衣物、帐篷等物品。时任日本外相的宫泽喜一还指示日本驻华大使,要他向中国政府转达:一俟中国方面做好接受的准备,就将物品发送。

正当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时,7月30日,中国外交部正式谢绝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示,并告知日本驻华大使:中国不接受外国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援助。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

前国防部长、时任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说,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前,每当国内出现灾难时,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国家的红十字会也都征求中国的意见,问要不要援助,但是都被年轻的新中国婉拒了。在当时那种政治思潮之下,许多中国人认为,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相反,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款物数量是很大的,几乎都是给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

唐山大地震中,共有24万多人丧生,16万多人伤残。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以上。迟浩田说,如果当时接受外援,应该能够抢救回更多的生命。

15.1978-1979北京西单民主墙民主运动。

黄翔[(1959年现行反革命劳教四年、1966年现行反革命内定判10年后平反、1970年再次打成现行反革命,1978年10月1日至1979年3月发起推动西单民主墙运动;1979年3月以异议分子入狱;1984年因恋爱秋潇雨兰被作为刑事犯罪案件立案逮捕秘密关押半年;1987年再次被捕判刑三年;1995年6月为六四在

京被密捕；魏京生（1979 年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第五个现代化》判 15 年，1995 年判 14 年）；陈尔晋（1972 年至 1976 年 5 月撰写《特权论》并上书毛、邓、胡耀邦；1978 年被秘密逮捕关押 1 年后平反；1979 年通过《四五论坛》及在西单民主墙公开发表《特权论》删节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1981 年 4 月 5 日被作为两非组织祖师反革命集团首犯判 10 年加 10 年严密监管）；徐文立（1981 年判 15 年，1998 年再判 13 年）、徐水良（1973 年 10 月发表《反对特权》；1975 年 11 月被捕入狱至 1979 年 1 月平反释放；1981 年 5 月再次被捕判 10 年）；王希哲（1974 年以李一哲名义发表《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15 年）；傅月华、张西凤、孙维邦（12 年）、刘青（3 年劳教加 8 年）、刘山青（10 年）、马文都（4 年）、康正果（3 年）、任畹町（2 年）、陈旅（吕）、路林、杨光、傅申奇、王军涛、杨周、郑钦华、刘国凯、汪岷、胡平、司马文征、倪育贤、莫建刚、李任科、何求、朱建斌、王屹峰、牟传珩、钟粤秋、张京生、秦永敏、皆被中共专制暴政枉法判刑。1976 年有政治犯 1000 万人。1982 年政治犯减少到 0.5%，1986 年犯人数降至 500 万，以后保持此率。1991 年政治犯人数约为 100000 人，2005 年有 7000 人之说（南郭注：实际政治犯人数肯定远远超出此数）。

16.1983 年“严打运动”。

这是中共任意践踏法律，无法无天的再度表现，在该运动中众多仅是小偷小摸行为或是一般追求性刺激的青少年均被当做流氓团伙枪决。全国约 100 万人被捕，至少 10000 人被杀；

17.1989 年六四天安门屠城。

六四天安门屠城事件是中共建政以来中国人最大规模的公开反共要求自由民主的政治运动，波及全国 80 个大中城市。是中共极权流氓暴政本质彻底大暴露，亦是其灭亡前的最后疯狂，如果在此前尚有可能和平改良的话，此后中国民主运动只可能是政治民主大革命：事件起因于 1989 年 4 月 15 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学生举行悼念活动，4 月 26 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动乱’的定性，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称：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动乱，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结果次日北京超过 10 万名大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该社论。5 月 19 日中共宣布北京戒严，结果犹如火上浇油。随后大学生开始绝食抗议。5 月 30 日中央美术学院师生集体创作的“民主女神”像在天安门广场安立。6 月 2 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建四君子宣布在天安门 72 小时绝食。但刘晓波被捕后，在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因而受到中共当局‘记大功’的奖励。[1] 但后来刘曾对自己的无耻行为忏悔：“我在 90 年的忏悔就是不可自我原谅和自我赦免之罪。它是我生命中永远的耻辱，永恒的罪责，纵令我以全部生命去洗刷，也无法干净了。这是我一生中最低贱的行为，那伤口永远不会愈合，永远新鲜，稍一碰就会血光四溅。每每想及此，都自觉无地自容。这种卑鄙的背叛行为，已经是铭刻在生命中抹不去的耻辱。要说做人的失败，这才是致命的。它将永远跟著我，直到有一天刻在墓碑上（假如有墓碑的话）。我的如此卑劣的行为，这种耻辱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毁灭性的。严格地讲，自己为自己烙下这耻辱之后，就再无法过真正意义上的有尊严的问心无愧的生活了”。[2]

1989年6月4日，中共动用30万正规军，真枪实弹数千辆坦克，装甲车强行洗场。邓小平下令开枪，法国研究专家称：“至少1000人被杀，10000人受伤，数千人随后在各省秘密被杀或以其他罪名枪杀；北京至少10000人被捕，全国至少有30000人被捕”。（南郭注：根据1989年10月12日总参谋部统计的资料显示，1989年6月1-10日中共枪杀的死亡总人数为31978人。任晓町先生亦说：总参谋部当年统计六四死亡3万多人[3]；另据苏联档案解密披露的数字为3000人死亡[4]）

国务院发言人袁枚公然称：“天安门没有死一个人”！前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北京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中国人大研究生吴仁华证明北京农业大学学生戴金平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在天安门广场被枪杀。吴仁华亲眼目睹了三辆坦克追逐碾压11名学生的暴行。「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目前已经找到坦克轧人惨案的五名死者和九名伤者，一共14人。其中五位遇难者是林仁富、董晓军、王培文、田道民、龚纪芳；九位伤者是方政、王宽宝、权锡平、刘华等，另一伤者是位女大学生，不愿公开姓名。

在六四后十余日，中共暴政即以反革命破坏公共财产罪等名义悍然枪杀了数十名北京和上海市民及工人政治犯：林昭荣、张

[1]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458页。

[2]刘晓波《恐怖对人性的摧残——狱中读《1957年的夏季》》1999年3月10日

[3]任晓町“2008年6月4日—6日访问荷兰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的讲话”《看中国》2008年6月9日。

[4]封从德：苏联档案解密，六四天安门死3000人（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08日）
Lukyanov reports that the real number of casualties on Tiananmen Square was 3000.
（Lukyanov：天安门真实死亡数字是3000人）

18.残酷镇压一切组党运动。

虽然中共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结社自由权，但自中共夺权以来从未有过一天任何中国人曾享受过此种自由。凡是组党者无一例外，全部到中共暴政公然践踏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枉法无罪重判。自1949年至1981年被以反革命罪处死的数百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因为组织“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研究学习小组”之类的组织，而被以所谓反革命集团罪名处决。

- 1981年4月5日镇压中国公权大同盟，中共以反革命集团罪名，逮捕‘两非’首犯陈尔晋。随后南京徐水良，北京徐文立等人亦被捕判重刑。

- 1989年5月陈晏彬因组建中国革命民主阵线被判15年刑。

- 1990年杨天水因组党被判10年徒刑。

- 1991年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中国自由工会。逮捕判刑胡适根（20年）、刘京生（15年）、王天成（5年）、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国齐、陈青林、陈卫在法庭上高喊“打倒共产党”！“自由民主万岁”！王萬星（被关入精神病院10年）。

- 1996年因组党被判刑的中国民主党人：陈西（3加10年）、廖二元（3加4年）、卢勇祥（5年）、黄燕明（5年）、曾宁（4加2年）、程凡、王培剑、吴高兴、叶文相、傅全、岳武、王兆明、庞庆祥；

• 1998 年中国民主党被捕判刑者：李作（15 年）、孔佑平（15 年）、哈达（15 年）、王有才（3 年加 11 年）、刘贤斌（13 年）、秦永敏（12 年）、余万宝（12 年）、宁先华（12 年）、高勤荣（12 年）、吴义龙（11 年）、胡明君（11 年）、李大伟（11 年）、华棣（10 年）、王森（10 年）、祝正明（10 年）、佟适冬（10 年）、张善光（10 年）、李旺阳（10 年）、查建国（9 年）、李海、何德普（8 年）、高洪明（8 年）、杨涛（8 年）、毛庆祥（8 年）、李智（8 年）、肖云良（7 年）、陈增祥（7 年）、陈忠和（7 年）、朱虞夫（7 年）、陶海东（7 年）、刘世遵（6 年）、廖石华（6 年）、肖诗昌（6 年）、王泽臣（6 年）、徐光（5 年）、马文林（5 年）、王策（4 年）、姚福信（4 年）、吕新华（4 年）、黄金波（4 年）、桑坚城（3 年）、李志友（3 年）、陈龙德（3 年）、王明（3 年）付国涌（3 年）、叶有福（3 年）、范子良（3 年）、李旺林（3 年）、袁斌（3.9 年）、欧阳懿（2 年）、单称峰（2 年）、戚惠民（2 年）、赵昕、刘连军、余铁龙父子、王文江、岳天祥、张善光（组独立工会）、安均、刘念春、韩罡、陈宴彬、张亚州、孙立勇、周志荣、尚文、解天刚、薛振标、庄德文、冯鉴、潘天云、王伟华、高建松、王柏祥、罗长福（重庆）、颜钧（西安）、刘京生、陶君、李任科、程凡、王培剑、周建和、谢万军、王荣清、唐元隽、姚振宪、燕鹏、热比亚、卡得尔、马少华、王林海、任诠、李岩、刘晓竹、刘大生、康玉春、高玉祥、秦耕、龙纬汶、王妙根、顾万久、刘浩峰、刘凤钢、林海、冯劲力、赵常青、桑坚城、许健（包头）姜维平（大连）、黄小勤、温方强、陶海东（新疆）、陈少交（湖南）、李运生、蒋世华、黎小龙、赵金东、杨洪林（长治）、王大齐（合肥）、李增春、王彦发、高建松、王柏祥、解天刚、朱更生、李玉君、李志欣、高鸿卫、庄德文、冯鉴、潘天云、王伟华；王凤山（甘）马晓明（西安）、李志友、黄燕明、廖石华、诸贤均因依法行使宪法第 35 条明文之结社自由权公开组党被中共专制暴政烂用国家强制力判处三至十五年重刑。中国民主党的群雄们为冲破党禁做出了伟大贡献与牺牲。

• 1998 年著名诗人俞心焦因组建中华复兴党被中共当局罗织强奸罪判 8 年徒。

• 2004 年归国留学生，作家和诗人黄金秋（清水君）因组成网络中华爱民党被中共暴政无罪重判 12 年。

• 2009 年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博士后，因组建中国新民党被中共暴政枉法无罪重判 10 年。

• 2009 年又有谭作人，谢长发，刘晓波等良心作家被中共流氓当局罗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无罪重判 6 至 12 年不等。

19.1980 年迄今镇压家庭教会。

[1]中共对家庭教会成员普遍实施酷刑，旨在强迫信众放弃信仰。据纽约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主席李世雄致（2003 年 3 月 17 日）第 59 届联合国人权大会函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 6 千万以上的家庭教会信徒中至少有 270 万人被任意拘捕过（即每 22 人中就有一个）、44 万人被判劳改劳教、750 人被通缉追捕、20 万人被迫离家外逃或失踪、1 万多人被迫害致死、2 万多人被酷刑致残、13 万人被监视居住、112 万人被勒索性罚款。”这些统计数字是根据他们从 2000 年秋开始，由两万多名基督徒对中国 22 省 207 个大小城市及无数个乡村的 56 万多名家庭教会基督徒所进行的走访调查，得出的保守数字。2006 年 4 月 12 日对华援助协会、美国宗教与公共事务研究所、国际禧年运动美国分会以及德克萨斯州美德兰牧师联盟 共同向全世界公布了「2005 年中国对家庭教会基督徒

酷刑虐待报告」。披露了在 2005 年 5 个省市 19 名家庭教会信徒和领袖被国安和警方酷刑虐待的情况。2000 年镇压中功张洪宝。

[1] 《人權教會機構公佈「05 年中國對家庭教會基督徒酷刑虐待報告」》

20.1994 年新疆克拉玛依市的恶性火灾

1994 年 12 月 8 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委和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在克拉玛依市友谊馆举办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评估验收团专场文艺演出活动。全市 7 所中学、8 所小学的学生、教师及有关领导共 796 人参加。在演出过程中，18 时 20 分左右，舞台纱幕被光柱灯烤燃，火势迅速蔓延至剧厅。剧场总共有 10 个出入口，只有一个出入口敞开着，其他出入口用铁链紧紧锁住，其中两侧的太平门不仅上了锁，还加装了栅栏防盗网，796 名来自全市 15 所中小学校的师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况丽叫住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火灾导致 323 人死亡，132 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 288 人是中小学生。在场的有 40 多名教师，有 36 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 20 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

据英国的《星期天泰晤士报》引述陈耀文的文章说，幸存者告诉他们，火灾发生后，听到主持演出的一位市教委的官员大喊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这样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都逃脱了，只有几个人受点伤。等官员们走完后，大火引起的毒气使得很多学生和教师窒息而死。一位叫况丽的官员事发后，自己跑到大火没有烧到的女厕所，把门反锁上，不让烟雾进来。门外有很多一同跑来的学生央求她开门，她没有开。结果，这位官员毫发无损地逃脱了，而厕所的门外堆了一百多具孩子的尸体！

21.迫害西藏新疆少数民族。

1956 年西藏新年在（）寺院被炸毁，至少 2000 名和尚信徒被杀死。西藏人不仅被枪杀，还被殴打致死，虐待致死，活活烧死，淹死，被肢解，饿死，勒死，绞死，活活煮死，活埋，碎尸，砍头等野蛮残忍方式杀害。

1950-1960 年期间，大量藏人被监禁，活着出狱者极少，不到 2%，他们分别关押在 166 个集中营。1959 年是西藏最黑暗的时期，同情起义的村庄被整村炸毁。伤员被遗弃，活埋或任由野狗撕咬，大量人员自杀。1959-1963 年，70000 名西藏人死于饥荒；占人口的 2-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 50%。1968 年 1 月拉萨毛派与保守派武斗，数百人丧生。1969 年另一次拉萨起义亦被中共血腥镇压，康巴游击队战斗直至 1972 年；1987 年起义又起，1989 年西藏实行戒严，依张少松将军称，18 个月期间至少 600 人丧生。1984 年达赖流亡政府估计 173800 人被枪决；西藏 1/4 成年男子是和尚，1/6 被划为右派，在四川藏区，2/3 藏民被捕关押直至 1964 年或 1977 年。若没有确证证明中共计划肉体群体灭绝藏人，无疑中共对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

文革结束后，6259 座寺庙，仅 13 个仍开放，绝大多数被变成军营，商店或

拘留所。绝大多数被毁坏一空。其珍宝，佛像，画，字，经书皆被毁或盗空。1973年一家北京（）熔化了600吨西藏佛相。1983年一个西藏代表，在北京发现32吨西藏遗物，包括13573座佛相。直到1979年所有的学校仅教汉语。1984年西藏流亡政府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120万受害者，亦即近1/4的人口。432000在1959年起义中丧生，似乎更难以置信。中国官方称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降至1966年的250万。若扣除流亡者和出生率，死亡人数至少在80万以上。唯有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可比。

2008年3月10日-3月14日，中共镇压藏民和平抗议，打死至少上百名藏民；2009年7月5日又在新疆乌鲁木齐人为制造了“七五”惨案。1989年胡锦涛在西藏亲自主持的血醒镇压藏民和平抗议则由[武警特務分隊緊急抽調三百人扮成市民和僧侶在五日上午打入八角街和拉薩其他鬧事地點，配合公安廳、市公安局的便衣完成造勢的任務。燒毀大召寺東北方向的經塔。砸搶鬧市區的糧店，引發市民哄搶糧食，並對藏甘貿易公司進行煽動性攻擊。鼓勵民眾哄搶商店物資.]虽然该血债不能由胡氏独担，因为当时的赵紫阳、杨尚昆、乔石及整个中共中央对血腥镇压有指令。今读唐达献先生之[一九八九西藏拉萨事件纪实]一文不由得令吾连想自3月10日藏民和平抗议再度引发的[314]西藏血案。真正的罪魁祸首乃中共一党专制的罪恶政治体制。残暴邪恶无能下流无耻乃中共专制流氓暴政的本质特征中共之残暴源于其是个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绝对权力，中共之邪恶源于其反人性悖天道的[共产]邪说的基因，中共之无能是因为其主体是由无知的流氓无产者依暴力加谎言演变成的无知流氓特权资产阶级组成，中共之下流无耻则是因其与生俱来的流氓本性决定的。

第十七章：人为制造谋杀性大饥荒虐杀农民 5000 万

提要：中共奉行马克思之“消灭财产私有制”，自1953年开始搞的农业合作社到1958年连骗带哄加强制实现人民公社化，同时毛泽东好大喜功，妄图称霸世界，完全不顾国贫民穷的现实，想一步到位发展重工业，挖空心思要购买制造原子弹，核潜艇技术，现代化军工业，几乎完全靠出口农产品换取，故对中国农民实行超级剥削。结果步苏联后尘，中共也为军事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人为制造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加上此前中共两次故意谋杀性质大饥荒，中国实质上故意谋杀了至少5000万中国农民。

一、1948年为换取苏联援助不惜饿死延安和东北地区农民。

1948年中共为换取苏联援助不惜饿死延安和东北地区几十万农民。苏联北朝鲜和蒙古对中共的巨大援助一直高度秘密进行。毛用中国人的苦难换取苏联人的巨大援助，1946年8月和10月毛两度向苏联驻哈尔滨贸易代表提议用粮食支付苏联援助，被拒。11月毛派刘亚楼赴莫斯科签定中共每年向苏联提供100万吨粮食换取苏联军援的协议。结果导致共党占领区好些地区出现饥荒和死亡。延安地区1947年饿死十万农民，中共控制的陕西和东北三省1948年饿死几十万人，甚至共军亦时常挨饿。几乎无人知道饥荒是因为毛将粮食出口苏联导致，以为是战争原因造成。[1]

二、1955 年抢粮逼迫 20 万农民自杀。

1955 年中共抢粮逼迫 20 万农民自杀。1955 年初，地方众多报告呈交毛，农民因缺粮食而吃树叶，卖儿女。赵紫阳的报告称干部挨家查抄，抢走农民所有的粮食，在高耀县 110 人被逼自杀，全国 2000 个县估计被逼自杀者超过 20 万。[2]

三、1958 年-1961 年四年大饥荒饿死 4000 万农民。

1958 年-1961 年中共故意饿死 4000 万农民。1988 年中共官方承认饿死 2000 万。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饥荒。第二大者是 1887-1888 年中国北方饿死 900 万-1300 万人；再次是 1932-1934 年苏联饿死 600 万人。1957-1961 年，48%的猪，30%的家畜被屠杀。甘肃省直到 1962 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 1959-1963 年也饿死 70 万人，占人口的 2-3%。[3]最近的研究显示，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此，青海藏民死亡率高达 50%。吴宏达先生证明说 1970 年与狱中一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被枪决后，他的脑子被一名安全官员吃了[4]。

1. 食物也成为革命的暴力武器与农民的反抗

“食物还是有的，但是政治上的选择，有人在决定谁可以吃，谁不可以。一些开会睡着、干活迟到、身体虚弱的人，或政治上被认为是坏人的人，是被饿死的，因为不许他们去公共食堂吃饭。“在档案记录中，有的村子 80%死亡的人是不许到食堂吃饭造成的。”在湖南，一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他的父亲被干部强迫把儿子活埋了。这个父亲几个星期后死于内疚。有的人因为偷一个土豆被头朝下吊起来，背上还压着石头。当时中国买了苏联很多设备，到期要付帐。周恩来先说：“我宁可不吃，也不欠债”。邓小平说：“只要每个人少吃一口就行了”。毛泽东的理论：“先发制人”，被谭震林在下面讲话时解释成：“在农民吃之前，国家要把粮食拿到手，否则就是思想有问题”。

早在 1953 年秋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而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项目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争夺粮食的战争。毛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国家应尽可能阻止农民多吃”。[1]溥一波事后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收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 年 10 月 2 日毛对政治局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一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农民是好的。”几天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指示说：“要准备十万个村农民暴乱，即中国 1/10 的村庄暴乱，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毛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2]为了更方便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 年 5 月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 150 万反革命。反革命占 5%”。河南信阳地区 1959 年秋，至少 10000 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 800 人！28000 农民受到各种惩罚；[3]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 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2.大饥荒到底饿死多少人

①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证实“当时饿死 4300 万至 4600 万”；②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论证：“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 3800 万中国人饿死”。③刘少奇在大饥荒中的 1961 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已经有 3000 万人非正常死亡。④据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丛进之《曲折发展的岁月》称：“当时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⑤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口号与中国》披露：“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和减少的出生人口共 4000 万。”⑥杨继绳在《墓碑》中考证饿死 3800 万；⑦金辉先生依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为依据分析的结果：全国非正常死亡 4040 万至 4319 万[5]。⑧1996 年英国记者贝克在其《饿鬼》书中估算中国当时至少 3000 万人饿死。⑨《争鸣》杂志 2005 年 11 月报导，中共解密文件透露：1959 年至 1962 年全国饿死 3755.8 万人！⑩2009 年底，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提及大饥荒时饿死 4500 万人。(11)2010 年初，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曹树基在公开讲座中称，根据官方人口统计推论 3000 万到 3200 万饿死。(12)专研中国近代史的荷兰学者冯客，2010 年 6 月在英国出版《毛制造的大饥荒》，综合论证 4500 万人饿死和死于暴力。

3.大饥荒导致中国多省出现吃人事件

①河南发生吃人事件，农民往往集体决定吃小孩。②1960 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成简报；③1958 年放出水稻亩产 13 万的广西环江县，1960 年饿死 30000 人，出现不少绝户绝村，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甚至公开卖人肉。[6]《乡村三十年》记载：④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〇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⑤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对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那时人们饿疯了，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死亡率从 1957 年的 11% 上升至 1959 年的 15%；1960 年达 29%；1961 年 15%。出生率则从 1957 年的 33%，降为 1961 年的 18%。不包括 3300 万缺陷儿。⑥仅 1960 年安徽富阳县即发生 63 起吃人事件，一对夫妇将 8 岁的儿子勒死后煮吃。[7]⑦甘肃省有个县 1/3 人口饿死，吃人事件普遍。上面命令“绝对不许开仓即使人民饿死”。[8]在四年期间至少 3800 万人饿死。

毛明知大饥荒，确于 1958 年至 59 年出口 700 万吨粮食。1958 年 10 月 9 日毛对亲信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1957 年在莫斯科毛说“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以赢得世界革命的胜利”。[7]1958 年 5 月 17 日在党代会上毛说“别对世界大战大惊小怪，至多人民死一半，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死一半人口最佳，死 1/3 次之。”[8]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对亲信说“大型水利工程，大炼钢铁，象这样工作，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半中国人可能得死。如果不死一半，死 1/3 或 1/4，即 5000 万得死。死 5000 万我会被开除，甚至掉脑袋。但如果你们坚持，我将不得不让你们干，当人民死亡时就不能怪我。”[9]仅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 60000 人中有 10000 多人累死；1961 年初，刘少奇知道已饿死三千万人。4-5 月刘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饿死，姐姐快饿死，一个 12 岁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刘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刘少奇吩咐释放他。刘沉重地向乡亲们道歉，回京

后，刘对中共高层说“我们不能再象这样继续下去”。[10]周恩来告诉小范围内的人说“中国制造原子弹非常便宜，仅花了几亿人民币。”事实上，中国制造原子弹，花费估计达 41 亿美元(1957 年的比价)。足以购买全国人每天 300 卡的小麦两年，足够拯救 3800 万饿死的人，一个也不会饿死。毛的原子弹造成的死亡，高于日本因两颗原子弹致死者 100 倍！[11]甘肃省直到 1962 年仍在饿死人。甚至连历史上从未有过饥荒的西藏也饿死近 70 万人。[12]吴宏达先生证明说 1970 年与狱中一名因在墙上书写打倒毛主席口号的犯人枪决后，他的脑子被一名安全官员吃了[13]。

[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392

[2]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394

[3] 《共产主义黑皮书》郭国汀译，1999 年，第 493 页。

[4]，同上第 495 页。

[5]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38

[6]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38

[7]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39

[8]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39

[9]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39

[10]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71

[11] Jun ChangMaoThe Unknown StoryAlfred A.KnopfNew York. 2005. P.485

[12] 郭国汀译《共产主义黑皮书》1999 年第 495 页。

[13]郭国汀译《共产主义黑皮书》1999 年第 520 页

4.大饥荒主要是政治原因

这由死亡率最高的省份均是毛派干部当权的事实得以证实：四川、河南、安徽。早在 1953 年秋始，中共便为了军事强国而大量出口粮食换取苏联援建项目与农民展开了全方位争夺粮食的战争。毛说“要教育农民少吃，国家应尽可能阻止农民多吃”。[9]溥一波事后承认“农民绝大多数粮食均被强制收走，被驱向死亡的境地。”1953 年 10 月 2 日毛对政治局说“我们正在为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展开一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说过农民是好的。”几天后，陈云向各省领导干部传达毛指示说：“要准备十万个村农民暴乱，即中国 1/10 的村庄暴乱，但这不会危及共产党的统治。”毛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没有良心，马克思主义是残酷的”。[10]为了方便夺取农民的粮食，中共发起农业集体化运动。1955 年 5 月在谈及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毛说“我们必须在五年内逮捕 150 万反革命。反革命占 5%”。

河南信阳地区 1959 年秋，至少 10000 名农民被捕；许多人饿死在监狱中；安徽省当局用机枪扫射向城市逃难的农民，凤阳地区死于机枪扫射的农民达 800 人！28000 农民受到各种惩罚；[11]大量村庄死亡率超过 50%，有些幸存者仅是干部家属。

大饥荒并非所谓自然灾害所致。1954 年和 1980 年的气候均比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坏得多。1960 年全中国 120 个气象站，仅 8 个有干旱后果纪录，仅 1/3 提及干旱问题。安徽作家张万舒证明：“1960 年，风调雨顺”。1960 年全国收获 143 百万吨谷物，比 1957 年的 195 百万吨少 26%；与 1958 年的 175 百万吨略少。[12]连刘少奇也不得不公开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尽管这三分天灾其实也根本

不存在，而纯属人祸体制性谋杀。

5.大饥荒期间仍然出口粮食 1000 万吨。

主要是向苏联出口；从 1958 年的 270 万吨，增加到 1959 年的 420 万吨；1960 年出口粮食与 1958 年相同；1961 年实际上进口 580 万吨。美国主动欲提供援助，却被中共政权因政治原因而拒绝。1961 年，世界上其他国家，均保持忽视灾难。援助农村的经费少于 45000 万元（即人均 0.8 元），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为每公斤 2-4 元！[13]刘少奇推出“三自一包”政策允许农民有少量的自留地，这些措施使农民迅速摆脱饥荒。

根本不存在中共胡编的所谓苏修逼债之事。据张戎女士详细考证，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反而主动减掉了约一半的债务。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1960 年 11 月 12 日，副总理李先念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队到河南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1990 年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据八十年代初我们考查过的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人约占全县四分之一”其中一个公社每三人中死两人。1986 年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三年困难时期，甘肃很多人死于饥饿”。陇中地区死亡 130 万-200 万人。

大饥荒完全是人为蓄意制造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 1958 年和 1959 年就高达 700 万吨，可以为 3800 万人每天提供 840 热卡，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不出口粮食，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根据中共统计数字，大饥荒期间人均仅 1534 热卡。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亲共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 1200。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 1300 到 1700。

6.大饥荒期间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

大饥荒期间中共大量援助外国共产党因为毛想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一九六〇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为了争取阿尔巴尼亚(人口 300 万)，1958 年给了霍查 5000 万卢布。1961 年 1 月，又给了他 5 亿卢布！还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1960 年 1 月 21 日，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中国最穷，却最慷慨，而且是无偿援助。毛说“我们不是军火商。”意即中国的军火不要钱。毛专权期间至少送了 200 多亿美金给印度支那。毛送给正在打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的无偿援助难以数计。古巴的切·格瓦拉 1960 年 11 月访华，毛给他 6000 万美金的“贷款”，周恩来特告格氏，“可以经过谈判不还”。

一九六〇年初，中共开始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该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有一套严密控制系统，以蒙骗外国人。美国中央情报局 1959 年 2 月对中国食品生产量的判断是“大幅度增长”。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低于万分之一。可是毛泽东时代一贫如洗，外援达到财政支出的 6.92%（1973 年）！更要命的是，中

共明知大跃进导致极为严重的大饥荒，却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广宣传，要他们学习中国道路，组织公社模仿大跃进。[15]中共的宣传开始对保加利亚共产党产生影响，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回保后，保加利亚的报纸即开始大规模宣传中共的公社，赞扬大跃进。随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在保实施中国的口号，将集体农庄扩大到荒唐规模并过度偏重重工业。1959年5月越共发动类似中共的大跃进。胡志明于1958年10月日亲自撰写多篇文章，鼓励大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项目，结果由于干旱导致农业生产欠收，引发了一场受害人数迄今不祥的大饥荒。

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向中国要食品的国家。彭德怀告诉他们中国老百姓很苦。可是捷克人充耳不闻。彭看出东欧都是“在我们这个干骨头兄弟身上刮油”。一九五八年，东欧与中国机器换食品的贸易达到了最高峰”。东德的乌布利希说他从报上看到中国农业获得奇迹般的丰收，问彭德怀可不可以多给东德一些肉，使东德能赶上西德的肉食消费水准，每人每年八十公斤？在中国，即使是城市里，每人每年定量也不过两三公斤。彭德怀沉默了许久，说：“各地报纸宣传都有很多假话，粮食肉类不是很多，而是很缺。”乌布利希这个斯大林主义者自己也虚构过不少数字，当然明白彭所言不差，但他无动于衷。中国老百姓挨不挨饿跟他没关系。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在上年五月取消食品配给制度”。

7.大饥荒期间用粮食制造航天用酒精，不停止研制原子弹

大饥荒期间中共还用粮食制造航天用酒精，甚至不停止研制原子弹。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1000公斤粮食。”周恩来说“中国制造原子弹非常便宜，仅花了几亿人民币。”事实上，中国制造原子弹花费达41亿美元（1957年的比价）。足以购买全国人每天300卡的小麦两年，足够拯救3800万饿死的人，如果不研制原子弹中国人一个也不会饿死。毛因研制原子弹间接造成的死亡，高于日本因两颗原子弹致死者100倍！[14]

中国的仓库里围满了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8.在大饥荒问题上长期故意欺骗

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后任总统）1961年访华，毛泽东对他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1960年，后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访华，回去后写了本天《两个单纯的人在红色中国》，书中特意批驳外界对大饥荒的报导，说“中国没有饥荒”。甚至前联合国粮农组织负责人粮农专家波尔德沃爵士也受骗，1959年访华后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55年到1958年翻倍，中国人“看来都丰衣足食”。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后称：“中国没有大规模的饥荒，只在有的地方粮食不足。”他见毛时甚至鼓励毛抓住权力不放，说：“中国需要主席，您可不能离开这艘船不管。”

毛明知大饥荒大量饿死人却未采纳任何救助措施。1958年10月9日毛对亲信说“死人有好处，可以肥田”。1957年在莫斯科毛说“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以赢得世界革命的胜利”。[16]毛在共产党峰会上说“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

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 [17] 全场听众无不震惊，唯有宋庆龄笑出声，全场一片死静。无人料到毛泽东会说出此疯狂的狂言。波共总书记哥穆卡对毛的发言极为反感，捷共总书记诺维特尼说“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那我们呢？我们捷克一共只有 1200 万人，我们将在核战后死得一个不剩，将不会有任何活人，留下来传种接代。” [18] 1958 年 5 月 17 日在党代会上毛说“别对世界大战大惊小怪，至多人民死一半，这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死一半人口最佳，死 1/3 次之。” [19] 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对亲信说“大型水利工程，大炼钢铁，象这样工作，完成所有这些项目，一半中国人可能得死。如果不死一半，死 1/3 或 1/4，即 5000 万得死。死 5000 万我会被开除，甚至掉脑袋。但如果你们坚持，我将不得不让你们干，当人民死亡时就不能怪我。” [20] 仅在河南省有个工地上 60000 人中有 10000 多人累死；1961 年初，刘少奇知道已饿死 3000 万人。4-5 月刘返湖南老家，他的姐夫已饿死，姐姐快饿死，一个 12 岁的男孩因呼喊打倒刘少奇！被公安以反革命逮捕；刘少奇吩咐释放他。刘沉重地向乡亲们道歉，回京后，刘对中共高层说“我们不能再象这样继续下去”。 [21] 1962 年 1 月刘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公开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私下对毛说“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由此种下的日后杀身之祸。

[1]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299

[2]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393

[3] 郭国汀译《共产主义黑皮书》1999 年第 495 页。

[4] 郭国汀译《共产主义黑皮书》1999 年第 520 页

[5] 金辉，“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 1993 年 4-5 月合刊《社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6] 《共产主义黑皮书》郭国汀译，1999 年，第 491 页。

[7] Jun Chang Mao The Unknown Story Alfred A. Knopf New York. 2005. P. 438

第十八章：论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归宿

共产党极权暴政的罪孽深重，其迫害死亡的人数史无前例，其野蛮残暴决不亚于希特勒纳粹和墨索里尼法西斯犯罪组织。依《共产主义黑皮书》初步统计世界各共产党暴政屠杀和害死的人数超过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军民死亡人数总和的两至三倍高达一亿至一亿五千万。其中苏联 2000 万至 4000 万；中国 6500 万至一亿；朝鲜 200 万；柬埔寨 200 万；阿富汗 150 万；越南 100 万；东欧 100 万；非洲 170 万；拉丁美洲 15 万；国际共运及未撑权的共产党 10000 人。亦即亚洲共产党政权杀人高达 8650 万至一亿六百万（因而最野蛮残暴，而亚洲无神论者占全球无神论者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其中中国又占亚洲无神论者总数的 88%）。

一、全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实质上均极度无知而狂妄

全世界共产党领导人实质上均极度无知而狂妄，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头子皆或多或少患有“偏执狂，自大狂，病态狂”的精神分裂症。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齐奥赛斯库、哥斯曼皆然。林彪拍毛为“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

天才”，称毛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尽管毛厚黑阴谋权术出类拔萃，毛泽东其实是个典型的“无知而狂妄”之徒，毛至少是个自然科学盲，数学白痴和法盲，却狂妄地争当世界共产主义导师。毛主义的核心乃是：在落后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武装包围城市，长期人民（恐怖）战争。毛之疯狂变态登峰造级他公然宣称“我们不怕打核大战，即使因此死掉二十七亿人口，消灭了资本主义也是值得的”。波尔布特自信是个超级天才，相信他将超越马、恩、列、斯、毛，成为 21 世纪革命的导师；他狂称“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只需要不超过 100 万优良的革命者，我们宁可杀掉 10 个朋友，也决不允许 1 个敌人生存！”；其自认的使命在于为整个星球引领进入新秩序的方法。他的姐夫，也是他最亲密的同仁沙利指责他是个自大狂：“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无与伦比的天才，在军事、经济事务；保健学，作曲，音乐，舞蹈，厨艺，时装，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谎的艺术等各方面。他认为在整个地球上他高明于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秘鲁共产党毛派头目哥斯曼则自封为马、列、斯、毛、哥斯曼！并公开宣称：“准备牺牲 100 万人的生命夺权”！阿富汗共产党则称“我们只需 100 万人来建设社会主义”！

共产党政权全部是由一小撮左派无知甚至的知识人，受马克思列宁似是而非的共产主义歪理邪说迷惑，初时怀抱改天换地的狂热激情，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不惜牺牲千百万工农兵及普通平民和广大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生命，践踏数千年积累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毁灭一切传统伦理道德宗教习惯，狂想创制共产主义新人，因而它们全部不将人当成人，而是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屠杀毁灭的垃圾及害虫；是故，凡是共产党必定杀人如麻，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而且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全部采用纯属黑社会流氓强盗的分赃模式竞争，故意毁弃人类文明社会公平竞争人人遵守公平游戏规则的最高价值，因此，它们必定首先杀戮一切反对派，然后杀尽党内异议或反对派，继而杀光或阉割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其它团体及任何人，共产党内最终胜出者，一定是最厚黑的黑心烂肝毫无人性之辈执掌大权；对其国家和人民实行超法西斯的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统治，以实现独裁全部国家政治权力，达到独占国家一切经济财富的最终目的。

二、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皆是罪恶魔鬼的化身

世界各国共产党政权皆是罪恶魔鬼的化身，它们之间唯有量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共产党是披着羊皮的狼，而狼决改不了其吃羊的本性。共产党政权皆犹如疯狗，而疯狗必然咬人，因为这同样是其本性。国际共运史的史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真理：所有的共产党都是极端自私自利，残暴无耻，虚伪至极，杀人如麻，抢劫成性，道德沦丧，毫无人性，充满兽性；纯属依靠暴力，欺骗，封锁信息和恐怖维持其一党极权专制流氓暴政的。正如斯大林承认的那样：“共产党党国体制能够生存，唯有对其人民，包括高级官员完全与世隔绝才有可能”。朝鲜与古巴及中国，越南和老挝共产党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严密封锁一切信息并用虚假信息误导欺骗公众。一旦广大人民不再受骗，拒绝谎言，只说真话，并勇于争权之日，即是共产党暴政彻底跨台之时！

必须指出：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三者并非同一回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或空想未偿不可；尽管当权共产党人基本上是贪官污吏，共产党人当然也有不少好人，但共产党员从法律上看皆难逃罪犯之嫌；然而全球曾经存在过的 90 个共产党没有一个是好的共产党，特别是当权的 40 余个共产党

政权无一例外全部是极权暴政，皆依赖暴力、谎言加恐怖实行专制统治。唯有一个智利共产党政权相对犯罪较轻，原因在于它是在自由选举，且保留独立司法和自由媒体的前提下。

共产党的罪恶是由“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消灭私有财产制，毁灭一切传统道德、宗教、习惯”等马列主义原教旨决定的。此外，共产党的罪孽是当权者由于人类的自私贪婪的天性（原罪），在不受任何有效力量制约的情况下的必然逻辑结果。正由于西方传统层出不穷的政治思想大家，对人性与政治经济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探讨争辩实践，远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其他文明先进，因而西方政治法律界早已找到解决人性，在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腐蚀下必然变质或恶性膨胀的有效方法与可操作性强的程序和制度：限制当权者的权力，将国王（当权者）锁进法治的牢笼内；政府权力的分权制衡理论，亦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制衡的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人的权力欲望，政治雄心及自私贪婪均得到有效制约与限制，从而真实有效地保障了每个公民最根本的权益。

三、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实质是依错误理论实施犯罪

共产党极权暴政的实质是依错误理论实施犯罪。国际共运史的历史实史充分证明：举凡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均与极权、血腥、暴力、秘密警察恐怖、欺骗、强制洗脑、独裁专制、人为大饥荒、宗教信仰迫害、经济落后，毁灭传统文化、社会动荡不安、国民普遍道德沦丧，精神人格分裂密切相关。从国际法上看，共产党犯下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从国内法上析，各国共产党则犯有杀人罪、抢劫罪、诈骗罪、贪污受贿罪、酷刑罪、信仰灭绝罪、宗教迫害罪及破坏自然环境资源罪。

就理论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共产主义理论归结为一句话即消灭财产私有制；人类社会的所有历史均是阶级斗争史；彻底摧毁一切传统道德、宗教和习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碎一切国家机器。列宁1902年在《怎么办？》中首创职业共产党；列宁公然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专政”。哈佛大学杰出的历史学家里查德教授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僵化的理论，一种伪科学转化成的一种伪宗教并植入一个没有灵活性的体制，历史业已充分证明，共产党政权无法摆脱错误概念，及依该错误理论建立的体制，最终唯有寿终正寝”。

就共产党犯罪实践而论，列宁是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残暴镇压，冷酷无情，秘密警察特务统治，欺诈谎言，集中营迫害，党国体制，不择手段的暴力恐怖等皆是列宁的发明。全世界当权共产党政权无一例外，全部是依靠暴力、谎言、恐怖对全民实行强制洗脑恐怖统治。暴力、谎言与恐怖是所有共产党政权一开始就有的，如果它变成不依暴力，不欺诈，不行国家恐怖主义了，那么它也就不成其共产党极权暴政了。问题在于凡是共产党暴政无一例外，皆以暴力骗子恐怖始，均以骗子暴力恐怖终。因此暴力欺骗恐怖是共产党暴政的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

强制取缔一切其他政党；与人民为敌消灭党内外一切政治竞争对手，镇压前政府党军政及文职人员，镇压工农兵反抗，阉割知识分子；消灭公民社会；强制取消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消灭神职人员摧毁宗教；毁灭传统道德习惯和文化；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及教会财产；秘密政治警察恐怖统治；暗无天日的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劳教营；无孔不入的强制洗脑欺骗。

四、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例是其自身政治改良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

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例是其自身政治改良成为自由宪政民主国，无论是东欧各国的天鹅绒革命，还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颜色革命，皆乃政治民主大革命。无论是欧洲的前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和东欧七国，还是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阿富汗；或是拉丁美洲的古巴、秘鲁、智利、尼加拉瓜；抑或非洲的索马里、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及莫桑比克概莫能外。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唯有共产党国家，发生过大饥荒，而其他自由宪政民主国家及所谓威权专制国家在 1900 年至 2000 年期间皆未有过大饥荒。特别严重的大饥荒发生在苏联、中国、朝鲜、柬埔寨、阿富汗、及非洲三个共产党国家，这决非偶然现象，而是共产党消灭财产私有制强制土地国有化的必然恶果。其次，所有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全部经过血腥残暴野蛮的恶斗，共产党全部不遵循公平竞争的价值观，不遵守人类文明政治规则，而奉行匪徒强盗黑社会流氓的厚黑竞争逻辑；第三，所有的共产党政权皆依赖秘密警察及线人无孔不入的严密监控进行极权特务统治；第四，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实质上皆非由于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自然进化的产物，而是由外因强制介入引进的产物；第五，所有共产党政权皆杀人如麻毫无人性充满兽性，同时道德高调唱得最动听，口头说的与内心想的背道而驰，几乎人人说假话，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不仁不义。结论乃是：共产党极权暴政党国体制不可能进行实质性改良，因为它是一种反人性、反自然、反人类的极度虚伪，野蛮残暴的极权暴政，因而必须彻底抛弃终结之。

全世界所有的共产暴政都经历了类似的暴力镇压同盟、残酷清洗党内竞争对手、迫害压制阉割知识分子、摧毁传统道德伦理宗教习惯文化、反复残暴血腥镇压工人和农民反抗、抢劫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私有财产、肉体消灭地主富农阶级、强制农业集体化（唯有南斯拉夫、波兰和古巴保留有私营农场）、取缔一切非共产党政治组组、消灭公民社会、利用秘密警察对全社会实行特务恐怖统治、利用强迫劳教集中营非法奴役及精神病院酷刑迫害所有敢于反抗的任何人士的一系列残暴下流无耻野蛮至极的极权罪孽。

五、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全世界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

具体言之，苏联布尔什维克是全世界共产党暴政的始作俑者。列宁的残暴，残忍，无法无天从他的众多命令、信件中暴露无遗；列宁并非出于人道主义或同情工农大众而投身革命，而是由于他的长兄亚历山大参与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沙皇，被当作恐怖分子处死，列宁的姐姐也因该阴谋而入狱；加之列宁本人因违纪被大学开除，因此列宁是因仇恨沙皇专制而投身革命的。在苏共夺权后几个月后列宁即亲自下令谋杀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包括年仅 15 岁的王子和三个美丽的公主及仆人。斯大林则是个残暴至极，毫无人性的家伙。他实质上是病态狂，自大狂和精神分裂症重症患者。列宁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实质上是一小撮共产党人打着工农兵旗号，实则以人民为敌的极权暴政；共产党迫害全社会所有的阶级，包括其标榜为其代表的工人阶级和同盟者的农民阶级；迫害其革命同盟无政府主义者，迫害共产党异议派孟什维克和社会主义革命党；迫害社会精英专家学者教授及各行业知识分子；迫害宗教神职人员；共产党始终依赖秘密警察特务恐怖统治，采用全面普遍迫害欺诈等手段，对全民实行恐怖统治；强制集体化，

故意饿死数百万人，滥制恶法，践踏法律正义，随心所欲反复清洗消灭数千万真实或想象的敌人。一部苏联共产党史就是一部暴力恐怖谎言杀人史（2000 万），世界各共产党国家的所有罪恶几乎皆能从苏共暴政中找到原创。

共产党毁掉了原来已迈上自由宪政民主政体坦途的阿富汗的光明前程，对阿富汗人民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迄今阿富汗人民还在蒙受源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伊斯兰极端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危害。恐怖、暴力、欺骗、秘密警察、群体屠杀、酷刑、共产党内黑社会流氓竞争相互残杀、打压宗教信仰、毁灭文化遗产、死亡（150 万）、伤残、人类历史上最大难民群体（700 万），这一切就是共产党带给阿富汗人民的礼物！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犯下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及群体灭绝罪，其残暴恐怖程度实际上业已超过纳粹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罪犯。

柬埔寨共产党除了在与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诺政权内战期间杀害了至少 60 万军民之外，在其夺取政权后的三年时间内，以马列原教旨为指南，受中共专家指导，凭借超极极权独裁体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儿童军人，通过体制性屠杀前政府官员、军人，恐怖暗杀反复清洗党内外一切潜在或假想的竞争对手，以谋杀性质的反复强制迁徙，群体虐杀城市平民，灭绝少数民族，利用地狱般的监狱和集中营的残酷虐杀和谋杀性的饥荒及体制性的强劳，屠杀和害死至少 200 万平民（包括妇孺老弱病残及 20 余万华裔；迄今中共政权从未谴责柬共屠杀华裔的罪孽，反而极力阻止对柬共的国际审判）；系统毁灭宗教，疯狂屠杀信众；摧毁一切传统文化，颠倒一切人类文明价值观；废除金钱，清空城市，消灭市场，消灭阶级，毁灭学校文化知识，迫害知识分子和一切专业人士，强制农业集体化，妄想大跃进，导致大饥荒饿死近 70 万人；柬埔寨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全部目的在于飞速实现共产主义，波尔布特自认为是个超级天才，狂妄地想成为超越马恩列斯毛的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导师。共产党政权实质上皆是极权暴政，而红色高棉是其中最野蛮、疯狂、残暴、无知、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个。

波兰共产党暴政是依靠苏联红军的暴力夺取政权，依赖恐怖暴力镇压维持权力，未取得人民的真实同意，因此始终不合法；本质上则是依赖秘密警察特务恐怖暴力谎言欺骗术一党专制独裁治国，波共夺权伊始即建立起数十万人的秘密政治警察系统，对各行各业的全体波兰人进行无孔不入的普遍恐怖迫害。全国成人 1/3 共计 560 万人被国安部秘密政治警察列入黑名单进行严密监控；自 1980 年始，波共改用渗透及建立假反对派组织的方式企图操控误导反对派。特务头子库溶（Jacek Kuron）建议“不用去摧毁这些组织，组织你自己的。”雇用大量线人打入团结工会。全世界共产党政权第一个崩溃的是波共政权。表面上似乎波共解体有其主观意愿妥协让步的一面，实质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长期坚持不懈的反共抗暴斗争的结果。波共之所以被迫妥协让步放弃权力，根本原因在于波兰工人阶级不怕牺牲，英勇顽强争权的斗争，特别是异议知识分子及天主教会皆积极参与团结工会活动使之实力强大；苏共总书记哥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开放政策，并不再干涉波兰内政则是波兰政治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波兰军方统帅由于天良未泯，出于人道主义，拒绝波共高层多数要求派军队镇压的指令，是极重要的原因；再者，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明智理性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此外，波共自 1953 年斯大林死后，对民众的镇压呈渐渐弱化的趋势，从普遍恐怖，至普遍迫害，到普通迫害，降至选择性迫害，再到有限迫害，进而被迫谈判妥协让步放弃独裁专制权力；且对政治反对派的屠杀及所判刑期远比中共对同性质的反抗者的大规模屠杀及所判重刑为轻，表明波共实质

上相对较中共及亚洲共产党暴政不那么野蛮残暴；而且波共仅对波兰人民实施过一次公然抢劫：即抢劫富农财产。而中共则对中国人民持续进行了三次公然大抢劫：亦即抢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财产变成所谓国有资产（实为党有）、抢劫国有资产变成中共官僚特权阶级的私人财产、破坏污染中国生态环境抢劫中国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波兰人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神论，特别是被中共强制洗脑变成的唯物无神论者，其中不乏极度无知且狂妄之徒。

中国共产党暴政毫无疑问是所有共产党暴政中最野蛮残暴下流无耻罪孽最深重的一个，也是迄今仍苟延残喘的五个共党政权的邪恶轴心（害死国人8000万）。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由于语言障碍，国情生疏及间接了解，不可避免会遗漏许多重大事件及其细节。《共产主义黑皮书》的作者们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罪行均有较深入的揭露，作者在《中国：通往黑暗的长征》文中对中共罪恶有所披露，南郭却认为作者似乎对中共所犯罪孽了解远远不够，中共极权暴政是全球仍逍遥法外、肆无忌惮欺压盘剥亿万中国人的邪恶轴心。国人迄今还在容忍这个流氓暴政原因众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迄今众多国人实际上仍然对中国暴政的深重罪孽，几乎无知或所知甚至微。中共暴政之所以能苟延残喘，残民以逞，甚至耀武扬威：除了广大民众对中共暴政的流氓本质认识不清，对共产暴政的罪孽真相相当无知，因而尚未真正觉悟觉醒之外；中国学人中还有不少无耻至极、极度自私自利的拍极权流氓暴政马屁，以期分脏暴政榨取民膏民脂的“流氓教授”的出卖灵魂之辈克意误导欺骗公众不无有关，也与部分民运及自由知识分子精英对共产党罪恶本质的实际上严重无知，以致迄今仍时刻不忘跪求流氓暴政自动政治改良的严重误导有关！甚至众多知识精英认为中共政权已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退化成为所谓“威权”。共产党暴政是绝对不可改良的邪恶政权，这是早已被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历史反复证明为真理的常识！而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肯定是有所有共党政权中最邪恶，最下流无耻，最野蛮残暴，最缺道德，最无人性的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流氓暴政！

近年来我曾在大量研究中外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共是个犯罪组织，论证了中共政是个极权专制流氓吸血鬼帮骗子暴政，论证了推翻中共极权暴政的合法性。（参见：论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合法性；中共政权始终是一个非法政权；论中共政权是个超级暴政；论中共政权是个极权暴政；胡锦涛不是在执政而是在犯罪）核心问题在于中共政权是否暴政？是否极权暴政？是否流氓暴政？是否骗子暴政？是否吸血鬼暴政？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共作为极权暴政的实施者肯定是个反人类的犯罪组织，因而取缔该流氓犯罪组织顺理成章。正如纳粹法西斯组织被认定为犯罪组织一样，中共决无任何可能例外，因为中共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远比纳粹法西斯严重得多。

有人认为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准有了巨大提高因而具有了合法性。姑且不论中共经济成就是虚假与欺骗性，也不论中共之所谓经济成就是建立在杀鸡取卵毁灭污染中国生态环境（实质系公然对中国人民实施第三次大抢劫）断子绝孙的犯罪政策基础上，经济成就并非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因为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根据乃是“主权在民”，在于全体公民的同意授权并体现在定期自由选举。事实上，纳粹统治德国期间，曾创造经济年增长率数年高达百分之百，德国全国零失业率的前无古人的经济奇迹，但并不能因为希特勒对德国经济做了此等好事，便认为希特勒是好人，纳粹党是合法组织或纳粹政权是

合法政权。

六、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相似性

一些研究者对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者从两者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寻找异同，寻求两种政权的联系，以及为何两者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的问题。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被争论过。[1]在 20 世纪，在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比中聚焦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人性的话题。这两种制度被认为与西方自由主义水火不容，重在强调纳粹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两者间的差异被缩小。[2]汉娜·阿伦特、卡尔·弗里德里希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对这一“极权主义”解读的著名拥护者。[3]极权主义模式在 1970 年代被从现代化方面理解苏联的政治学家挑战，[4]还有功能主义学派历史学者马丁·布罗萨特（英语：Martin Broszat）和汉斯·莫姆森（英语：Hans Mommsen），二者提出纳粹体制太混乱而不被认为是极权主义。[5][6]被冷战期间政治学者的理论基础主导的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比较，现在接近于实证研究的基础，由于大量可以获得的信息。然而这仍然是被学术研究忽略的领域。[7]

虽然纳粹党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共产主义，阿道夫·希特勒及其他纳粹领袖频繁表现出只有苏俄是他们所能找到的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同路者的认同。[9]阿道夫·希特勒仰慕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10]许多场合希特勒公开赞扬斯大林，而且他明确评述斯大林寻求清除苏联共产党中的犹太人影响，尤其是清洗列夫·托洛茨基、格里高利·季诺维耶夫、列夫·加米涅夫、卡尔·拉狄克之类的犹太共产党员。[11]

在生命政治学方面，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彼此强调乌托邦式生命政治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生殖方面。[12]这一强调，并不是唯一的，在当时许多欧洲国家尝试优生学的情况下，而且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的理想截然不同。[12]关键的相似之处在于生育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目标的联系。[13]然而两种制度之间的观点上有重大差异。斯大林的苏联从不官方支持像纳粹那样做的优生学——苏联政府称优生学为“法西斯科学”——即使尽管事实上苏联有优生学家。同样两种制度对家庭与有偿劳动之间的关系有不同观点——纳粹主义提倡一个男性持家的家庭，而斯大林主义提倡两个工薪阶层的家庭。[14]

纳粹德国、苏联和法西斯意大利都高度集中于低出生率。[15]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生育政策通过他们的医疗体系主管——两种制度都视医疗为发展他们设计的新社会的支柱。[16]当时苏联从头设计公共医疗体系，纳粹德国基于德国从 1883 年起由奥托·冯·俾斯麦的法案发展起来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公共医疗程序的已有的公共医疗体系。[16]纳粹注重德国的医疗体系以推行纳粹在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上的组成部分，并且把已有的志愿的和政府公益机关替换成新的迎合种族卫生及其他纳粹意识形态的成分的机关。[17]

共产党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于 1920 年随着俄罗斯优生学院的建立而接受优生学，次年建立苏联科学院优生局。[18]

在政治暴力和暴力社会方面，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在运用大规模暴力。[19]斯大林苏联与纳粹德国都运用国家机关领导集中营——苏联的 NKVD 和纳粹党卫军。[19]两种体制都以排外思想为基础实行暴力反对少数族群——纳粹的排外暴力明目张胆但解释成反对“不合群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的排外暴力掩饰成反对“危害社会的”元素——那就是针对散居的民族术语。[20]

斯大林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是暴力社会，那里大规模暴力都受国家认可，如 1937 至 1938 年苏联大清洗和纳粹德国及其二战期间占领区的大屠杀。[21] 斯大林苏联建立了包含有犯罪前科者、罪犯、无业流民、剥夺选举权者及“反阶级成分”在内的“危害社会的”或者“社会危险”者被驱逐进去的“特别定居点”。[22] “特别定居点”大量设置在西伯利亚、北极、乌拉尔山区或其他不宜居住的地区。[23] 1933 年 7 月，苏联以他们的种族划分为基础有效地大规模逮捕了 5000 名罗姆人，他们在那一月被驱逐到西西伯利亚的“特别定居点”。[23] 1935 年，苏联逮捕了 160,000 无家可归的人和少年犯并把大多数送到 NKVD 劳改营实施强制劳动。[24]

与纳粹主义相似，斯大林主义事实上从 1930 年代到 1950 年代在苏联实行种族驱逐，有总共 3 百万苏联公民被处以基于种族的重新安置。[25] 第一次大的种族驱逐发生于 1932 年 12 月至 1933 年 1 月，其间 60,000 名库班哥萨克受整个集体的刑事指控为对抗社会主义与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同流合污。[26] 从 1935 年到 1936 年，苏联驱逐了居住在乌克兰西部的波兰裔和德裔苏联公民，以及苏芬边界上的芬兰裔苏联公民。[26] 1935 年到 1936 年的这些驱逐影响了上万户家庭。[26] 从 1937 年 9 月到 10 月，苏联当局从远东地区把朝鲜人驱逐到日占朝鲜。[26] 苏联当局宣称这一地区是“日本人耕种的肥沃土壤”——意味着苏联怀疑朝鲜人可能暗中和日军联手统一日占朝鲜。[26] 超过 170,000 名朝鲜人从 1937 年 9 月到 10 月被驱逐到苏联中亚部分的偏远地区。这些基于种族的驱逐反应了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基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怀疑这些人对外国资本主义影响敏感，以及基于复兴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苏联排外主义”新趋势。[26]

1941 年纳粹德国向苏联宣战后，苏联发起了另一个大规模的种族驱逐。第一个以苏联德意志人为目标，1941 年 9 月至 1942 年 2 月间，900,000 人——超过已有苏联德意志人社群的 70%——在大规模行动中被驱逐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27] 第二波大规模的种族驱逐发生在 1943 年 11 月至 1944 年 5 月间，其中苏联当局驱逐六个族群（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印古什人、卡拉柴人和卡尔梅克人）计有 900,000 人。[28] 二战间及之后还有小规模涉及种族清洗和散居民族的行动，其中数万名克里米亚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伊朗人、肯什人、库尔德人和美斯可黑田突厥人从黑海和外高加索边境地区被驱逐。[28]

两个少数民族受到斯大林的苏联特别针对性的迫害，就是车臣人和印古什人。[28] 不像其他会被怀疑拥有外国国籍而与之相联系的民族，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完全是苏联本土民族。[28] 相反，苏联宣称这些人的文化不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相适应——像是因与“土匪主义”的联系而逮捕车臣人——并且宣称苏联必须介入以“再造”和“改革”他们的文化。[28] 事实上这意味着实行全副武装的惩罚性行动反对车臣“土匪”未能实现其强迫同化，导致苏联当局 1944 年做出大规模种族清洗行动从高加索逮捕超过 500,000 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以“解除”车臣-印古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占人口 30%）。[29] 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驱逐也造成上千人的彻底的大屠杀，以及针对被驱逐者的恶劣条件——他们被送进拆封的火车厢里，在乎没有任何食物的四周的行程里许多人因为饥饿和虚脱而死。[30]

在集中营的建立上，恩斯特·诺尔特、安德烈亚斯·黑尔格鲁伯（英语：Andreas Hillgruber）及其他历史学家于 1980 年代的作品对比了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的政策，并且指出苏联和纳粹德国集中营体系的共同之处。[32]

玛加蕾特·布贝-诺伊曼在她从共产（1937-1940）和纳粹（1940-1945）集中

营的回忆录中发现两者统治的方法非常相似。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被释放之后她总结了以下观察：[33]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的这些罪状之间，依我之见，只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当然，共产主义作为思想一开始就是正面的，而且国家社会主义不再是正面的；的确，从它的起源及其开始后，犯罪就在其目的和程序之中。我不知道是否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已经包含了基本错误，或者仅仅是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实践背叛了原始的思想并在苏联建立起一种法西斯主义。[34]

在创造“新人”上，斯大林主义与纳粹主义都共用一种创造“新人”的意识形态的观点，都把“资产阶级”的世界定义为落伍的旧世界，而且都完全拒绝自由主义，以及个人权利和自由，在此他们追寻创建新的、思想偏狭的现代社会。[35][36]对新人的这一观点在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斯大林主义想像新人必然涉及全人类的解放——一个全球的和无民族性的目标，而纳粹想像新人是能在欧洲组织新的种族结构的优等民族。[35]两种体系都大量运用政治宣传，还有斯大林重塑新“苏联人”的尝试。[37]

在两者都奉行的军国主义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展现出军国主义。[38]都把重点放在创立“党军”，就此而言苏联的政治委员与1943年引入的“国家社会主义指导员”相当。[9]

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后纳粹德国把布列斯特控制权移交给苏联，期间在斯大林像面前交谈的德苏两国士兵。

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驱逐之间的主要不同在于：纳粹德国清洗种族以使德国人迁入被清洗的区域，斯大林的苏联推行种族清洗为了从战略上重要的地区清除少数民族。[31]

共产政权全部是极权政权，但并非所有的共产政权都是流氓暴政。它们性质虽然相同，但有程度轻重区别。东欧各前共产国家，波兰和匈牙利的压迫暴虐程度最轻，罗马尼亚最重，阿尔巴尼亚最封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居中。但一个共同点即是：所有的共产党无一例外全部要么改名为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要么自动解散。所有的东欧共产国家都曾都是共产党专政，秘密警察恐怖统治，党控军队，党控传媒，党控司法亦即全部是极权政权。举凡极权政权，没有一个可以永世长存；凡是极权流氓暴政，注定归缩乃是历史的垃圾堆。中共极权流氓暴政必定彻底灭亡，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结论。中共暴政随时面临灭亡，只是压垮中共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是以和平过渡方式还是政治民主革命方式？是短期内还是仍需要一段时间？共党内良知改革派主动为之还是被全体国人消灭？吾以为，中国不可能有保加利亚式的“温柔革命”或捷克那样的“天鹅绒革命”或爱莎尼亚的“歌唱式革命”或波兰和匈牙利的自制改革过渡式革命。根源在于中共暴政本质上是个犯罪组织，是个极权、流氓、专制暴政，是全世界所有共产极权国家中最下流、最无耻、最残暴，犯罪最严重的流氓暴政，因而绝对无可救药！但是中共暴政决不会轻易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我认为中共极权暴政必定彻底灭亡，其下场极可能与罗巴尼亚齐奥赛斯库暴政类似。

[1] 2010年全球支持中國和亞洲民主化斯特拉斯堡大會专稿

Geyer (2009). p. 18.

Geyer (2009). p. 16.

Geyer, p. 4-9

Geyer (2009). p. 7.

Geyer (2009). p. 5.

Lorenz, Chris "Broszat, Martin" pages 143-144

Giangreco, D.M and Griffin, Robert E. (1988) *Airbridge to Berlin --- The Berlin Crisis of 1948*

Payne (1983). p. 103.

François Furet.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SA; London, England, UK: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0-226-27340-7. Pp. 191-192.

François Furet. *Passing of an Illusion: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Illinois, USA; London, England, UK: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Geyer (2009). p. 87.

Geyer (2009). p. 88.

Geyer (2009). p. 90.

Geyer (2009). pp. 83-97.

Geyer (2009). p. 98.

Geyer (2009). pp. 98-99.

Geyer (2009). p. 102.

Geyer (2009). p. 133.

Geyer (2009). p. 135.

Geyer (2009). Pp. 135, 139-151.

Geyer (2009). Pp. 139-140.

Geyer (2009). p. 140.

Geyer (2009). p. 141.

Geyer (2009). pp. 157-158.

Geyer (2009). p. 158.

Geyer (2009). pp. 158-159.

Geyer (2009). p. 159.

Geyer (2009). pp. 159-160.

Geyer (2009). p. 160.

Geyer (2009). p. 161.

Thomas F. Banchoff. *The German problem transformed: institution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1945-1995*.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1999. p.118

Margarete Buber-Neumann. *Under Two Dictators. Prisoner of Stalin and Hitler*. 2008. ISBN 978-1-84595-102-3.

